

毛澤東全傳

2

新訂本

MAO ZE DONG QUAN ZHUAN

万

里

长

征

辛子陵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全传》的重大特点，除了对毛一生的完整描述外，尚在于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作者在本书中引用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中共秘密档案，其丰富、可靠程度是海内外其它著述所难以企及的。对于中共党史、毛泽东生平里的疑案，据此便可作澄清与解答。

ISBN 7-80099-693-X



9 787800 996931 >

辛子陵著

万里长征



利文出版

图书在编(CIP)数据

毛泽东全传 卷二:万里长征/辛子陵主编. - 呼和浩特:忠天文化出版社,2003.11

ISBN 962-7766-11-9

中国牌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48475 号



毛泽东全传

忠天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2003年11月第1版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962-7766-11-9

定价 128元(全集)



毛澤東與康生



毛澤東與林彪



周恩來與新四軍領導人葉挺(右)、項英(左)。

迎出的門緊鎖着，
 二狗爬走的烟被關着，
 一個聲音高叫着：爬出來呵，塔爾台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到人的軀
 體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衝騰把這活棺材和我
 一起燒掉，我友誼在烈火和鮮血中
 得到永生。

六面碰壁居士 卅一十二月一



皖南事變后，葉挺被囚。他在獄中寫下《囚歌》明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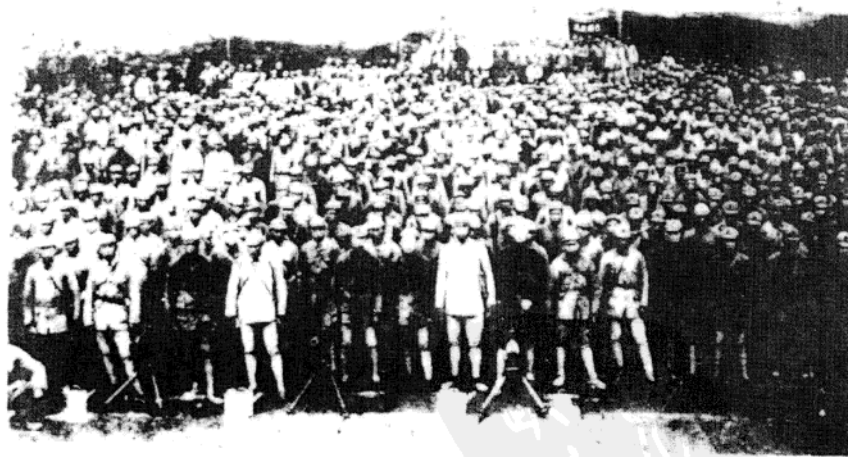


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因無法在上海立足，於1933年1月遷入瑞金葉坪。

為推行左傾政治路線、中共中央負責人博古親自發動反羅明路線鬥爭，迫害羅明、鄧小平、毛澤東、謝維俊、古柏等人，其實質是要打擊毛澤東。這是當時的有關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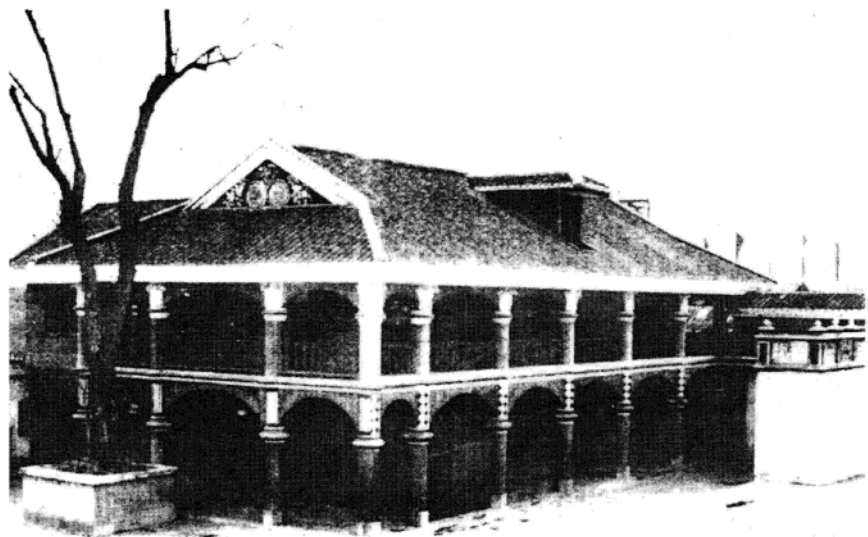
萬里長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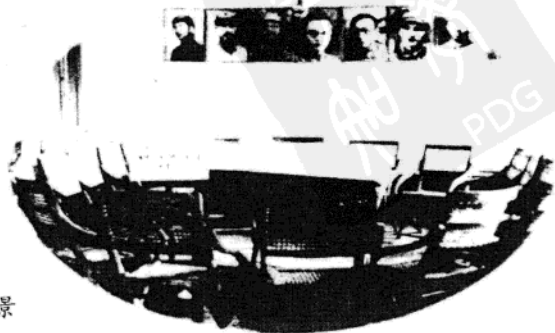
長征前的紅軍

中華書局
PDG

萬里長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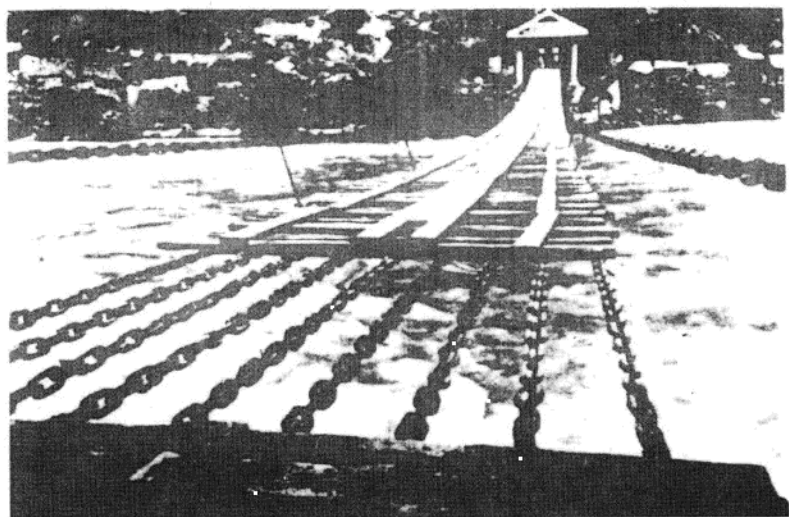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毛澤東東山再起，并確立了自己在中共黨內的領袖地位。



遵義會議室內景

萬里長征



大渡橋橫鐵索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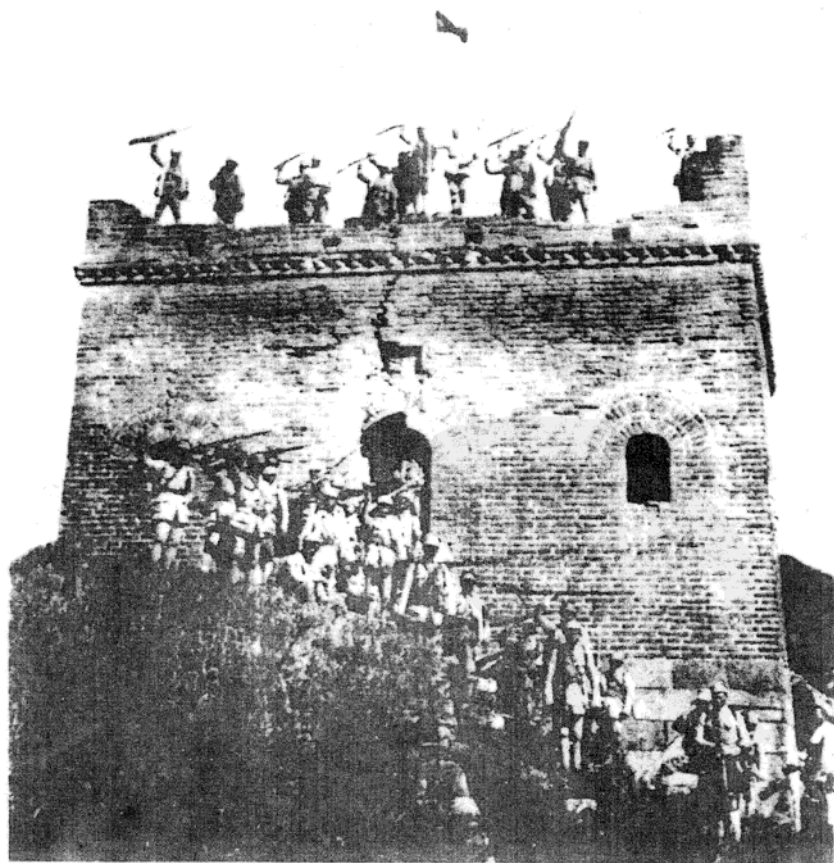
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達維鎮的會師處



1942年，毛澤東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并發表講話，開展中共在文藝界的整風。

萬里長征

彭德懷在最前綫
視察敵情



百團大戰，八路軍在長城烽火臺歡呼勝利。

卷二目录

- 31 功过颠倒 毛泽东三胜遭贬
斯毛并论 秦邦宪七窍生烟..... 11
- 32 门庭冷落 贺子珍心情凄楚
众星捧月 布劳恩神采飞扬..... 20
- 33 雨后送伞 兵败城破救兵到
犯颜直谏 崽卖爷田心不疼..... 38
- 34 昏迷三日 毛泽东醒来献计
网开一面 陈济棠暗助红军..... 54
- 35 前堵侧截 红军无人湘之路
心劳力拙 博古有自杀之心..... 74
- 36 遵义会议 毛泽东东山再起
乌江战败 吴奇伟过河拆桥..... 91
- 37 假道伐虢 剪除军阀王家烈
舍己救人 巾幗英雄贺子珍..... 110
- 38 保存实力 众诸侯勾心门角
斩关夺隘 参谋长人杰地灵..... 127
- 39 两军会合 梦笔山下会战友
一心篡党 政治局里起波澜..... 149
- 40 机智深沉 叶剑英忠心护党
鲁莽灭裂 张国焘自立为王..... 168
- 41 榜罗黎明 毛泽东当众赋诗
峨眉梦残 蒋介石对天长叹..... 188
- 42 陕北疾呼 有亡国灭种之祸

	南京软语	无百年不解之仇	209
43	一尊初定	大度能容反对派	
	三军会师	众心悦服毛泽东	228
44	改弦更张	蒋氏屈从兵谏	
	化敌为友	周公力挽狂澜	251
45	打通国际	徐向前勇担艰巨	
	鏖战临高	西路军血染河西	268
46	统一指挥	蒋介石口蜜腹剑	
	独立自主	毛泽东远虑深谋	284
47	国际钦差	陈绍禹踌躇满志	
	中共叛徒	张国焘掏尾乞怜	299
48	糟糠下堂	子珍含悲异域	
	红袖添香	江青直上青云	313
49	六中全会	绍禹争雄初败阵	
	二期抗战	泽东宏论率群伦	327
50	秘密反共	蒋介石隐身重庆	
	公开降日	汪精卫开府南京	341
51	百团大战	彭德怀功高遭谤	
	独断乾纲	毛泽东初露锋芒	356
52	上官得手	南面堵截北面驱赶	
	项英失策	一误茂林再误星潭	372
53	观局布子	毛泽东纵横有道	
	妄自尊大	蒋介石进退失着	389
54	不忘农民	指导根据地建设	
	志在中华	设计共和国蓝图	403
55	统一思想	确立领袖地位	
	整风运动	分清路线是非	417

56	天良未灭	胡宗南中途罢手	
	文章传世	陈伯边脱颖而出	432
57	白日西驰	陈毅规劝李明扬	
	曲线救国	文强指导孙殿英	447
58	总结历史	正确路线两代表	
	团结全党	毛刘体制二十年	460
59	两党相争	赫尔利来华作说客	
	三强协定	斯大林贪利背友朋	478
60	夺城占地	蒋介石十指摊开	
	大略雄才	毛泽东双拳收紧	493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毛泽东全传 卷二：万里长征

作者=辛子陵主编

页数=505

SS号=12798257

出版日期=2003.11

出版社=中天文化出版社

原书定价=128.00

参考文献格式=辛子陵主编.毛泽东全传 卷2 万里长征.中天文化出版社,2003.11.

31 功过颠倒 毛泽东三胜遭贬

斯毛并论 秦邦宪七窍生烟

毛泽东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后,立即和总司令朱德一起部署指挥乐安、宜黄战役。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朱毛签发红一方面军攻击乐安的训令,训令指出,乐安守敌为孙连仲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的两个团,城周围筑有工事,由林彪任攻城总指挥,统一指挥攻城作战行动;红五军团在城南作预备队,红三军团在东北警戒宜黄、崇仁之敌。十六日,红一军团以第三军袭击乐安未奏效。十七日由第四军为主进行强攻。战斗凌晨打响,乐安城被红一军团四面包围,攻城部队搭上云梯,前仆后继,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首先突入城中,打开城门,大队由此涌进,到中午就结束战斗。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共三千余人,从旅长以下全部当了俘虏。攻乐安当天,敌机前来袭扰,被红军击落一架。红军打下飞机来这是第一次。林彪和聂荣臻在飞机前合影留念。八月十八日,朱毛发布进攻宜黄的训令。宜黄守军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

的第七十九、第八十一旅(四个团欠一个营),以主力守城,一部据守城外峨嵋山、北华山工事。这次由彭德怀任攻城总指挥,红三军团主攻宜黄东南门,红一军团一部助攻宜黄北门。二十日拂晓,红三军团首先对城南峨嵋山、北华山等敌人据点发起攻击,白天下雨,战斗成胶着状态,当夜天气转晴,月光如昼,红三军团从东南门突破,担任助攻的红三军也从北门攻入。守军大都被歼,残部向北逃窜,红一军团一部实施追击,于二十二日将逃敌的大部歼灭于抚州以南的龙骨渡。宜黄战斗共歼敌三个多团,俘敌二千余人。

八月二十三日,红十二军攻占南丰。

八月底,红一方面军撤至宁都县东韶、洛口一带休整。

九月二十六日,朱德、毛泽东发布《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提出对第四次反‘围剿’要做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与消灭敌人的条件,令部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做一个时期争取群众、发展苏区的工作,并加强自身的教育训练。

为了这一工作部署,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苏区中央局(实即在瑞金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任为代理书记)九月二十九日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口气十分强硬:‘九月[政]治(二十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三十日,苏区中央局又致周恩来一电,强调对一切离开原则分散赤化扩大苏区的观点要‘给以无情的打击。’

苏区中央局正式成员共有八人：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瑞金留守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周恩来是书记，去了前方，任弼时是副书记，代理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照常理而论，四票对四票，书记倾向于哪一面，哪一面的意见将占上风。反常的是后方四个人的意见可以否决前方四个人的意见，并以上级的口吻命令前方，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后方四人有上海中央的支持，他们也以中央正确路线的执行者和监督者自居。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十月三日——八日，在宁都城北东山坝乡小源村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这便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因涉及到许多高级领导人与毛泽东的关系，在毛和这些领导人在世的时候，是个讳莫如深的问题。现今大陆的权威著作《周恩来年谱》说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但却为周恩来生前的一次讲话所否定。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一十二日《周总理关于我党十次路线斗争的报告》中说：

我在宁都会议上夺了毛主席的权，成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为以后临时中央指挥红军开辟了道路。虽然，任弼时他们搞的，我是书记在前方未参加会议，任弼时代理书记。一九三二年剥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我为红军总政委。主席临走时我到主席那里，主席说：‘前方如有急需，可来电报，我仍可以回来。’

周恩来讲这番话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三位宁都会议的参加者还健在，况且周是个勇于自我批评、承担责任，从不文过饰非

的人,记忆力又超人的准确,是否主持了宁都会议这样的大关节,他不会随便讲,更不会记错的。至于‘夺权’说,要回到一九七二年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去理解。宁都会议时周的地位在毛以上;他极不情愿代替毛出任红军总政委,是中央局多数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上。

会议后期,周恩来从前方回到宁都,宁都会议的结论是由他作的;并参与了对毛泽东的组织处理。这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了记载。

会议前期,是任弼时主持会议并引导了会议的方向,这样判断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参加会议的中央局委员还有项英、邓发、顾作霖、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黄少群副教授《论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一文,是大陆研究宁都会议的最新成果。黄文驳了港台学者司马长风、严静文、王健民等说宁都会议是中央局扩大会议,彭德怀、刘伯承、陈毅都曾与会,一致批判了毛泽东的说法。黄文正确之处是:第一,宁都会议是中央局全体会议,不是扩大会议;第二,彭德怀、陈毅未曾与会。彭德怀的狱中自述说,打南丰时(按:一九三三年二月)‘我强攻两天未克,伤亡约千人,三师师长彭鳌阵亡。这时,方面军领导来了,有朱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原任中央局书记,当时似乎不再兼了)、刘伯承总参谋长,唯不见毛主席。我问刘:毛主席未来?刘答:政府事忙。’尽管任免毛泽东红军总政委都是用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的名义下达命令的,副署人之一的彭德怀并不知毛被免职的内情,足证彭未参加宁都会议。

至于陈毅,他自己讲过,反对毛泽东,只有红四军‘七大’‘一箭之仇’。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所操纵的专案组可以说是拿放大镜找寻彭、陈两帅的反毛罪行,但都没有提到过他们参加宁都会议。彭、陈未曾与会,可成定论。

问题是刘伯承是否参加了宁都会议? 笔者考证的结果是,除了苏区中央局委员之外,红军学校校长刘伯承参加了会议。这可能是任弼时等觉得后方中央局四位委员与前方中央局四位委员关于军事行动的方针尖锐对立,四票对四票,不好决定问题,而刘伯承是党内知名的军事家,指挥过大的战役,又从苏联学习归国不久,对国际路线必能坚决拥护和执行。请刘参加会议可能是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了增加贯彻国际路线的份量而特邀的。总之,刘伯承不是中央局委员,但却参加了宁都会议,这是确鉴无疑的。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刘伯承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说:‘我在党内近二十年了,犯了一次严重的错误,就是宁都会议(四次“围剿”前中央召集的)。由于我政治上落后,单纯军事观点,从战术上看问题,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起了支持作用,结果使毛主席离开了领导。’这件事情使毛泽东一辈子对刘伯承心存芥蒂,是一九五八年发动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打击刘伯承的历史前因。

宁都会议是路线之争,不是权力之争。反对毛泽东的任弼时、项英等人,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都是一心为了胜利,他们的可悲之处在于:当时他们真心认为上海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国际的指示是正确的,他们是为贯彻这条路线进行‘原则’斗争。撤销毛泽

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是组织对个人、上级对下级的一种处理,判断的尺度是正确与否,谈不到是‘夺权’。

据任弼时等起草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记载:‘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这是个总纲,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

(一)向赣东发展与向赣北发展的争论。

三次反‘围剿’一胜利以后,朱德、毛泽东率红军主力在以长汀为中心的赣南闽西地区开辟工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三令五申要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沿赣水流域向北发展,夺取南昌、抚州、吉安、赣州等中心城市。苏区中央局坚决贯彻中央这一指示,执行中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发现中央的指示与实际情况有不相符合、难以行通之处,周恩来曾致电中央,请求便宜行事,中央严厉驳回。从此周恩来、朱德就想方设法执行中央指示,既要多打胜仗,使红军少受损失,又要符合中央精神。毛泽东独持批评态度,认为南昌是指挥反共战争的大本营,向北发展,向南昌方向发展,甚至要攻打南昌,是没有前途的,是要碰钉子的;他主张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赣东南发展。结果呢,按中央的指示攻打赣州,碰了大钉子,损失了红军一个师。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和朱德,率部向东向南,打下了漳州,歼灭了敌人一个师,筹款一百多万银元,随后在南雄水口战役宜黄乐安战役又打了胜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当时是教条主义统治人们思想的时候

期,实践没有权威,只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王明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共发号施令,只有以他的 是为是,以他的非为非。苏区中央局的任、项、顾、邓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们认为为:毛泽东‘进占漳州虽然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迟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是个错误;‘在南雄宜乐之间分兵赤化的计划也是错误的’,认为消灭土围子,巩固根据地,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二)所谓‘不尊重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毛泽东曾批评中共临时中央命令打赣州是错误的。后方中央局同志认为,这是组织观念有问题,是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并为打赣州文过饰非说:‘攻赣本有克城可能,惟因对敌必坚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遂未坚决布置,解决增援敌人,在轻敌之下,造成增援之敌已入城而不能攻,以及爆炸技术有缺点,致未能克城而撤回。’

宁都会议前期,因周恩来未参加,后方中央局与前方中央局变成了四比三,再加上刘伯承的发言,变成了五比三,‘左’倾意见占了压倒优势。在研究封毛泽东的组织处理时,周恩来 回到了宁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是这样记载的:‘留在后方中央局同志对于 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认为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提出由恩来同志 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因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在前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

针责任。在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 了 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朱德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主张让毛泽东留在前方共同策划军事。难得的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王稼祥公然站出来为毛泽东辩护,他说:‘大敌当前,不可换将!’但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未能说服多数,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即回后方去了。

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十月中旬,任命刘伯承为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

后方中央局的几位成员为了贯彻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又向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告了周恩来。会议结束后的十一月十二日,任、顾、邓、项联合给中央发电报,说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指责周恩来的会议结论‘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了的斗争战线。’周恩来也于同日致电中央申述个人意见:‘我承认在会议中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临时中央收到这两份电报后,复电苏区中央局,指出:‘中央局会议所取路线与一般方针是正确的,’‘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帮助泽东迅速彻底的改正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恩来同志在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为击破敌之“围剿”,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削去毛泽

东的军队指挥权,是王明、博古的主要目的。这个目的既已达到,他们则倡导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了。他们对周恩来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是因为在资望和能力上除了周,没有人能代替毛泽东。

且说毛泽东开完宁都会议,回到在宁都的临时寓所,坐在椅子上,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半天不说一句话。贺子珍身孕已经很沉了。正躺在床上休息,见此情景,费劲地坐起来问毛泽东:‘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说我右倾保守,把我的军内职务撤了,不让我管军队了’

贺子珍一听就急了,忙问:‘那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能讲什么,他们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我只能说,前方什么时候需要我,我会回来的。’

毛泽东见贺子珍满脸怒容,眼眶里含着泪水,怕把她急坏了,安慰说:‘我的事你不用管了,我自然会处理,你自己保重要紧。我已经同傅连⑧说好,你到他那里去生孩子,明天就动身吧,中央也让我休养,说不定过些天,我也到长汀去了。’

傅连⑧是长汀福音医院院长。这家医院原是英国教会开办的慈善事业。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军经过这里时,傅连⑧和他的医院就开始为革命服务了。医院座落辛耕别墅,花木茂盛,环境清幽。

贺子珍在这里生了一个男孩。傅连⑧受毛泽东之托,亲自给接生,母子平安。但产后没几天,贺子珍吃了不干净的香菜,得了中毒性痢疾,老跑厕所,可又解不出什么来,产后贫血加上拉痢,贺

子珍瘦得剩把骨头。傅连⑧把自己的姐姐找来、专门照顾贺子珍。

就在贺子珍产后的第十四天，毛泽东也从宁都来到长汀医院，他住在老古井的一座楼上，这是福音医院的高干病房。

毛泽东见贺子珍瘦得厉害，安慰了一阵。贺子珍心里一阵酸楚，悲不自胜。

‘儿子呢？我们的儿子呢？’毛泽东急于看看孩子。

‘因为我得的是中毒性痢疾，傅医生不让我带孩子，也不准我喂奶，傅医生的姐姐暂时给带着。’

第二天，毛泽东又来到贺子珍的床前，手里提着个瓷罐，他把盖子打开，是一罐炖鸡，鸡煨得很烂，汤还冒着热气，肉香扑鼻。毛泽东扶贺子珍坐起来，把罐子递到她手里，还带来一把汤匙，轻声地说：‘快趁热吃吧。’

那时能吃上一只鸡，是很难得的补品。贺子珍拿起汤匙，不禁问道：‘哪儿来的鸡呀？’

‘我让警卫员到老乡家里买的。’

‘又要花好多钱。’

‘我有钱，组织上给我发了休养费。’

‘这些钱是组织上照顾你身体的，你身体不好，再不要为我花钱了。’

‘我也有呢，一共买了两只，我留下了一只。’

贺子珍知道，毛泽东说买了两只，是在哄她。毛泽东奋斗了半辈子，带几万军队，当苏维埃主席，但还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为了让毛泽东高兴,贺子珍当他的面把鸡汤喝了,毛泽东果然为尽了一点做丈夫的心意感到欣慰。

一生清廉,构成了毛泽东人格的一个方面。那时候,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担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红军从地主、土豪、官绅那里征收来的大批金条、银钱、银元、珠宝,只从漳州运回来的银元就有一百多万。这些都归毛泽民管理。毛泽东派了两个最可靠的红军战士——自己的警卫员吴吉清和王亚堂,去帮助也是监督毛泽民把这批财宝藏在了瑞金附近的一个山洞里。据吴吉清回忆,雇了一百多名民工,沿着蜿蜒小路把这批财宝打上山顶,发了工钱即把他们打发走了。由吴吉清、王亚堂和毛泽民再把这些财宝秘密藏进洞里,洞口封起来,做上记号,三个人才下山。中央苏区没有人知道这批财宝藏在哪里。这批财宝直到一九三四年夏才启用,成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搬家的经费,也是红军万里长征的经费。

只要毛泽东一句话,可以有很多银元供他支配,起码供应自己的妻子产后每天吃一只鸡是不成问题的,但贺子珍只吃上了一只鸡。毛泽东自己不管钱,他的钱由警卫员管,从当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到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直是这样。

贺子珍的心情是矛盾的。她希望毛泽东天天守在自己身边,又不希望毛泽东天天守在自己身边。作为妻子和母亲,产后当然希望丈夫陪伴照顾自己。但她知道,只有毛泽东在政治上‘倒霉’的时候才能这样;否则,戎马倥偬的毛泽东是不会如此儿女情长

的。

毛泽东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奶妈是江西人，江西人喜欢把小孩子叫毛毛。贺子珍的这个男孩，长得瘦小。奶妈就叫他小毛，小毛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小毛生得天庭饱满，大而明亮的眼睛，很像他爸爸。毛泽东每天都要来坐上一阵子，见了孩子又是亲又是摸。毛泽东胡须不算浓，但胡茬还是硬的，好几次把小毛亲哭了。有时来到这里，贺子珍带着孩子睡着了。他就静静地坐在床边，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

这时候，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因腰伤住进了福音医院。从开辟闽西到打漳州，他作为地方党的负责人积极配合主力红军行动，和毛泽东混得很熟。所以，经常到毛泽东的病房去讨教。谈到敌人正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罗明请毛泽东指示闽西的工作方针。

毛泽东说：‘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牵制敌人，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漳州地区你是熟悉的，老蒋把十九路军摆在那里，再往西就是陈济棠的粤军。你们要在上杭、永定、龙岩这块老区开展游击战争，西边牵制陈济棠，东边牵制蔡廷锴，这对于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罗明消息闭塞，宁都会议的精神又没有向下传达，他对于高层的斗争一点也不知道，仍把毛泽东看成是中央苏区的最高领袖人物，对于毛泽东的指示，谨记在心。待出院以后，立即召开省委会

议进行传达,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省委委员都到了,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并决定罗明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去杭、永、岩地区领导游击战争,由刘晓主持省委工作。罗明模仿毛泽东的工作方法,一到前线,成立了杭、永、岩地区前敌委员会,自任书记,谭震林、方方为委员,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

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等先后进入中央苏区。由中央苏区国家保卫局执行科长卓雄率一个班的训练有素的精干卫士护送。正在上杭白砂的罗明,听说中央领导同志要经过这里,细心安排了食宿,保卫工作更是十二分的小心,慎之又慎,然后兴冲冲地去迎接博古。这位年轻的党的领袖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盯着罗明,劈头就问:‘你是省委代理书记,来白砂干什么?’

罗明答:‘为了准备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在杭、永、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省委决定我来主持前敌委员会的工作。’

‘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博古板着面孔问。

‘还没听到传达’罗明照实回答。

‘吃饭了,不谈了。’博古扶了一下眼镜,站起来挥手让罗明退出。

罗明碰了一鼻子灰,心里直纳闷。

一九三三年一月下旬,不识相的罗明两次给省委写报告,不同

意用编并地方武装的办法‘猛烈地扩大红军’认为保留一点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比把游击队都送到前方主力红军的作用还要大。特别是杭、永、岩地区,一九二八年举行武装暴动,开辟了三县游击区,大部分青壮年已参了军,一部分青壮年和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参加了地方红军独立团、独立连和不脱产的赤卫队,此外便是老弱妇孺,在敌人的进攻下,很难大规模地扩大主力红军,但群众愿意参加保卫家乡的地方武装。这些边缘区应先抓紧时间发展地方武装以解决打退敌人骚扰,保卫乡土的问题。他认为这方面的工作远比较弱。‘如果不抓紧我最弱的这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好的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注:永定的村庄),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

罗明的意见并不错,即使有错也构不成什么路线错误。问题出在罗明称毛泽东为‘最好的领袖’,而且把毛泽东和斯大林相提并论,这把博古气得无名火三千丈,他把这份文件往桌子上一摔对洛甫说:‘我一进苏区,就看这个罗明不对头。他眼睛里根本没有中央,又是毛的指示,又是游击战争,连工作方法也是毛的那一套,成立什么前敌委员会,如今竟然把毛泽东捧为领袖,省委一级是这种状态,我们在瑞金还能立足吗?’

‘你打算怎么办?’洛甫冷静地问道。

‘搬倒他，肃清他的影响。’

‘搬倒老毛可不简单。你不要忘记一月十七日王明同志发来的电报，他起草了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园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宣言，这个宣言又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领衔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布的。毛泽东已经成了国际人物，你马上要搬倒他，国际能答应吗？’

‘将来由你当中央政府主席。’博古说。

‘那是将来的事情了，目前就抓住罗明不放，不直接涉及毛泽东。’

俩人商量一阵子，全套的部署就形成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发布了《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所谓闽粤赣省委就是福建省委。《决定》一开头就说：

中央局检阅了福建省委的工作之后，认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部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认为在杭、永、岩苏区内群众的革命斗争已经低落，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已经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广东军与十九路军的欺骗宣传已经深入了广大群众，一切发群众斗争的政治工作必然失败，所以实际上他是主张党应该抛弃这一苏区根据地，向着后方退却逃跑，这一路线甚至公开走上了取消党，取消群众革命团体的取消主义

道路。

《决定》指出：

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

罗明在上杭看到《斗争》报上苏区中央局的《决定》，才知道自己成了党内一次路线斗争的代表人物。他百思不得其解。这时省委通知他回汀州。在回来的路上，恰与张鼎丞相遇。罗明问：‘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张鼎丞答：‘他们说我们犯了路线错误，说我们不扩大红军，只顾打游击战争。’

罗明回到汀州，又接到通知去瑞金。到了瑞金，洛甫接见谈话，问他看了中央局决定没有？有什么意见？

罗明怀着满肚子委屈说：

‘我自己提出并得到省委同意，由汀州赶到最艰苦的边缘县区参加游击战争，为什么说是退却逃跑呢？’

洛甫摆出学问高深的架势，说：‘从路线上说是“退却逃跑”，用辩证法看问题，事物都是发展的，例如过去打游击战争是需要的，现在再打就变成“游击主义”了。’接着又反问道：‘在边缘地为什么不能和中心区一样扩大红军？’

罗明说：‘边缘县区要进行游击战争，随时准备应付敌人的进

攻,不能和中心区一样。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出逐步地、分批地扩大主力红军。’

‘这是富农路线。你说听群众的呼声,就是这么听吗?’洛甫插话反驳。

罗明不示弱:‘这是永定县金沙乡贫农会议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正如列宁所说:“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罗明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党员,也是个知识分子干部,读过几本马列,但他书生气十足,以为在道理上驳倒了对方,就能减轻自己的‘罪行’,所以把列宁也搬出来了。由于罗明根本就不认识错误,他被关在叶坪中央局的一个房子里。白天由中级干部批斗,晚上由一般干部批斗。有一天晚上,开了几百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不断高呼口号,会上气氛很紧张,有人提议枪毙罗明。据罗明回忆,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到会讲话。批评了过激的口号,制止了批斗会进一步升级。

最后,博古找他谈话。一上来就怒气冲冲地质问:‘你为什么把毛泽东和斯大林相提并论?这是不伦不类的。’(在博古的授意下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采用指桑骂槐的手法写道:‘企图拿罗明与斯大林相比,那正像把狗子同猛虎比较同样的觉得不伦不类吧?’)‘你不承认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反驳。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我们不了解边缘区的实际情况,是不是要我们去搞调查研究?这是你们的狭隘的经验主义。你不承认路

线错误就开除你的党籍，撤销你党内外一切职务。还有比你更高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你回汀州要在党代会上进行深刻检查。’

训完话，就把罗明打发回去了。

二月二十四日，在汀州召开中共福建省临时代表大会，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央局派人参加。会上，罗明作了检查。照中央定的调子与会人员多数作了批判性的发言。但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出来为罗明鸣不平，说：‘新泉就是罗明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才紧急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敌人进攻的。县委手里没点武装，敌人来了就得跑，那才真正是“退却逃跑”呢’。上杭、永定县的代表也说‘罗明同志和我们一起照毛主席的指示打了好多次胜仗。留得红色区乡在：可以不断出红军。’开到最后，由中央局代表作总结，他宣布了补选省委委员名单，由陈潭秋任省委书记。当场撤销了杨文仲的县委书记职务，勒令他交待和罗明的小组织活动。

这次大会之后，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由省委机关，县、区委至乡支部，自上而下，全面铺开，打击和撤换了一大批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省委常委、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由于不同意反‘罗明路线’被扣上‘一贯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者’的帽子，被撤销了省苏维埃主席职务。省委常委、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由于拒不检查‘罗明路线’的错误，被指责为‘企图保留一部分机会主义武装，在某一时机来向党进攻’，被撤销了军区司令员的职务。省委常委

郭滴人，是一九二六年的党员，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认识了毛泽东，是龙岩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被列为‘罗明路线’的拥护者，被斗争后，先把他调到省委宣传部，不久调到省军区宣传部，然后又调到前方去领导几十个人修工事。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和省委团委书记陈荣被指责为‘腐朽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者’而受到批判。省土地部长范乐春、省军事部长游瑞轩、长汀县委书记李坚真、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都被调离原职，另行分配工作。永定县委委员罗禄山、关坤林，武平县委书记陈玉梅，汀东县委委员陈玉珍、熊丁州等，都被撤销了领导职务。不久，这场斗争又波及到了江西。

32 门庭冷落 贺于珍心情凄楚

众星捧月 布劳恩神采飞扬

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夫妇带着儿子小毛（毛泽东给取的学名叫毛岸红）离开了长汀红军医院。他们没有回到叶坪去住，而在沙洲坝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不远的地方找了几间房子住下来。房东杨嫂，丈夫当红军上了前线，身边只有一个两岁多的男孩。

住下以后，警卫员吴吉清向杨嫂打听水源。杨嫂热心地领着吴吉清到村口一棵大樟树底下村民们汲水的塘边，指着伸向塘里的半截木桥说：‘就在这里舀吧。’

吴吉清提回一桶水，告诉贺子珍，塘里不干净，洗菜、淘米都在那里，塘里有菜叶，还有死鱼呢，所以水不太好。贺子珍蹲下嗅一嗅，闻到一股腥味，这怎么给毛泽东烧茶喝呢。贺子珍让吴吉清把水倒掉，两人上山去找泉水。走出四、五里，到鹅公。 窖钵希卅(11) 忠还缮 泉汨汨流淌，贺子珍非常高兴，她提了一壶，吴吉清打了

一桶，回到了住处，这下烧茶做饭够用一天的了。

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后，喝着泉水泡的山茶说：‘好，这水香味！喝了延年益寿，要想法子把这股泉水引到村里来，让大家都能喝上。’第二天，毛泽东便发动中，政府的工作人员上山砍毛竹，打通关节，一根接一根连起来，一直接到鹅公。 十 呀 到了沙洲坝。杨嫂喝上了泉水，非常高兴，带着孩子到贺子珍房里来坐，说：

‘外乡的人说：“有女莫嫁沙洲坝，有河无水洗被帕”。现在好了，托毛主席的福，你们一搬来，我们就喝上泉水了。’

贺于珍接过杨嫂怀里的孩子，亲热地问道：‘叫什么名子？几岁啦？’

‘杨石生发子，两岁。’孩子自己回答，发音不是那么清楚，名字又挺长，贺子珍没有听清，杨嫂又重复了一遍，才闹清了是五个字的名字。

毛泽东抱着毛毛笑了：‘杨石生发子——比人家多两个字，像外国人，不好叫，我看他比毛毛大，就叫他大毛，毛毛叫小毛，从此他们就是兄弟了。’

杨嫂高兴地回答：‘好呀！好呀！’

一天，毛泽东在门前大槐树底下石头上坐下，大毛和小毛，一左一右坐在他的腿上，叫吴吉清去把沙洲坝的老表请来。一会儿，村里老少爷们来了十几个人，热情地跟毛泽东打招呼，随便散坐在树下。

毛泽东吸着贺子珍给卷的喇叭烟，开口说道：‘我请大家来是

商量个事,挖井。’

‘挖井?’老表们露出惊讶的神色。

‘挖井是好事,只是没钱。’一位五十开外的长者说出了大家的疑虑,以为要乡民们摊派哩。

‘钱嘛。由政府出,只要大家同意,出把力气就行了。咱们说干就干起来,大家回家去取工具。’

毛泽东把膝上的两个孩子递给他们的母亲,接过吴吉清透过来的铁锹,跟老表们一起干起来。这个地方水位高。几天工夫就见了水,又用砖石砌好井壁。这就是后来传为美谈的红军井。全国解放后立了块石碑:

饮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毛主席。

挖井的事热闹过去以后,毛泽东的家冷清下来。过去,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宾客盈门。军队的、党政机关的各方面的干部经常来看望毛泽东。有的是请示汇报工作,有的没什么事 纯属联络感情,道有的带来作战缴获的两瓶罐头,几包‘三炮台’香烟。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必定把香烟打开,让在座的分享,在喷云吐雾中开始他那纵横天下的议论,来客个个听得着迷,直到掌灯时分,毛泽东开始办公了,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告辞。如今,除了邻居的大嫂么妹热情地问候贺子珍,抱抱她的小儿子之外,竟无一人来看望毛泽东。寂寞和冷落使贺子珍心里非常难受。她想到机关里去看看同志们。多年来,她和曾碧漪(古柏的妻子)一直担任总前委的秘书,管理机要文件。总前委撤销后,他们又成了苏维埃政府的机要秘

书。到了机关——过去的杨氏祠堂,遇到的人都冷冷地,有的打个招呼。有的招呼也不打,头一扭就过去了。她找到了曾碧漪,曾碧漪紧紧拉着她的手,含着眼泪说:‘不让我们管机要文件了,让我们去当收发。’

贺子珍回到家里,充满委曲地把调动工作的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劝她说:‘不让管就不管吧,免得他们不放心。’

‘可你还是苏维埃主席呀!他们凭什么这样对待我?’贺子珍说。

‘博古他们已经摆开架势,要往死里整我了,你要有最坏的思想准备。’说完这句话,毛泽东就沉默了。

毛泽东完全被孤立起来了。据贺子珍回忆:‘他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不同外人讲一句话。’这时,博古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的‘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斗争进入了高潮。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在宁都召开江西省委扩大会议。会议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主持,博古带着中央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亲自到会坐镇。被确定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人物进行残酷斗争的有四个:邓(小平)毛(泽东)谢(唯俊)古(柏)。邓小平任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任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任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五师师长,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大会指责‘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四人当中,又着重打击邓小平,认定他是‘毛派的头子’。

一九三一年八月邓小平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前任瑞金县委书记,后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并没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接触;他怎么会成为‘毛派的头子’呢?只能说是政治思想上的一致和路线政策上的认同。当时,以中央组织 部长的身份领导批判邓毛谢古的罗迈,经中央局批准,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发表了《为党的路线而斗争》一文,文章的副题是‘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文章披露:

在上海,邓小平就反对过王明、博古等人。受到批评后,‘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在掩藏在两副面孔的下面,散播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仰,实际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邓小平到了苏区,即曾在党代会前后,与毛、谢等共同提出了对四次战争的机会主义的口号,共同进行反对中央局的活动。’‘在三次战争后。依据全国的形势,红军应该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他们却说红军的力量只能留在苏区打上围子。打赣州的时候,他们袖手旁观的讥笑,对党指示的工作,完全怠工。在敌人第四次大举进攻的面前,他们主张放弃苏区根据地,红军主力应退到兴国一带来或调到河西去,实行退却逃跑。’‘对于扩大红军,他们认为边区是不可能的。又谈扩大红军,不如扩大地方武装,实行对扩大红军怠工。’‘最后对于“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他们借口苏区群众担负太重,来反对推销公债,退还公债和借谷子。并主张主力红军要把打土豪筹款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

在江西省委扩大会上,批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说十六字诀是‘退却逃跑’;批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说这是富农路线。这都是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和土地政策的著名主张,虽然没有公开点毛泽东的名,但与会者心里都清楚,批邓毛谢古,实际上是批毛泽东。

罗迈(李维汉)晚年著文《在中央苏区》(一九八六年《党史通讯》第一期),说清了这一段历史。文章说:

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一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东、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搞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

在开会期间,邓毛谢古被责令交待‘罪行’,隔离审查。毛泽东作为毛泽东的弟弟,不仅不能与哥哥见面,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都受到了追查。他妻子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时任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因为拒绝揭发丈夫的‘反党罪行’被撤了职,送党校接受批判审查。进党校时,她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孩子生下来,竟不准毛泽覃探望妻儿。一天,经过秘密安排,她避过耳目,偷偷把孩子抱出来,让毛泽东看看。夫妻相对无言,潸然泪下。作为中央党

校兼任校长的博古,听了关于贺怡情况的汇报后,说她不能和毛泽覃划清界线,要开除她的党籍。副校长董必武出面力保,才改为党内警告处分。

一天,贺怡带着一肚子委屈来到姐姐家。哭诉了自己的遭遇。还说到,哥哥贺敏学,也被撤了红二十四师代师长的职务,送进红军大学接受审查了。贺子珍听到伤心处也掉下泪来。

毛泽东出奇地冷静,严峻;听完,缓慢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邓小平受的打击最重。检查三次都不能过关,职务一捋到底,被关了一个时期。妻子金维映受不住巨大的政治压力,跟他离婚了。解除关押后把他派到乐安县南村去当巡视员。

毛泽东不露声色,带上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代理部长胡海,副部长王观澜,秘书长谢觉哉,开展了中共苏区的查田运动。根据一九三三年七、八、九三个月的统计,在江西、福建、粤赣三省共查出地主六千九百八十八家,富农六千六百三十八家,从这些漏划的地主、富农手中收回土地三十一万七千五百三十九石,没收地主现金与富农捐款六万零六千九百十六元。查出的土地分配给贫雇农。实物‘在群众的监视下进行没收。没收的东西堆在一个大坪上,再经过群众同意立即分配给应得东西的群众’。吃得的东西又是‘一个处置,就是杀猪煮饭让群众大吃一顿。’(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查田运动得到了贫苦农民的衷心拥护,大大激

发了他们的热情。仅瑞金壬田区就有七百余名青年参加了红军。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境况，据天津《大公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的统计，国民党区域内捐税名目共有一千七百五十六种，四川的田赋预征到了一九八七年，陕西的田赋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增加了二十五倍。这就是亿万农民跟共产党走不跟国民党走的原因。

这期间，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重大胜利，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一万多支。关于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王明路线得势时，被说成是‘坚决的执行国际与中共中央局所指示的进攻路线，反对退却逃跑路线，以及以准备为中心的纯粹防御路线’的伟大胜利；清算王明路线后，又被说成是‘毛主席虽然被排斥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但是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在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王明错误的军事路线还没有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第四次反“围剿”仍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

公正地说，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既不应给王明贴金，也不必给毛泽东添彩，那种功劳要归于最高领导者的思维定式，是封建社会‘功则归君’的遗风。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这都是当代大军事家，是他们精心运筹，审情度势，指挥有方，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胜利。功劳应该归于他们。如果王明、博古真正把军事指挥权授给周、朱、刘，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也不至于打成那样一种结局。可惜的是，四次反‘围剿’打胜之后，周、朱就被削去了最高

军事决策权。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临时中央提议，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前方移至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由项英代理主席。中革军委主席是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是副主席之一。朱、周驻节之地即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谓由前方移至瑞金，项英出任代主席，就意味着实际剥夺了朱德的军委主席的职权，在前方的军委主席要受在瑞金的代主席节制。王明、博古在军事指挥上既排斥了毛泽东，又不用朱德、周恩来、刘伯承，这就决定了第五次反‘围剿’必然失败的命运。

二十六岁的党的总书记秦邦宪，稚嫩的肩膀挑不起指挥十万红军与几十万国民党军作战的重担。正像中国的一句俗语：‘菩萨是近处不灵，远处的灵。’万里迢迢从苏联请来了奥托·布劳恩来执掌兵权。

奥托·布劳恩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八日生于德国慕尼黑郊区伊斯玛宁，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个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于一九一八年应该征服兵役上了前线。一九一九年四月加入‘斯巴达克’联盟，该组织于同年年底成为德国共产党。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他在台尔曼领导下的汉堡党组织工作，一九二四年任德共秋林吉亚秘密委员会第二书记，一九二六年秋被捕，关进柏林莫阿比特监狱，一九二八年四月越狱逃往苏联，以来宾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送入莫斯科‘无产阶级师’进行从列兵到团指挥员的训练；一九二九年春，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一九三二年毕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王明、博古的请求派

遣他前往中国,担任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总部的顾问。

经过能干的中共地下交通的秘密安排,这位蓝眼睛、金黄色头发、身高一米八的德国人,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底来到红都瑞金。为了给他创造工作和生活的条件,在沙洲坝离中央和军委机关步行只需五分钟的一块地方建造了一座独立房子,共三间,中间是堂屋,当会议室用,墙上挂满了作战地图;东头一间是他的卧室;西头一间给翻译伍修权、王智涛居住。来瑞金后,因布劳恩的俄文名字是利得洛夫,博古给他取的中国名字叫李德(‘利得’的谐音)。后来他发表军事论文,署名华夫。他更喜欢华夫这个名字。他自己的解释是‘中国的男子汉’;因为他娶了个中国妻子萧月华,总部机关人员对这个名字的理解是‘萧月华的丈夫’。在饮食吸烟等生活问题上,总参管理局长宋裕和费尽心思筹划,保证他的‘特供’需要。

李德住下来以后,十月初,召开了一次高峰会议,政治局、军委和苏维埃政府各方面的负责人与他见面。地点在独立房子。这本是李德的住处。为改变反客为主的局面,李德被请到博古那里去谈话。待洛甫、项英、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刘伯承、邓发等到齐后,李德才在博古的陪同下从外面缓步进来。入境随俗,李德已换下西服,穿上新做的一身红军军装。一进门他从容地脱下八角帽,在虚位以待的会场中心坐下来。博古透过深度的近视眼镜环顾会场,主持这次会议。他说: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

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

话音一顿，与会者礼貌地鼓掌欢迎。

‘先宣布一个通知，为了保密和顾问同志的安全，今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名字李德，不得泄漏他的身份和原名。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的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与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热情。李德同志今后将列席中央及军委的会议，参与党和红军各项方针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别是军事战略、战役和战术，他负有指导和监督的重任。党和红军各级领导不仅要不断地向李德同志请示报告，还必须尊重和听从他的指示。’

然后，博古宣布请李德同志讲话。

李德用俄语讲话，伍修权作翻译。

‘我受共产国际及驻华最高军事代表弗雷德的委派，来到你们这里，代表共产国际和弗雷德同志，负责对你们提供军事指挥上的协助与指导，帮助你们粉碎资产阶级敌人即白军的进攻阴谋，并指导你们建设正规的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以巩固和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让共产主义的旗帜迅速插遍亚洲东方以至世界各地！在上海时曾就如何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等问题，和波古良（博古的俄文名字）同志广泛交换意见，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这次来到苏区，希望能取得中共和红军各领导人的一致支

持和密切合作,以期共同完成共产国际交付给中共以及我本人的重要任务。’

李德讲完话,博古带头又是一阵有礼貌地鼓掌。掌声停止后,博古一一介绍在座的中国领导人。

‘这是朱德同志,红军总司令。’朱德以标准的军人姿态行军礼与李德见面。

‘军委代主席项英同志,他在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项英有些激动,双手握住李德的手,说:‘好,你来了就好了,今后请多指导。’

周恩来与李德握手时,用漂亮的英语说:‘非常欢迎你,李德同志。’

紧跟着站起来是张闻天,李德认识,直呼他的俄语名字:‘依思美洛夫同志。’热情伸过手来。张闻天化名洛甫,就是俄文名字尾音的衍化。

国家政治保卫局长邓发和总参谋长刘伯承,数日来接待陪同李德,已经熟识。一一握手而过。

这时介绍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右手中指和食指夹着香烟,沉着淡漠地坐在那里,等博古介绍完毕,略停了一两秒,才把烟卷从右手换在左手上,从容站起身,略一点头,去握李德已经伸出的手,口里说:‘幸会!幸会!’

李德转头问翻译,毛泽东说的什么?伍修权答道:‘他说你好!’

博古觉得意思未尽，重新翻译：‘毛泽东同志说，他能见到你，感到很荣幸。’

最后与腹部负伤的王稼祥见面，博古介绍他的俄文名字：‘这是康莫纳尔同志，在四次反“围剿”作战中他负了伤。’李德高兴的伸过手来说：‘早知道你的名字，希望今后对我的工作大力支持。’

中央苏区的群英会就这样结束了。大家告辞而去，独博古留下来、用俄语与李德交谈。‘利得洛夫同志，在军事上主要依靠您了。我们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都会尊重您的意见，支持您的工作，刚才大家对您的热烈欢迎可以看出这一点。’

‘毛泽东态度很冷淡。’李德对刚才见面时他先伸出友谊的手，而毛泽东过了两秒钟才把手伸过来，与别人先伸手，甚至两只手都伸过来，握住他的毛茸茸的大手摇晃所形成的反差颇有感觉。

‘毛泽东是个无知的乡下佬，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他很傲慢，对谁都不尊重。他和朱德不过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所描写的绿林好汉而已。但井冈山根据地是他们先搞起来的，都有一批追随着，我们不团结他们并给他们一定的尊重。现在毛泽东在军内已没有职务，朱德保留了军委主席的名义，但实际主持工作的是代主席项英。项英资历、威望和能力都不够，您的到来他觉得有了依靠，所以特别高兴。’

‘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李德一方面表示谦虚，一方面表明他和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坚决站在一起的立场。

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李德踌躇满志、神采飞扬地升入了红军的中军宝帐。

事有凑巧,在蒋介石那一边,也请来一位德国顾问,这便是冯·赛克特。赛克特出身普鲁士贵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历任军团参谋长、驻土耳其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和德国陆军总参谋长;战后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六年任德国国防总司令,后晋升一级上将退休。希特勒派他来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死敌。

十月二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在赛克特的协助下,制定了对红军第五次‘围剿’计划。共出动‘围剿’兵力一百万人。其中‘围剿’江西苏区的兵力五十万人,分为三路: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三十多个师,是‘围剿’军的主力,依托堡垒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指挥九个师、三个旅,主要用于‘围剿’湘赣、湘鄂赣苏区,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机动;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十一个师、一个旅,阻止红一方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福建蔡廷锴率第十九路军并指挥地方杂牌部队六个师,两个旅,在闽赣边防堵红军向东发展。根据赛克特的建议、采取持久战与堡垒战的新战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企图逐步压缩革命根据地,然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消灭红军。

战前,国民党军的堡垒体系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北部从赣江

延伸到永丰,直至黎川;西部沿赣江到赣州,继续拐弯向南,到信丰以北和会昌以南,直至福建边界;东部是蔡廷锴的十九路军,由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有‘罪’,被蒋介石调到福建来,官兵上下对修碉堡进攻红军不积极,因而敞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蒋介石准备拿下黎川后,继续构筑,形成对瑞金的包围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首先在黎川打响了。

进攻黎川的是国民党第八纵队副指挥官周浑元指挥的三个师。守将是红军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但他的主力部队随三军团到福建去了,剩下一个独立师,又于一星期前调往硝石,归前总直接指挥;他手上只有一个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萧劲光于九月二十八日撤出、退到城外六十里的溪口。博古和李德震惊于黎川之失,急令彭德怀率东方军从福建返回,令萧劲光以第七军团政治委员的名义率第二十师(两千多人)配合作战,先打黎川西北的据点浒湾,再‘收复赤色黎川’,达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目的。因联系配合不好,浒湾没有打下来,红军伤亡千余人。毛泽东以旁观者清的姿态说,李德的指挥‘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

李德震怒了。下令(当然是通过中革军委)撤了萧劲光的职,送后方接受审查。彭德怀向军委说明浒湾战斗失利责任不在萧劲光,李德、博古以黎川失守一事问罪,说萧劲光‘退却逃跑’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军队的代表,必须严办。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经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公审,判处萧劲光五年监禁徒刑,开除党

籍、军籍。

萧劲光被送进了监狱。那时候，一犯错误，老战友、老部下都纷纷划清界限，停止往来。萧劲光在监狱里心情很坏。在公审大会上他曾经自我辩护：‘我手上的兵都被调走了，敌人是一个军三个师，我怎么能守住黎川呢？再说上级也没让我死守黎川。我到差不多被敌人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才带领七十余人的教导队撤出，这有什么错误呢？’老是这几句话在脑子里转来转去，有时下意识地喃喃有声。看守不让他说话，但不能不让他想，他闷得快要发疯了。

萧劲光是湖南长沙人，青年时期就是毛泽东的追随者。毛泽东知道处分萧劲光是把他作毛派的代表，杀鸡给猴看。警告军队干部要跟毛泽东划清界限。

‘子珍，你代表我去看看萧劲光好吗？’毛泽东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向妻子提出一个突兀的要求。

贺子珍一怔。想了想说：‘现在去看萧劲光，不是跟他们唱对台吗！他们又没有直接牵涉到你，反罗明，反邓毛谢古，你都忍下来了，这次何必出头呢？’

‘怎么没牵涉我？说萧劲光是军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就是说我。因为恩来说了，军队没有罗明路线，他们不好再给萧戴“罗明路线”的帽子，就换了一顶，但还是对我来的。’

‘他们正得势，博古当了立式的总书记，国际又派了个顾问来，你斗得过他们吗？’贺子珍忧心忡忡。

‘我知道掌握分寸、不直接跟他们摊牌，就叫你去看看萧劲光。’略一沉吟，毛泽东接着说：‘最近开的五中全会，虽然博古当了总书记，但他们没敢罢免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还让我当了政治局委员；朱总司令由候补中委递补为正式中委，又当了政治局委员。去年十月，十九路军派人来谈判，指名要见朱毛，他们只好安排我接见。据我观察，他们目前还不敢丢掉朱毛的旗帜。’

贺子珍听的眼睛睁得老大，忽闪了两下，略带兴奋地说：‘既然这样，你和朱总司令就拉起旗帜跟他们干，他们欺人太甚了。贺怡又跟我哭过好几次……’

‘不行，不行。’毛泽东连连摆手，制止妻子说下去。‘现在是战争环境，大敌当前，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去共同对付敌人，反对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国民党要根本消灭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党，怎么去对付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呢？如果拉起旗帜干，党内分裂了，自己打起来了，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吗？’

贺子珍连连点头，表示理解：‘那我怎么去看萧劲光呢？’

‘明人不做暗事。你就大摇大摆地去，跟看守人员讲：毛主席叫我代表他探望萧劲光。要让看到的人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的一天，贺子珍来到关押萧劲光的地方。瑞金上下人等谁不认识贺子珍呢。看守很客气地把她领到萧劲光的单人牢房，并自觉回避了。

当萧劲光从沉思中清醒过来，认出贺子珍时，这个坚强的汉子

委屈得涕泪长流。

‘子珍同志，叫我带着七十个人守黎川，挡住敌人三个师，毛主席从来没有这样指挥打仗！’

‘毛主席说了，你应该撤退，做得对。他不同意处罚你，叫我告诉你，保重身体，他要出面讲话的。’

二月初，萧劲光被放出来，到红军大学当了战术教员。

33 雨后送伞 兵败城破救兵到 犯颜直谏 崽卖爷田心不疼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一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到会代表六百九十三名，候补代表八十三名。全苏区的重要人物都出席了大会，李德作为特邀的贵宾和博古、毛泽东等坐在主席台上。毛泽东主持了大会。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全国总工会代表刘少奇、少共中央代表凯丰（何克全）、全国红军代表朱德致祝词。毛泽东唱主角，作《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报告》，朱德作红军建设报告，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部长林伯渠作《经济建设报告》，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吴亮平作《苏维埃建设报告》。大会进行期间，获悉国民党军队将大举进攻的消息，主席团决定将原定会期缩短五天，并推举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作为闭幕词。毛泽东在大会上三次曝光。当他作完《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报告》的时候，速记员描绘会

场上的气氛，‘随着雷鸣一样的掌声，全体代表起立，欢迎毛泽东同志，唱国际歌。’

大会选举一百七十五名中央执行委员，三十六名候补执行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询、朱地元、邓发、方志敏、李维汉、周月林(女)等十七人组成中央政府主席团。

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副主席为项英、张国焘。

朱德继续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周恩来、王稼祥。

一个微妙的变化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原由毛泽东兼任，现在变成了洛甫。

中共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常委，成员有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在二苏大会前研究人事安排时，周恩来曾就洛甫代替毛泽东一事向博古提出：‘似无此必要。’博古的答覆是：‘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

在博古心里的算盘，这一着是一石二鸟，既分了毛泽东的权，又降低了洛甫在党内的作用，洛甫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延安整风的发言中说：‘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但博古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促成了毛洛的联盟，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这是后话。

据洛甫回忆，他和博古的分歧是从处理福建事变引起的。

发动福建事变的是第十九路军。‘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抗日反蒋运动的推动下，第十九路军在上海浴血抗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一九三三年五月，日本侵入华北，蒋介石同日本侵略者签订塘沽协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通电反对。蒋介石下令调第十九路军开往福建‘剿共’。八月，第十九路军与红军彭德怀部作战受挫，区寿年师在连城全军覆没；谭启秀师在延平战败，退出水口。第十九路军高层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蒋介石蓄意消灭第十九路军，现在正好借手红军来达成目的，一定不会调兵增援。为挽救第十九路军，必须与红军联合，共同反蒋。决定派出代表徐名鸿、陈公培与中共联系。徐、陈在瑞金会见了中共的党、政、军领导人。十月二十六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健行（汉年）和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李济深为主席，蔡廷锴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并发表了义正辞严的反蒋宣言。这就是所谓福建事变。

当闽变初起时，蒋介石认为第十九路军既与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协定，该军一经发动，则红军必将大举反攻。第五次‘围剿’刚刚发动，前线就出现倒戈，因此终日彷徨，莫知所措，常常自言自语地说：‘糟了！糟了！’及至看到江西红军并无配合反攻迹象，其他反蒋势力亦无响应者，才转忧为喜，对陈诚、熊式辉、林蔚等人说：‘蔡廷锴孤立无援，闽变不足平矣。’中共有议之士都是主张在军事上

配合支持蔡廷锴的。毛泽东分析了政治、军事形势，考虑了几天，提笔给博古写了一封信，提出两点建议：（一）红军与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在军事上互相配合，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二）鉴于蒋介石为了镇压福建事变。已将驻宁沪杭沿线的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全部调往福建，国民党江、浙、皖后方腹心地区兵力非常空虚，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其进攻江西和福建的部队回援，这样既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可解中央苏区之围。毛泽东这一方略的高明处，从蒋介石的战略思想可以看出来。据蒋的亲信将领宋希濂说：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共军扩展的■围越大，我军兵力就越难于对付。’（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五辑第二〇〇页）博古看了毛泽东的信不予置理。毛泽东又跑去叶坪和博古谈了一次，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周恩来、朱德、洛甫、彭德怀都主张在军事上要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独总书记博古反对。有资格和他争论的只有党内第二号人物洛甫。

‘一月十七日我们发表了原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联合作战的宣言，这个文件可是国际批准的。’洛甫为了加强自己的论据，把国际先搬出来了。

博古满脸严肃地说：‘三项条件只是宣传口号，只是对下层士

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对于蔡廷锴这样的上层反动分子怎么能够联合呢!’那架势是垄断国际指示的解释权。

‘不管怎么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应该在军事上积极配合十九路军的反蒋作战,这对我们粉碎第五次“围剿”有利。’

你怎么支持老毛的意见呢!这问题我已发电报请示共产国际,等等国际的指示再作最后决定。李德同志最近又强调,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希望开会讨论时你不要支持老毛反对我。’

在博古的决策下,红军对第十九路军的在军事上采取了完全不配合的政策。

为镇压福建事变,蒋介石从第五次“围剿”的主力北路军中抽了八个嫡系师,从南路军抽调一个嫡系师,以九个师的兵力(其番号是: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冷欣的第四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汤思伯的第八十九师),(并集中了海空军和炮兵的精锐,蒋介石也从南昌跑到建瓯,亲自指挥围歼第十九路军。

‘战场上的这样变化,大大减轻了对中央苏区的压力。这真是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的绝好时机。

当讨蔡军的北路军第三、第九两个师在蒋鼎文的率领下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时,红一军团刚打完大雄关战斗,就在附近休整,正处在敌人行进从队的侧面。据聂荣臻回忆:‘敌人移动时,我

们看得清清楚楚，一路一路地移，正好打。大家都说，这个时机不打什么时候打，再不打机会就没有了。可是上面就是不叫打，说打是等于帮助了小军阀。’（《聂荣臻回忆录》上第一九二页）卫立煌率领的五个师从抚州出发，经金■、资溪、光泽进入福建，经过地区绝大部分都是崇山峻岭，羊肠小道。红军如果埋伏主力，组织大规模的伏击战，像四次反‘围剿’大龙坪战斗那样，是可以打一个大胜仗的，但红军主力一、三军分开了，根本没有这个打算。周恩来、朱德于十二月十三日致电博古、项英，建议立即集中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主力在闽赣边界的东山、德胜关与入闽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决战。收到电报后，李德对博古说：‘蔡廷锴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十三、十四两日，博古、李德连电朱、周，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令将红军主力西调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构筑的堡垒线，不准向东配合第十九路军作战。在具体部署上，二十四小时之内四次变更命令。十六日，朱、周再电博、项，对他们举棋不定，屡次变更，造成部队指挥混乱提出批评，并请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博古、项英和李德认为这是分庭抗礼，向他们的权威挑战。二十日，由李德出面，提出解决所谓‘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前敌指挥部的关系’问题。认为‘前敌指挥部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行动。’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

苏区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作战，实际上是绕开朱德、周恩来，由博古、项英、李德直接指挥军队。一月四日，周恩来、朱德从前方返回瑞金。恰在这时蔡廷锴发来延平（今南平）告急请求调派援兵的电报。周朱见到博古、项英，力陈出兵援蔡的必要，蔡廷锴如果垮了，蒋介石马上会把抽走的主力重新投入第五次‘围剿’的战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答复这时候也到了。据李德回忆：‘主要内容是：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军事上可以独自作出决定。’（《中国纪事》第八十七页）在这种情况下博古才同意出兵配合十九路军作战，但他要亲自掌握出兵事宜。据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张云逸回忆说：

一天，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忽然找我去，告诉我十九路军方面要求我方出兵配合作战，盖派一个军事代表去。因我是广东人，大革命时期和十九路军有些关系，中央决定派我立即去福州担任军事代表。博古同志特别指示我：此行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可是，关于如何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如何出兵配合作战支持他们反蒋抗日，克服其软弱动摇等等问题，他却一字未提。

由于福建方面敦促甚急，我接受任务后，带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很快就出发了。

辗转来到福州。福建政府主席李济深立即接见了。寒暄一番以后，他劈口就问我：‘你们部队究竟什么时候出动？’

我早就估计到他们会提出这个问题，便答复道：‘三军团已经

出动了,现在到了哪里,还不知道,我可以打电报去问。但是,还希望你们能把前方的情况随时通知我。’

李济深的脸色阴暗下来,好半天才又低声说:‘司徒非旅被消灭了;廷锷不久就要从前方回来了。’(张云逸:《一次重大的失策》)

为对付蒋军,蔡廷锷把精锐布置在延平、古田、水口一带。延平是福州的门户,古田和水口是屏障福州的两个要点。司徒非为第十九路军第五军第五师师长,守延平,该军第七师师长赵一肩守古田,第五军军长谭启秀率军预备队一个团守水口。能否守住延平,是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安危存亡之所系。从一月初,蒋介石直接指挥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和投靠蒋介石的福建军阀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攻延平,并派飞机十余架支援地面作战。司徒非全师兵力六千人,守了两天,丢了九峰山主阵地,延平失去屏障,司徒非率部投降。据福建事变参加者麦朝枢回忆:‘大约是在延平失守的那天,接到了红军领袖的电报,内容是:红军出动三个军,分别在清流和沙县已经追上蒋军两师,要求十九路军只派一个团守闽清,两面夹击,可以把敌人彻底消灭。这一天似乎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那时十九路军内部已经起了严重的变化,结果没有派兵。’(《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第九十页)所谓‘严重变化’,就是延平失守的当天晚上,守古田的赵一肩师长在蒋系第四路军总指挥张治中的劝降之下归顺‘中央’了。十四日下午三点,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锷乘飞机离开福州去香港,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存在了五十三天,从此烟消火灭。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在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都已逃离福州，一个星期之后，博古才制定出《中央局关于抵御福建军阀战争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和策略》，他预计：‘十九路军瓦解，失去名义上独立的军事力量，采取下面四个道路发展：

甲、叛卖与投降宁方。

乙、投入闽现有日本豢养的土匪，正是日本干涉的公开的先锋。

丙、编入广东军队。

丁、寻找到红军之路。

这里我行动基本原则，不去帮助十九路军维持其独立因素，但延长其实际与南京作战过程，这样可取得时间，使我争取其最大部分群众和武装。’

一言以蔽之，博古的一厢情愿的打算，是等蒋介石把第十九路军打败以后，由红军来收编第十九路军的残余武装。这等于是等人家打了胜仗，自己去打扫战场，其政治上的幼稚由此可见。他派红三、红七军团入闽，一月二十五日红三军团攻占沙县，和福建地方军阀卢兴邦打了一仗。但卢兴邦参加了福建事变，是蔡廷锴第一方面军序列的第十五军军长。等于是红军援闽没打蒋介石，打了蔡廷锴。由此观之，博古根本没有驾驭全局的政治、军事才能，历史把他推到了中共领袖的位置上，第五次反‘围剿’只有失败之一途。

前线总司令部撤销以后，李德、博古直接指挥到独立师、团，再

无人中间梗塞了，很觉得心应手。他们是怎样指挥呢？据伍修权回忆说：

‘我们当时的工作程序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先由我们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我们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由他在军委或政治局会议上将李德的建议提出讨论并付诸实行。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也常到独立房子来，李德也常步行到到军委去参加会议。他也懂英语，周恩来同志可以用英语和他直接交谈，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则用俄语和他交谈。

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由李德一个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我们。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这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为李德作翻译》《中共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一辑第一七〇—

一七二页)

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后,将入闽部队组成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卫立煌任前敌总指挥,从福建杀向中央苏区,与北路军、西路军、南路军相配合,形成对中央苏区的合围形势。据一九三四年一月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构筑碉堡二千九百多个。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是企图避免和红军打运动战,迫使红军打阵地战,这样,即避开了红军的长处和他们自己的短处。

博古、李德完全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认为战场上星罗棋布的碉堡群的出现,不能打运动战了,不能像一至四次反‘围剿’采用运动战那样可以一次歼灭敌人几个师团,只能以堡垒对堡垒,红军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我军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靠不断地突击,一个连一个营地消灭敌人,依靠战术的胜利,积少成多,积小胜为大胜,变成战役的胜利,最后会逐步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的变化。这便是‘短促突击’战术的由来。‘短促突击’是李德在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指挥纲要。刘伯承对此评论说:‘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作为总参谋长,刘伯承本来应是李德、博古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但因为军事思想、指挥意见经常不一致,磕磕碰碰的事越来越多,周恩来从前方回瑞金后,名义上虽是军委副主席,实际做的总参谋长的工作,刘伯承则去管红军学校和后方医院去了。

四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在陈诚率领下，东路军在蒋鼎文率领下，进至康都、西城桥至泰宁一线。四月十日，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

广昌是瑞金的门户。户破则堂危，其战略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博古提出‘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战斗口号。为保卫广昌，中革军委在前方另组临时司令部，司令部设在头陂，朱德兼任司令员，博古兼任政治委员。李德到前方亲自指挥，朱德只是根据李、德的决心签署命令。李德一到前线，就拉开架势与敌人打寸土必争的阵地战。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博朱李关于广昌战役部署的意见》指出：‘广昌战役成阵地战性质，敌我均无力迅速解决此战役。’下令调集红一、红三军团和红十三师、红二十三师及原在广昌担任守备的红九军团共九个师的兵力与敌决战。广昌没有城墙，李德决定派一个团的兵力修半永久性工事。进驻的守备部队应成为整个防御体系的支点。所谓半永久性工事，就是用五六十厘米粗的松树作工事顶盖，横一层，竖一层，上面再盖上二三尺厚的泥土。阵地前沿第一线埋上土地雷，地雷引信拴在绳子上，绳子通过打通的竹节埋进土中，一直拉到工事里。如果敌人进到阵地前沿，就可以在工事里拉响地雷。前沿第二线重要地段埋上竹签，作好伪装，这种竹签在火里煨过，又尖又硬。就凭这个，要挡住敌人飞机、大炮和装甲战车的进攻。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联名下达保卫广昌的‘政治命令’，强

调：‘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使用有纪律之火 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战斗从四月十日打响。敌人出动七个师，一个炮兵旅，在三、四十架飞机的配合下，拖着乌龟壳(修碉堡的钢筋水泥筑件)，步步为营前进。每次前进一千至二千米，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之下，站稳了脚跟，做好了野战工事，配备好火力，再进第二步。从上午八时到下午四时，所谓半永久性工事，很快被飞机、大炮轰塌了。钻在工事里担任守备的分队，大部分壮烈牺牲。红三军团组成了几次阵前出击，即‘短促突击’，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红一军团独立十三团的一个排长，是个瑞金老表，对这种堡垒对堡垒的战法，发表了一段非常幽默的评论：‘不知搞啥鬼呵，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嘛！’就这样，凭干部战士的血肉之躯，广昌保卫战打了十八天，红军伤亡五千五百余人，广昌还是失守了。

广昌战斗以来，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脾气越来越坏。气不打一处来。年初，他收到毛泽东托人给他捎来的一本书，他打开一看，是列宁著的《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书上还写了一句话：‘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尽管战斗频繁，他还是利用晚上和空隙时间把这本书认真看了一遍。从看过那本书，彭德怀的气就更大了。他不懂马列，不敢说李

德这一套战法是‘左’还是右,说他‘左’吧,他又挺怕敌人;说他右吧,他又主张拼命,甚至要把红军拼光。不管怎么说,要把红军拼光我老彭得说话。创立中央苏区,死了多少人,不容易呀!在撤出广昌这天,他黑着脸,闷闷地想着心事。

五月二日晚上八时,红三军团指挥部电话铃响了。彭德怀一接,是总书记博古,约彭德怀和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到头陂临时司令部谈话。博古陪同李德到前线亲自指挥保卫广昌的战斗,打成这样一个局面,担心高级指挥员对他们失去信仰,想谈一谈,统一作战指导思想。彭、杨应召而往。一见面,李德就哇哩哇喇说了一通。伍修权面向彭德怀,大概想缓和一下一见面就有些紧张的气氛,慢条斯理地说:‘顾问说,短促突击你们没有组织好,应该有更强的火力掩护才能成功。’

彭德怀一听就火了:‘怎么去组织更强的火力?根本没有子弹!根本没有子弹,懂吗!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有十次要失败。’

‘这么说你在指挥上就没一点缺点?’李德不悦。

讲到指挥上的问题,你们的作战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主要是方面军指挥上的错误,就是主力不集中。团村战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作战,集中使用,就能歼灭敌人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获枪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现在每战都同敌人拼消耗。敌军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的帮助,我们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条

道理。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想停止半天消灭被围之最后一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员连这个机动权都没有!硬是命令我们为硝石,差点叫敌人把三军团消灭掉。第二次打南丰,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你们坐在瑞金瞎指挥,连迫击炮放列位置都在地图上规定了。实际这一带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位都搞错了。如果不是红军指战员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被你送掉了。这次打广昌,结局你们已经看到了,完全是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创立这块根据地不容易,“崽卖爷田心不疼”,就这样被你们送掉了!’彭德怀闪电雷鸣一般把几个月来憋在肚里的火向外喷射,伍修权给李德翻译时,难免磨去了一些棱角,李德还坐得住;博古却听得目瞪口呆?

彭德怀见李德没发火,知道翻译怕他生气,后面的话没译给他听;就对杨尚昆说:‘尚昆同志,你把我后面的话告诉他。’杨尚昆对着李德用俄语说:‘彭德怀同志说,如果把中央苏区丢掉,我们是非常痛心的;你就像不孝的儿子卖掉父亲的田产一样,不知道难过。’

‘封建!封建!’李德跳起来说:‘你彭德怀不满意,就是因为撤了你的军委副主席。’‘老彭,太过分了。就凭你对顾问这种态度就得给你处分。’博古自觉理屈,气不是很壮。

‘开除党籍,公审,杀头,我都准备了。’彭德怀是宁折不曲的汉子。

‘你们先回去吧,以后再谈。’博古向杨尚昆一挥手,似乎是怪

他多事,不该补充翻译后面那两句话。杨尚昆抻了一下彭德怀的袖子,小声说:‘我们先回去吧。’

李德回到瑞金,气忿难平,要求博古严办彭德怀:‘不把他关起来,我的面子丢光了,今后怎么指挥作战。’

博古说:‘李德洛夫同志,发生这不愉快的事情真是太遗憾了。不过,彭德怀是仅次于朱德的第二号军事将领,把他关起来震动太大了。上次把萧劲光关起来,毛泽东派他的夫人去慰问,这件事许多人都知道了。如果把彭关起来,毛泽东一定会站出来,不仅毛泽东,连朱德、周恩来也会反对我们,仗正在打着,内部一乱,后果严重啊!’

李德沉默了。

广昌战斗后,红军节节抗击,一直退到石城,顶了四个多月。其中在高虎埡打了一个胜仗,这是利用反斜面的特殊地形打的。博古叫彭德怀写篇文章介绍经验。彭德怀写了。文中特别注明:‘这是特殊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而不能证明、‘短促突击’是适合的。’博古拿到文稿,把那句话删去了,修改成为‘高虎埡战斗的胜利证明“短促突击”的战术是正确的。’在《革命与战斗》杂志发表了,算是给李德挽回面子。

34 昏迷三日 毛泽东醒来献计

网开一面 陈济棠暗助红军

从处分萧劲光到不敢处分彭德怀,博古和李德愈来愈感到毛泽东的存在(尽管他已没什么权力)是对他们权威的巨大挑战。

‘波古良,我提议把毛泽东送到苏联去养病。’

‘这是个好主意。’表情呆板的博古脸上出现了笑容。

他们马上起草了一份给共产国际的电报,由李德和博古签发,这是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初。

很快就收到回电。国际执委会认为毛泽东在苏区人民和军队中有重要作用,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在博古原文宣读这一电文时,李德情绪低落,抽着烟两眼平视窗外,一句话也没说。洛甫对博古用华语说:‘我早对你说过,国际不会丢掉毛泽东,他在这里是一面旗帜。’广昌失守后,在瑞金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即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的有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李德被邀参加了会

议,会议分析了广昌失守后的形势,鉴于国民党军已逼进中央苏区腹心地区,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通过上海电台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六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覆电同意转移。中央常委又开会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全盘筹划准备;政治由博古作主,军事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落实。原则上‘作主’是容易的,要具体落实则是千头万绪、浩繁庞杂的组织工作。周恩来是个天才的组织家,他兢兢业业地挑起了这副重担。正如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所评论的:‘周一般地使自己处于次要地位,忠实地起着使机器运转的作用。’

毛泽东又一次被推到前台,给他安排了‘八一’接受记者访问的节目。这时候,为躲避敌机的空袭,苏维埃机关已迁到瑞金城西十六公里处的云石山,在云山古寺临时办公处,毛泽东发表了预告红军未来动向的重要谈话,发表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第二二一期《红色中华》报上的消息说:‘本报记者昨晋谒中央政府毛主席访问关于目前时局和北上抗日先遣队问题。’毛主席说:

苏维埃中央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民党卖掉半个中国,全国民众望红军北上抗日上大旱望雨的时候,派遣了一个抗日先遣队,这两天已经可以逼近福州,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目的是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红军的主力虽因国民党五次围剿挡住了北上的路,正在也只有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之后,才能大举北上。这是对红军主力即将撤出江西苏

区作战略转移的预告。但北上抗日是宣传口号,实际目的是到湘西。

自从毛泽东得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作出撤出中央苏区的决定,并已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之后,他食不知味,夜不能寐,只是吸烟,看地图,在屋子里转圈;第二天看看前方的战报,又是吸烟,看地图,转圈。想想自己,奋斗了半辈子,抛妻别子,多少追随者流血牺牲,创立了这片基业,如今就这样被葬送了。最令人痛苦难熬的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被葬送,出谋划策没有人听。他想发脾气,想跟谁吵一架,想集合自己的追随者赶跑那个洋鬼子……但不能,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要有一个统一的党才能对付敌人。

想到这里,他的思想打了一个结,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睡就是三天三夜。可把贺子珍和警卫员急坏了。请来西医诊治,西药吃进去,不见效果;又请来中医,开了草药服下,仍不退烧。贺子珍摸摸毛泽东滚烫的前额,怕持续高烧烧坏了大脑,就用毛巾浸过冷水敷在额上;还从医生那里借来个金属散热器,像金箍咒一样套在头上,据说可以降温。

到第四天上午,毛泽东睁开了眼睛,体温也降下来,一见贺子珍那疲劳过度、憔悴不堪的模样,怜惜地说:

‘这几天把你搞苦了。’

‘你身体好了,再累我心里也高兴。’贺子珍振作一下精神,说:‘你想吃点什么?我去弄。你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口干得很,弄点粥喝吧。’毛泽东说,声音很微弱。

贺子珍马上让警卫员熬了，亲自用勺喂自己的丈夫。

毛泽东一面吃一面问：‘这几天送来什么文件、电报没有？前线有什么消息吗？’

‘你身体刚好。就先静养两天吧，别为这些事操心。’

毛泽东看贺子珍不肯讲，吃了几口粥，就挣扎着要坐起来，到书桌旁边去。

贺子珍赶忙说：‘你躺着别动，还是让我念给你听。’她把整齐地擦在桌上的文件、电报和战报拿过来，一份一份地读给他听。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眼光中流露出忧伤的神色。听完以后，慢慢地把眼睛闭上了。贺子珍以为丈夫累了，想睡觉，就轻轻地退了出来，她自己也觉得累极了，几天没合眼，来到奶妈和小毛的房子里，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贺子珍一觉醒来，已是黄昏时分。赶紧起身去看看重病的丈夫。等她推开房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那张大地图又摊在桌子上了，毛泽东弯着腰用铅笔在图上画，她知道那是画敌人进到什么位置了。屋子里光线很暗，毛泽东鼻子尖快碰到地图上了。

贺子珍紧走两步，来到桌子跟前，把丈夫从地图旁拉开，生气地说：‘你不要命啦，今天刚能喝一点粥，就开始工作。’

毛泽东顺从地坐到床上，接过毛巾揩一揩额上的虚汗，喃喃地说：‘战局这个样，我放心不下啊！搞不好，中央根据地全都要丢了。我在想还有什么办法能挽回败局。’

‘你想出办法来又怎么样？人家又不听你的。’贺子珍气愤地

说。

‘听不听是他们的事情，我尽我的责任吧。立此存照。你给我研一点墨，我要给中央写信。’毛泽东平静地说，但那神气是不可违拗的。

贺子珍无可奈何地看了丈夫一眼，去研墨了。

毛泽东铺开毛边纸，又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建议：以主力向湖南中部挺进，威胁长沙，调动江西敌人回援，寻找战机，歼敌一部，打破第五次‘围剿’。具体方案是：红军主力从与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进入湖南，再攻酃县、茶陵、攸县，在衡山附近跨过粤汉路，到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兵源。尔后再取永丰，攻兰田或宝庆（邵阳）。在这一地区歼灭被调动之敌一部后，返回赣南、闽西。信写完，郑重封起来。派警卫员送去。

但此计又不见用。李德不仅不集中主力使用，反而来了个‘六路分兵’。这六路是：以红三军团第六师和第二十一师在与国西北沙村地区，抵御敌第八纵队的进攻；以红二十三师和江西独立团在古龙冈以北地区，抵御敌人第六纵队的进攻；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在头陂地区，抵御敌第五纵队的进攻；以红三军团第四、五两师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驿前以北地区，抵御敌第三、第十纵队的进攻；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及红二十四师在朋口、连城以西地区，抵御敌东路军的进攻；以红二十二师在筠门岭地区，抵御敌南路军的进攻。

这天毛泽东拿着战报，对照地图，标上这‘六路分兵’的部署，

颓然坐在椅子上,连喊‘完了!完了!’

敌人六路军,陈城指挥的第三、第十纵队五个师是主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主力并指挥红五军团一部在高虎垌、万年亭到驿前十五公里纵深内,构筑了五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在高虎垌、万年亭战斗中,红军凭步机枪、手榴弹、大刀,击退了敌人多次冲锋。使蒋介石的精锐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伤亡惨重,丧失战斗力,不得不退出战斗。但红三、红五军团也伤亡二千三百余人,不得不于八月二十八日放弃驿前以北全部阵地。

毛泽东病情好转,能出外散散步了。这天,他来到云山古寺的外面,见古木森森,浓荫蔽天,暑气全消。隆隆的飞机声,穿过云层,穿过浓荫,吵得人心烦。但没有投弹,从西北而来,转了一圈,向东北飞去。毛泽东引领远望,看不见飞机,忽然有人说话:‘老毛,身体好一些么?’毛泽东侧身一看,洛甫站在跟前。二人就在一棵樟树下谈起来。

‘敌人从北面、东面压过来,包围圈愈来愈小,我们只有东至长汀、西至兴国、北至石城、南至会昌的狭小地区了。如果转移,要早作打算才好。’毛泽东说。

‘战略转移的事一切是三人团作主,我也不多问。’洛甫语气中有些不满。

‘再不能跟敌人硬拼了,要保存有生力量打出去。’毛泽东心想,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守广昌那样硬拼，我早就不赞成，和博古争论过，他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像普列汉诺夫对一九〇五年革命一样。’

洛甫谈出了一个尖端情况。毛泽东的头脑接受了这些信号，闪电般地运作着，表情淡淡地说：‘跟敌人打阵地战，好比叫花子跟龙王比宝，敌人是飞机、大炮，我们是土地雷、竹签、树枝搭起的工事，怎么能打得赢呢？’

这时警卫员来叫：‘毛主席，子珍同志叫你回去吃药。’毛泽东点了点头，和洛甫并肩向寺门走去。尚未结婚的洛甫，带着警卫员住在寺庙的另一厢。这种安排是因为毛洛同为苏维埃政府系统的首脑。同住在一座庙里，低头不见抬头见，使毛泽东和洛甫增加了接触和交谈的机会。毛泽东患的是疟疾，卧床时候居多，洛甫经常来探望。

为准备战略转移，周恩来、朱德在九月份派出代表与陈济棠谈判。

‘南天王’陈济棠在第五次‘围剿’中被蒋介石任命为南路军总司令，从广东韶关经平远、寻乌向筠门岭推进，但行动缓慢，作战不积极。蒋陈关系微妙。陈济棠有不臣之志，曾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日联合闽、粤、桂三省成立‘西南国防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公然与蒋委员长分庭抗礼。蒋令陈济棠参加反共战争，是想让陈济棠为他消灭红军，又在反共战争中削弱陈济棠。一九三四年九月中旬，宋希濂率三十六师驻防福建新泉，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路过新

泉,夜宿宋希濂师部,与宋密谈,进行战略交底,顾祝同说:

“十九路军在福建的变乱,他们如同共党结合起来,形势是很严重的。委员长曾因此几晚不能安眠。福建事变的迅速平定,把十九路军消灭得这样彻底,是始料所不及的。这个问题的迅速解决,扭转了整个局势。我军的有力部队进驻闽西,和北路军联成气,共军窜往皖浙苏的可能性减少了;而且缩小了对共军的包围圈,这一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现在我军把重点放在北路和东路,采取稳扎稳打、逐步前进的办法。第一步先攻下宁都、长汀,然后再进取瑞金、兴国,压迫共军于赣江而消灭之。这是我们作战的目的。但委员长估计到我军压力过大,共军招架不住时,可能逃窜。他们这样多的人,想从赣江下游渡江西窜的可能性不大,唯一的就是从赣南窜入广东。现赣南兵力不多,这种公算颇大。委员长认为如万一共军窜往广东,我们一定能消灭它。因为共军离开根据地,到了广东,东临大海,活动的范围小了。陈济棠为了他自身利益,必然会拼命打;中央大军几十个师跟着进入广东,共军主力就很难生存了。现广东和中央处于对立的状态,阻碍国家的统

一,这是使中央最头痛的。如共军入粤,我们大部队跟着进去,不仅可消灭共军,也可迫使陈济棠就范,岂不是一箭双雕吗?广东问题一解决,广西的李白就孤立了,将来也比较容易解决。至于其他地方军阀,力量都不大,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号召力,是不

敢与中央抗衡的。这样就可以完成国家的统一’。(宋希濂：《第五次‘围剿’中的朋口战役》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五辑第二〇〇—二〇一页)

从顾祝同这次谈话来看，蒋介石对红军突围转移的方向判断是准确的，他的一箭双雕的算盘也并非没有根据的胡思乱想。他的棋差一着之处是对于共产党与陈济棠化敌为友，陈济棠网开一面，放‘虎’出山，完全没有料到。就在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率蒋介石的嫡系精锐从北面压过来的时候，红军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开始了秘密谈判。

在筠门岭赤白交界的羊角水，一连粤军簇拥着两顶轿子在暮色苍茫中缓缓南行。行至罗塘镇，在一幢崭新的小楼前停下了。这里是粤军独立第一师第二旅旅部。打开轿帘，下来两个人，一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健行(汉年)，一个是红军粤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这便是朱德、周恩来派来的谈判代表。粤军第二旅参谋长韩宗盛负责接待和保卫工作，热情地与潘、何寒暄，引他们上楼叙话。

陈济棠与红军早有秘密接触。最初是他托红军一位高级将领在广州的亲属向周恩来传话，要求通商贸易。他瞩目大庾的钨矿，愿给红军提供药品和日用工业品。联系很快沟通了。大庾钨矿年产一千吨，苏区政府通过转手贸易都卖给了陈济棠在广东的一家大公司，换来了大宗日用工业品和药品。所以粤军被蒋介石逼上‘剿共’前线，采用‘外打内通’，‘明打暗合’的策略。从中共中央常

委决定战略转移后，周恩来就在考虑利用陈济棠的关系借道西进。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中革军委就与陈济棠谈判让出红军西进道路等问题，给一、三、五、八、九军团发出了通知电。陈济棠曾派高级参议杨幼敏、第二旅参谋长韩宗盛进入苏区。现在的谈判是过去谈判的继续。

何长工掏出一封信，递给韩宗盛，说：‘请韩参座面交黄师长。’韩宗盛见信没有封口，就抽出信函来，见上面写道：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邀，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望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

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十月五日

信中黄师长是陈济棠的亲信、粤军独一师师长黄任寰（旭初）：‘贵总司令电邀’指陈济棠的密电。韩宗盛把信叠好仔细地装入信封，谦恭地说：‘我今晚就面呈师座。’

第二天上午，在潘河驻地会议室开始了正式会谈。陈济棠派出的代表除杨幼敏之外，还有独一师师长黄任寰，第八师师长黄质文，韩宗盛忙于会谈的记录，叨陪末座。潘何一见对方的谈判阵容

有两位师长参加,知道陈济棠是抱有诚意,要当面决定一些问题。双方代表经过三天谈判,达成了五项协议:

-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 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 3.解除封锁;
- 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内设立后方,建立医院;
- 5.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红军行动前将所经过之要点告陈,陈部后撤四十华里,让红军通过;唯红军只准借道西行,保证不入广东腹地。

达成协议后,黄旭初师长以东道主身份,盛宴为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饯行。席间,独一师电台转来红军电台发给何长工的电报,译出的电文是:‘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署名‘翔宇’。翔宇是周恩来别名,何长工留法时熟悉。电文由韩参谋长送给黄师长看过之后,才交到何长工手里。黄质文笑问:‘何司令,你们是否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说:‘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飞上天了。’饭后,潘何告别粤军的几位将领,匆匆北返覆命。

早在九月初,办事滴水不漏的周恩来来到云山古寺看望毛泽东。向他通报了与陈济棠会谈的情况,并告诉他中央已经决定在最近期间率主力突围转移,到湘西与贺龙、萧克率领的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最后,周恩来客气地说:‘如果毛主席身体能够支持,想请你先期到粤都去,办两件事情:一是察看地形,选

择突围的路线；二是给留下的干部讲一次话。你在干部和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由你出面讲讲形势，可以统一大家的思想，提高坚持斗争的信心。毛泽东义不容辞地答应了。长期受冷落的毛泽东，心情有些激动，他坚持要把周恩来送上马，目送他扬鞭而去。

关于毛泽东长征前夕在雩都的活动，某些外国学者写的毛泽东传记说他受到监视或软禁，这是没有根据的。据长征中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后来成为张闻天的夫人）一九八六年写的长篇回忆录《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透露，过了雩都河，她见到了毛泽东。

我问毛主席：“你九月份到雩都是有什么特别任务吧？”

‘毛主席这才告诉我，他来雩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现在我们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安然地过了雩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选择突围路线’这意味着毛泽东参与了部分指挥工作。谁赋予他这样的任务？周恩来。因为李德、博古和项英正在窃窃私议，提防毛泽东东山再起，担心‘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李德：《中国纪事》一一八页）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红军大队出发之前，周恩来曾先期赶赴雩都。这个行军路线的选择应看作是周恩来听取了先期到达这里的毛泽东的意见后，二人取得共识的结果。人情练达的周恩来深知，要统率毛泽东创建和培养的红军主力一、三军团作战略转移，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是个必

要的条件。绝顶聪明的毛泽东从周恩来对他的倚重当中，看到了三人团分裂的前景和自己东山再起的希望。所以，毛泽东出发时的心情并不坏，有词为证：

清平乐·会昌一九三四年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对毛泽东的这首词，注解者很多，但见仁见智，各不相同。关键的句子是‘风景这边独好’，与‘这边’相对应的‘那边’是指何处？有注释者认为‘这边’是指苏区，‘那边’是指国民党统治区。笔者认为这首词写于长征的前夕。‘这边’‘那边’都讲的当时的战场形势。因为陈济棠这边同意给红军‘借道’，而广昌、瑞金那边，红军打了败仗，顾祝同步步进逼，所以说‘风景这边独好。’最后两句也和‘借道’有关，是说红军经过‘南粤’突围出去，前途光明，充满生机。

十月初，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到云石山告诉贺子珍：中央已批准贺子珍随部队出发，同总卫生部休养连一起行动，让贺子珍抓紧把小毛安顿好，到休养连报到。贺子珍赶忙把毛泽覃要用的衣物收拾好，还把一件在福建作战时缴获的红毛毯包上，交警卫员带走。

贺子珍来到瑞金下萧村贺怡的家。组织上已经决定：毛泽覃和贺怡留下。毛泽覃被任命为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新成立的一个独立师的师长。贺子珍见到贺怡和毛泽覃，想到骨肉分离，再也控

制不住自己,放声地哭了。

贺怡也悲不自胜,但还得安慰姐姐,就问道:‘你跟姐夫走吗?’

‘老毛从零都那边走,我马上要随队伍出发,小毛和爸爸妈妈只好请你们照顾了。’

‘怎么,小毛要留下吗?姐,你可就这一个儿子呀!’贺怡觉得不妥。

‘规定不准带孩子,开始连我都不让跟着走,是老毛找了周恩来,才特别批准的。’

‘你放心留下吧,只要我们在,就得把小毛抚养大。’毛泽覃看得清楚,婆婆妈妈,商量来商量去没用了。

贺子珍赶回家里,把小毛和奶妈送到妹妹家,忍受着骨肉分离的巨大痛苦,跟着队伍上路了。在白色恐怖下,毛泽覃怕走露消息,小毛会遭毒手,秘密把孩子转移到一个老乡家里。一九三五年四月毛泽覃在战斗中牺牲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找到小毛。

红军长征出发时到底多少人枪?准确的数字应该让世人知道了。附表是一九二四年十月八日《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

这个统计表系原始资料,它比一切估算更接近于实际是毫无疑问的。表中军委纵队又称第一野战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由中央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直属部队组成,是长征大军的统率机关,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都在这里。

罗迈纵队因罗迈任司令员兼政委而得名，序列是第二野战纵队，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门、总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编成。从这个表可以看出，战斗部队一、三、五、八、九军团共有七万二千二百三十三名，其中有火器者（包括各种枪炮）三万三千二百一十四名，持冷兵器者二万五千一百三十五名，这就是红军出发时的战斗力。他们要保卫的是一万四千七百四十六人组成的机关队伍和庞大的后勤辎重队伍。

1934年10月8日野战军人员武器药供给统计表

队别 类别	一军团	三军团	五军团	八军团	九军团	军委纵队	罗迈纵队	总计
人员	19800	17805	12168	10922	11538	4893	9853	86979
马匹	90	71	49	21	29	34	44	338
步马枪	6992	7193	4190	3292	3650	1768	2068	29153
短枪	1052	857	609	89	197	183	154	3141
重机	102	102	45	42	42	12	12	357
轻机	105	30	39	35	36	9		254
手提花机枪	132	37	42	18	20	16	6	271
迫击炮	8	8	2	2	2	16		38
冷兵器 (刺刀、梭标)	6645	4114	3234	2715	2784	1497	4146	25135
步马弹	412288	391116	169949	153082	169260	54236	68275	1418206
短枪弹	25350	14856	16726	1483	3715	7105	3656	72891
手榴弹	12981	20518	9828	10006	9942	2361	4590	70226

重机弹	47544	49510	13999	14289	14988	5409	5770	15 1509
轻机弹	33759	10614	4773	4286	9656	1460		64548
花机弹	27708	9455	8614	7219	11078	2400	1235	67709
迫炮弹	612	680	93	104	104	880		2473

后勤辎重主要是两大部分：一是贺诚领导的野战医院和休养连，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蔡畅、邓颖超、正在怀孕的贺子珍、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博古的夫人刘群仙等都在这个特殊的连队里，许多老人、病人只能坐担架被抬着走。二是叶季壮领导后勤供给部门，携带着几乎所有的家产：从兵工厂的机床到刚造出来的子弹、手榴弹，从印钞票的铜版到石印机，从发电机到成捆的电线，从缝纫机到大批的军服，还有各种文件、档案、图书资料，成箱的银元和金条；出发前征购赎的六十万石粮食，除发给部队携带一部分外，大部分也在这里。据统计，行李担子有三千副。几千名新兵和雇来的挑夫（每天一块银元），担负着繁重的搬运任务。

出发时的行军队形是：中央、军委机关和后勤辎重队伍居中，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两翼掩护，五军团殿后。这支队伍展开时，逶迤蜿蜒百余里。

后来多有评论，说这种带着坛坛罐罐搬家式的转移如何愚蠢，如何缺少战略眼光等等。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和精密的组织者周恩

来怎会不懂这个？因为出发时并没有走两万五千里、行经十一个省的思想准备，而是从赣南粤北的边界进入湘西会合二、六军团，况且与广东军阀陈济棠又达成了借道的协议，所以当时作这种处置自有其根据和道理。

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撤离后，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一万六千余人坚持斗争。

十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接到东路军占领瑞金后送来的情报：红军转移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机动；不是南下，而是西进。晚上七时，蒋召集行营参谋长贺国光、作战厅（第一厅）副厅长晏道刚，拟定追堵计划，九时给各路军发出电令，其要旨是：

1. 西路军何键部除刘膺古纵队于赣西‘清剿’外，主力悉调湘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并以有力之一部在粤湘堵击，该路总部移驻衡阳；

2. 南路军陈济棠部除李扬敬纵队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地区截击，该路总部推进至韶关；

3. 第四集团军（注：桂系李宗仁部）主力集中桂北，总部移至桂林；

4. 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六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拟好电稿时，晏道刚向蒋建议：‘两广现在是半独立状态，陈济

棠、李宗仁是否依令办事是防绪的关键，应派员妥为联系才能贯彻命令。’

蒋介石胸有成竹地说：‘你不要管，命令只管下。他们不照我的命令行事，共军进去他们受不了，他们执不执行我的命令是第二步。’

蒋介石以为这步棋逼得陈济棠无路可走，但陈济棠自有他的应付方法。自从和红军秘密达成协议后，他把协议内容传达到同红军接触部队少将以上军官，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又为欺骗蒋介石的耳目，广筑工事，要口设防，拿出一副坚决堵击的架势。二十一日，红一军团在安远、信丰间发起突围战役，守在这里的是余汉谋第一军，稍事接触，则边打边撤。因红一军团攻势凌厉，粤军被歼约一个团，并俘其三百余人。有鉴于此，中央军委于十月二十六日电告各军团首长：‘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红军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电令在汝城、仁化至乐昌组成第二道封锁线。并要陈济棠、何键分兵郴州、宜章、临武间沿粤汉路南段利用原有碉堡加强工事，布置第三道封锁线。陈济棠接到电令后，着韶关开地区作战司令李汉魂率独三师、独立警备旅赶至仁化、乐昌、汝城附近设防。李汉魂在布防中对下属军官说明已同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让出红军西进道路，并把一些最反共的军官调离第一线，而让一些能够领会贯彻意图的军官到第一线指挥。十一月初，红军分

两路从南雄经聂都、王润进入仁化。布防在这里的警备旅第一团发现红军徒涉浚水时,请示旅部是否出击,当时旅作战室负责人、少校黄若天(黄本是政训室主任,临时到作战室值班)答覆:‘上司严令,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当副旅长黄国梁发现刚从广州开来粤北的第三团何汉武营在给红军让出的通道上布防,并与红军先头部队交火,立即下令何营撤出战斗,并加以严责。正因为粤军遵守‘借道’协议,红军先锋顺利通过仁化,转向城口。城口本是第三道封锁线的要隘,但李汉魂只派了一个连防守。红二师六团一个奇袭就夺占了城口。十一月六日下午三时,红一军团到达乐昌麻坑圩,林彪利用敌人的电话线,冒充敌人的军官给赖田民团团长打电话问:‘粤军上来没有?’民团团长答:‘乐昌前日到了邓龙光部三个团,一团今日开往九峰山去了。’林彪、聂荣臻立派二师四团,昼夜兼程直奔九峰山,抢先占领阵地,掩护大队通过。九峰山是粤湘交界地势显要的军事要冲。邓龙光是陈济棠部独立第四师师长,他令部队在仁化停留两日,第三天才派一个团上山也是为了履行‘借道’的协议,使红军未经什么战斗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眼看红军通过了三道封锁线,看出了陈济棠作战不积极,似有意放过红军,但他并不知道陈济棠与红军的秘密协议,给陈发了一份措词严厉的电报,说陈‘拥兵自重,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并严令将功赎罪,‘集中兵力二十七团,位于蓝山、临武、嘉禾之间堵截。’陈济棠为应付蒋,乃令叶肇、李汉魂、李振球三个师分头沿乐昌、坪石尾随红军

人湘。

35 前堵侧截 红军无入湘之路 心劳力拙 博古有自杀之心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汝城之延寿圩，红九军团及红十五师与追击之粤军李汉魂部小有接触。陈济棠立即向蒋报捷，虚报伤亡和俘虏数字，为夸大战果，说发现红军一、三、五、九军团番号。蒋介石认为延寿战役是弄清‘敌情’的最有意义的一仗，嘉奖粤军。蒋最怕朱毛红军进入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在湘鄂川黔建立根据地；下决心依靠湘江天险，调集优势兵力，聚歼红军于湘江以东。为此，令‘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前敌总指挥薛岳在衡阳召开军事会议，进行五路堵截、湘江决战的周密部署：

第一路：以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为司令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开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灌阳夏威所率第十五军切取联系，进行堵截。

第二路：以吴奇伟为司令率第四、第五两军主力韩汉英、欧震、梁华盛、唐云山、郭思演五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

止朱毛红军北上与贺龙、萧克部会合。

第三路：以第三十六军军长周浑元为司令，率所辖谢溥福、萧致平、万耀煌三个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防止朱毛红军南下进入桂北。

第四路：以第二十七军军长李云杰为司令，率自兼师长的第二十三师和王东原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朱毛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第五路：以第十六军军长李韞珩为司令，率自兼师长之第五十三师取道临武、蓝山，沿朱毛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五路中第二、第三路是主力，部队是蒋的嫡系精锐之师。蒋的战役企图是第三路军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第二路军沿永州西进，阻遏红军北上，逼迫红军强渡湘江，在大军前堵后截，左右侧击之不利态势下与国民党军决战。第一路军属湘军系，因何键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私交甚厚，以湘军人全州，李、白不会疑心图桂，必能合力封锁湘江。第四、第五路军多为湘南子弟，跟踪追击，地形熟悉，可收地利人和之便。蒋介石在命令中引用了古代兵法《尉缭子》中的四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兵法注云：‘求之若求亡子者，惧其或失也；击之若救溺人者，惧其或缓也。’蒋介石引用尉缭子的四句话，是担心追不上，打不着，劳师无功。

红军的情报工作还是很灵的，很快就知道了蒋介石五路‘追剿’的部署。彭德怀根据他在沙场上与敌作战多年的经验。考虑

红军在敌四十万大军密集布阵阻截下，掩护着庞大的中央军委机关和后勤辎重渡湘江，后果不堪设想。他向最高三人团提出了如下建议：以三军团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吸引牵制敌主力，迫使敌军改变部署；中央军委率红一、红五、红八、红九军团进占溆浦，并以溆浦为中心，于沅陵、新化、武冈一带发动群众，准备战场，创建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但博古、李德急于赶到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主张放下行李担子再打仗，拒绝了彭德怀的建议。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决定，红军分四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这时，国民党军第一路两个师由东安进至全州、咸水一线；第二路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由宁远尾追红军；第四、第五路由宁远向东安集结。

二十七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红三军团第四师各一部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约六十华里的渡河点，这里有四处浅滩可以徒涉。但后续部队因辎重拖累，未及时赶到渡口。二十八日，湘军第一路由全州向脚山铺地区红二师阵地发起进攻，桂军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攻。接着，在飞机的支援下，湘、桂军互相策应，向湘江两岸红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聚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五时，作为‘三人团’最后决心的执行者、军委主席朱德发出给各军团和军委一、二纵队首长的电报，部署湘江

战役：

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周(昆)
黄(苏)罗(炳辉)蔡(树藩)叶(剑英)罗(迈)邓(发)：

甲、敌情另电告。我们估计湘敌第一路军之两个师明二十九日晨有可能由全州沿湘江向我进攻，其主要突击方向是沿全(州)桂(林)汽车道，桂军于灌阳、兴安开各有一个至两个师，企图从南阻止我军沿灌阳至界首大道西进，并由南进行辅助突击，周(浑元)敌将企图由蒋家岭诸关口进行猛追。

乙、我军应自二十九日起至三十日止全部渡过湘江，并坚决击溃敌人各方的进攻。

丙、各兵团二十九日之部署及任务：

1. 一军团明二十九日晨，主力应在朱塘铺、咸水圩、坪[屏]山地域，并准备消灭自全州沿汽车道或湘江前出之敌。十五师应固守小嵯岭、五百岭第二团地带，主力位于文市河西岸，在敌人向文市方向有力压迫之下可转入运动防御，并应于文市之北阻扼敌人。

2. 三军团四师应确实保持石玉村、水车、光华铺地域，并应消灭自与安前进之敌；五师应进至四师之西南地区，并突击自南经建乡、富岁塘两路前进之敌，协助四师；第六师以一个团固守泡江之北，主力应移至新圩及以南地区，以击溃自灌阳前进之敌。

3. 五军团至二十九日中午止应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开地域，从二十九日中午则于蒋家岭及文市、水车间沿永安、雷口两条

大道进行运动防御,并扼阻周敌于文市、水车之线以东,后方则转移至古岭关。

4.九军团二十九日晨应赶到文市,其任务为当全州之敌向文市前进时消灭之,因此,应与在小嵯岭之十五师之一团取得联络,并准备经古头岭、桥南岭(凤凰咀)方向前进。

5.八军团二十九日中午应赶至水车地域,并与六师取得联络,为其突击队,并准备经下背田、青龙山向光华铺方向前进。

6.军委一纵队进至石塘圩以东之官山。

7.军委二纵队分两队前进。二、四梯队由邓登率领随三军团后方部队行动,并受彭杨指挥;一、三梯队由罗迈率领随一纵队前进,二十九日晨应至上营地。

丁、各兵团应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各兵团后方及军委纵队应充分准备坚决抗击侵人与接近自己之敌人。

从军事角度看,在急于达成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之战略目的未变的大前提下,战役部署只能如此,付出重大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秋雨绵绵,山地行军是非常困难的。最苦的是运输队,肩挑背扛,都是重家伙。一个人挑着担子走已属不易,几个人抬着不能再分解的各种机器部件,死沉死沉的,要想合上脚步都很困难。因为要躲飞机,行军都在夜里,又不准点火把照明,深一脚浅一脚,不小

心就跌下悬崖去了。由于疲劳过度,过沟过坎,稍一停留就睡着了。打个盹再走,因为拉开了距离又要拼命赶队,这更增加了疲劳。许多战士和挑夫草鞋早穿碎了,赤着脚走路,脚沔烂了,一踏地就钻心似的疼,于是出现了战士和挑夫的大量逃亡。老实的民工流着眼泪请求让他们回去,说再跟着走远了,回去就会被认为参加了红军,抓起来就没命了。于是又增加了一个扩夫子的任务,走一段换一批,找不到足够的夫子,就只好甩掉一些东西。由桂岩到湘江渡河点,只有一百六十华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则有可能以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庞大的后勤轻辎重队伍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足足走了四天,才赶到湘江边。因为行动迟缓,掩护部队和后勤辎重部队都付出了惨重代价。

一、三、五、八、九军团经新圩、古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战斗,阻住优势敌军之进攻,掩护中央军委一、二纵队于十二月一日渡过湘江,进至西延地区。但执行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红三军团六师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虽经英勇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其他各部也遭受重大伤亡。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从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灭为三万余人。

博古在一群警卫战士的簇拥之下骑马渡过了湘江。举目四望,杂沓涉水的队伍,满江漂流的文件、票子,随处遗弃的机器,沙滩上横躺竖卧的尸体,遍地硝烟,一片惨红。……使这位青年知识分子的心一阵一阵地收紧。他,作为中共的第一把手,这支几万人

队伍的负责人，记起了六届五中全会的情况，当选完政治局，推选出四名书记，最后推举总负责人的时候，他稍微客气了一下：‘请别的同志担吧！’有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他义不容辞地说：‘好，就是我。’那时候，充满了使命感和荣誉感。主持会议，发表演说，起草决议案，都是驾轻就熟的事情。但苏区和上海不同，多了一件事情，就是打仗，自己一介书生，怎么压得住台，于是请来了国际顾问李德。这个蓝眼黄发的德国人，满腹经纶，说起凯撒、古斯道夫、拿破仑、克劳塞维茨、毛奇，他们的军事理论和指挥的战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决心果断，指挥若定，力排众议，否决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和彭德怀、刘伯承等人的意见，而坚决贯彻自己的决心。但由于敌人过于强大，仗总是没打好。广昌失利，彭德怀就当着自己的面辱骂了李德。过江前老彭又上书言事，李德断然否决了。湘江战役伏尸百里，造成这样大的伤亡，怎样向全党、全军交待呢？！他感到肩上的压力越来越重，抬不起头来，直不起腰来，简直要把他压垮了。

剪不断，理还乱。转念之间到了石塘圩以东之官山，这是总司令部宿营地。博石让警卫排的战士们去设营、休息，他要自己再想一想……他不堪回首，但还是回过头向着湘江，湘江是看不见了，越城岭横亘在面前，隐隐约约看见还有战士和民工，牵着骡马下山。突然，一个驮着重物的牲口直立起来，驭手死拽着缰绳，双脚都离开了地面——哟，想起来了，那一段是九十度的垂直石磴，路只有一尺多宽，叫雷公岩，俯首百仞之下，有摔死的几匹马和摔碎

的箱子,以及散落的机器部件,文件图书和苏区发行的纸币。‘喂,松手!’博古大喊一声,他想提醒那个战士扔掉东西和牲口;但他的声音太微弱了,那边根本听不见。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牲口和人一幌,全没有了,暮霭中像皮影戏收场一样,倏然不见……他掏出了自卫手枪,那是缴获的一只小左论,除了试射,没怎么用过,警卫员定期擦拭,保养得很好,有一种黑里透蓝的光泽……‘我丢掉了中央苏区,丢掉了几万红军,辜负了共产国际对我的信任和重托,将来怎么见米夫同志,国际会怎么处置我?不如一了百了,死是一种解脱……’他喃喃地自言自语,慢慢地举起了手枪,手微微颤抖着……‘博古同志,你冷静一点。随着声音,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策马扬鞭,到他跟前,勒住马头,坐骑原地转了半圈,停稳了,翻身下马。由于博古思前想后的走了神儿,一军团司令部开过来他竟没有注意到。

‘荣臻同志’,博古这才如梦方醒,羞愧地说:‘仗打成这样子,牺牲这么大,我无颜见江东父老,真想一了百了,到马克思那儿去报到。’

‘你现在是党内的主要领导人,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万一走了火,怎么向大家解释,会给军心士气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博古也深悔自己的失态,岔开话题,问了问一军团的情况,回总司令部去了。

博古这里精神快要崩溃了,李德还是那样凶焰万丈,他在总司令部正在大骂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

‘你们师全军覆没，你有什么脸面跑回来，你怎么指挥的部队？你算什么师长，我撤你的帜。’他转脸对翻译说：‘叫警卫班来人，把周子昆铐起来。’

警卫班迟迟不执行命令，说是没有手铐子。

‘我们在东岸水车村掩护全军过江，还有些驮子没过完，就被湘军给包围了……’周子昆想辩解几句。

‘没有手铐，快拿绳子捆起来，把他押下去。他应该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李德咆哮着。

博古目睹这个场面，怔怔地一声不吭。

毛泽东走上前去，对着翻译而不是对着李德说：‘请李德同志息怒。这件事由我来处理吧。’说完，他把周子昆领走了。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位待罪的师长竟没有向博古和李德行礼，转身跟着毛泽东出去了。

李德看一眼博古，博古还是端坐不语，像一座雕像。没有这位年轻的党的领袖的毫无保留的支持，自己指挥千军万马的这种特殊身份是难以维持下去的。博古信心动摇了——李德转念至此，心底一阵悲凉。

渡过湘江以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缩小军团、师级的直属队，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和兵站，将所有后方机关直属队编余人员充实作战部队，全军进行轻装，抛弃和销毁不必要的担子。

部队继续西进。

毛泽东身体逐渐恢复了。他在中央队行列里走着。后面跟着警卫人员，抬担架的战士，最后面马夫牵着那匹黄膘马，马背上驮着这一行人吃穿用的东西。

前面传下原地休息的口令。警卫员陈昌看见里间房子，近前一看，都上了锁，老百姓全跑光了。只有一间柴房没有门，可以避避风寒，陈昌伸头一看，已有首长住下了。

‘同志，里头还有空地方吗？’

‘莫喊叫，影响人家休息，我们就在外头吧。’毛泽东上来制止。

‘泽东同志，进来休息吧，外头太冷了。’原来王稼祥在担架上躺着。

毛泽东诙谐地应道：‘好，承你盛情相邀，就借你这“广厦”一间，庇我户外寒士吧！’毛泽东弯腰进来，王稼祥的警卫员早把柴草聚拢，暄暄地堆成了一个软座，扶毛泽东坐下。

‘你的伤势怎样？炎症是否减轻？’毛泽东上前问候。

‘因为弹片没有取出来，一直流浓，只好每天换绷带。你身体怎样？要多多保重呀！’王稼祥边说边吃力地坐起来。

烟瘾很大的毛泽东摸出了两支烟，递过去一支。王稼祥摆了摆手：‘现在不能抽。今天上午，军委发出了关于宿营地防火的指示。一进入苗区，发生了几起火灾，敌人也纵火给我军栽脏。咱们这间房子，半屋子柴草，一旦失火我们就成了纵火犯了。’

毛泽东一听忙说：‘那我们只能克服一下喽！’说罢把烟卷举到鼻子跟前，嗅那烟草的香味。边嗅边说：‘烟瘾好过，身病也能挺，

可打败仗的心病难治啊！’

王稼祥这几天昼夜思虑红军的出路，摆脱目前危机的办法，正想找个人谈一谈呢。就开门见山地说：‘毛泽东同志，你对当前的局势怎么看？’

毛泽东略停了几秒，反问道：‘你呢？你有什么看法？’

‘我吗，一句话，不能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了。’

‘那么依你之见，我们如何摆脱困境呢？’毛泽东又追问一句。

王稼祥说：‘我正在考虑，还没有理出个头绪来，所以想请教于你。’

毛泽东敏感地感觉到，最高领导层摊牌的时机快到了。他咳嗽一声，清了一下嗓子说：‘那么我就先抒愚见，抛砖引玉，再听你的高论。打仗是兵不厌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敌人摸不着自己的底细和意图，才能出奇制胜，把仗打赢。李德他们指挥打仗，认准一个方向，死也不回头，连迂过一下都觉得不像革命军队的样子，这样打法，怎能不败呢。’

‘过江前，彭德怀写信给中央，建议不在湘江决战，他带三军团往长沙那边打，把敌人引开，在敌人重新调动部署中，我主力寻机歼敌，然后再奔湘西。李德根本不予考虑，真是连迂过一下都不行。’王稼祥说。

远处前进号响了。警卫员提醒首长上路。毛泽东站起身，拍打一下身上的草屑说：

‘你我边走边谈，来个谈话行军两不误吧。’

毛泽东出门也上了担架。他们行军谈,休息谈,宿营时住在一起谈,愈说愈投缘。

这时,蒋介石判断,朱毛红军还是要往湘西与贺萧部会师,遂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部署二十万兵力,设了四道防线。这个情报很快地传入了红军总司令部。

李德自从发现博古因湘江失败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就有一种孤掌难鸣之感。一定要鼓起他的勇气来。没有他的支持,我这个顾问是很难发挥作用的——李德连日来反覆思考这个问题。他们用俄语交流思想,避开翻译,可以敞开心扉,无话不谈。博古也力图重振自己的勇气,他要从李德那里汲取信心和力量。所以也乐于和李德交谈。他们也是行军谈,休息谈,宿营时住在一起谈。

‘波古良,湘江一战,损失是大了些,但我们毕竟是过来了,向着既定目标前进了一大步。让拿破仑来指挥,这个仗也得这样打。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慈不掌兵。作为高级领导人,不能因为看见死多一些,就在战略上动摇。’

‘利得洛夫同志,你反覆向我说明了到湖南西部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一战略思想我是坚决支持你的。不过在选择行军路线和作战方法上,我希望你多考虑恩来和朱德的意见,少一点伤亡多保存一些力量,国际对这次转移也是非常强调这一点的。’

‘波古良’两人原来是躺在床上说话的,李德一激动坐起来了,点上一根雪茄,深深吸了一口,才接着说:‘拿破仑早就说过:两个

优秀的总司令，不如一个蹩脚的总司令。军事行动上要专一独断，不要怕议论纷纷，等我们和二、六军团会师后，打几个胜仗，重新开展局面，他们自然就无话可讲了。

博古静静地听着。

出发前项英找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介绍了一九三〇年左右毛泽东对持不同意见的干部所进行的迫害。他担心毛如果掌了大权，你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忠于国际主义原则的同志，都会成为阶下之囚。因此，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

‘利得洛夫同志，感谢你的提醒。对这一点我是有警惕的，那天毛泽东亲自同我谈过，大敌当前，他绝不会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恩来跟我说他向毛通报过和陈济棠秘密谈判的情况，出发前行军路线的选择，也征求过毛的意见。所以一路上还没听说毛说三道四。’

‘我看他那天把三十四师师长包庇起来，就是对你的权威的公开挑战。’李德想激怒博古。

博古又沉默了。

在另一处红军营地，谈话也在进行着。

毛泽东虽然已经失去军职，但每到宿营地，仍像过去指挥一、二、三次反‘围剿’那样，让警卫员为他搭起办公桌，点上马灯，铺开军用地图，对着战报，研究战场形势的变化。这天晚上匆匆吃过晚饭刚把摊子铺开，王稼祥在警卫员的搀扶下进来了。

‘稼祥同志，你来看，敌人已经发现了我军想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在我军前进的方向；调集了十五个师的兵力部署于城步、绥宁、靖县、洪江、黔阳、芷江一线，赶筑工事，张网以待。可是李德同志非要带上三万疲惫之师，去钻敌人的口袋，你说他傻不傻？’

王稼祥慢慢地坐在一个铁皮文件箱上，扶正眼镜看着地图。他虽然不懂军事，有些标图符号也弄不清楚代表什么意思，但一支红色的箭头正投入蓝军的封锁线，那是一目了然的。

‘明明预见到危险，当然不能往敌人口袋里钻！’王稼祥抬起头对着毛泽东，递过一支烟来，毛泽东忙划火柴，二人点上，相对无言片刻。

‘泽东同志，依你之见，我们的路线怎么走呢？’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据最新情报，贵州方面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防御体系，我们可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乘虚而入贵州，让蒋介石十几万人马在湘西修碉筑路白忙一场。’‘应该这么办，来个避实就虚。’王稼祥不住地颌首。

‘可惜他们不这样看。’

‘未必，我看现在很多同志都会赞同你的意见。’

‘你看哪些人会赞同我的意见？’

‘我看政治局内就有同志是尊重你的意见的。’

‘你最近同他们交谈过吗？’

‘我同洛甫同志交换过意见。’好，一花不是春，独木不成林。我们可以再找些同志交换交换看法。’

‘我一定把你转兵贵州的意见告诉同志们。’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省通道县城。

第二天，在通道的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议，李德称之为‘飞行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关于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也没有形成什么决议，李德的回忆，是六位当事人留下的唯一的文字材料，这段回忆与有关资料相对照，大体上是真实客观的。

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计划时，我提醒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 this 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注：李德说的‘中央三人小组’指毛泽东、洛甫、王稼祥。

本无所谓‘中央三人小组’，李德是在讽刺的意义上这样称谓的。)

(奥托·布劳恩：《(中国记事)》第二一四页)

红军继续西进。十二月十五日红一师攻占贵州省之黎平，九军团攻占锦平。军委一、二纵队在洪州小寨地域休整。鉴于过湘江的惨痛教训，把庞大的挑夫队伍解散了，下狠心甩掉一些东西。凡是能战斗的人，都补充到战斗部队。余下的成立一个队，主要管资财、供给和档案，留一批担子和驮子，由杨立三当队长，毛泽民当副队长，刘英当指导员。这一下子精干多了。军委一、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调回因和李德争吵被贬到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复任总参谋长并兼中央纵队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撤销红八军团番号，将红八军团余部编入红五军团。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黎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李德因发烧没有出席。没有李德在场，博古在军事问题上拿不出独立主张来。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成为主要发言人，他的意见获得了多数的赞同和支持。最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

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

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中央红军二十日从黎平出发,经南加堡、革东、施秉,三十一日到达瓮安县猴场(今草塘)。部队正在准备抢渡乌江,李德、博古又提出来不过乌江,还是要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在猴场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

36 遵义会议 毛泽东东山再起

乌江战败 吴奇伟过河拆桥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仍往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的意见，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

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在目前转入反攻，已具有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这种形势之下，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的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的取得胜利。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

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猴场会议实际上停止了‘三人团’的最高指挥权，重申中央政治局的权威，为开好遵义会议作了准备。

乌江又称黔江，是贵州的第一道大川，从西南贯通贵州东部，向东流，整个贵州被它隔成两半，号称贵州第二大城市的遵义，就位于乌江以北。

周恩来、朱德因忙于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准备，委托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红二师强渡乌江，攻占遵义。

一月三日，红二师第四团在耿飏团长、杨成武政委的率领下，强渡成功，突破黔军江防司令林秀生三个团的防线，控制了渡口。

一月四日十七时，军委主席朱德电令刘伯承：

一、望令二师今晚攻占猪场并向溃敌跟踪追击。

二、当敌向团溪、遵义、大蔡溃退时，我二师应将敌压至水边消灭之，并迅速取得羊岩卡渡河点以便明日进行架桥；当敌向湄潭大道溃退时，应以得力部队进行追击，二师主力则于明五日晨进至羊岩卡渡河点，并进行架桥。

三、江界河浮桥架成后，云逸即率干部团第七连及工兵营（缺一连）开至猪场，并准五日开往羊岩卡渡河点架桥。

猪场是黔军江防司令部所在地。红二师主力在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的率领下，乘渡江胜利的余威于当晚占领猪场，林秀生率残部逃往遵义。

红二师派第六团为攻取遵义的先头团，师主力随后跟进。第六团在遵义城外三十里的小镇深溪水，抓了一批黔军俘虏，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计上心来，决心化装成败退的黔军去诈城，这个主意受到刘总参谋长的赞扬。这出戏的主要角色由第一营长曾宝堂担任。他带着第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二三十个司号员，都换上了黔军的服装，让一个被俘的连长和十几个士兵走在前面，大部队在稍后的地方跟进，准备万一诈城不得手，便强攻。

这是一个大雨之夜。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路滑得像泼上了油。行军队列里不断有人跌跤，差不多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身泥水，真像是深溪水逃回来的败兵。急行军两个多小时，大雨停了。透过夜幕，见前面城楼上一灯摇曳。曾营长小声下令：‘跑步前进。’于是队伍急速地向南门跑去。

‘干什么的？’城楼上的哨兵发出一句凶狠的问话，接着拉动枪栓，子弹上了膛。

‘自己人。’一个俘虏兵用贵州话纵容回答。

‘哪一部分？’

俘虏的那个连长出场了。他的身份还是连长。只听他丧气地回答：‘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匪’包围了，庄子丢了，营长也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弟兄进出来了，快开门吧。’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

那俘虏的连长毫不迟疑地答上了。

城楼上沉闷了一阵子,看样子正在分析这批‘自己人’是真是假。只听城门外人声嘈杂,连骂连嚷:‘快开门呀,‘共匪’马上就追上来啦!’

‘吵什么!’一个口气很冲的军官大喝一声。接着从城楼上射下来几道手电光束,在这群‘败兵’身上照来照去。一看,果然全是‘自己人’。于是传话:‘别吵,等着,这就给你们开门。’

等门一开,前卫连一拥而入,先把城楼上的敌人收拾掉了。二三十个司号员一齐吹起来了冲锋号,几里以外的红二师主力跑步前进,一瞬间,像洪水和疾风一般冲入城门。守敌也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早已失去抵抗能力,一部被俘,一部从北门逃走。驻守遵义的黔军川南边防司令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在红军突破乌江时就逃走了。

刘伯承立即将红二师袭占遵义的经过报告朱总司令。一月七日二十一时十分,中央军委通告全军:‘我二师今二时已经袭占遵义,敌由北门溃逃,我正乘胜追击中。’

一月八日《朱关于我军九日行动的部署》通知各军团:

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留干部团在遵义担任警卫工作。第一军团二师前出遵义北面桐梓、松坎一线,军团主力在遵义东面老婆场、青神桥、虾子场地

域；三军团在遵义南面的刀靶水、尚稽场，控制遵义通贵阳的公路，扼守乌江北岸；五军团在遵义东北的湄潭；九军团在遵义东南的猪场。

这时蒋介石派空军候侦察，得到的报告是红军在遵义、桐梓、仁怀一带集结，动向不明。由于红军通道转兵，不向湘西而进入贵州，使部署在湘西堵截红军的二十万国民党军置于无用之地。红军在遵义地区驻下了，蒋介石手头掌握的只有嫡系薛岳统领的八个师，编为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第二纵队司令周浑元。蒋在政略上的运用是利用追堵红军的机会，削弱西南各省军阀，达到一箭双雕，统一西南的目的。他在南昌行营对‘文胆’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黔、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第十五页）本着这样的政略，蒋置红军于遵义地区而暂时不顾，令薛岳率八个师不顾贵州军阀王家烈是否愿意，乘黔军乌江、遵义新败之际，以急行军长驱直入进占贵阳地区，令第一纵队集结在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在乌江南岸对遵义红军警戒。

正当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纵横捭阖、勾心斗角的时候，一月十五——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场设在

黔军旅长柏辉章的公馆。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博古、洛甫、周恩来，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列席会议的有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红星报》主编、准备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以及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上接连失利作了些检讨，但主要是强调客观原因，强调敌人的强大，作为不能在中央根据地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对组织指挥方面的失误主动承担了责任。然后，洛甫按照和毛泽东、王稼祥交换意见所形成的提纲，作了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基调发言。毛泽东又作了淋漓尽致的补充和发挥。接着王稼祥抱病站起来发言，支持洛、毛的意见，并郑重提议：立即改组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

那时中共党内对共产国际有很深的迷信。对国际支持的领导人是不敢轻易非议的。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发言，打破了这种迷信，其他出席和列席会议的同志，尤其是几位高级将领，多以激烈的言词批评李德的瞎指挥。他们举出了广昌战斗、三溪圩战斗、太阳嶂战斗、石城战斗等，搞‘短促突击’，打阵地战，每战都要付出

死伤二三千人的代价，三军团在一个短时期内老的连长完全死伤。在错误的军事指挥之下，从一九三三年五月到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的十五万红军新战士，除一部因政治工作薄弱而逃亡外，大部分牺牲了。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是第二天才赶到会场。因为会议是晚上进行，他先在新城看望了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四人相见后，毛泽东又把他领进自己的房间，让他细说红五军团的情况。李卓然说：‘长征以来，部队上上下下真是怨声载道……’毛泽东一听就说：‘好！你晚上到大会上发言，就这样讲，代表五军团，对洋本本和洋大人，来一个重炮轰击！’

只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何克全）为博古和李德辩护，攻击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只按《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来打仗。

据陈云一九三五年所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载，扩大会议最后作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A(按:李德)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洛甫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经常委审查修改后,发到中共全党各支部。决议指出: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了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争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说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激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博古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

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

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心情很好,但他深藏不露,倒显出心事重重的样子,慢慢地走着。具有文学修养的洛甫,信口吟了两句诗:‘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希望你和恩来、朱德同志一起,精心运筹,打两个胜仗,扭转被动局面。’

毛泽东说:‘个人岂有回天力,众志成城土变金。还是要靠大家,靠我们这个领导集体。’

二人交谈着,到了驻地——一位军阀的小公馆。因为二人同住在一幢楼房里,洛甫到毛泽东屋里小坐,见桌上一擦旧报纸,还有敌人散发的传单、宣传品,他信手拿了几份翻阅。一则报道引起了他的注意,不由地念出声来:

据悉,朱德在遵义地区猪头山一役中已被击毙。朱德当时率领部队企图攻占贵阳。……

尾体尚未入棺。……现用红绸里缠由其亲信抬运。……朱德由于重伤,不治而死。……其亲

信在逃命之暇,不断在红绸里缠的尾体前用三牲祭祀……现经证实共匪残余已不足一万人。

洛甫轻蔑地把报纸扔在桌上:‘谣言造得太离奇了。看这个简直是浪费时间。’

毛泽东笑道:‘洛甫同志,你莫生气。这可是有用之物,要知己

知彼,你就得多看看这些东西。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朱老总早已形同靠边,毛某人被免去军职,可是白区报纸老是讲‘朱毛匪首’如何如何,这说明蒋介石的情报机构、新闻机构,消息是很不灵通的。’

洛甫深有所感地说:

‘你和朱德同志是党和红军的两面旗帜。’

毛泽东对洛甫能有这样的认识,心里很满意。把早已想好的话水到渠成地告诉洛甫:

‘我建议你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我的能力和威望都不够,还是你或者恩来负总责吧。’洛甫谦辞。

‘我和恩来、朱德同志,集中精力把仗打好,当前急务是要跳出敌人围堵的圈子,把这支队伍带出去。党内的事情你就多管一些吧。如果这样可以,我再和恩来、朱德等同志通通气。’

洛甫没再推让。

‘还有一件事,我们应该想到。’毛泽东点了一支烟接着说。

‘什么事?’洛甫两眼盯着毛泽东。

‘李德是国际派来的顾问,博古也是国际指定的党的负责人,现在有了变化,我们应该主动报告,取得国际的支持。’毛泽东一副深谋远虑的样子。

‘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也想到了,但和上海的无线电联

系断了,电报发不出去怎么办?’洛甫说。

‘派个人去吧。’

‘你看派谁呢?’

‘陈云同志。’

‘好,陈云同志可以把这里的形势和会议情况向国际作全面汇报。’

经和周恩来商量,周提议增派潘汉年,陈潘各走各的,万一一人路上发生意外,另一人还可以去联系,这样保险系数大些。但因处在敌人包围中走不出去,直至五月三十一日红军占领泸定后,陈云才带着神秘的使命,化装成一个商人,取道重庆、上海,乘船到苏联去了:潘汉年则从香港上船赴苏。这是后话。

听到遵义会议的情况,贺子珍非常高兴。她知道毛泽东爱吃鱼,就到街市上买了两条鲜鱼回来,红烧鱼,加上辣椒;又做了两个菜。听他们谈话告一段落,就张罗说:‘快吃饭吧,晚饭快成夜宵了。’

毛泽东笑着说:‘来,尝尝子珍烧的地道的湖南菜。’

‘我还是喜欢湖南风味的。’洛甫笑着就坐。

‘爱吃湖南菜就得讨个湖南老婆。’毛泽东不失幽默和机智,说出了一句惊人的话:‘你是否看上了我们湖南女子刘英?’

刘英留苏时叫尤克娜,容颜秀美,体态轻盈,性格开朗,落落大方。洛甫作为红色教授讲课时,尤克娜问这问那,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几年虽同在苏区工作,但自己身份高了,与她接触的机

会反而少了。毛泽东观察问题真细呀！洛甫想到这里，扶了一下眼镜，面带羞涩地说：

‘印象是不错，不过现在成天行军打仗，个人事情等环境安定下来再说吧。’

‘结婚是得等环境安定下来，谈恋爱则不必。穆桂英和杨宗保，不是在两军阵前还在谈恋爱吗？’

这句玩笑把洛甫和贺子珍都说乐了。

毛泽东接着说：‘好，我来玉成此事，君子成人之美嘛。’

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在贵州、云南、四川三省边界的交汇点上，这个村子叫‘鸡鸣三省’，博古把党内负总责的职务交给了洛甫。从此人们习惯地称洛甫为总书记。

不久，刘英接到调令，上写：‘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后面签署是：李富春。

刘英骑马来到中央队管地，见到毛泽东和王稼祥。毛泽东笑着问：‘刘英，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

‘李富春呗。’‘是我提议你来的。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了。’

‘小平能文能武，精明强干，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我干不了。’

毛泽东和王稼祥异口同声地说：‘你干得了。’说罢两人都笑了，笑得有些异样。

这时洛甫从外边回来了，见了刘英，丝毫不掩饰高兴的心情，

说：‘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中央开会时做个记录。’

从此，刘英就留在洛甫身边工作了，到了瓦窑堡他们才结婚。

遵义会议后，中央常委分头到各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来到了红一军团。聂荣臻因为脚伤暂随中央纵队行军。林彪在遵义会议后同意李德来一军团‘体验生活’。为了甩掉敌人，最近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部队跑路多一些，林彪又啧有烦言，甚至发电报给军委，说‘弄清我们的位置再下命令。’对于林彪的态度，毛泽东有些放心不下。到了一军团司令部，他先找林彪谈话。然后又会见了李德。李德一进门，毛泽东上前热情和他握手，说：

‘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动机是高尚的，是要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想把事情办坏，前一段仗没有打好。主要的应由中国同志负责。你和你的同胞赛克特是不同的，他是来帮助蒋介石，镇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是坏心办坏事；而你是好心办了坏事。’

李德说：‘我很欣赏主席说我和我的同胞赛克特不同这一番话，我们的不同就像毛主席和蒋委员长之不同一样。’

毛泽东又接见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政治部主任谭政。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解释目前的作战行动中所以频繁的转移，‘是为了寻求有利的时机和地区消灭敌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一渡赤水向西

来,是打算从宜宾到泸州一带北渡长江,现在川军重兵守江防,我们就再转回去,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军委改变渡江计划而产生别的什么想法,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大家要作好思想上的准备。’

阴历大年三十,大雪纷飞,山岭沟壑一片银白世界。中央红军转移到云南东北部的扎西一带休整过年。利用休整时机,全军进行了整编。红一、三军团各编四个团,五、九军团各编三个团,加上干部团和警卫团,红一方面军共十六个团。

这时蒋介石也重新调整了部署,将湘军改为第一路军,在湘西‘围剿’红军二、六军团;薛岳兵团和滇黔地方军阀部队组成第二路军,以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辖四个纵队,以吴奇伟四个师为第一纵队,周浑元四个师为第二纵队,滇军孙渡部四个旅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四个师为第四纵队。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见敌军主力一、二纵队经黔西、大定西进,第三纵队到了镇雄、毕节,大军云集黔西,遵义地区只剩下王家烈的‘双枪兵’看家,乃迅速回头东进,二渡赤水,二月二十四日红一军团先头团在杨得志团长率领下攻占桐梓,守敌两个连向娄山关溃逃。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亲自到遵义坐镇指挥,令其精锐杜肇华旅守娄山关,企图凭山据险,以待援军。

娄山阴位于大娄山脉的主峰,海拔一千四百公尺,四周崇山峻岭,悬崖绝壁,地势十分险要。娄山关北接桐梓县,南临遵义城,在群山中,只有一条险要环山公路贯通川黔两省,为川黔两省交通来

往的孔道，黔北的门户，素以军事要隘闻名，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二月二十五日二十三时，军委主席朱德发出《关于我军消灭娄山关黔敌夺取遵义的指示》：

林聂彭杨：

甲、敌情如你们所知，估计守娄山关、黑神庙的柏〔辉章〕杜〔肇华〕两部〔旅〕，可能为黔军第一、第四、第五、第八、十五、十六共六个团，或仅一部共三个团，有凭娄山关相机出击阻我南下，掩护遵义，以待薛敌来援的模样。

乙、我野战军决以一部阻滞四川追敌主力，坚决消灭娄山之黔敌，乘胜争取遵义城，

以开展局面。我五、九军团主力明二十六日均移官店，其两个后卫团分在温水与新罗坝两阻滞川敌，并令其在二十九日以前不该敌逼近桐梓。

丙、我一、三两军团及干部团统归彭杨指挥，应于明二十六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坚决消灭之，并乘胜夺取遵义，以开赤化黔北之关。

二十六日拂晓，大雾迷漫。红一、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下向娄山关发起总攻。彭德怀令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团同时投入战斗。其部署是第十二、第十三团担任主攻，从正面攻

击,力求迅速突破敌人阵地。第十、第十一团从东面迂回板桥之敌,断敌后路,阻其增援。在关口点灯山一带山梁上,红三军团与敌展开异常激烈、反覆争夺的肉搏战,始夺占娄山关。第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员重伤。红一军团主力从娄山关东西两侧向敌后方板桥地区迂回,攻占黑神庙、板桥、观音阁等地,残敌退往遵义。

坐镇遵义的王家烈见红军主力来取遵义,自知不敌,本想保存实力,走为上计,但蒋介石派了两个‘督察专员’,一个叫路邦道,一个叫潘壮飞,朝夕不离监视着他,不打一下子这两位专员就不答应。于是只好硬着头皮,收集兵力作孤注一掷,对遵义守城战作了如下布置:命第八团开赴遵义城北十华里之董公祠一带构筑阵地,准备对红军迎击,并掩护由娄山关退下来的刘鹤鸣的第六团;命江荣华第一团在董公祠以西飞来石一带构筑阵地准备抵抗:刚由金沙开来的第五团在遵义城垣集结作预备队。

二十七日拂晓,红军一、三军团在遵义以北之董公祠与黔军三个团展开激战。王家烈要两位督察专员陪他去前线视察阵地,两位专员怕当俘虏推脱了。他拉上副军长犹国材来到凤朝门郊外观察形势,得知杜肇华和第一团团长江荣华负伤,第八团伤亡很大,防线已呈动摇。遂令第一、第五、第六各团退入遵义城垣,由刘鹤鸣指挥守城;万式炯率第八团退守南门关高地。王家烈与犹国材带手枪排逃往忠庄铺吴奇伟指挥所。二十八日晨红军占领遵义。攻城时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中弹牺牲。

二十八日上午,蒋军嫡系第一纵队司令员吴奇伟率第五十九

师(师长韩汉英)、第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从乌江南岸驰援遵义,向遵义南门外老鸭山发动猛烈进攻。红三军团主力在老鸭山红花岗与敌人展开激烈的争夺,打得十分艰苦。坚守红花岗主阵地的红十团,有很大伤亡,团长张宗逊负伤,参谋长钟伟剑牺牲,只剩下政委黄克诚在指挥战斗。这时干部团在团长陈广、政委宋任穷的率领下从侧翼出击,配合红十团打退了敌人,歼敌第五十九师大部,歼敌向鸭溪方向撤退。红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率领下担负起追击敌人的任务,一直追到乌江边。吴奇伟怕当俘虏,带着补充团到达乌江南岸后,下令斩断乌江上的浮桥保险索,把一千多官兵留在江北岸当红军的俘虏。

遵义大捷,是长征以来第一个令红军将士扬眉吐气的胜仗。五天之内,红军十六个团在国民党军六十个团的跟追堵截中,迅速回头,避实击虚,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人(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内部报告是柏辉章、转汉英、唐云山三个师均损失过半,伤亡损耗在万人以上),这是高级指挥员的真本事和硬功夫。这一仗给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十八时中央军委朱、周、王发布关于设前敌司令部,并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命令。广大指战员由此得知,毛泽东又参予领导和指挥作战了,信心和士气倍增。

蒋介石接到遵义战报大发脾气,给薛岳发来电报,说遵义之败

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并下令说：‘今后在 frontline 作战，不论是追是堵，是攻是防，如不与阵地、城池共存，未奉命即逃避者，一律治以失守纵敌之罪。’此处置，蒋介石意犹未尽，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带上宋美龄、陈诚和晏道刚，飞往重庆，住在范庄（川军师长范绍增公馆），亲自指挥西南军事。

蒋介石判断朱毛红军甩头东指，还是要往湘西与贺龙、萧克部会合。不料三月中旬红军又三渡赤水，跳到西进去了。于是，蒋在范庄召集幕僚研究红军动向。陈诚认为：‘我军遵义之败证明、匪军战力仍未消灭，不可轻视；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匪军徘徊于此绝，乃大方针未定之表现。’蒋频频点头说：‘辞修所见有理。’晏道刚原是作战庭副庭长，对军事也属内行，就乘机献策说：‘这一带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大部队无法行动，共匪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鉴于遵义之失，我军不要轻易地打运动战，还是修路筑碉，像江西那样的办法，长围久困，敌军自然瓦解。’‘好！好！好！’蒋介石一里叠声新的决心就形成了。晏道刚马上拿起纸笔，蒋对着地图口述命令：

令薛岳各纵队尾追侧击，采取在江西修碉围攻的办法，步步向赤水包围；

调李韫珩部（五十三师）由黔东开遵义，在该城周围修碉；

调上官云相部（第九军）在桐梓、遵义间修碉筑路；

电告刘湘(四川‘剿匪’总司令)加强泸州上下一带长江防线，并挺进至长江南叙永、

赤水、土城、古蔺地区修碉封锁；

电龙云以孙渡部进至大定、毕节以东地区防堵，修碉封锁，并切实加强封锁横江。

电报发出后，蒋介石恐前方将士敷衍塞责，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四日飞往贵阳督师，随行人员中又添了澳国顾问端纳，以及顾祝同、吴忠信等。蒋到贵阳，在乐会巷设行营。这里原是黔军老军阀毛光翔的私宅。蒋与宋美龄住在二楼，两头楼梯口设双卫兵，除了端纳、顾祝同、陈诚、吴忠信、晏道刚等几位大员外，任何人不经传唤不得上楼。电话一架通，蒋立即找前敌总指挥薛岳听电话，令他千方百计把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侦察清楚，并派出飞机空中侦察但一连三天薛岳都没有肯定的回话，吱吱唔唔，似是而非，情况不少，就是不能判定红军主力的动向。气得蒋介石把电话听筒摔在地板上，顿足大骂不止。

37 假道伐虢 剪除军阀王家烈

舍己救人 巾幗英雄贺子珍

遵义战败后，王家烈到金沙收集残部，江荣华、李维亚、刘鹤鸣、万式炯各团相继开来，一星期后，戴玉堂、周相魁两团由赤水到金沙，第一师师长何知重、第二师师长柏辉章也到了。王家烈一看，部队虽然残破，还能撑起两师六团的架子。这是王家烈的嫡系。黔军还有犹国才、蒋在珍、侯之担三个，名义上归属第二十五军，实际上各霸一方，王家烈指挥不动。经过和师团长们商量，遵义丢了，贵阳在给蒋介石布置行营，蒋马上要来，也不敢回去，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转到黔西驻防。

王家躲开蒋介石，蒋介石却没有忘记王家烈。蒋亲自到贵阳督师，就是玩的‘假道伐虢’之计，以‘剿共’为由入黔，剪除贵州军阀王家烈。他把代替王家烈的人选吴忠信都带来了。

三月十五日，王家烈刚在黔西布置就绪，就接到了为蒋设管打前站的李仲公来电，约王到贵阳面叙。王家烈心想可能是前省主

席毛光翔的房子不宽敞，或是还有什么别的事需要我帮助解决，满腹猜疑来到贵阳。到乐会巷见了李仲公。李仲公满脸严肃，客气话一句没有，开门见山地说：‘蒋先生让我征你的意见，希望你对贵州的政治和军事专搞一样，你愿意主军还是主政？’

王家烈心想，老蒋果然毒辣，以追剿红军为借口，大军压境，搞掉我王家烈，但敛住气，平静地说：‘共匪入黔以来，我谨遵委座命令，亲赴前线督战，不无微功，何以要撤我？军长不兼主席就军费无着，主席不兼军长就没有保障。’

李仲公微微一笑：‘败军之将不可言功。你继续主政，还不是把贵州送给共产党吗！你想两者都不丢，恐怕两者都不保。委座叫你选一样，是对你的照顾。’

王家烈无奈，回答说：‘政治非我所长，我愿专搞军事。’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派与王家烈有私交的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省主席何成浚由武汉来贵阳劝说王家烈，安抚中带有威胁，于是王家烈彻底服输，答应交出贵州省主席，但要保住第二十五军军长，何成浚拍胸脯担保。

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到贵阳。三十日即明令免去王家烈贵州省主席职务，发表王为‘第二路军追剿总指挥’，同时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贵州毗邻广西。王家烈走私鸦片，广西获利甚多。王家烈长期以来与李宗仁、白崇禧交好，免去王家烈的贵州省主席，等于断了李、白的一条财路，当然会引起桂系不满。而吴忠信与李、白有私交，以吴代王，鸦片财路不致全断，可以缓和与桂系的

矛盾。这是蒋介石在纵横捭阖中的精明之处。然而，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刘湘、龙云、何键一见王家烈的下场，就更加把保存实力，保存地盘放在‘剿共’之上，蒋介石再说多少‘同心同德，以竟全功’一都没有用了。蒋介石作为阴谋家是第一流的，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是蹩脚的。

王家烈交卸了省主席的职务，保住了第二十五军军长的职务，又获得一个‘第二路军追剿指挥’的虚衔，觉得面子上还过得去，就又回到了黔西军中。谁知见了何知重、柏辉章一说，两位师长拥戴他专任主席辞去军长。理由是‘军座当主席可以解决全军军饷问题，我们照样听命于你；如辞去主席，全军薪饷无来源，部队怎么生存下去？问题明摆着，事情已不可翻悔，这是逼王家烈连军长也辞掉。

原来在王家烈去贵阳期间，蒋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来到第二十五军密与何、柏两师长会晤，说不要军这一级，可编为直辖师，直属中央统辖，可领实足军饷，再不会受王家烈从中扣，并秘密给何知重大洋五万元，给柏辉章三万元。所以王家烈一回来，两位亲信师长都变了腔调。

王家烈急于整编部队。心想只要在今后与红军作战中卖卖力气，军长还是可以当下去的。仗正在打着，蒋总要用人嘛。我替你带兵打仗，你就得给我发饷。岂料这是王家烈的一厢情愿。蒋介石发话下来，部队未缩编，未经点验，暂不能发饷。晏道刚作为监军等着点验部队发饷。各级军官则强烈要求先发饷才能缩编。这

时,侯之担师已被薛岳吞并,改编为新编二十五师,调薛部第四军第五十九师副师长沈久成任师长,侯之担因乌江失守被撤;犹国材师改编为第一二一师,原参谋长吴剑平出任师长;蒋在珍师改编入新八师,蒋仍任师长。何知重、柏辉章两师五个旅十五个团给以第一〇一、第一〇三师番号,撤消旅的建制,缩编为六个团。缩编要遣散部分官兵,当然用钱。蒋介石扣住饷不发,就是叫王家烈缩编不成;而缩编不成又反过来成了蒋不发饷的理由。于是鸡生蛋,蛋生鸡,吵过来,吵过去,闹得乌烟瘴气,不可开交。一日,王家烈正和晏道刚、何知重、柏辉章议事,营长令狐作宾带着一群官兵前来闹响。令狐说:‘一日无粮千军散。现在我们营已然揭不开锅了,我只好把弟兄们送到军部来。’士兵们吵吵嚷嚷,大骂王家烈喝兵血,叫王家烈出来跟大家见面。柏辉章见是他们师的官兵来闹,出面讲了几句,说是军长正在想办法,三天内一定给弟兄们发饷,闹饷的官兵骂骂咧咧地散去。

王家烈这才看明白:全军上下串通起来逼他走,他已成了孤家寡人,在第二十五军已无容身之地了。当天愤然离开军部回贵阳面见蒋介石,要求辞去军职。出外考察。蒋介石皮里阳秋地说:‘辜负了你啊!在国内各地看就行了。’第二天,《中央日报》和贵州地方报纸同时公布:任命王家烈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后又派他到武汉行营,在老朋友何成浚的照拂下养起来了。临走蒋送他五千元旅费。

在遵义与红军打仗,蒋介石是赢家;在贵阳与王家烈斗法,蒋

介石是赢家。剪除了王家烈，贵州、的大宗鸦片收入抓到自己手里，蒋觉得一阵快意，面部天气也阴转晴。

二占遵义以后，红军各军团都举行了祝捷大会，改善伙食，补发物资装备，整理个人卫生，进行短期休整。

中央纵队回师遵义城。毛泽东这时身体已完全康复，不坐担架，不骑马，跟身边的年青战士们一起行军。过一个路口时，见一位六七十几的老妪，领着小孙子，身穿破烂单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老人手里举着一个粗瓷碗，里面空空的，既没有钱也没有食物，由于冻饿已经迈不动步了，一老一小。慢慢地向前蹭。毛泽东叫警卫员停下来，拿干粮给祖孙二人吃，还当场把身上穿的一件毛线衣脱下叫老人穿上，又叫警卫员拿过两条装满白米的干粮袋送给老人。老婆婆当场就给毛泽东跪下磕头，感谢救命恩人。毛泽东忙把老人扶起来，把他的竹棍穿在米袋子中间，叫她和小孙子抬着走。老人说：‘恩人尊姓大名？我要天天在菩萨面前磕头保佑你……’毛泽东说：‘我们是红军，是劳动人民的军队，你就记住红军吧。’老婆婆念叨着红军向相反的方向慢慢走去。这时红军战士驻足围观者甚多，毛泽东对大家说：‘这个老婆婆和她的孙子，是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缩影。我们就是为他们去打天下。’

毛泽东和蒋介石争天下，这时候确实是叫化子跟龙王爷比宝。蒋介石到了贵阳，宋子文给送来的特别费是一百万银元。所以蒋挥金如土，他用银弹打败了王家烈，八万元收买了王的两个追随多年的亲信师长。毛现在虽然名份上是与蒋对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主席，但手中没有分文，只能从身上脱下一件毛线衣来周济穷人。但历史将要证明：这一件毛线衣的作用，比那一百万银元的作用还要大。

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军委关于作战计划的汇报。会议由洛甫主持。在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时，出现了意见分歧。多数人同意打；毛泽东力主不打，他预计红军十二日才能赶到新场，届时滇军也将赶到新场和黔军会合，同时川军还可能侧击红军。但与会多数主张打。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以辞去前敌政治委员之职相力争。主持会议的洛甫觉得不便专断否定多数人的意见，就宣布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表决结果，还是打的意见占上风。毛既已说出如要打他就辞职，批准了打的方案也就是批准了毛的辞职。晚上，毛泽东到周恩来住处，建议推迟下命令，再加考虑。周当即召开少数决策人研究，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说服了大家。当晚二十一时，军委下令不进攻打鼓新场，而向平安寨、枫香坎、花苗田地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其后，鉴于战场形势变化快，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在南渡乌江以前，中央决定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但在组织上还是周恩来为首，周很尊重毛，实际上毛泽东的意见往往成为三人团的最后决策。

三月十六日，中央红军三渡赤水，由茅台渡河西进。由于川军郭勋祺师尾追，毕节、赤水滇军孙渡部截击，周毛朱令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专向古蔺方向佯动，伪装主力西进，红军大队又迅速掉

头,二十日在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似流水疾风一般向东转南,直逼乌江。又派出红九军团在马鬃岭西北大路上摆露天标语,路两侧放烟火扮炊烟,伪装主力正在此地区活动,并向北出击。大部队在南进途中,一闻飞机声,立即向后转佯装北进,待敌机走后再转身南下。蒋的前敌总指挥薛岳,除了飞机侦察,别无情报来源,他每天派飞机侦察回来,都是一堆互相矛盾的情况,后来他亲自听取飞行员小报,以断真伪。

甲说:我亲自看见红军大队向北行军。

乙说:我见马鬃岭一带炊烟四起,似有大部队驻扎。

丙说:我看见一股队伍向南走。

‘到底是向北还是向南,你们看清了没有?’薛岳发火了。

三个飞行员面面相觑,都怔住了。

‘总座的意思是……’其中的一位想问薛岳:你想让我们怎么说?

‘我没什么意思,只要你们讲真话。搞清了共匪的真实动向,委员长好下决心部署兵力,极峰跟我们要的是真实情况,你们懂这个意思吗?’

三个飞行员频频点头表示会意,又异口同声地说:‘我讲的是真实情况。’

所以薛岳向蒋介石报告,只罗列情况,不分析归纳。没有判断和结论,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气得蒋介石摔了电话机,顿足大骂的详情。

四月初的一天，终于搞清了红军真实动向，蒋介石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出席的有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何成浚、晏道刚、吴忠信。吴就贵州省主席后新任命的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副司令郭思演、贵阳公安局长萧树经。蒋宣布会议开始后，首由顾祝同报告敌情，顾说：‘据息峰、开阳县长的电话，共匪的主力由乌江下游南渡，前锋已过开阳县境，有进犯贵阳的企图，贵阳城防必须加强。请王司令指挥一个宪兵营、两个消防连及警察四百余人负城防责任，在三天内把城垣周围的碉堡修理竣事；萧局长的别动队四百余人警卫行营和严查户口。’

这时蒋介石插话：‘给孙渡（龙云的参谋长，时以第三纵队司令的名义在前方指挥作战）发报，带他的三个由安顺急行军到贵阳，加强守备。关于朱毛南渡乌江的战略企图，诸位有何见解，请发表。’

陈诚起立：‘我以为共匪主力向贵阳扑来是虚张声势，意在转移我注意力，其真实目的是东进湖南实现其与贺萧部会合的根本企图。’陈诚像钻到蒋介石肚子里一样了解蒋内心的想法。故作此发言。

吴忠信发言：‘辞修所见极是。不过目前委座行营在此，委座一身击天下之安危，贵州的防务还是要适当加强。’他担心的是刚当上省主席，就把省城丢了。

蒋介石转向王天锡：‘三天把碉堡修好有把握吗？’

王天锡赶紧起立：‘只要一天一夜就可以完成。’

蒋说：‘不能草率罗！贵阳的得失。关系国际视听哩。’

王答：‘修好以后，请委员长派人视察，如不行。可以再修。’

次日黎明，蒋介石在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和王天锡陪同下亲自上城检查防御工事加固情况，回到行营后，把王天锡叫到办公室，当面嘉奖。这时顾祝同匆忙进来说：‘报告委座，刚才水田坝有多少电话来，敌人已过水田坝，快到天星寨了。’蒋介石由沙发上站起来，问王天锡：‘水田坝距贵阳有多少里路，在哪个方向？’王答：‘在东北角，距贵阳大约三十华里。’蒋在地毯上转了一圈又问：‘距清镇飞机场多远？’王天锡一时回答不出，要看一下地图计算里程，这时陈诚又跑来了，说：‘乌当来电话，敌人已过乌当。清镇也来电话，据报机场附近发现敌人便衣队，二十五军有一部分叛兵在机场附近滋扰。’

蒋默不作声，踱着步沉思良久，说：‘王司令，不经清镇，有便路到安顺吗？’

‘有。从次南门出去，经花溪走马场，可以直达平坝。平坝到安顺，只有六十多里了。’

‘你去准备一下。挑选二十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十二匹好马，两顶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

‘是。’王天锡唯唯而退。

十点左右。王天锡把蒋交办的事情一一准备停当，面蒋覆命。蒋喜形于色地告王：‘刚才郭思演由茶店来电话，说敌人由乌当过洗马河，向龙里、贵定方向走了。’这时，顾祝同、陈诚、端纳、吴忠信

等人都在座，蒋把军用地图摊在办公桌上，手里拿着一支红铅笔指着地图说：‘廖磊的一个军驻在都匀、独山，敌人为了避免消耗战，是不敢向南走的。我逆料他们必然出马场坪东下镇远出湘西。辞修，电薛伯陵由遵义东进石阡、余庆阻截，电何键把重兵摆在湘西。’

陈诚这一昼夜食不知味，寝不安席，混身上下不舒服。他深悔昨日会上出言唐突。竟没有把銮驾的安全摆在第一位。察言观色委员长仍亲切无间，但夫人似有冷淡之意。昨天夜里大骂副官蒋孝镇，说副官不关心委员长和她的安全，是否也有对我不满的意思呢……陈诚一直在胡思乱想。一听蒋介石叫他发报，马上站起身来，听完蒋介石的用兵决策，脸上兴奋地放光：‘我的意见是符合委员长的意图的。’他心里的话差点说出来。

侍卫来报：‘孙渡已到，等候传见。’

三月下旬，孙渡率第三纵队四个旅在古蔺、大定之间跨赤水河担任防堵任务。忽接蒋介石急电，除留预备旅留守外，立率第二、第五、第七旅星夜兼程赶赴贵阳。蒋对滇军‘勤王护驾’十分满意，说‘这才算真正的军队。’在接见孙渡时给孙特别费两万元，又单独接见三个旅长，各送特别费一万元。

蒋亲自给孙渡交代任务：‘现据飞机侦察报告，共匪已转至清水江附近，并在清水江上架有浮桥两座，队伍正在纷纷过江，向东急进，似有向黄平、施秉、镇远一带回转模样。第三纵队应先开赴黄平、施秉附近防堵，如该处无敌，应继续赶至镇远附近迎头阻

击。’孙渡领命，马不停蹄地率队东进。

蒋介石说的‘清水江上架有浮桥两座，队伍正在纷纷过江，向东急进’这是罗炳辉、蔡树藩率领的红九军团根据军委的意图所进行的佯动。这一招把蒋介石部署在遵义至贵阳线及其以西地区的主力部队，包括薛岳的第一、第二纵队，共八个师，孙渡的第三纵队三个旅都调到了贵州东部去了，贵州西部出现了一片空白。毛泽东在和刘伯承研究部署红九军团的佯动计划时就说：‘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把孙渡这只拦路虎调开了。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又于四月八日令红二师在陈光、刘亚楼率领下佯攻贵阳东面的龙里，以坚定蒋介石关于红军主力东去的判断；与此同时，率红军大队急转向南，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军防线，以每天一百二十华里的急行军，经青岩、定番（今惠水）、紫云西进。

一天下午，休养连的队伍经过一个苗族村寨。长征出发时就已怀孕的贺子珍感到阵阵腹痛，她预感到要分娩了。休养连连长侯政马上把医生、护士留下，在路边找了一间房子，把贺子珍抬了进去。

这间房子靠近路边，已久无人住，没有床，没有锅，也没有灶，连门都没有，只剩一个破门框。贺子珍只能躺在担架上分娩。护士想烧点热水，但既无柴，又无水，一时还找不到水源。队伍一列一列过去了。她们不能掉队太远，几个医务人员带个产妇遇见敌人是十分危险的。漫漫长征路上，一个产妇——尽管她是毛泽东

的妻子——的生活，回到了洪荒时代。在没一点水的情况下，她生下了第四个孩子，是一个女婴。衣裤上还残留着胞胎的血迹，她就被抬起来上路了。

毛泽东没有时间照料她，只有妯娌钱希钧（毛泽民的妻子）算是唯一的亲人在跟前。钱希钧用一个棉大衣把女婴包好，贺子珍掏出身上的全部财富——四块银元，交给钱希钧，有气无力地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吧。’

担架没走出多远，钱希钧抱着孩子又追上来说：‘大嫂。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或者留个什么信物，日后也好相认。’

贺子珍摇了摇头，刚毅地说：

‘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当个老百姓吧。’

毛泽东来看望贺子珍，把自己刚分到的一份火腿给贺子珍带来了。贺子珍说：‘我们这里也分了。董老（必武）来看我，关照给我分了两份，我没有接受特殊照顾，全军上下都很困难，我怎么能要两份呢，只留下了我应得的一份，那一份叫护士送回连部了。’贺子珍产后虚弱，喘息了一下，接着说：‘生了个女娃，也没跟你商量，我自己作主把孩子送走了。’毛泽东同意地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咱们干革命是为了下一代，但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一个星期以后，贺子珍就坚持不坐担架，和大家一起行军了。

部队越过了北盘江来到贵州和云南接壤的盘县。休养连宿营的地方叫作猪场。大家刚把头上的伪装(用树枝编成了帽圈)取下,忽然传来了敌机的嗡嗡声。司号员立即吹号叫大家隐蔽。

休养连支部书记董必武正召开支委会,徐特立、谢觉哉和休养连连长侯政等都在场,他们围成一圈坐在山脚下。敌机呼啸而过,丢下一颗炸弹来,不偏不倚。正好掉在人圈中间。炸弹很大,一头栽进土里,泥土四溅,几老木然盯着这颗炸弹,但是出现了奇迹,竟然没响。徐特立风趣地说:‘这是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着我们。阎王爷查了查生死簿,说这几个老家伙该向我报到来了。大胡子马克思不同意,说他们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哩!’

这里正在说笑,三架敌机盘旋一圈,又是一个俯冲。树下的一副担架,想到沟里去躲避,两个战士抬着担架匆匆跑着,一架敌机擦树梢低飞,开动机关枪扫射。硝烟散后,担架停放在路上,抬担架的战士牺牲了,那伤员还活着,他要挣扎着爬下来到沟里去。敌机发现了目标,再次低飞投弹。这时候,贺子珍不顾一切地冲出沟去抢救那位伤员;但是一个产后不久的弱女子怎么能背得动一个伤员呢。只听一声巨响,炸弹爆炸了,碎片按照辐射的原理向四周杀伤。烟尘散尽,只见贺子珍俯在伤员身上,头上、背上、臂上、腿上。鲜血殷殷,她已经不省人事了。伤员没有二次负伤。这位被救下来的伤员就是娄山关战斗负重伤截掉一条腿的团政委锤赤兵。他呼唤着:‘贺大姐,贺大姐……’泪如泉涌。

连里的医生起来了。经过检查,发现贺子珍全身被炸弹碎片

炸伤十四处。医生只能把表层的弹片取出,嵌入深层皮肉的弹片没有条件动手术,只能洗净伤口,敷上白药,包扎起来。

贺子珍依然昏迷不醒,伤口不断淌血。后来连鼻子、嘴里也都流血不止,呼吸越来越微弱,脉搏也摸不到了。

医生看到这个情形,判断是弹片打人心脏了。立即告诉护士准备抢救。强心针装在一个木箱里,盖钉死了,医生救人心急,一脚把箱子盖踩裂,拿出强心针剂给贺子珍注射。

这时,钱希钧和休养连的领导董必武、侯政守护在床边,钱希钧一会叫‘子珍’,一会叫‘大嫂,呼风唤雨唤着,希望贺子珍能把眼睛睁开。

两小时以后,微弱的脉搏又起跳了,这一转机给大家带来希望。一天以后,贺子珍终于醒过来了。原来弹片没打人心脏,而是打到肺里了,以致引起大量出血。

钱希钧告诉她,因为她的掩护,那个伤员没再伤着,伤员是个团政委,感动极了,老是喊出‘贺大姐’痛哭不止,还说他对不起毛主席。

钱希钧又说:‘吴吉清已把你负伤的事报告毛主席了,他要抽空来看你。’

正说着,毛泽东派傅连章医生来了,又给贺子珍作了检查。

鉴于贺子珍伤势很重,又不能颠簸,休养连建议把她留在老乡家里,打电话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马上回了电话,说:‘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

我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我现在不坐担架了把我的担架和担架员，都转到休养连去’

贺子珍负伤的第三天，毛泽东终于来了。下了马快步走近担架旁，弯下腰，细细察看贺子珍伤势，见她浑身都缠着绷带，脸色苍白，只有两双大眼睛还是那么明亮，细一看，原来是闪动的泪花。贺子珍见了毛泽东，多想投入丈夫的怀里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呀！但伤势使她起不来，环境和身份也不允许她这样做，只是无限深情地看着毛泽东，泪湿枕上。

贺子珍说：‘连里说把我留下，是我要求的。我不能工作，还得要人抬着。所以我想留在老乡家养伤，等养好了，我再找你们去。’

毛泽东给她拉拉被角，劝慰她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了，会治好的。决不能把你留下，给我抬担架的两个同志带着担架已经过来了，一定要把你抬到目的地。’

贺子珍说：‘那怎么行？你经常整夜办公不睡觉，全靠行军时睡一会。’

休养连连长侯政说：‘请毛主席放心，子珍同志为掩护伤员负伤，全连老老少少都受到了教育和感动，我们走到那里，要把子珍抬到那里，你的担架，我让他们先回去了。主席要指挥全军，我们要对你的健康负责。’

董必武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把子珍交给我吧，你放心去忙你的军机大事。’

毛泽东又和侯政、医生、护士一一握手，说：‘感谢大家，拜托

了。’这时警卫员已牵过马来，毛泽东挥鞭策马，回总司令部去了。

自己伤成这个样子，多盼他来呀！见了面，众目睽睽之下短暂的几句谈话，他又走了。贺子珍很伤感，一阵钻心的疼痛，使她又昏过去了。

贺子珍为救伤员而负重伤的消息，既没有登报（虽然长征中《红星报》还办着），也没发内部通报。但通过小广播——干部、战士的嘴，一传十，十传百，各个军团差不多都知道了。

‘听说毛主席的堂客为救伤员负伤十几处。’一个湖南籍的战士这样说。

‘她叫贺子珍。贺大姐是好样的，永新一枝花，双手能打枪，我见过。’一个瑞金老表这样回答。

没有什么精雕细刻，没有什么添彩拔高，没有什么闪光语言，有的战士说的甚至有些粗俗。但毛主席的夫人为救伤员负了伤，人们爱说，原谈，仰慕，敬佩。这种传播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传播中增强了官兵的团结，传播中增强了红军的凝聚力，传播中提高了中共的威望，传播中毛泽东赢得了全军的尊敬。

长征中还有一件与贺子珍有关传遍全军的事情，那就是贺子珍的小弟贺敏仁被处决。

贺敏仁追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后，先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第三纵队当战士，后三纵队改编为红六军，他当了号兵。长征中他仍在一个团里当司号员。行至毛儿盖藏族区，军委总政治部特别强调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违者严惩。就在这时候，有人报告：贺敏

仁违犯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拿了一千多块银元。于是贺敏仁被关押起来。报到师里,师政委认为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不论是谁的亲戚,该枪毙就得枪毙,以维护红军纪律。团长、政委主张发个电报告军委和毛泽东。那时候发份电报很麻烦,要先给电池充电,第一次因为充电不足没能发出去,后来发出去了,延误了一些时间。结果,等军委的电报回来指示缓期执行时,人已经被处决了。

贺于珍知道了这件事,很伤心。为了搞清弟弟的案情,她亲自作了调查。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确有错误,他拿了喇嘛庙里一百多个铜板,大约值一个银元。检查他的背包,一条军毯,几件衣服,一块银元也没有。当时一个强壮的挑夫,一担只能挑八百块银元,贺敏仁不可能拿一千多银元,如果拿那么多银元,第一他没处存放;第二他没法带走。显然,把一百多个铜板夸大为一千多银元了。案情被夸大了,判处死刑当然是过重了。她把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情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毛泽东更是采取了宽容态度,息事宁人了结此案。

但这件事情传扬开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战士们认为红军铁的纪律是不能违犯的,上级执法如山,不徇私情,连毛泽东的小舅子都给枪毙了。所以长征在最困难的时期,战士们吃野菜煮皮带,宁肯饿死而不抢群众的牛羊和粮食。

38 保存实力 众诸侯勾心斗角 斩关夺隘 参谋长人杰地灵

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选刘伯承作先锋官，可谓知人善任。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他运用自己在川军中的崇高声望，发挥了人杰地灵的独特作用。

朱毛红军由盘县进入云南，四月下旬，连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直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已全部东调，云南省主席龙云心惊胆颤，只好调集民团守城。周、毛、朱认为，利用滇军主力东调的有利时机，红军抢渡金沙江，是摆脱国民党军七十个团围追的关键性一着。五月二日，军委主席朱德命令作如下部署：

甲、据调查会理只划文辉部三百余人。昆明通会理道路除走元谋、龙街大道渡江外，另有两条商路：一经腮坝、猴街、卡子塘、马鹿塘、大松树到洪门口渡江（腮坝到洪门口约二百九十里）；一条经小仓、龙海塘、石板河、绞西到绞平渡渡江。洪门口、绞平渡有渡船

各二,每船可容二十余人,或马六七匹。河窄处十余丈,流急;宽处三十余丈,流缓,有架桥可能,西岸山陡无竹,但南岸有木头可做木排。万一架桥不成,可漕渡,洪门口下游之白滩、小猱及左上游纳平、鲁车,均有渡船。

乙、我第一军团决经武定:元谋由龙街渡江,并引敌向西;军委纵队以刘参谋长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营、二十九分队,赶于四日上午到绞十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

丙、我十三团应经老务营江边渡普渡河(派工兵先行架桥)转入通马鹿塘道上,亦限四日上午赶到洪门口架桥,侦察其下游各渡河点,并与刘参谋长密切取联络,每日至少两次电告架桥情形。

丁、第三军团主力随十三团后前进,其后卫团在可及之敌向第五军团尾追时,加紧左侧后警戒。

戊、三军团全部应于大松树以前带足三天米粮。

又给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发专电,令该部担任后卫,阻击万耀煌部和滇军,掩护大队过江。

刘伯承受命后立即来到干部团。经和陈广、宋任穷研究,挑选第三营去完成抢占绞平渡的任务,宋任穷带队前往。他们换上了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大摇大摆地向江边急进。到离江边三十多里的杉落树时,一个大胖子区长出来欢迎。刘伯承、宋任穷带几个警卫人员进入区公所。区长说:‘上峰来了公文,要烧船封江。’刘伯承一边喝水一边说:‘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公文拿出

来看看。’区长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递进过来。刘伯承边看边问：‘船你烧了没有？’区长唯恐怠慢受责，解释说：‘刚接到公文，还没来得及烧。’刘伯承说：‘那好，由我们来办吧。’接着又仔细问河宽、流速、水深、两岸守渡口的兵力等情况。一一问明之后，刘伯承勃然变色，告诉进位区长：‘我们是红军，你带我们去找船，如果船发生问题，船你烧了没有。’区长大惊失色。宋任穷派一个侦察组跟着他，向江边走去。到江边时，一个船工见是区长领几个大兵过来了，以为他们要过江办事，上前打招呼说：‘回来啦？’‘回来了。’侦察组一跃登舟，把两条船控制起来了。

宋任穷命萧应棠率前卫连先渡。连长令三排在江边掩护，率一、二排分乘两只船首批过江，消灭了厘金局三十多个保安队，控制了渡口。刘伯承和宋任穷过江后，察看了渡口，水深流急，无法架桥。在船民张朝寿等人的帮助下，又找到了四条船。刘伯承喜出望外，在江边一个山洞里，设渡河指挥部，制定了《渡河守则》。令二十九分队架设电台，向总司令报告：‘绞平有船六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

依靠这六只船，军委纵队于五日全部渡完。

这时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因江面太宽，又有敌机低飞骚扰，架桥、漕渡均不成；第十三团在洪斗渡架设的浮桥又被激流冲垮，朱德遂下令全军都从绞平渡过江，限红三军团六日一昼夜过完，七、八日红一、红五军团渡江。刘伯承获悉全军都从绞平渡过江；立即命令宋任穷，只留工兵遵守渡口，带第三营翻山四十里支援干部团

主力抢占通安州。三营营长林芳英、政委罗贵波把队伍集合好，刘伯承亲自交待任务：‘通安州是金沙江北面的门户。一定要占领通安州，保证全军安全渡江。陈赓团长已率一、二营上去了，你们跟进，要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敌人，占领通安州。’

从五月四日至九日，军委纵队及红一、红三、红五军团，除红三军团第十三团从洪门渡过江，红一军团一个野战医院在鲁车渡过江外，都从绞平渡过了金沙江。红九军团在完成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行动的任务后，也于云南东川渡过金沙江，在泸沽与主力部队会合。巧渡金沙江的胜利，使朱毛红军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蒋介石是在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后，才最终搞清楚朱毛红军的动向。他一面下令薛岳、孙渡部回头向西，作跨越贵州全省的追击；一面于四月二十八日打电报给龙云，令其控制船只封锁金沙江巧家至谋段，严防红军渡江。

薛部八个师官兵刚从赤水一带风风火火急行军跑到贵州最东边，又要千里急行军往贵州最西边跑，上下疲劳厌战情绪很大，希望能在贵阳休整一段。吴奇伟首先称病留在贵阳，没有随军行动。军令如山，下级官兵只好执行，但沿途生病、掉队、逃亡者不少，遗弃辎重很多，到云南时，各连剩下的人数最多者六、七十人。

孙渡部三个旅追至紫云以西时，又奉蒋电令，说有红军四千人的一个纵队，正在向宗地、龙场东进中，令孙部再掉头向东追，一日

之后，始知又中了红军佯东实西之计，待掉头再向西时，红军已安渡北盘江远去了。

云南王龙云实力比王家烈雄厚，地位比王家烈巩固。接蒋电令后，并不去封锁金沙江，而是集中兵力和民团防守大小城池，一防红军，二防蒋军。当薛岳部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先头部队接近昆明时，龙云派专使来慰劳部队，带来了云南地图、白药和火腿，但装载慰劳品的汽车被红军‘抢’去了，专使只代表龙云传话：不许薛岳的部队进入昆明。薛岳低声下气，只带副官、卫士各一人去昆明会见龙云。出乎意料的是龙云又以仅次于欢迎蒋介石的盛大场面欢迎薛岳，连日宴饮。直至五月七日，龙云才陪薛岳乘飞机到金沙江上空侦察，见红军正在抢渡中，他们回来后，薛岳不忙‘追剿’，与龙云拜把兄弟，尊龙云为大哥，继续花天酒地。过了两天，即五月九日，龙云给蒋发一电报谓：‘匪已过江无疑，闻讯之后五内如焚……实职之调度无方，各部队追剿不力，但何能尤人，惟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以谢党国。’

蒋接龙云报告，五月十二日只带军事人员飞至昆明，住五华山官邸，部署大渡河会战。大渡河会战计划蒋要川军打头阵，电令刘湘以第二十军全部和第二十一军之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至大渡河北岸防堵；令刘文辉将第二十四军大渡河以南部队（六个旅）统归刘元璋率领受薛岳指挥，堵截红军北上，掩护薛岳部主力北进；第二十四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指定第二十军军长杨森、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到汉源指挥。电令说：‘大渡河乃太平

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匪人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之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致励所部建立殊勋。

渡过金沙江以后，中央红军在会理地区从容休整半个月。五月十二日在会理城外的铁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纠正红军中因对毛泽东的战略意图的不理解而产生的消极埋怨情绪。遵义会议后，周、毛、朱为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夺取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忽东忽西，大踏步进退。既然把薛岳的追剿军拖得疲惫不堪，红军将士当然也是十分疲劳的，因而对中央军委的指挥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代表了部分群众的这种不满，说这一段尽走‘弓背路’，‘转圈圈’，‘会拖垮部队’。他不顾政治委员聂荣臻的反对以他个人名义给中央写了封信，提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会上周恩来批评了林彪，赞扬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情况下，采用了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两进遵义，甩掉了敌人，取得了顺利渡过金沙江的重大胜利。毛泽东则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含有对他年轻幼稚不与计较的意思，板子的重点打在了彭德怀身上，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

彭德怀有野心想夺指挥权。彭没有申辩,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直到一九五九年计上心来庐山会议,毛泽东重提此事,林彪才庄严声明,说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

因为大敌当前,处在战争环境中,说清了问题,统一了思想就完了,并没有过分追究,以利团结对敌。

会议决定刘伯承任先遣司令,利用他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为全军开路。

五月十六日,刘伯承率先遣团至德昌。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其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二团扼守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阻截红军。许剑霜是刘伯承在川军时的老部下,曾参加过泸州、顺庆起义。刘伯承写一亲笔信派人送进德昌,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许见信后,派亲信副官将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刘元璋不置可否,许认为是默许给红军让路。十六日黄昏时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指挥下于十七日三时占领德昌。刘元璋为加强西昌的防守力量,调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率部由宁南来援。邓系彝族,有正规军两个团,并能调动附近彝民武装近万人。邓率部前出到西昌南面的黄水塘时,收到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亲笔信。邓通汉文,在川军混事多年,久闻刘伯承大名,只见信上写着: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邓秀廷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打吧,自知绝不是对手;不打,又怕对刘元璋不好交待。最后的决

心是，摆开打的架式，应付刘元璋；但不开枪，免得折了老本。他把彝族军官召集起来训话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邓把部队摆在大道两边山上，眼看红军通过。有一彝兵走火响了一枪，引起别人也打了几枪，邓秀廷急用彝话制止。第一军团前锋亦未还击，红军战士边走边喊话：‘汉彝一家’，‘汉彝是兄弟’，照样前进。其时有两架蒋介石的飞机来助战，‘邓部也未摆出指示标的标志，飞机盲目投弹，炸死邓部官兵几十人。邓秀廷随即把部队由黄水塘高地，撤往冕宁地区。

五月二十日上午，先遣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聂荣臻率先遣团到达泸沽。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到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条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是崎岖难行的山路，尤其是要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长途的大凉山彝族区。

晚上，刘、聂听取了侦察组关于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敌情、居民情况和给养情形的详细汇报，又接见了中共冕宁地下党派来的李祥云、向德伦、李发明，对于搞清敌情打很大帮助。

当面在大渡河布防阻截红军的是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其第四旅在左，守泸定桥一带；第五旅在右，守安顺场至富林一带。第五旅旅长杨学端率一个团驻富林另据传闻刘湘所属王泽浚旅正向富林开进中，明日可到。

刘伯承认为：‘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

功。是否建议军委改变一下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不过这条路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对汉人疑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

聂荣臻表示同意：‘我们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我们建议军委改走小路。让左权、刘亚楼带第五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敌人。’

二人商议妥当，立即给中央军委发报。军委覆电完全同意刘、聂建议，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安顺场北进。

五月二十一日十八时，军委主席朱德电令全军，摘要如下：

林(彪)、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罗(炳辉)、何(长工

)、邓(发)、蔡(树藩)：(万万火急)

(甲)我先遣第一团今由泸沽经冕宁开大桥两站路，尚有四站路即到江边之纳耳坝：我第五团今到登相营侦察，越西、小相岭、登相营一带，仅敌一营，刘敌第五旅到越西讯似不确(刘聂侦察报告另抄发)。

(乙)我野战军以执行昨二日九时半电令所规定的任务，决以主力依一、五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次序改经冕宁、大桥、拖乌、笕箕湾、岔罗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而以我第五团续经越西北进，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上正面之敌，遇小敌则消灭之。

以九军团担任迟阻进敌，其前进道路按日规定。……

(丙)为绝对保持改道秘密，必须：

一、泸沽至冕宁道上严禁被敌机发现目标，挂露天标语；上午七时半至十时半，下午三时半至五时半，严禁部队运动。

二、第一军团部队对去路，第三、九军团对来路，要断绝行人出入。

三、严密搜捕敌探。

(丁)冕宁至渡口有两站路缺粮，各兵团应在冕宁、礼州之线补充粮食，离冕宁时带足三天。

(戊)关于搜集筑桥材料经冕宁起应严格执行昨日电令。

过了一些时候，刘聂又收到中央军委一电，译出来一看是《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由总司令朱德署名，但那内容和文笔，一看便知出自毛泽东之手。刘伯承将这个红军布告交给了冕宁地下党负责人陈野萍、廖志高，让他们组织人大宁书写，在冕宁县城乡广泛张贴，布告内容是：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纪律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买卖，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特此速播西蜀。

这张布告鲜明生动、深入浅出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深得彝族人民拥护，在群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对于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共四川地下党为配合红军过境，在冕宁县文昌宫召开有城乡群众一千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告冕宁县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军代表李井泉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陈野萍为副主席，廖志高、李祥云等为委员。朱德总司令与汉彝人民见面，即席发表了讲话。

革命委员会首先宣布废除轮班坐质制度。所谓轮班坐质是国民党政府令彝族各家支头人到县城里坐牢，作为人质。坐牢的‘质彝’可以以父代子，以兄代弟，以叔代侄，顶替换班。凡有苛捐杂税未完，聚众反抗闹事者，即向坐质的头人施加各种酷刑乃至杀害。这种对彝族的残暴统治从清朝延续到民国，遭到彝人的切齿痛恨。然后，革命委员会又宣布没收县城大土豪刘耀南、刘勃如的财产，没收大桥镇大地主周顺武的财产，不分汉彝，分配给穷人。这两项

政策一执行,一下子就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先遣团从大桥镇出发,经过一段彝汉杂居区到俄瓦垭口,再从俄瓦垭口经一碗水、海子边、北沙村到喇嘛房,便属于拖乌彝族居住区了。境内有‘孔明寨’,相传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战场就在这里,‘孔明寨’便是蜀军兵营的遗址。这里山势险峻,道路崎岖,小路从蒿草和密林中穿过,便于隐蔽,易守难攻。前卫连刚到喇嘛房,就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上枪等各种武器的彝人堵住了去路。他们‘呜呼!呜呼!’吆喝着,人愈聚愈多。工作团的冯文彬带着‘通司’上去答话。一个小头目说:‘娃娃们要点钱,让你们通过。’冯问:‘要多少?’回答说:‘要二百块。’马上给了他们二百块银元,大家一抢而散。一会儿,又来了一群人要钱,说刚才是罗洪家的,我们是沽基家,正在交涉之际,后面来人报告:工兵连遭到袭击,器材武器都被抢了,被抓占的人,剥光了衣服放回来了。

前卫连只好停止前进。萧华、冯文彬等出面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一个彝人去请沽基家支的头领。过了一会儿,一个高大的汉子,头上缠一帕子,长发纷披,赤膊,腰间围着一块麻布,赤足,后面跟着十几个手持长矛的青年。来人自我介绍:‘我是沽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于是,萧华先去向刘司令员聂政委报告,冯文彬陪同小叶丹从后面跟来。在群山环抱的一个坪里,有一个清水池塘,名为袁居海子,刘伯承与小叶丹在这里相见。小叶丹见来者身材魁伟,后面跟着几个‘亲兵’,知是刘司令到了,就按彝家习惯,取下头上帕子,准备叩头行

礼。刘伯承趋前几步把他扶起，二人在池塘边一块大石头上坐下。

小叶丹说：‘今天在后面打你们的不是我的人，是罗洪家。听说你们要打刘义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刘司令结义为兄弟。’

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人的汉人，也是我们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

小叶丹非常高兴，叫一个娃子到家里去拿一只公鸡来。结拜仪式按彝家规矩简单庄重：娃子拿来公鸡，用碗在塘里舀了一碗清水，一手持刀，一手拿鸡，把鸡头斩，鸡血滴在水碗中，清水立即变成了殷红色，然后将‘血酒’分作两碗，分别摆在刘伯承和小叶丹面前。几个‘红小鬼’看着好玩，有的发出笑声。只见刘伯承面色凝重，谁也不敢笑了。一切准备妥贴之后，刘伯承与小叶丹虔诚地并排跪下，面对着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池水端起‘血酒’，刘伯承说：‘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覆，天诛地灭。’说完一饮而尽。小叶丹懂汉语，听罢刘伯承的誓词，激动地说：‘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这时夕阳快落山了。刘伯承决定返回人桥镇宴请小叶丹。小叶丹带领十八个小头领欣然前往。刘伯承素知彝民嗜酒善饮，叫管理员把大桥镇的酒全部买来。晚宴在一个保长的宅院举行，这里是红军的先遣司令部。

席间，小叶丹对刘伯承说：‘明天我要沽基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你们过境。罗洪家的抢了你们东西，还抓了你们的人。如明天罗洪家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把村寨给他们烧光。’

刘伯承说：‘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要共同对付压迫你们的反动政府，对付军阀刘文辉。’又伸出手比划说：‘一个指头没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希望彝族各家支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刘文辉、刘元璋。’说罢站起来，把一面红旗赠给小叶丹，上书‘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他的弟弟古基尔拉为副队长，当场写了委任状，并把自己随身佩带的手枪送给他：小叶丹非常高兴。刘伯承又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这个纯朴的汉子把刘司令的教诲，点点滴滴记在心头。当晚，小叶丹住在先遣司令部。

第二天早饭后，先遣团再入彝民区。小叶丹跟着前卫连六连走在前头。进入彝族区时，沽基家的娃子拿着红旗，背着弓箭，‘呜呼！呜呼！’喊叫着表示欢迎。一些娃子都主动接近战士们，战士们有的送给他们一条毛巾，有的送给一双鞋子，得到的人欢呼雀跃。

小叶丹陪同刘司令员、聂政委走了一程，依依不舍地说：‘不能再走了，前面不是我管的地方了。我派四个娃子送你们到前边的村寨；另外，我挑选了二十个娃子当红军，学了本事回来打刘文辉。’

刘伯承说：‘后边红军大队还多，拜托你一定把全部红军安全送过彝区。红军走后你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临别之前，送你一点薄礼。’这时警卫员抬过擦得油亮的十支步枪。小叶丹大受感动，坚持要把他的坐骑——一匹精壮的大黑骡子，送

给刘司令。

大凉山的道路就这样打通了。小叶丹忠实地执行了刘伯承的嘱托,与罗洪、倮伍各彝民部落联合起来,护送红军后续部队过境。他昼夜奔忙,往返于大桥镇和箐箕湾,经过七天七夜,红军大队一路畅通无阻,安全通过彝族区。

红军走后,小叶丹打出了红军彝民支队的旗帜。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冕宁县萨塔村,联合罗洪、倮伍家支,召开反对国民党军阀誓师大会,提出‘停止冤家械斗,一致对外’的口号,在留下来的红军政委的帮助下,组成千余人的游击队,坚持了五年的斗争。

一九四一年彝人败类邓秀廷在军阀支持下,分化了三个家支的联盟,镇压了彝民革命,抓住了红军政委。小叶丹倾家荡产,拿出一千五百块银元给邓秀廷,赎出了红军政委。后来小叶丹和沽基尔拉的委任状被邓秀廷搜去,以‘通共有据’的罪名,在大桥镇杀害了他们兄弟。小叶丹在被捕前,含着热泪告诉妻子和弟弟沽基尼杰:‘只有共产党、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这样的军队一定会回来的。刘伯承这样的伟大人物是绝不会骗人的。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刘司令。’

在红军主力部队经冕宁向安顺场挺进的同时,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红二师政委刘亚楼率红五团和军团侦察连,从泸沽出发,经越西县城向大树堡疾进。一路上造的声势很大。五月二十二日进入越西县城,砸开监狱,释放了关押的彝汉群众五百余人,其中有彝族各家支换班坐质的头人。在彝人带领下,红五团团团长陈湘

中部追歼敌县府武装两个连,活捉县长彭灿(原第二十四军参谋处长),然后翻过晒经关,直逼大树堡。大树堡守敌一个营没敢抵抗,过河逃窜。红五团一直追到大渡河边,占领了大树堡南岸渡口,大事张扬,收集渡船和架桥材料,动员许多民工和船工,造船扎筏,扬言要在这里强渡大渡河,攻打汉源,进军雅安。

蒋介石部署大渡河会战计划时,一再强调四川各系军阀要同心协力,建立殊勋。实际上因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八个县(西昌、越西、冕宁、宁南、德昌、会理、盐源、鉴边),雅河以西、大渡河以北六个县(雅安、荣经、汉源、天全、芦山、宝兴),都是第二十四军刘文辉的地盘,拥有三个军(第二十一、第二十三、第四十四军)的川军总司令刘湘和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对大渡河会战并不热心。川军总司令刘湘为敷衍蒋介石,派出王泽浚旅到富林。当王旅五月二十一日到达指定位置时,蒋介石、刘湘电告刘文辉与杨森联系,令杨部向富林靠拢。在汉源的刘文辉与杨森联系时,前锋已到富林以东四十公里处之金口河的杨森部,侦知富林有战事,又撤走了。刘文辉则下令把自己的第五旅从富林调到次要方向,让王泽浚旅独守他们认为是红军主要突击方向的富林。都怕损伤实力,都不愿跟红军打硬仗,这是川军各派系军阀的共同心理。正当蒋介石、刘湘、杨森、刘文辉眼睛盯着富林的时候,从大渡河上游安顺场传来了红军强渡的消息。

守在安顺场的是刘文辉‘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他心存侥幸,以为红军很可能走富林。当红一团一营冲入街心的时候,敌

哨所还传出胡琴声和唱戏声。赖执中已沉入梦乡。闻枪声赖执中翻墙而逃，士兵作鸟兽散。赖执中奉命把所有的船都烧掉了，剩下一条船是准备自己逃命用的。这条船被眼明手快的一营战士缴获了，成为红军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唯一的一只船。

大渡河两岸都是横断山脉，崇山峻岭。在安顺场渡口，河幅有一百多米宽，流速每秒四米，水深三十米。河底乱石嵯峨，形成无数旋涡，俗称竹筒河，鹅毛沉底，水性多好的人也不能泅渡。由于水深流急，不能架桥。船横渡时，要先拉到上游二里许，放船后，要有经验的船工掌舵，十余名船工篙竿齐施，精神和体力都紧张到极点，与流速形成一种合力，使小船沿一条斜线冲到对岸。对岸有石级，但如对不正渡口，碰到两侧石壁上，则船毁人亡。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早晨，一个四十多岁的老船夫带着二十多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到河边。刘伯承亲自和老船工谈过话。这些船工家里的船被刘文辉派人烧掉了，还要烧他们的房子强迫搬家。所以船工都愿意帮助红军。当然，报酬是优厚的，连万一发生不测对眷属的抚恤都作了安排。

七点整，刘伯承、聂荣臻来到岸边。这时，第一营战士们正在为争当突击队，争坐第一船，闹嚷嚷吵个不休，以致任务分不下去。当然，大家心里全明白，这不是游山玩水，不是龙舟竞渡，这是战斗，是九死一生的战斗。在这样的任务面前，旧军队是靠组织督战队解决问题的。但红军战士面临这样的场面，却要争，要抢，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自己去冒最大的危险。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聂

荣臻政委发话了：‘不要争了。由你们营长下命令吧，叫谁去谁去。’这时全营才安静下来，几百双眼睛盯着孙营长。孙继先找团长杨得志小声交谈了几句，宣布由第二连组织突击队。二连三个排又是一番争执，最后是连长点名，挑选了十七个人，他们是：连长熊长林，排长曾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萧桂兰、宋祥云、谢良明、丁流名、张万清。人员挑选完毕，给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冲锋枪），一把马刀，还有八颗手榴弹。在熊连长的带领下，登上了第一船。

这时候，刘伯承举着他那单筒望远镜仔细观察对岸敌人的工事和火力点。待突击队准备完毕，他转头问黄参谋：‘赵章成来了没有？’黄参谋回答：‘迫击炮已经架好了。’刘伯承说：叫赵章成瞄准对岸那两个碉堡。我们就几发炮弹了，听命令，一定要打准。’他看了看腕上的表正好九点正，抬头对杨得志说：‘开始。’杨团长下命令：‘轻重机枪掩护，强渡开始。’击在岸上的船缆解开了。在船工熟练的操纵下，小船一颠一簸向河心斜漂过去。六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从不同的角度向对岸密集射击，压得敌人扒在工事里抬不起头来。船靠岸了。十七个英雄飞身下船。敌人的手榴弹、滚雷从上面甩下来。英雄们利用石阶的死角，竟没有伤亡，英勇机智夺取了岸边的工事，向敌人的碉堡靠近。防守大渡河北岸的是刘文辉的第五旅第七团韩槐阶营。韩是名山县百丈场的袍哥首领，他的队伍欺压百姓有余，但正规战争还没经历过。一个军官带

着二百多人从碉堡和散兵壕里钻出来，向上岸的十七勇士反冲锋。刘伯承举着望远镜果断下令：‘开炮！’赵章成真不愧为神炮手，第一炮打在敌人的碉堡顶上，接着两炮打在敌人集拢起来的队伍中。敌营顿时大乱，四散奔逃。十七勇士占领了北岸登陆点。

后续部队一船一船昼夜不停地渡。船的最大容量可坐四十人，往返一次要一个多小时，直到二十六日上午十点，一团才全部过河。刘伯承一计算，似这种渡法，全军过河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不允许的。据总部通报，敌薛岳纵队二十六日巴进至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已达峨边以西的金门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刘伯承陷入深深的焦虑中，他指挥工兵连千方百计地架桥，搞了几次都失败了。幸好又搞到三条船，加上原来的一条，共四条船，但在敌人已经迫近的情况下，靠四条船全军过不完就会遭到敌人的‘半渡之击’，那将是湘江惨败的重演。

中午时分，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到达安顺场，刘伯承和聂荣臻亲自到村头迎接，陪同到先遣司令部休息。午饭时，用缴获的米酒招待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端起大碗米酒高兴地说：‘祝贺先遣司令和干部战士们！’接着幽默地问起刘伯承：‘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

刘伯承谦虚地说：‘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

刘伯承微笑着说：‘人乡随俗嘛！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周恩来说：‘后续大队通过久凉山时，小叶丹打着『中国红军彝民沽支队』的旗帜出来欢迎，派向导一程一程地领路，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

朱德说：‘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

听到这里，刘伯承答话：‘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不能架桥发愁呢。’接着详细汇报了漕渡和架桥的情况。

毛泽东听完刘伯承的汇报说：‘我提议，我们兵分两路。一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归刘聂指挥，循大渡河左岸前进；林彪率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左带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在四川搞个局面。’

毛说完，周、朱均表赞同，遂以军委主席朱德名义给各团阐发出相应电报。

林彪把抢占泸定桥的任务交给了红四团。安顺场距泸定桥三百二十华里，命令他们二天赶到，二十九日要把泸定桥拿下来。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红四团以‘要桥不要命’的精神硬是于二十九日早晨六点钟赶到了。

总攻泸定桥的战斗于下午四点打响。王开湘和杨成武在桥头指挥战斗。二连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支部书记李友林率领十九名红军战士(可惜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在凌厉的冲锋号声中冲上泸定桥。

泸定桥是铁索做成的。从东岸到西岸有十三根用粗铁环连成的长索。两边各两根，做成桥栏，底下并排九根，作为桥面。原来桥面上横铺着木板，现在，木板被敌人拆的七零八落，许多地方只剩下悬空的铁索。下面奔腾的水势，似无底深渊，令人毛骨悚然。二十二位英雄在全团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冲上去了。守桥的是刘文辉部第四旅第三十八团(欠一营)。原以为红军从富林渡河，直至五月二十八日团长李全山才令周桂三营跑步由冷碛进驻泸定桥。周派连长饶杰带二十多人为先遣队，带上全团的旗帜二十八日傍晚到达泸定，将旗帜插遍全城，虚张声势，然后拆除桥板，因士兵疲劳不堪，烟瘾又发，进度很慢，二十九日天亮后，对岸已发现红军，因而拆除桥板工作未能彻底进行。周营主力赶到泸定桥时已是二十九日凌晨三点钟了，立即构筑工事，进入阵地。红军打过桥来，周营并没有充分准备和休息。见二十二位英雄硬是不怕死往前冲，有六人因中弹或失手坠入深渊，但前仆后继，后续部队又上来了，周营军心动摇，打了一阵，放火烧了桥东的凉亭就往后跑。团长李全山在电话上向旅长袁国瑞告急，袁国瑞在电话里说：‘我这里也很紧张，红军快打到旅部了。’原来东岸邓华和萧华率红二团打到龙八布，龙八布在泸定城南五十里，设在这里的袁国瑞旅部已乱了营。二十九日十七时，红四团乘敌犹豫动摇之际，冒着大火冲过了泸定桥，守敌向天全退去。刘伯承和聂荣臻进入泸定城时，已是五月三十日凌晨两点钟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不顾鞍马劳顿，坚持要去看看泸定桥。杨成

武提上马灯。陪着两位首长从桥东走到桥西。刘伯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得十分仔细，好像要把整个泸定桥印在自己脑海里。他从桥西折回走到桥中央的时候，停住脚步，扶着桥栏，俯视大渡河的激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踩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化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蒋介石要红军当石达开的迷梦破灭了，彻底破灭了！’

39 两军会合 梦笔山下会战友 一心篡党 政治局里起波澜

红四方面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主力之一，是由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湖北黄(安)麻(城)、河南商(城)南、安徽六(安)霍(山)等地农民起义武装发展起来的。这一地区被称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根据地，于五月成立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十二月七日，在黄安七里坪成立了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总兵力近三万人。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二年六月，红四方面军相继取得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进攻战役的重大胜利，共歼国民党军六万余人，主力红军发展到四万五千余人。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向平汉路以西转移，一九三三年一月相继占领了川陕边的通江、南江、巴

中等县。二月，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工农兵政府，川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二月至六月，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川陕根据地的三路围攻，歼敌一万四千余人。七月，红四方面军在木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原属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用纯全）、第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全军共四万余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副主席，曾中生任参谋长。下设方面军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树声副总指挥。

一九三二年八月至十月，红四方面军举行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共歼川军近两万人。直达战役期间，红四方面军同在达县、宣汉、梁山（今梁平）地区坚持斗争的川东游击军会师。川东游击军纳入红四方面军序列，改编为第二十三（军长王维舟，政治委员杨克明）。这时红四方面军发展到八万余人。

川军在连遭沉重打击后，又调集约二十万人的兵力，于十一月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了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奋战至一九三四年九月，粉碎了川军的六路围攻，共毙伤俘敌八万余人。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接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关于四方面军配合野战转入川西的指示）。要求四方面军‘于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为积极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一九三五年

三月底至四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举行嘉陵江战役，歼川军一万余人，占领嘉陵江以西大片地区。遂即在江油附近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两军会合后，要在川西北创造根据地，赤化川、康、陕、甘、青等省。为打破蒋介石的合围部署，四方面军下一步应行先占领北川、茂县、理县、松潘一带地区，作为立脚点。那一带是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应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以利开展局面。

五月十五日，红一四方面军占领茂县（今茂汶自治县），方面军总部即设于此。先头部队一部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威川等要点；一部直逼汶川，占领理番（今理县）。后续部队北进松潘、平武以南的镇江关、片口等地。在镇江关、片口、北川、观音梁子、千佛山至汶川一线，与先机占领松潘的国民党军胡宗南对峙。

为接应中央红军，确定由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本军第八十八师及红九军第二十七、第二十五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六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第二师师长陈光率领下，翻越宝兴县西北的大雪山——夹金山，到达懋功（今小金）的达维，与李先念部会师。

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等翻越雪山，到达连维镇。当天下午两点，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四人的名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全文全下：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利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达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西岸直至峨眉山附近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上策。我野战军于十二日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十八日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两河口一线，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中理番地区，并准备渡岷江。

戊、弟等意见如此，兄意如何乞覆为盼。

这封信没有用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下属党组织和部队的语气，而是称兄道弟，平等协商，但分歧已露端倪。毛泽东等的意见是‘占领陕汀川三省’建立根据地，张国焘等的意见是‘在川西北创造根据地。’

六日十七日，张国焘覆电中央，说由岷江向东或向北发展困难

大,提出从阿坝过草地西进北上,向青海、新疆、甘肃发展;如果遇到困难,再向南进攻。十八日,中央再电张国焘,指出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下,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

六月二十日,洛甫、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请‘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因懋功边陲小镇,存粮不多,难养众多部队。军委纵队于六月二十四日到达两河口,受到驻扎这里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送来了粮食和毛衣、毛袜、皮背心等慰问品,还给中央领导人每人送一套粗呢制服。

两军会合后,一、四方面军领导人尚未见面,遂确定张国焘来两河口参加中央会议时,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邓发受命布置会场。他调来了工兵连,亲自指挥着伐木斩荆,掘石挖土,在梦笔山和虹桥山的下面,清出了百米见方的一块平地,上首是就自然土石切削而成的一个主席台;右面凸出的一块,是司号员集中吹奏的乐坛;左侧是一条醒目大标语:‘欢迎红四方面军同志!’标语是一条十来米长鲜艳的红绸子,两端固定在木桩上,结结实实地插入地面;其他花花绿绿的标语牌插在花草和树木业中。

临时架设的电话线,爬向虹桥山方向北里处,派出了守机员,以及时通报客人到来的消息。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钟,五位政治局委员洛甫、周恩来、毛

泽东、朱德、博古，总参谋长刘伯承，政治保卫局长邓发在一大群中央机关干部的陪同下来到了会场。有组织的一、四方面军部队的代表，排列整齐，精神饱满，高唱《两大主力会师歌》，歌声间隙，夹杂着口号声。

东面山脚的林隙中，隐约地露出几个马头，渐渐走近了，约有三十骑，马‘得！得！’地小跑着，不快不慢。快到会场时，为首者下马，早有警卫员接过缰绳。他身着蓝色粗呢制服，面色红润，高视阔步，兴奋地走向迎上来的人群。这便是张国焘。

赶来欢迎的，五位政治局委员，按照预先的安排，山军委和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挂头牌。他面目黧黑，军服破旧，带着长征万里的风尘，不卑不亢地热情迎上去和张国焘握手，军号演奏欢迎乐曲，号声和鼓掌声，使热烈的气氛达到高潮。

沸腾的人群肃静下来了。朱德登台致欢迎词：

同志们！……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欢迎快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在那里庆祝欢呼！这是全中国抗日土地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然后是张国焘上台讲话：同志们！……这里有八年前我们在一起斗争过的同志（按：指南昌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刘伯承），更多的是从未见过面的同志。多年来我们虽是分隔在几个地方斗争奋斗，但都是存着一个目标——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为着党的策

略路线的胜利……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 的更好条件。

红军万岁!

朱总司令万岁!

共产党万岁! 这个讲演词的摘要是当时的真实纪录,不是作者杜撰,张国焘确实喊了一句‘朱总司令万岁!’

张国焘的讲演词在毛泽东心里引起了很大的不快。但他沉着稳重面带微笑地和张国焘握手,喜怒不形于色。

张国焘与毛泽东同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在上海见过面,在嘉兴南湖泛过舟。这样的大事张没有提,只说见到了八年前‘在一起斗争的同志’,而把十四年前共同发起建党的同志忘记了。此其一。

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口号是‘拥护中共中央’,‘拥护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虽然毛泽东这几年在党内权力有很大削弱,但他始终和朱德齐名,是党和红军名义上的领袖。张国焘喊‘朱总司令万岁!’是有意扬朱而贬毛。此其二。

关于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方向,几番函电交换意见,看来张国焘是坚持不让步,在讲演词中重申他的主张‘创造川、康、新大局面’。此其三。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一座喇嘛庙里召开。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朱德、王稼祥、张国焘,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凯丰;

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列席会议。中央秘书长刘英为会议作记录。会议由洛甫主持，周恩来作报告。

周恩来阐述在川西北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去的理由：（一）川陕甘地域便终于机动；松（潘）理（县）茂（县）地域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封锁，不利于红军反攻。（二）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多，是汉人区域，便利红军扩大；而松、理、茂一带子人口只二十万，又是少数民族区域，不利于红军扩充。（三）松、理、茂地域粮食牛羊缺乏；川陕甘物主较丰富。红军如陷在松、理、茂地区，将无前途。并指出，向南是不可能，敌人已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更不可能，敌人已集结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更艰难，只有向北，只有采用运动战，发扬红四方面军的勇猛果敢精神，迅速打退松潘的胡宗南部。为此，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军委。红军分三个纵队北上，派六个团攻松潘，对岷江东岸佯攻。

周恩来报告后，会议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打松潘的问题来讨论，从战略上说，这是涉及到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来说涉及谁担当打松潘的主力问题。

张国焘提出‘以西康为后方’的计划，认为这里‘地形险要，军阀的实力又薄弱。

博古说：‘你那个进攻西康的计划是行不通的，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少粮少，红军不但无法在那里立足生根，而且没有退路，国民党军队来了，很容易把我们封锁住，这就成了瓮中捉鳖了。’

张国焘大为不满。后来多次驳斥‘瓮中捉鳖’这句话。

会议开了二天，最后，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北上意见，一致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决定）（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决定指出：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兵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造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洛甫、周恩来、毛泽

东、博古出席，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当周恩来把中央这一决定通知张国焘时，张悻悻然告辞而去。他回到杂谷脑（在理县）四方面军总部，于七月一日致电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洛甫，提出‘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他认为北上战略决定右倾。张国焘根本没有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放在眼里，自恃有八万之师，一方面军的两万余人应归他指挥，他所谓的‘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是这个意思：继续听命于周、毛、朱、王不行，与周、毛、朱、王共同指挥也不行。他要用这封电报推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叫洛、周、毛、宋、王等知道他这一票的份量。他的强大的后援是按兵不动，不执行中央军委下达的《松潘战役计划》。

七月六日，张国焘向到四方面军进行工作的中央慰问团负责人、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重提解决一、组织问题’，他提出的方案是：‘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中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十八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转朱德，电文说：‘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总〔任〕前敌总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同时又以‘川康省委’名义发出类似电报，给中央施加压力。这就是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要由张国焘说了算。

周恩来在长征中，始终处在指挥中枢的岗位上。他太劳累了。到了毛儿盖以后，由于粮食缺乏，他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他

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而倒下了，连日高烧不退。经王斌、李治两位医生诊断，患的是黄疸性肝炎。

这时，军委纵队已进至芦花。毛泽东与洛甫商量人事问题、周恩来因发烧未参加。

毛泽东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很难合成一股绳。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样子平起平坐，他不甘心。’

洛甫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给他好了。’

毛泽东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那怎么办呢？’洛甫这方面纵横捭阖的经验显得很不够。

‘让他当总政委吧。可以考虑军委设常委，原来三人团周毛王参加，这样，张当总政委可能抓去一部分军权，但又不能全抓去。不过这要同恩来商量一下。’

二人来到周恩来住处，将刚谈过的人事安排方案提出征询周的意见。果然如毛泽东所料，周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七月十八日，在芦花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为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顾全大局，辞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以前，暂时由周恩来协助。会议还决

定陈昌浩参加中央军委常委。

这样，军委常委的组成为：张国焘、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陈昌浩八月四日至六日的沙窝会议上，又增补朱德为军委常委。

这次人事调整，周恩来相忍为党，作出的牺牲最大。他失去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同时也就失去了遵义会议确定的‘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地位。毛泽东表面上无得无失，实际上有一个微妙的但却是重要的变化，他摆脱了遵义会议对他的身份和作用的一种确定，那就是‘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为他日后当军委主席撤除了最后一道门槛。张国焘当上了红军总政委，并成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但在军委六个常委中，他只占两票，在决策层中仍然是少数。尽管如此，张代替了周，成为军委的‘总负责者’，对于张国焘来说仍是一种满足，足能够争取到的最高权力了。军委主席朱德，一直是名义上的军事领袖，现在仍然是名义上的军事领袖。自称当过‘旧军阀’的朱德，只管领兵作战，从来不与那些‘根红苗正’的共产党领袖人物争锋，作为军委主席，博古那一届三人团没他，周恩来这一届三人团仍然没他，这次改组军委，半个月以后才决定让他参加常委，但他从不计较，他深知‘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张国焘就任红军总政委之后，中央军委第一个统一的号令是七月二十一日发布的《中央军委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

各军首长:(机密)

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更,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原一军团改为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萦臻,参谋长左权;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五军团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槐(代);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原第四、第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的番号仍旧,四军以许世友为军长,王建安为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九军以孙玉清为军长,陈海松为政委,陈伯钧为参谋长;三十军以程世才为军长,李先念为政委,李天佑为参谋长;三十一军以余天云为军长,詹才芳为政委,李聚奎为参谋长;三十三军以罗南辉为军长,张广才为政委,李荣乌为参谋长。特电知照。

朱张周王

七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在芦花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四方面军领导人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汇报。四方面军领导人除张国焘是政治局委员必然要出席之外,陈昌浩、徐向前也参加了会议。会前,为表彰总指挥徐向前在创建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中的历史功绩,根据中央的决定,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名义,授予徐向前五星金质奖章。会议肯定红四方

面军政治路线、战略战术是正确的，指出轻敌、分散兵力是四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退出通南巴根据地后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在少数民族未发动的情况下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错误的。

会上，毛泽东和张国焘发生了唇枪舌剑的交锋。

毛泽东在肯定四方面军的光辉业绩之后说：‘四方面军在军事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放弃了原有的川陕苏区，没有留置足够的兵力和强化游击部队，保卫那个根据地；二是没有使用足够的兵力控制战略要地松潘，让胡宗南占先机之利，致令北进计划受到重大阻碍。’

张国焘起而答辩：‘川陕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我们当时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川陕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顺利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向北夺取松潘，中央是不是会批评我们隔岸观火，看轻尤戚相关的大义？’

张国焘感到中央政治局势单力孤，会后向中央提出一个九人名单，要求中央讨论批准进入政治局。中央没有同意，他更于七月二十六日下令前线部队停止进攻松潘。

就在芦花开会期间，张国焘派秘书长黄超来到红三军，给彭德

怀送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有二三百块银元。耿直的彭德怀粗中有细，牛肉、大米送一点，属同志情谊的当事，白花花一兜子银洋叫他怪不舒服的，军阀部队就是这一套吗？坐下叙话时，黄超单刀直入问及会理会议的情况，还说‘张主席很知道你’这引起彭德怀的警惕，知道来者不善，是替张国焘拉人的，谈话中保持了距离。

其后几天，陈昌浩找我聂荣臻谈话，问：‘你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的态度怎么样？’

聂荣臻说：‘遵义会议我已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

陈昌浩见不得要领，话不投机，高谈阔论一阵子就走了。

傅鍾奉张国焘之命，带了一个名单来找洛甫。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畅叙旧情之后，傅就把名单拿出来了，上面写着红四方面军哪些人进中委，哪些进政治局。洛甫看过后说，中央可以考虑，但恐怕不能进那么多。

八月四日至六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开会。

张国焘与陈昌浩在一个骑兵班的护卫下从毛儿盖出发去沙窝开会。到达沙窝山口时，洛甫已在那里迎候。寒暄两句，洛甫小声告诉张国焘：‘今天是政治局会议，昌浩同志还不是政治局成员，不能参加。’张国焘只带了一个随身警卫员跟洛甫赴会。过了几道岗，哨兵使用特殊口令，显得警戒森严。张国焘见状不悦，弦外有音地说：‘中央机关自行警戒如此严密，那就不用着总司令部担心它的安全了。’

一进会场，毛泽东递给张国焘一份会议文件：《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现任务的决议》（草案）。张国焘一目十行地浏览一遍，见写着‘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后面则是强调团结，写着‘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

张国焘把文件拿在手上，第一个发言，他指点着说：‘谁在破坏团结？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也有人引经据典地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煞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得不成样子。试问，这是谁在破坏团结？’

毛泽东不软不硬地插话说：‘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有人说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是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会议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张国焘决不示弱；‘也许不宜冒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

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人民群众所接受。’

张国焘这一席话是专对毛泽东来的。他把进攻的矛头主要指向苏维埃运动,强调苏维埃运动‘失败了’,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醉翁之意不在酒,意思是说,你毛泽东这个‘中华全国苏维埃主席’,已经成了流亡政府,没有一块地盘了,你神气什么,你还做什么主席,你说我的西北联邦政府不该成立,但我这个西北联邦政府有军队有地盘,和你那个中华全国苏维埃,牛头对不上马嘴,不受你的领导,也根本不承认你。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在领导集团中的政治地位。

张国焘口沫横飞,四面出击,攻完了苏维埃运动,否定了毛泽东之后,话锋一转,又攻中央的政治路线,他说:‘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为了统一党内的意志,我主张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现在一、四方面军的干部互有隔阂,对中央也有不满,这样,扩大的会议更有必要。当然,我们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因此,我们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

张国焘自以为手里有真理,自以为说的婉转而全面,什么‘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啦,‘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啦,但会说

的不如会听的，他这一番话把博古、洛甫、王稼祥、凯丰等都激怒了。他们是政治家，是共产国际派来执行政治使命的，军事上错了，他们可以不负或少负责任，如果政治路线错了，他们都得下台。

在政治斗争中，张国焘尽管也算得上圆通老辣，但和毛泽东比起来则显得幼稚而笨拙，像毛头小伙子一样感情用事。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何尝不是认为博古他们的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但他绝口不提，而是申明‘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这就为纠正军、路线的错误减少了阻力，使‘左’倾路线的核心集团博古、洛甫、王稼祥发生了分化，把洛甫和王稼祥争取过来了。因军事路线错误所负的连带责任而不得不下台的总书记博古，因为‘政治路线正确’，政治局常委还可以当下去；而洛甫和王稼祥因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有功，政治地位不仅没有下降，而且上升了。毛泽东没有去谋取总书记的位置，这是他的明智通达之处。那时候，中国党的第一把手，共产国际如果不承认是没法干下去的。他把张闻天推出来代替博古，共产国际容易接受，对共产国际决定中国问题时有很大

影响力的王明也不致横生枝节。作为政治家，毛泽东已历练功的炉火纯青了。沙窝会议上的张国焘，拥兵自重，向整个中央政治局宣战，让大家都承认错了，臣服于他，拥戴他为党和红军的领袖，这就注定了在上层斗争中他必然失败。

在张国焘提出把军队的高级干部都请来讨论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时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七嘴八舌，一致反对。还是

毛泽东厉害，几句话就代表了政治局多数的意见，把张国焘说的目瞪口呆。毛泽东微笑着说：‘国焘同志，你是不是要开督军会议，改组中央领导啊！‘督军团会议是一九一七年安徽督军张动在徐州召开的密谋推翻民国、复辟帝制的会议。这句话击中了要害，揭穿了张国焘的阴谋。

毛泽东接着说：‘中国共产党是全国性的政党。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两方军来检讨。’

有板有眼，有理有据。张国焘再也不提召开两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了。

接下来就是与会者反分裂、要团结的呼声。

主持者洛甫说：经政治局常委研究，增补陈昌浩、周纯全同志为中央委、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徐向同志为中央委员，何长、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

张国焘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嘛！’

毛泽东说：‘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40 机智深沉 叶剑英忠心护党 鲁莽灭裂 张国焘自立为王

八月初,军委召开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行动部署。朱德、张国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叶剑英出席了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新战役计划的要旨是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以创造甘南根据地。为实现这一企图,徐向前、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但张国焘提出分左、右两路军北上。为尊重张国焘在军委负总责的身份,按他的意见,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红一、红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红四、红三十军组成,由中央率领,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的红九、红三十一、红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红五、红三十二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以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为政委,刘

伯承为参谋长。

一切都商量好了，右路军的先头团——红三十军二六四团和二六五团已出发在途，张国焘又横生枝节，提出北进夏河以后变原战役计划中向东（陕西）发展为向西（青海）发展。于是，中央机关又停下来，于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举行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周恩来患重病，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已去左路军，叶剑英带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彭德怀率三军殿后，均未参加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主题发言。他说：‘根据中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和军委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我军北进夏河地区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东向陕西，一是西向青海。我的意见，主力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红军北出后，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这一地区背靠草地，川敌不易过来；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至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路，也是好的。’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和徐向前相继发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陈昌浩说：‘现在应抓紧时间，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的既定方针。’

徐向前说：‘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

毛泽东见大家思想一致，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他说：‘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否则，将被敌迫我向西，陷红军于不利境地。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可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而向右路军靠拢。我们不应将左路军看成是战略预备队。作战略预备队它赶不及，不能指望。总之，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遇到一些困难就转而向西。’

最后，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本内容，整理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八月二十一日，右路军际会陆续出动。红一军先行，继后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再后是红三十、红四军，彭德怀率红三军殿后。这时，左路军已占领阿坝。徐向前、陈昌浩连电朱德、张国焘，告以中央新决定，强调目前主力西向或分兵出西宁，均不妥当。左路军占领阿坝后，不必肃清该地区之敌，要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力量灭敌，速出甘南。中央也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电告朱、张。八月二十四日，徐向前、陈昌浩又电朱、张：‘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面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覆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从八月二十二日起,右路军进入了若尔盖大草原。草原行程约半个月,里面茫茫一片,没有人烟。出发前每人要采集二十斤青棵麦,不然就走不出草原。还要带一根搭帐篷用的三尺长的棍子,一捆干柴。中央机关的同志,男男女女早在忙着过草地的准备工作。出发前,前方部队给中央机关送来一头牦牛,警卫队把它宰了。牛头和内脏煮着吃了,牛肉舍不得吃,每人分一小块,切成牛肉干当干粮。警卫队周队长一份一份分好发给人家。贺子珍生孩子、救护伤负伤以后,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分给她的就比徐特立、谢觉战、董必武几个老同志稍多些。这事不知怎么让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把刘英找了去,问:‘这是怎么回事?贺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们多呢?’刘英说:‘这事不是我管的,是周队长分的。’毛泽东很认真:‘你跟他说,贺子珍不能特殊,一定要给几位老同志补上。’刘英找到周队长,传了毛泽东的话,周队长很为难说:‘啊呀,现在全分完了,剩下的就是毛主席、洛甫同志几位领导人的了,这可怎么办呢?’刘英说:‘毛主席说了要补,可不敢不补啊!’后来只好从几位领导人的份子里割一点下来,补给了几位老人。毛泽东听说后很满意。

部队指战员就更苦一些。有的没有筹到足够的粮食,几天后就断粮了,野葱、野芹菜、马鞍、皮带成了指战员充饥的食物。有的人吃了有毒的野菜或喝了有毒的水死掉了。草原上没有路。地面平坦辽阔,雨水不入江河,都积蓄在地表下,一插足就是没膝深,有

的地方是几米的深潭，人马一陷入，愈挣扎愈往下沉，直至没顶，泥水里泛着泡沫，就完了。这里气候 变化也大。中午晴空万里，烈日炎炎，下午可能黑云密布，雨雷交加，晚上气温降到零度以下。一方面军万里转战，体力消耗太大，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许多人头天在凄风苦雨中睡下，第二天就再也起不来了。据殿后的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计算，一军团掉队落 伍与牺牲的在四百以上。

穿过草地，右路军进入半农半牧的巴西、班佑地区，这里有粮、有水、有牛羊、有房子住，部队得以稍事休整。前敌指挥部设在巴西一座喇嘛庙里，叫班佑寺，徐向前、陈昌浩、叶 剑英同住一间大屋，作战科、机要科在左侧一间房子里。毛泽东和洛甫、博古住在离指挥部十余里的牙弄。

距离巴西、班佑一百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有包座河纵贯其间。守敌是胡宗南部伍诚仁第四十九师，利用山险隘路，修筑许多碉堡，并储存了大批粮食，妄图扼住红军北进通道。

徐向前和陈昌浩向毛泽东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红四方面军的红一二十军和红四军承担。红一军作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保护中央机关的安全。毛泽东批准了这一 意见。

许世友这时来开会受领作战任务，策马来到巴西班佑寺。见毛泽东正在寺院外面草原上散步，急忙下马上前敬礼，并自我介绍说：‘我是四军军长许士友。’毛泽东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经常听

到你的名字,还没见过面。你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呀?’

许世友说:‘说来话长,我幼名叫友德,姓的是言午许,家谱上是仕字辈,父亲便给我起名仕友。参加红军后,学了文化,知道‘仕’是做官的意思,我就悄悄把立人旁去掉,改成士友了。主席,你看我改得好不好?’

二人边说边走进入指挥部。毛泽东说:‘你坐下,我们商量一下,我想给你再改个字。’

‘怎样改法呢?’

‘你看,把『士』改成世界的『世』好不好?这样一改你就成了世界之友了。’毛泽东说罢哈哈大笑。

许世友说:‘好,从今后我就改成世界的世。’

说笑间,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也到了。徐向前介绍程世才见过毛主席。把地图铺在地上,大家蹲下围着地图开会。徐向前给两位军长交代了任务。毛泽东询问了部队一些情况,许世友、程世才告辞而去。

徐向前、陈昌浩把指挥所设在上下包座之间的一个山头上。按照战斗分工,红四军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守敌,红三十军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守敌。两个军都打得不错,包座之战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四千余人,俘敌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机枪五十余挺,电台一部,粮食、牦牛、马匹甚多。战斗中,红四军第十师师长王友钧打红了眼,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向敌猛烈扫射,掩护部队冲锋,不幸中弹阵亡。

右路军出草地进入包座，已是八月底。左路军那边迟迟不行动。毛泽东把陈昌浩、徐向前找去商量办法，决定以毛、陈、徐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催促左路军北上。

九月三日，张国焘回电说：‘（葛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

九月八日，张国焘致电陈徐，令右路军暂停向罗达进，准备南下。这封电报是张国焘一人署名的。朱德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九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到阿坝时，张就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并发电报要把北上的队伍调回南下，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朱德作为统帅人物，在大的政治关节上是不含糊的。从那以后，他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就不能正常地履行职责，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斗争。陈昌浩将电报送张闻天。晚上，在周恩来驻地召开会议，通过了七人署名的履电，恳切陈辞，劝张北上。原电如下：朱张刘（伯承）三同志：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

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定)、泸(定)、天(全)、芦(山)、雅(安)、名(山)、邛(崃)、林(邑)直至懋(功)抚(边)一带,敲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朮(疑为‘富’字之误)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綏(即綏靖,又名靖化,今大金县)崇(化)入口八个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亦]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宗南)敌不敢动,周(浑元)王(均)两部到连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九日,张国焘复电,强调北进困难,坚持南下,电文如下: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疑为‘岷’字之误)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

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人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

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翁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陈昌浩接此电后，改变了态度，持电找中央领导人游说，挨了一顿批评，当天中央覆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入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徐向前是顾全大局主张共同北上的，力言‘合而后分，兵家大忌’，但这时他很为难。回忆此事时，他说：‘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历史的回顾》中第四二五页）

这时，前敌指挥部驻在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驻在牙弄，两地相距十余里；周恩来、王稼祥因患病随殿后的三军团驻在巴西一座喇嘛庙，距指挥部约二十余里。据彭德怀文革时狱中自述，在这个危急关头他办了两件事。第一件：‘秘密派第一团隐蔽在毛主

席住处不 远,以备万一。’第二件:‘在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处,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三军团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本,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朝鲜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纵,务把电台密本 送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作了。’周恩来把总政委让给张国焘以后,就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没有周恩来的授意或同意,这两件事彭德怀和李富春都是不能干、不敢干的。周恩来是何等精明的人物,早就防着张国焘。

九日下午,彭德怀到前敌指挥部观察动静,见到毛泽东,说:‘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前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决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

毛泽东想了一会,答曰:‘不可。’

‘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觉悟的。’

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的电台掌握在周恩来派来的三局局长曾希圣手中。九日下午收到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密电,令其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参谋把密电交给了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从密电里看出了隐伏着的杀机,连夜骑马来到牙弄,

将密电迳直交给了毛泽东。对于叶剑英这一功，毛泽东念念不忘，多次提及。还送叶一副对联：‘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毛泽东把密电收起来，不露声色，找到陈昌浩。陈说：‘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怎么办？’毛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同意，没有阻拦，因为他没有看到‘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电报，不敢对中央放肆，他也没想到这是毛泽东等人的脱身之计。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来到巴西周恩来住处，王稼祥早在这里，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毛、张、博、周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王稼祥是政治局委员，这个会议是中共中央最高层的决策。会议一致认为，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中央率一、三军立即北上。为强调中央的正统地位，发表《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用中央政治局名义给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下达政治命令。

会议结束后，五位中央领导人来到寺院的院坝里，临时召开红军部分指挥员会议，主要是中央直属队干部团和三军团的各级主要领导干部。毛泽东站在台阶上宣布了中央的紧急决定。着重解释了党中央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张国焘南下川康的方针是错误的，也是没有前途的。他说：‘每个革命同志都要以大局为重，明辨是非；但是，愿意北上就北上，愿意南下就南下，红军内部要团结，不能互相打架。我们相信南下的红军，一定会按照中央的路线，重

新走上北上的道路。’

这天夜里，叶剑英率领曾希圣领导的三局，来到三军司令部。中央率三军秘密北上。毛泽东和彭德怀率后卫团即杨勇的第十团殿后。

十日凌晨，右路军前敌指挥部乱了营。有人向徐向前、陈昌浩报告：‘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一方面军的人都走了。’接着，前面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连夜开走，还放了警戒哨，请示打不打？陈昌浩拿着听筒问徐向前：‘怎么办？’徐向前一听就急了。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对着听筒重复了一遍徐向前的话，算是他们两个给部队的命令。刚放下电话，红军大学政委何畏专程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接着他又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叫骑兵通信员以‘特急飞件’送去。

何畏回到红大，立即派教育长李特去追。李特骑上快马，带了几个骑兵警卫员，很快就追上了红军学校的队伍。红校特科团干部是一方面军的，学员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认识一些学员，就边走边喊：‘四方面军同志不要走了。’部队停下来了。这时随红军学校行进的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快步迎上前去，与李特吵起来了。李特也是留苏的，说一口流利的俄语。所以二李是用俄语吵架。懂俄语的同志一听，原来李德是说：‘北上是正确的，不许你胡闹。我们一起去见毛泽东同志。’李特就是不去。

正在这时，有人喊：‘毛主席来了。’只见毛泽东、张闻天、叶剑英、杨尚昆等在警卫人员的簇拥下过来了。

李特见了毛泽东，说明是奉命而来，并问道：‘现在张总政委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毛泽东很平静地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你向国同志转达我的意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强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甘孜、芦花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李特见追回中央领导人和红一方面军根本不可能，就说：‘根据陈昌浩同志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学员要留下。’

毛泽东说：‘可以，红军学校的学员回去跟四方面军南下吧，特科团的干部要北上。’并当场命令宋任穷和韦国清，集合特科团讲话。毛泽东说：‘现在你们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然后让李特把一部分学员领走了。

骑兵通信员追上红三军，把陈昌浩的信件交给彭德怀，彭看后给毛泽东，并问：‘怎么办？’毛说：‘回张条子给他。’彭给陈昌浩写了回信，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言明‘后会有期。’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方寸不乱，有板有眼，连下两道命令：

九月十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因张国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

彻自己的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及政委并责成实行之。’并告中央已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俄界前进，红四、红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红一、红三军后前进；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

九月十一日，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给张国焘：‘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延误。’

在当时，他们知道，这两道命令是不可能被接受被执行的。但不再称兄道弟，而是以上对下，堂堂正正，立此存照，这就占住了一个‘理’字。

九月十二日，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今后战略方针及与张国焘争论的报告。他说：‘红军今后总的战略方针是北进，但目前党中央只率一、三军单独北上，力量不够，可以考虑首先打到甘东或陕北，进行游击战争，以便得到国际帮助，整顿、休养，扩大红军，创造根据地。张国焘的错误，是右倾分裂主义性质，目前还是党内斗争，现在不忙做组织结论，这有利于争取四方面军北上。’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的争论实质是由于对目前形势与敌我力量的对比估计有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张国焘有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

同志离开党。’会议认为目前仍是党内斗争，为等待张国焘的醒悟，暂不作组织结论。此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俄界会议对张国焘错误的处理，表明了毛泽东、周恩来在政治上的成熟。与后面张国焘的政治举措成为鲜明对照。会议决定红一、红三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会议还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罗迈五人组成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整编工作。

九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致电张国焘，恳切说明：率军北上‘只是为着实现领导全国抗日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奋斗，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利他们北上。一、四方面军目前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和电令，总政委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能说得上团结一致。’

但是，张国焘没有悬崖勒马，幡然悔悟。九月中旬，他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在一个喇嘛庙里举行，迎面一条横幅是‘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实际上开成了批斗朱德、刘伯承的大会。省委、省苏维埃、法院、保卫局、妇女和青年团的干部都到了会，以壮声势。会上逼朱德支持南下的方针，朱德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说：‘我是个共产党员，毛儿盖会议我举手同意北上，你们说毛

儿盖会议是错误的，我认为正确的。北上才有出路，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你们这样做，就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轮到刘伯承表态，他说：‘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你们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你们向南去，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朱、刘的态度影响一大批人，特别是原一方面军五、九军团的干部。九军参谋长陈伯钧就直接找张国焘谈话，呼吁团结，反对分裂。对于反对南下的干部，张国焘以‘蒋介石侦探’、‘日本间谍’、‘小组织活动’等种种罪名加以撤换、逮捕甚至杀害。

十月五日，在大金县东北的卓木碉，张国焘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说中央已‘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他要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织‘临时中央’。接着就宣布‘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名单，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还宣布。

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当天，张国焘还给中央发一电报：

(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这样一来,张国焘鲁莽灭裂,就把事情做绝,毫无转圜的余地了。解决完组织问题,张国焘率军南下。四方面军本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十多天连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共歼敌五千余人,还击落敌机一架,控制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懋功以南广大地区,造成了直捣四川军阀大本营成都的战略态势。

军阀割据的特点是,对过境的红军是‘送行式’的追击,‘敲梆子式’的堵截,尽可能的保存实力,不打硬仗,能应付一下蒋介石就行了,但如红军要落地生根,威胁到他赖以作威作福的地盘,则要起来拼命。左路军这次南下打到成都的大门口所造成的态势,就包含着下一步失败的因素。果然,川军总司令刘湘,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急调王瓚绪、唐式遵、范绍曾、李家钰等部,驰援名山及其东北的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地区,连同原来守军,合计兵力达到八十个团。

四方面军这时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以劣势兵力继续向东打,十月十六日,直下邛崃至名山大路上的重镇百丈。刘湘下令,拼死要夺回百丈,临阵不前者,一律就地枪决。十九日拂晓,川军十几个旅从东、北、南三面发起强有力的反突击。这一仗打了七天七夜,真可谓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英勇的红四方面军共毙伤敌人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近万人。战局没有打开,薛岳部又从南部

压了上来。红军则有伤亡和消耗,没有兵员和武器弹药的补充,终于不支,向西撤退。百丈决战,是四方面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赤壁的主要标志。

红四方面军退守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南下东进均不可能,处境转入被动。这一地区多为藏族聚居区,人口不过数十万,物产不丰,粮食被服补给发生极大困难。那年降了多年不遇的大雪,漫山皆白,地冻三尺,有的筹粮人员冻死在雪地里。藏民武装多次与筹粮队发生冲突。部队一日两稀一干,都难以为继。现实有力地驳斥了张国焘所谓南下‘有房有粮’的空话,在这样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时候,不断传来陕北的胜利消息。毛泽东、周恩来率一、三军在陕北与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指挥直罗镇战役,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两个师,俘敌五千余人,缴枪三千五百余支。陕北根据地已发展到二十多个县,红军亦有壮大。这些消息在四方面军各部队流传,许多指战员窃窃私语:‘还是中央的路线胜利了。’张国焘多年建立起来的威信一落千丈。

十一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来到了瓦窑堡,带来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文件、《八一宣言》。

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潘汉年也回来了。他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为了安全,他身上片纸只字都没有,他把密码记在脑

子里了。向周恩来汇报后，周命他将密码告诉掌管机要的邓颖超。邓颖超一一记下后，向莫斯科试发报，成功了。从此，中共中央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张浩致电张国焘，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的第二‘中央’。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二十七日致电陕北，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路线，并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

三月三十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向甘孜地区转移，与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红六军团二万二千余人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的率领下，从一九三五年春到一九三六年夏，先后转战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西康等省，以坚决积极的作战行动牵制和消灭了大量国民党军，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长征。七月二日，二、六军团齐集甘孜，胜利完成了同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七月五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发布命令：红二、红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兼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兼红二军团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陈伯钧为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为政委。二十二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

七月一日，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与张国焘举行甘孜会议。这时张国焘虽然内心别有打算，仍不愿与中央会合，但由于朱、刘、任、贺、关的坚持，会议作出了北上与中央会合的决定。

41 榜罗黎明 毛泽东当众赋诗 峨眉梦残 蒋介石对天长叹

俄界会议后，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着这支八千余人的队伍，沿着白龙江源头的栈道，进入甘南境内。再往前走，就是天险腊子口。

这腊子口仿佛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为两半，从下往上观察，山口只有三十来米宽，纵深是一道用石壁构成的长廊，两侧绝壁陡立。山口的两座山峰之间，是水流湍急的腊子河，两山之间横架一座东西走向的木桥，要通过腊子口，非过此桥不可。守腊子口的是陇南土匪出身的鲁大昌部，新番号是国民党第三军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令其第一旅旅长梁应奎率第六团（两个营）守腊子口，师部率主力驻岷州。沟口两侧悬崖上筑有碉堡，口子后面是一个三角形的谷地，山坡上筑有工事。交叉火力从沟口到纵深严密封销了入口处。林彪、聂荣臻、红二师师长陈光和红四团团团长王开

湘、政委杨成武都到前沿看了地形。如果不走腊子口，就要西绕青海或东出汉中，西绕青海路途遥远且有马家军阻截，东出汉中正当严密布阵的王均第三军主力；反覆权衡结果，只有从腊子口闯过去。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一路打先锋的红四团。

王开湘和杨成武又率全团营连干部到前沿看地形。经反覆侦察，发现了守敌的两个弱点：一是山顶碉堡没有顶盖；二是守敌集中在正面，两侧因为都是陡峭的高山，山顶上没有发现敌人。遂决定：由王开湘率一、二连和侦察队攀援绝壁，插到敌人侧背去；杨成武指挥二营从正面攻击，六连担任主攻。侧背得手发一红一绿信号弹，总攻开始发三颗红色信号弹。战斗预计在九月十七日凌晨三点打响。王开湘率领迂迴部队登上悬崖，看准没有顶盖的炮楼和敌人的阵地，扔下一个接一个的手榴弹，轻机枪和冲锋枪也一齐开火，从后边和上边打响了，敌人一下就乱了营。这时，正面攻击的第二营开始过河，控制了独木桥，沿河的两岸向峡谷纵深扩大战果，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拼杀，突破了敌纵深防御体系，夺取了敌人的几处预设阵地和几个堆满弹药、物资的仓库，占领了腊子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就这样被突破了。残敌向岷州方向败退。十九日毛泽东挥兵向东，占领了哈达铺。在大草滩缴获粮食数十万斤，盐两千斤。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大家欢欣鼓舞。

鲁大昌惊魂未定，怕把全师拼掉师长也当不成了，只坚守岷州，不敢出击；要求第十二师来援，被师长唐维源拒绝了。这就给

了红军几天休整的机会。

九月二十一日，中央机关进驻哈达铺。毛泽东住在一家中药铺里。其他领导人与司令部住在一起。先头部队进占哈达铺的时候，在当地邮局得到了不少积存的报纸。主要是七、八月份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等以极大的兴趣翻阅这些过时的报纸。原来聂荣臻在哈达铺看到一张《山西日报》，其中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这就是说：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哩！聂荣臻派骑兵通信员赶紧把报纸送给毛泽东。几位领导人忙着翻阅旧报纸。就是想知道陕北根据地更多、更具体的情况。洛甫还认真作了读报札记，把有关资料集中起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后来发表在《前进报》上，文章指出：陕北二十三县都有游击队活动，其中延安、延长、保安、安塞、安靖、靖边等五六个县是刘志丹领导的苏区根据地，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有三个师，一万多支枪。下面还有十四支游击队。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有精兵三千，于七月中旬从甘南胜利突围，转移到陕甘交界处活动。领导人议论着陕北，这才有了把陕北作为长征落脚点的想法。

九月二十二日，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

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追堵围剿，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

作梦都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这本身就是个伟大的胜利。感谢国民党的报纸,给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哩!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宣布一个重要决定,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我兼政治委员,林彪当副司令员,下属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由一军团改编,林彪兼司令员,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第二纵队由三军团改编,彭雪枫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治委员;中央机关编为第三纵队,由叶剑英同志任司令员,邓发为政治委员。目前我们只有八千余人,人是少了一点,但小有小的好处,目标小,作战灵活性大。人少,更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留下来的这些同志都是经过锻炼和考验的,不论政治上、军事上、身体上个个都是很强的。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

九月二十三日,陕甘支队以一部兵力东进间井镇,佯攻天水,调动人向天水集中,彭德怀、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向北急进,在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北渡渭河,二十七日占领榜罗镇和通渭县城。在榜罗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把革命大本

营放在陕北。第二天召开连以上干部会。为躲避飞机，会议于凌晨五点钟开。天还没有亮，细雨蒙蒙，大家就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会场是一个晒麦子的场子，周围圈着矮矮的土墙，两个角上堆了两大堆麦秸。就在麦秸中间摆放一张桌子，几个小凳子，领导人坐在那里。然后以桌子为圆心，一捆麦秸排成弧形，成了与会者的‘软席’座位。大家不顾风雨，唱着歌。人到齐以后，洛甫宣布开会。名份都还没有变，但毛泽东的地位逐渐突出了。这次开会又是他唱主角。他披一件蓝布旧大衣，穿一身灰布军衣，膝盖上有两块补丁，袖口和肘部也有缝补的痕迹。因为休整了几天，贺子珍刚给洗过，显得还整洁。他环顾会场，秩序井然。雨停了，晨光熹微中，大家见毛泽东特别高兴。毛泽东说：

我们渡过了渭河，这是姜太公钓鱼的地方。现在，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弟兄们。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去。中央政治局决定，我们要把领导抗日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现在还有一道关口，就是蒋介石、张学良在固原、平凉的一条封锁线。这将是我们的长征的最后一个关口。同志们努力吧。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力向前。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从前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自己知道如此，我们的朋友知道如此，我们的敌人也知道如此。

.....

毛泽东充满了信心。虽然他手里只有八千人，但他把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的中央正统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尽管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吵吵嚷嚷，要开除他的党籍，又要通缉他，他料定张国焘沐猴而冠，成不了气候。昨天一夜没怎么睡觉。想的问题很多，兴奋中成诗一首。讲话到诗最后，诗兴大发，当众朗诵起来：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上引长征诗与流传的标准本有一字之差，第五句‘金沙浪拍云崖暖’，标准本‘浪’作水。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应向读者交待的是当初发表时是‘浪拍’，一九五一年元旦山东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元贞给毛泽东写信拜年，信中提出长征诗第三句‘五岭逶迤腾细浪’有一浪字，第五句又出现一个‘浪’字，显得重复，提议把第五句‘浪拍’改为‘水拍’。毛欣然接受。一九五七年《诗刊》一月号正式发表此诗时，就是‘金沙水拍云崖暖’了。

就在毛泽东吟诗的时候，蒋介石正在仰天长叹。为追剿红军，他从南昌到重庆，从重庆到昆明，从昆明到成都。在成都，为讨蒋介石的喜欢，刘文辉把私宅让出来，让蒋介石作为‘行辕’，希望蒋

能宽恕安顺场、泸定桥两处堵截不力，被红军突破的过失。但蒋七月下旬进入成都，怒气未消，只对刘文辉本人留点面子未加处分，却令刘文辉将刘元琮（刘文辉的侄子）、余松林（刘文辉的大邑同乡）两旅长押参谋团法办。刘元琮旅在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奉命追击，在金汤被击败；余松林旅在大金川西岸被击败。在处分杂牌将领的同时，召见薛岳部少校以上军官，每人犒赏数百元不等。然后召集师长以上军官开会。会上蒋介石指出，根据胡宗南的情报，红军先头已抵毛儿盖，当前红军主力可能向西北行动，但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军，其突围路线可能是两条：一条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当前在甘陕边凤县、两当地区活动的徐海东部（红二十五军）有出甘南接应红军主力北上的企图。在会上，蒋介石决定薛岳率部于八月上旬将第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徐海东布置堵截；以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部联防；以胡宗南的第一军归薛岳指挥，集中于松潘、樟腊营、黄胜关、上下包座一线，堵截红军主力北上。以上归薛岳指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在十四万左右。

然后，蒋介石又传檄四方，调兵入陕甘。令第七路军毛维寿率前第十九路军改编的第四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分别由安徽、河南、河北三地入甘，归朱绍良指挥，调至松潘担任堵截；令豫皖边第三军王均部（原滇军朱培德旧部）进入洮河两岸的和政、临洮、渭源、陇西、武山、天水之线，构筑第二道封镇线；令江西第三十七军

毛炳文部(原湘军底子)到甘肃静宁、会宁、华家岭、隆德地区构筑第三道封锁线;调东北军张学良的骑兵军何柱国部进驻平凉,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进至天水,一部防卫兰州;第五十七军董英斌部、第六十七军王以哲部进入陕西,一部进至平凉、固原地区;令宁夏马鸿逵第十五路军人固原及环县布防,作最后之堵截。以上七个整军加马家军一部共达二十多万人。

以绝对优势兵力,堵截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蒋介石自信胜算在握。布置就绪就上峨眉山举办峨眉山训练团去了。八、九、十三个月共举办了三期。受训者每期一千,共三千人。由蒋白兼团长,陈诚、刘湘为副团长,杨森、邓锡侯、刘文辉为团附,轮训川军武官营长以上和四川地方文官县长、中学校长以上人员。训练的主要内容是打破四川军阀的割据观念,接受‘拥护领袖,忠党爱国’的教育。这是蒋介石对四川军阀挖墙角的一种办法,给他们的下级披上半个‘黄马褂’(意为半个黄埔生),直接忠于领袖。

蒋介石踌躇满志,训练团的事放手让陈诚去管,自己住在红珠别墅,饱览峨眉秀色,静候前方捷报。不料,九月初传来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在包座被歼灭的消息,接着是新十四师鲁大昌部在腊子口溃败,九月下旬红军又突破了第三军王均部的渭河防线,蒋介石心情忧郁,对左右说:‘我料定共匪要出腊子口,入甘南,乃调集大军,利用山河之险沿途堵截,今共匪一路突破,如入无人之境,非统帅不明,实将士作战不力。华家岭之役的俘虏供称:过渭河这一路是毛泽东率领的一、三军团。我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天不

亡毛,非人力之所及也。’说罢,传令下山。

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率领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转战,一九三五年九月底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九月十六日,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来到永坪,和红二十五军会师。十七日,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改组西北军事委员会,聂洪钧任主席;组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第七十五师由红二十五军编成,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第七十八师由红二十六军编成,师长杨森(与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重名),政委张明先;第八十一师由红二十七军编成,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全军团共七千余人。

在此之前,国民党军已对陕北根据地进行了两次‘围剿’。蒋介石为摧毁陕北根据地,使毛泽东及其率领的红军无立足之地,于七月中旬就部署了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后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指挥东北军于学忠、董英斌、王以哲、何柱国等四个军十一个师,晋军孙楚部四个旅及陕西军阀高桂滋、高双成两个师,采取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向北压缩的办法,企图将陕北红军围歼于保安、安塞地区。

组建红十五军团时,东北军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正由中部县(今黄陵县)向北进犯,其军部及刘翰东的第一〇七师已进驻洛川,

该师第六一九团一个营伸占羊泉原。何立中的第一一〇师、周福成的第一二九师(欠第六八五团)也沿洛(川)延(安)公路推进到延安,以第六八五团驻甘泉,维护南北交通。此时,于学忠军尚在兰州,董英斌军尚在庆阳,孙楚的四个旅尚未入陕。

徐海东、刘志丹等研究分析了敌情,制定了‘围城打援’的计划。被称为陕北‘活地图’的刘志丹建议在劳山设伏,先派一支部队围攻甘泉,切断敌南北交通,延安之敌断了补给,必然回援,劳山是延安至甘泉必经之地,攀山耸立,树木茂密,地势险要,十分利于部队隐蔽。这个作战计划被通过了。

九月二十八日,红八十一师第二四三团包围甘泉,军团主力于翌日进入伏击阵地。一直等了三天,十月一日,敌第一一〇师才在师长何立中率领下从延安出动,沿公路向甘泉增援。途中,他下令第六三〇团留四十里铺作为接应,率第六二八、第六二九两团搜索前进。何立中骑一匹高头大马,与参谋长范驭州并辔而行。过了九沿山,何对范说:‘都说徐海东厉害,我还以为他会打我个埋伏呢!现在,出了龙潭虎穴了。’传令部队由两路纵队改四路纵队快速向甘泉开进。

下午二时,何师先头部队进至甘泉以北的白土坡时,红八十一师第二四一团突然开火,堵住敌前进道路。位于阳台(劳山北三公里)的红七十八师骑兵时出击,断敌退路。何部首尾受挫,遂自动向中心靠拢,这时,埋伏在公路两侧山地的红七十五、红七十八师,同时向敌行军队形猛烈冲击,很快将其分割在榆树沟口和小劳山,

劳山,经五个小时激战,敌第一一〇师第六二八、第六二九两团和师直属队被全歼,师长何立中重伤逃入甘泉后毙命。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三千七百余,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东北军第六十七军遭受沉重打击后,改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十月二十日,其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和第六二〇团一个营进驻榆林桥。红十五军团仍以第二四三团围攻甘泉,主力自王家坪向道佐铺开进,逼近榆林桥。二十五日,红七十五师、红七十八师同时由东西两面,向榆林桥发起攻击。守敌凭借房屋和窑洞顽抗。战至下午,将敌全歼。这次战斗,俘敌团长高福元以下一千八百余人。这个高福元后来对沟通共产党与张学良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正当刘志丹率部与敌人拼搏的时候,祸起萧墙,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派人送来信件,要逮捕他。在此以前已逮捕关押了红二十六军一大批干部。此事主要责任者是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和西北保卫局长戴季英。聂、戴签署的命令落到了刘志丹手里。刘志丹坦然自若,只身前往瓦窑堡,企图说服他们停止错误的‘肃反’,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但刘志丹还是被捕了,和习仲勋等一起,关押在瓦窑堡的一个当铺里,受尽酷刑和虐待。十月天气。晚上不给被子盖,睡觉时还要捆上手脚。

刘志丹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参加过北伐,后在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职。一九二八年四月,与唐澍领导渭华起义,失败后回陕北,任中共陕北特

委军委书记。为开展兵连工作，当过保安县团总，后被派打进国民党军内部任团长、旅长。

一九三二年五月，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兼党委书记。一九三四年一月，任红四十二师师长，一九三五年一月，当选为陕北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二月任西北工委委员和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就因为复杂历史条件下的斗争中形成的这种复杂经历，刘志丹被诬为‘白军军官’，说他与杨虎城有联系是‘勾结军阀’，说他只分川地，不分山地，是‘不实行土地革命’（实际情况是当时陕北地多，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等等。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八千余人到达陕北吴起镇。陕甘边特委龚逢春去迎接，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边根据地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又汇报了乱搞‘肃反’，把刘志丹和红二十六军一大批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泽东听后派红军保卫局长王首道去瓦窑堡传达中央命令：立即停止逮捕，被捕审查的干部全部交中央处理。接着就成立了党务委员会，以董必武为主任，成员有王首道（红军保卫局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迅速甄别平反。十一月底召开平反大会，洛甫、博古、刘少奇等出席。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立即释放，分配工作；并宣布了对主要责任者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戴、聂也作了检讨。

这件事情的正确决策和迅速处理，使毛泽东成了陕北党和红军的‘毛青天’，为毛泽东在陕北立足生根创造了很好的政治条件。

十一月三日，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并将陕北的红十五军团与红一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共一万一千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十一月初，军委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到道佐铺看望红十五军团的领导干部，与徐海东、程子华、高岗、郭述申（政治部主任）一一握手，然后坐下叙话。

毛泽东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开长一色”。我们军队打到哪里，根据地就发展到哪里。现在到陕北，根据地就建在陕北。”

徐海东说：“今后一切大政方针由中央掌管，我们就照中央指示办，一定要执行好，贯做好，保证不发生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那样的错误。”接着又汇报了劳山、榆林桥两次战斗的情况。

“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打？”

“准备把县（今富县）西南的张村驿、羊泉原、东村、套通等几个民团据点拿下来，都是些土顽，但他们储藏了大量粮食和物资，打下来可以解决部队的物资供应问题。”

毛泽东说：“为要粉碎敌人对陕甘的第三次“围剿”，必须先打下张村驿。打下张村驿，使陕北苏区联成一片，打开我军向西出击的道路。”

“我回前方立即按毛主席指示，部署打张村驿。”徐海东要告辞。

毛泽东说：“给你一部电台带着。”

徐海东还没见过电台，作难地说：‘我不会用它。’

‘不要你自己动手，’毛泽东笑着说：‘需要联系，你向电台工作同志说，他们会使用它。’

徐海东满怀信心地回到前方。

‘打下张村驿，迎接毛主席！’成了红十五军团的战斗口号。徐海东令第二三二团团团长韩先楚和政委黄罗斌，率部一举拿下张村驿，歼民团数百人，缴获粮食和物资一部，为直罗镇战役作了战场准备。

徐海东除派人给中央红军送粮食、弹药、衣服、布匹、药品外，还和程子华商量，决定将军团一万元‘家底’全部送给中央。商量好就把供给部长查国桢、财务科长传家选找来，当面吩咐：‘中央红军刚到，困难比我们多，我们决定，把咱们一万块钱的“家底”给中央送去，多为中央解决困难。你们立即就办。’当查国桢、传家选把钱送到时，中央供给部部长叶季壮说：‘这真是雪里送炭啊！’

陕北红军取得劳山、榆林桥胜利后，东北军又以五个师的兵力组织新的进攻。东边一个师（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沿洛川、县大道北上；西边四个师（第五十七军第一〇六、第一〇八、第一〇九、第一一一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北县方面前进。

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已作了新的分工：毛泽东负责指挥作战；周恩来领导组织部、宣传部及后方军事工作。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在象鼻子湾军委总部召集会师后的各路红军指挥员，部署直罗镇战役。

罗镇战役。

直罗镇是由甘肃合水通向陕西县道路上的一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南北有连绵的土山对峙，中间是狭长的谷地，镇子就座落其中。一条东西贯通的大道从镇子中央穿过。镇子东头，有座古老的寨子，房屋虽倒塌，石头砌的砖墙却大都完好；镇子北面，是流速缓慢的葫芦河。

指挥员们看过地形后，决定要把镇东的寨子彻底拆毁，防止敌人利用。红十五军团派出一个营，去拆这座寨子。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红军以逸待劳。十一月二十日拂晓，敌第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带着部队在六架飞机的掩护下从黑水寺向直罗镇开来。中午，第六二六、第六二七团分别占领直罗镇两侧高地，牛元峰率第六二五团和师直属队进入直罗镇。毛泽东接到报告，先不叫打。他的指挥所在距直罗镇不远的北山坡吴家台北端高地几个破窑洞里。彭德怀在红十五军团指挥，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

牛元峰率部占领直罗镇后，到处不见人，只见到处是花花绿绿的标语：‘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我们帮你们打回老家去！’好不容易抓到几个人，一问，都是第一一〇师前几天被俘的士兵，说红军待他们不错，抓了去又放回来了。牛元峰原是辎重司令，根本没打过仗。对遇到的情况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来。全师官兵走了大半天了，先埋锅造饭，抓了一些百姓的鸡、鸭、小猪等，吃饱了闷头大睡。

晚上,毛泽东下了进攻命令。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以急行军在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两军团的兵力合起来是十个团。总攻前,毛泽东亲自给彭德怀和林彪打电话:‘一定要打歼灭战!要的是歼灭战!’

二十一日拂晓,两路红军像两只铁拳,从直罗镇南北高山上砸了下去。南面枪一响,敌蜂涌向北;北面枪一响,他们又向南边撤。第一〇九师三个团被红军十个团包围在两山之中一条川里,死伤甚多。第六二六团团团长石世安,认为大势已去,自戕而死。第六二七团团团长郑维藩重伤而死。第六二五团团副李吉堂,因组织突围不力,被牛元峰当场枪毙了。牛元峰果然逃到镇东头的寨子里,依靠断垣残壁,率杂乱建制的五百多人顽抗。

这时,一个被红军捉去的俘虏带回一封信来给牛元峰,参谋长刘德裕打开演给他听:

葫芦河边,老人山上,望远镜中,看到你的官兵均已厌战,纷纷投降。

我们北上抗日,是帮助你们打回老家去,你们东北军没有什么理由到西北打内战。现在你们大部被歼,最好你投到我们这里来,共同抗日,否则玉石俱焚,悔之晚矣!

牛元峰听后默无一语。第六二六团团副孟广云说:‘我们先写回信,可以说稍加考虑,再作决定。’牛元峰说:‘好!你就写吧!’实

际是想拖延时间。他最后的决心是：半夜十二点突围。路线是向南偏东，目的地是县。怎奈人心都散了。牛元峰突出土圈子，身边只剩下四、五十人。却见孟广云带着一百多人往正南去投红军了。越走人越少，最后只剩下参谋处长沈叔明和随从副官。跟追的红军越来越近。牛元峰突然站住，从腰际把勃朗宁手枪交给副官说：‘你把我打死。’副官接过手枪照牛元峰后脑打进一颗子弹，从前面打出，面颊炸碎而死。

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派第一〇六师去解围，在黑水寺被歼一个团，跑回去了。

直罗镇战役全歼第一〇九师，俘敌五千三百余人，缴枪三千五百余支。红四团政委黄苏和红二团圆长李英华在此役中献身。毛泽东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毕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爆发了大规模的爱国示威运动，史称‘一二九’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并不以侵占满洲为满足，又策划‘华北自治’，妄图吞并华北，是谓‘华北事变’。

一九三五年十月，日本唆使汉奸发起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自治运动’。十一月二十五日，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华北‘独立’，使冀东二十二县沦于敌

手。二十六日，国民政府撤消北平军分会，设‘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为委员。蒋介石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敌人侵步步退让，对抗日的进步力量加紧镇压。‘一二九’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在这之前的十一月一日，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涕泣陈词，催人泪下，宣言说：

我中华人民之受困于专制政府者久矣。民国以还，国体改制，以民为主，吾民莫不三呼

万岁，以为自是可得解放。……詎料大局既安，政府诸公竟自食其言，而所谓约法者，乃不

啻一纸空言。莫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段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

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负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一举一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北京大学学生组织“帝国主义研究

会”，清华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乃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杜重达先生系爱国

志士，竟以“妨碍邦交”而受刑事审判。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

十一月十八日，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当时涌现出来的学生领袖有彭涛、郭明秋、姚依林、黄敬、李葆华、徐冰、周小舟、蒋南翔、黄华(王汝梅)、刘导生、李吕、陈翰伯、张兆等。十二月三日北平学联通过了反对任何华北自治组织和联络全市大中学校发起请愿运动两个议案。六日，发出《北平各校通电》，通电指出：

自叛逆殷汝耕倡乱冀东，汉奸益形活跃，背景所在，尽人皆知。……吾民誓死反对断送领土及主权之自治行动以及任何变相之独立阴谋，以其纯为暴敌所一手造成者也。凡有倡言自治之人均为汉奸，民族之姦贼，人人皆得而诛之。应请政府立即下令讨伐首倡叛乱之殷汝耕，收回冀东，以保持领土及行政之完整。……十一月十九日五金代会蒋介石先生对外关系演词中谓：‘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吾民兹以今日之情形为问：和平主尚有望？最后关头岂尚未到？若尚固执‘安内攘外’、‘生聚教训’之见，城恐内部既不得安，外患又与日俱甚，将见国亡之后，适受敌人

之‘教训’，资敌人以‘生聚’也。

八日，北平学联在燕京大学召开各校代表大会，确定了请愿的

八日，北平学联在燕京大学召开各校代表大会，确定了请愿的路线和时间。

十二月九日清晨，北平各校毕生万余人冒着严寒向预定集合地点新华门进发。清华、燕京大学等校学生被国民党军警阻于西直门以外。城里五、六千学生冲破军警的包围，汇聚到新华门，在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停止一切内战’等六项要求。当请愿队伍长安街到达西单时，遭到军警的袭击。后来集合起来的队伍经王府井大街时又遭手持皮鞭、大刀、水龙的军警镇压，学生们忍受饥寒，赤手与武装军警展开了搏斗，一百多人受伤，三十多人被捕。第二天，学生开始总罢课，并酝酿更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十六日，再次走上街头，在天桥召开了有两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提出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使预定十六日成立的这个汉奸政权不得不推迟。

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有三十多个城市相继爆发了爱国学生运动。‘群燕子代表着春天。‘一二九’学生运动标志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后来斯诺访问毛泽东，对‘一二九’运动作了高度的评价。

斯诺说：‘这次学生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五四运动’。从这次运动中，我看到了这个民族倔强高贵的灵魂。’

毛泽东笑着问：‘斯诺先生，你们夫妇真是这次学生运动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者吗？’

斯诺说：‘王汝梅（就是黄华）经常到我家里来（注：斯诺住燕京

大学),他们几个学生领袖经常在我家的小客厅里开会,我一点也没看出王汝梅是个共产党员。’

毛泽东笑了笑,说道:‘让你看出来还行。’

42 陕北疾呼 有亡国灭种之祸 南京软语 无百年不解之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在陕北瓦窑堡张闻天住的窑洞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林育英）等人。首先由张浩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季米特洛夫在‘七大’所作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会议中，博古仍有‘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对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和大资产阶级营垒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很快取得了一致。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两天后，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摆脱王

明集团的压抑,在政治路线上拿出自己的主张,说自己想说的话(遵义会议上他只能就军事路线上拿出自己的主张,说自己想说的话)。

这个报告标志着毛泽东作为中共政治家在政治上的成熟。他洞察时局,把握着历史发展的趋势,高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预言了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动态。事变的发展大体上是按照他描绘的轨迹运作的。蒋介石作为政治家,从此时起则显得相形见绌,在政治上转入被动。这一点观之于蒋介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讲演而益信。

下面就毛蒋两篇讲话作一对照分析。关于日本的图谋。

毛泽东认为:‘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日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属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最近的冀东事变和外交谈判,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

蒋介石认为:‘我东邻日本,关于东亚之和平,与彼此两国之福祉,亦必关心更切。吾人今日孜孜以求看,不过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而已。’原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又谋华北五省,是关心‘彼此两国之福祉。’蒋氏准备与这遣位‘东邻’‘求共存’。

关于民族复兴之道。

毛泽东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

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

蒋介石认为:‘所谓民族运动,决非单纯的对外运动。盖民族运动应有内外两面,对外运动,仅为民族运动中之一部分,决不足以概民族运动之全,换言之,对外应向国际为吾民族求独立平等,对内应向民族为吾国家求自立自强。’那末在蒋氏作此言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那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民族运动的两面应以何者为主呢?答曰:‘必须同时平衡进展,方有成功之望,若仅着力于一面之突出,必遭意外之挫折。’就是说,一股劲地抗日,就会惹下祸来。

关于与列强诸国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当着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不去说它。于今只说被蒋介石禁闭过的国民党政客胡汉民,不久以前也签名于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文件。胡汉民所依托的两广派军阀,也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并重”(蒋介石的是“先剿匪,后抗日”)的欺骗口号之下同蒋介石对立。你们看,不是有点奇怪吗?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痹又疼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

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这里毛泽东已经有了把同样欺侮过中国的英美日列强作区别的思想，当前主要敌人是日本，应把英、美同日本加以区别，把亲英美派同亲日派加以区别。

蒋介石认为：‘国与国间关系，与个人与个人间之关系，完全不同，国家与国家间，决无百年不解之仇……决定国际间离合友敌关系，应以整个国家盛衰，及整个民族利害为对象，不应以一时之感情，及局部的利害为对象，其间权衡缓急急，比较轻重，决定政策，实为负责政治家与革命党员应守之规范。’他这位‘负责之政治家’权衡的结果是，‘今日之敌，未始不可能为明日之友。’因此，对已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的日本，‘不应以一时之感情，及局部的利害为对象’，轻言抗日，他要等着这个‘今日之敌’化为‘明日之友’。

那时蒋介石握有全国政权，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消息和蒋介石在大会上的讲演，各城市大报均有登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的讲演，只在狭小的革命根据地公开宣传，在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区、则是以地下传单的形式与部分群众见面的。人们读毛氏之讲话，如高屋建瓴，酣畅淋漓，抗日救亡之信心大增；读蒋氏之讲话，吞吞吐吐，曲曲折折，如钝刀子割肉，掩卷细思之，曰不抗日而已。两相对照，毛泽东大大露了脸，蒋介石大大丢了分。中国的先进分子，首先是知识界，由敬重‘蒋委员长’，逐渐地变成了敬重‘毛主席’。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上海文化界马相伯等二百八十余

人签署《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同月北平文化界马叙伦、邢西萍、武新宇、许德珩、许寿裳、黄松龄、刘彦、刘万祺、齐燕铭、严景耀等一百四十九人签署《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名流学者们拍案而起，不指名的批驳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演讲，反对与日本妥协、提携、亲善，反对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谴责镇压‘一二九’学生运动。北平文化界的宣言说：‘真正的民意，正在预备着全体武装，为最后的奋斗。所以“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北平学生示威运动，便如电掣雷兴地起来；各地的毕生运动也如崩山倒海地继续发展。他们费了父母的血汗之资来入学校，希望学成后做一个社会的中坚分子，国家的柱石良材；决不是不知艰难的黄口稚子，决不是爱出风头的无聊政客，决不是混水捞鱼的腐败官僚，决不是被人收买的捣乱分子，而是为爱国心所驱使，为民众争生存，愿意牺牲他们的光阴，愿意以赤血洗白刃而为民众的先驱，为救国的斗士。……很惭愧地负了北平文化责任的我们，平日将什么智仁勇呀！礼义廉耻呀！教化青年民众。这是什么时候，是不是我们应当实现所谓智仁勇和礼义廉耻最后的机会来了？我们期望着政府决定国策，已经挨过了四年，如今敌人得寸进尺，竟有所谓新二十一条，如华北特别区、沿江沿海亲善区、某某三省独立区和其他的策划，都要在所谓“广田三原则”底下实现出来；那末不但华北重亡，整个的民族快要沦为奴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们还能等什么？还能迟疑什么？还能埋在一堆一堆的文化材料之中，进行着所谓文化救国的生活么？’

在瓦窑堡会议讨论《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反覆说明：‘阎锡山正面与日寇勾勾搭搭，东征讨阎，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苏区联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太穷的问题。只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才有出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议》强调‘红军应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下，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战略方针‘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其具体步骤是把红军的行动与苏区的主要发展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

东征军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主任。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新从国际回来的张浩（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决定张浩和彭德怀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也随军出征。兵分两路，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为右路军，徐海东、程子华率红十五军团和新编成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为左路军。周恩来、博古、邓发留瓦窑堡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后方工作。

一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贺子珍，秘书黄有风，电台台长曹丹辉，

电台工作人员和一个警卫班,还有乘马、驮子等等,从延长出发向黄河边走去。彭德怀已到前边选择渡口去了。刚过旧历年。一场大雪覆盖着山川大地。毛泽东穿着一件青布棉大衣(这是到陕北后新做的),拄根树棍走在队伍前面,一边走一边欣赏雪后的北国风光,不像去打仗,倒像个旅游者。马夫牵着一匹枣红马在后面跟着。晓行夜宿,二月初,到了离黄河不到半天路程的一个山村——清涧县袁家沟,一行人在这里住了下来。电台架在一个山包上,毛泽东在这里指挥东征渡河作战。

在毛泽东的窑洞里,每夜都烛光明亮,甚至通宵不熄。如今他走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他与全国中共机构和各地红军,保持着直接联系。

一天,夜不能寐,行军中酝酿的一首词,联句形成了。他铺纸挥毫,龙飞凤舞地写下来,反复低声吟诵,推敲,修改,誊清在两张信纸上:

沁园春·雪一九三六年二月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对毛泽东这首词,注家颇多。他自己也有解释,特别说明:‘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其实,古往今来,任何诗人的诗,都是以自己

为中心的。他当然不能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古代的大英雄,谁也比不了我,看我超过他们。但睥睨千古的英雄气概是跃然纸上的。

在袁家沟住了两个多星期,二月中旬,黄河开始解冻了。河水夹着大块的冰排,汹涌澎湃而下。二月二十日,东征军从陕北清涧以东的沟口、河口等地渡河,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进入河东。二十三日,全部控制了辛关至三交镇之间各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横宽五十公里,纵深三十五公里的地区。

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他从清末在山西当都督到民国当省主席和绥靖主任,统治山西几十年。当时他有部队八万人,有自己的兵工厂,连山西铁路都是窄轨的,一般火车进不去,是个典型的割据一方的军阀。如今见红军进入山西,急调入陕之正太护路军军长孙楚部四个旅撤回柳林、离石、中阳地区,会同原在该地区的第七十一师,阻止东征军北进,牵制其东进;调驻长治、晋城的第六十六师到介休,驻太原的第七十二师主力(一个旅另一个团)附从轩岗调来之第六十八师一个旅前出汾阳,驻汾阳之独二旅向关上村推进,阻止东征军东进;调驻临汾、襄陵、大宁、吉县的第六十九师向隰县前进,阻止东征军南进,牵制其东进。

为打破阎军的防堵,彭德怀、毛泽东二月二十四日决定:除以一部兵力(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二二四团)继续团攻石楼外,主力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水和这一弧形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作战根据地,作为东征军第二步任务。

根据上述部署,红一军团于二月二十六日攻占关上村,歼灭阎军独二旅第四团。该旅旅部率第三团向汾阳溃逃,红一军团乘胜追击,于二十七日将其歼灭。军团主力推进到汾阳西南兑九峪、三泉镇地区。红十五军团于二月二十五日在石楼歼敌一个营,继以三个团向隰县急进,在隰县以北十五公里的预期遭遇战中,歼灭阎军第六十九师先头部队一个营,击溃其另一个营。二十七日进占水头镇,接着推进到大麦郊地区。

面对东征军的强大攻势,阎锡山将自己的机动部队集中起来,编组为四个纵队,于三月四日开始向东征军反击。其部署是:以第六十九师三个旅为第一纵队,由隰县向北反击;以第六十六师三个旅为第二纵队,由介休向西反击;以第七十二师一个旅另一个团和第六十八师一个旅为第三纵队,由汾阳向西反击;以第一〇一师三个旅和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师各一个旅共五个旅为第四纵队,由中阳向南反击。

根据敌情变化,彭毛决心:以红一军团第二师一部在关上村附近钳制敌第四纵队,以红十五军团一个营在石口镇地区钳制敌第一纵队的先头旅,集中两军团主力,歼灭兑九峪及其附近之敌第二、第三纵队。三月十日将阎军两个纵队击溃,退往孝义、汾阳地区。这样,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即被粉碎。

三月十日,在所到之处张贴了由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署名的《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布告》,这个布告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文曰:

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的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的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协商、协定或谅解。我中华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议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

为发展胜利,彭毛令红十五军团一部围攻石楼,吸敌来援。阎锡山于三月十七日果然集中了四个纵队向石楼方向反击。彭毛乘晋南和晋西北防守薄弱之机,令右路军红一军团和红八十一师沿汾河和蒲路南下,迅速占领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等县的广大乡村,破坏同蒲路百余公里,消灭敌人正规军和民团各一部。抓紧时机,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筹集资财,建立秘密党群组织和抗日游击队;令左路军红十五军团主力于三月十八日从灵石以西地区北上,经南、北师屯,于二十二日进至岔口镇,作短暂休整,并开展地方工作。二十五日,红十五军团派出一个团附骑兵连东出袭击晋祠镇,威胁太原,吸引敌人加强省城守备;军团主力于二十六日从岔口镇北上,经娄烦向西北于三十一日达兴县以南地区,歼敌两个营另一个炮兵连,转到康宁镇休整、扩军和做群众工作。

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在隰县大麦郊镇附近的上益千村、石楼县罗村、四江村,召开了中央政台局会议,随军的政治局委员毛

泽东、张闻天、凯丰以及林育英、彭德怀到会；周恩来、博古、邓发也从河西赶来参加。会议分析了联蒋抗日的可能性。这是中共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转变的起点。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蒋介石要陈立夫设法找到与中共联系的渠道。陈交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甫办。曾通过谌小岑找到上海地下党员张子华，和北方局地下党员周小舟、吕振羽打通了关系。张子华、周小舟、吕振羽专程赶到大麦郊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国民党蒋介石这一最新动态。

根据蒋介石的最新姿态，在大麦郊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认为：不排除蒋介石允许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可能，没有再谈反蒋的问题。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周恩来发言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他指出：‘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有推迟的可能。一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已认识到抗日的必要性，但也有人想挑动日苏战争，所以至今国民党对于降日还是联俄仍举棋未定。要抓住孙中山提出过的“联俄、联共”口号和红军率先抗日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是抗日的中坚力量，要发动准备组织抗日战争。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要集中在华北。当前有三大任务：（一）向东发展，扩大山西根据地；（二）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以推动抗日运动；（三）正确运用上下层统一战线，推动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我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不放松准备建立，但又不麻痹群众；在抗日讨逆、停止内战等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并要求国民党有实际行动；我党保持批评的自由；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的同

时,不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的工作。

鉴于中共中央随军行动造成与各地联系的不便(如这次汇报蒋介石的信息费了许多周折才找到军中),会议决定今后中共中央不随红军行动。

东征军分左右两路南下北上后,阎锡山连电蒋介石求援。蒋介石调遣十个师入晋,分别集结在同蒲路南面和晋东南地区。二月二十四日,陈诚到太原,任入晋‘中央军’总指挥,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

四月三日,彭毛决定,逐步收拢兵力,寻机集中歼敌。右路军于四月四日向西转移,九日,以红一师向南进击稷山,主力进至河津以北地区。这时阎军第一纵队和第七纵队(‘中央军一第十三军两个师)向稷山以北地区逼进。右路军於十二日向北转,十五日攻克吉县,全歼守敌,俘吉县县长璩象咸以下三百余人,缴枪二百余支。接着,以两个师绕过大宁,於十七、十八两日扫除了平渡关至清水关四十公里的黄河沿岸据点;另两个师进至大宁、蒲县、隰县间阻敌北进,掩护位于康城的东征军总部。左路军于四月四日由兴县康宁镇地区南移,至白文镇、寨上村、故县村一带,与奉命刚到河东的红二十八军会合。六日晚,左路军继续南移,绕过离石县城,十一日在金罗镇附近击溃敌两个营;十二日在中阳城东南同晋军第六十六师第一九六旅遭遇,经过激战,全歼其第三九二团,俘团长郭登瀛以下六百余人;十四日进至大麦郊休整。

在左路军由金罗镇向东南转移时,刘志丹率第二十八军歼击

三交、转角、辛关、义牒一带之敌，抢占黄河渡口。四月十四日，在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刘志丹不幸牺牲。十五日该军撤出战斗，经石楼、永和之间向东南转移，十七日到达康城镇，与东征军总部会合。

东征军收拢后，敌人也跟踪围攻过来，企图压迫东征军于黄河东岸狭小地区而消灭之。毛泽东和彭德怀分析战场形势，认为晋军和蒋军共五十一个团，采取堡垒主义，稳步向我推进；陕西方面，蒋介石行强令东北军、西北军向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神府、三边（陕北的靖边，安边和定边）地区和环县、合水及其以西地区均较空虚。遂以毛彭名义致电周恩来和各军团首长，指出：‘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我军决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於延长地域。’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彭毛下达西渡黄河命令。从二日至五日，全军分批从清水关、铁罗关渡河，进至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

这次东征，历时七十五天，共歼灭敌人约七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四千余支，炮二十门，迫使进攻陕北的孙楚部撤回山西，使陕北根据地得以恢复和发展。在山西二十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有些地区建立了中共组织和游击武装，并扩充新兵八千人，筹款三十万元。

毛泽东回到瓦窑堡，接见了被俘的晋军团长郭登瀛。毛泽东

爽快地说：‘郭团长，我要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

郭登瀛很羞惭，也有些拘谨，轻声对毛泽东说：‘毛先生，败军之将怎敢求功。被俘以后得到贵军的优待，很是感激，如有什么事情要我，原意效劳。’

毛泽东说：‘我们准备放你回去，你帮我送一封信给百川先生（注：百川，阎锡山的字）。另外，还有一些意见信上没写那么具体，请你转达。敝党敝军进入山西，只为抗日，别无他求，但抗日得有块地盘，否则，打完仗没个睡觉是的地方怎么行呢？因此：第一，希望能 在绥远让给我们十几个县，作为红军的抗日根据地；如果不行，那么，第二，在雁北让给红 军一条路，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第三是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共产党共同抗日，我们之间化干戈为玉帛，联合起来共九四七年冬组建成的，由杨成武任司令员，李井 泉任政委，向绥远出击；令华北第二兵团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的率领下出击平古（北口）路和平张（家口）路，以钳制傅作义，使其不能抽兵增援东北。

八月十一日十一时，林彪电毛泽东，报告获悉范汉杰部将增援华中的消息；强调本军南下北宁线粮食困难，又无雨具，不能肯定出动的时间。

毛泽东接电很生气，八月十二日六时覆电提出措词严厉的批评，电文如下：

十一日一时电悉。关于敌人从东北撤退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

敌人，如敌人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个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是否提早出动上面。你们六日十九时电虽曾提列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是否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八日十七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愿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份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吉县县长暂留此间，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诸贤者决难坐视也。

专此。即颂
动祺。不一！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阎锡山看完信，思索有日。红军回师西渡以后，‘中央军’仍赖在山西不走，陈诚并收买拉拢阎的高级将领李生达等，在晋南要策动‘河东独立’。阎锡山深感请蒋的嫡系军队入晋为失策，说：‘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他认为摆在自己面前的有三条路，召集他的心腹智囊，要大家在‘联共抗日’、‘联蒋剿共’、‘联日反共’三个方案之间，仔细权衡利弊，限期呈上对策。他说：‘我们如今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哪一颗也不能踩破了。’综合众谋士意见，阎锡山最后形成了‘联共抗日’的决心。但他不直接答覆毛泽东，派梁化之前往天津，邀请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赴晋磋商。

朱蕴山与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南汉宸、王世英交换了意见，摸了共产党的底以后来到太原。经过多次会谈，与阎锡山达成了三条协议：一、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反动组织（如‘防共保卫团’等）；二、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三、组织一个抗日的民众团体，发动群众，开展抗日运动。从此以后，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由薄一波（秘密共产党员）等人领导的‘山西各界牺牲救国同盟会’於是年秋正式成立，东征红军在山西各地播下的抗日火种以燎原之势迅速燃烧起来。

毛泽东自从到了陕北，‘左’派教条集团彻底表示臣服，他以中共和红军领袖的名义自由地与国内各派联系，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之慨，头上再没有什么束缚了。毛泽东以超一流政治家的敏感和气魄，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高举‘民族团结’和‘抗日救

亡’两面大旗，向国民党和蒋介石展开了独具魅力的政治攻势。一九三六年他给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地方实力派军阀，文人学者和社会名流，写了不少书信。

其中给蒋介石的信是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的具体体现，简直把 个蒋委员长逼到了墙角，实录如下。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年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於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幡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徵、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城、马鸿逵、马鸿宝、高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注：此役歼灭胡宗南部一个旅)。夫全国人民对日寇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

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降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原机枪於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则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声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原先生热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祥 彭德怀
贺 龙 任弼时 林 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率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43 一尊初定 大度能容反对派 三军会师 众心悦服毛泽东

因瓦窑堡遭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炮兵营的袭击，一九二六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迁到保安。这是一座古老的山城。一条平川横贯两山之间，保安城依着炮楼山，坐落在川道里。经过连年战乱，小城破败不堪。全城房屋不过百间，百姓不上千人。毛泽东随着中央机关来到保安，被安排住在一孔石窑洞里，在这里他住到一九三七年一月迁往延安。

经过遵义会议和遵义会议以后的长征，经过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在中共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逐步树立起来了。有四个有资格和毛泽东争夺领袖地位的人物：博古、张国焘、张闻天、周恩来。中央苏区的丢失和湘江之战的失败，使博古自叹弗如，指挥战争这副重担他挑不起来，遵义会议后他把这副担子交出来了。两军会合后，张国焘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他虽然人多

枪多,但在上层斗争中他把毛周张博一齐打倒,这四个人本来是有矛盾的,叫他这一攻,四人结成了坚强的反张国焘的联合阵线。后来张国焘鲁莽灭裂,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自立第二中央,犯了一系列错误,自己把自己在政治上搞垮了。一九三六年六月,张国焘被迫在炉霍取消第二‘中央’;七月二十七日,接受陕北中央的任命,就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遵义会议后的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习惯地被称为总书记。但张实际上是在毛强有力地支持下取博古而代之的;他坐上第一把交椅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他在毛面前的软弱性。他这个总书记只起一个主持政治局会议的作用,拿大主意,决定大政方针的是毛不是张。张闻天不懂军事。在那时的中国,军事上的弱者成不了政治上的强人。周恩来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有德有才,极孚众望。他在军事上的才能全党公认并不比毛弱,所以直至遵义会议上,仍决定‘周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而‘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来的三人小组,也还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如果长征最后失败了,周恩来是难辞其咎的。周深知毛泽东是个不能居于人下的人物。他相忍为党,顾全大局。在芦花,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一到陕北,就把军权交给了毛泽东,自己成了‘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的不能居于人下,周恩来的没有个人野心,这种不同的品格构成了他们以后长期合作的政治基础。毛周二人的合作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使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军事路线,从此避免了左右摇摆,走上了步步胜利的坦途。

毛泽东在一尊初定的时候，十分谦虚谨慎，敬老尊贤，特别是注意团结反对过自己并被历史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从一九三一年春以来长期压制打击毛泽东的博古，到陕北后，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反‘邓毛谢古’的急先锋罗迈（李维汉），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遵义会议上公开跳出来反毛的凯丰（何克全）继续当他的团中央局书记。这几个人一安排，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跟着犯过错误，直接或间接反对过毛泽东的人，就都安定了。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接见了一位美国客人，这就是青年记者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位外国客人的来访。他要通过这位美国记者，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红军、苏维埃运动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介绍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世界级的人物。

斯诺进入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窑洞，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壁上挂满了地图，此外别无陈设。土炕上铺着简单的被褥。毛泽东穿着和红军战士一样的粗布军装，而且还打了几块补丁，衣领上佩戴着两条红布做的领章。

毛泽东吸着烟，不拘形迹，在窑洞来回走动。他微笑着问道：‘斯诺先生，你为什么飘洋过海到我们中国来呢？’

担任翻译的是年仅二十六岁但已翻译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样艰深的理论著作的吴亮平。

斯诺回答说：‘我一九二八年到中国来的目的仅仅是为寻找东

方的魅力和异国的情调。我 开始是盲目的到中国来,像所有的冒险家一样撞大运,想写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成为一个作家。’

毛泽东风趣地说:‘我看你到我们苏区来,是真正地撞上大运啦!保证你能写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吸了一口烟,又接着问道:‘你是孙夫人介绍来的,可 你是怎么认识孙夫人的呢?’

斯诺说:‘最早看见孙夫人是在蒋介石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她真是中国的一个伟大的女性。未见到她之前,我以为她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可怕的女人。见面之后,她十分平易近人。她的英语讲得非常流利。在她的教育之下,使我消除了一些无知,使我领悟到中国人民 有力量、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国家。她告诉我,中国最卑贱的苦力,将要像一个人那样行动起来。我这次到了红区后,看到了中国的苦力,正聚集在共产党的红旗下,像一个人那样行动起来了。’

‘孙夫人能自由地和革命人士来往吗?’毛接着问。

‘孙夫人住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座两层楼房里,周围有许多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和法国警察警戒和监视着,表面上说是为了保护她,其实是让她幽居深处,与外人隔绝。但是她很勇敢,对那些政客,怒目而视,寸步不让,那些家伙很害怕她。’斯诺回答

毛泽东把话题一转说:‘斯诺先生,你到苏区来采访是一次非凡的旅程,将像意大利的航海家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轰动全世界。’

斯诺听了深受鼓舞，激动地说：‘是你们的斗争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太吸引人了。’

说过一阵必要的‘闲话’，到了吃饭的时间，警卫员贺清华和李久长送上晚饭来了。一盘凉拌苦菜，一盘肉丝炒豆角，一盘西红柿炒辣椒。主食是热气腾腾的小米乾饭。斯诺敏锐地观察着。

‘主席一天的生活费是多少钱？’斯诺提问。

‘每天一角，和大家一样。’贺清华代替加答。

斯诺听了吃惊地说：‘毛主席的生活费每天才一角钱，蒋委员长一顿饭就是几十块银元哩！’

贺清华说：‘毛主席不准超过伙食标准，还给我们规定：十天一小结，一月一大结。如果前十天超过了，后十天一定要补上；这月超了，下月要补上。总之，不能超过标准，而且要节余一点，否则

‘这是什么菜呢？’斯诺不放过细节，指着一盘墨绿色而有光泽的凉拌菜。

‘这是苋菜，老百姓叫苦菜，是我们警卫班采来的野菜。陕北人吃苦菜是先把苦菜用开水煮一下，再用凉水泡上两三天，就没有苦味了。然后就炒着或凉拌着，毛主席很爱吃。主席说：“生活费没有提高，可生活改善了，一个菜变成了两个菜。”’

又看见一盘西红柿炒辣椒，斯诺惊奇地问题：‘主席，保安还有西红柿吗？’

贺清华代替毛泽东回答：‘保安没有西红柿，这是周副主席从东线指挥都给主席捎回来的四个西红柿，今天晚上为了招待你，主

席让炒了两个。’

毛泽东接着说：‘延安天主教堂的神父给东北军送了两篮西红柿，东北军又给周副主席送了几个，恩来没有舍得吃，又给我捎来了。’

毛泽东请斯诺坐在饭桌前，亲自将小米乾饭盛在碗里递给斯诺，又要给吴亮平盛饭，吴亮平赶快拿起碗说：‘主席，我自己来。’毛泽东笑着说：‘斯诺先生，你要习惯吃小米，不习惯吃小米就不懂得我们红军，就不懂得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能以小米加步枪，战胜国民党飞机加大炮对我们的多次围剿。’

斯诺吃着小米乾饭说：‘我已经习惯吃小米了，我也开始理解装备低劣的红军，为什么能够战胜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这个不可思议的问题了。’

毛泽东夹了几块西红柿，送到斯诺的碗里，说道：‘西红柿在我们这里是非常稀罕的东西，你要多吃一些。’

斯诺表示感激，说：‘主席，你应该多吃一些，西红柿的营养很丰富，我在北平倒是不难吃到西红柿的。’

毛泽东又给吴亮平夹了一箸，自己才开始吃饭。吃了两口，又说：‘西红柿从欧洲传入我们中国才有几十年的时间，在民间还没有广泛的栽种，许多人还不知道西红柿是营养丰富的蔬菜哩！西红柿传入你们美国的时间，可能比中国还要晚一点吧？’

斯诺听完吴亮平的翻译，止箸笑了笑说：‘我还没有考证过西红柿传入美国的时间。不过。我想不会比中国晚多少。因为西红

柿的老家在南美洲秘鲁的森林里,据说十六世纪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丈夫佛罗达拉里公爵到南美洲旅行时,挖了几株带回欧洲奉献给他的妻子,这才传入欧洲。’

毛泽东吃着饭认真地听着。稍顿,说道:‘听说西红柿原来有个很可怕的名字叫“狼桃”,是吗?’

斯诺惊讶地说:‘是呀!西红柿未被人们发现能食用之前,就叫“狼桃”。’

毛泽东吃了一口辣椒,接着说:‘由於西红柿的枝叶分泌出的气味难闻,所以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有毒之果,蒙受了冷遇数百年。直到十八世纪末,法国有一个不大出名的画家在为西红柿写生时,被西红柿艳丽的色泽所吸引,产生了品尝的欲念。他决心孤注一掷,品尝一个又可爱又可怕的“狼桃”。他在品尝之前,先穿好了人殓的衣服,接着当众吃了一个“狼桃”。他当时觉得甜丝丝、酸溜溜的,十分清爽可口,并无难受之感。这可口的滋味,反而使他心情更加紧张,他干脆躺在床上,等着死神的召唤。可是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这个画家没有死。从此,西红柿之谜揭开了,立刻风靡世界。栽种者日众,成为人们争相食用的最佳蔬菜之一。这个原来不大出名的画家也因此成了传奇式的人物’

斯诺听毛泽东讲述西红柿被人们发现、食用的经过,非常敬佩毛泽东知识的广泛,说了几句恭维的话,毛泽东笑了笑说:‘这算什么知识,年轻时偶然在报章上看到的掌故,看后就记住了。’

吃罢晚饭,毛泽东来回在地上走动了几步,随手拿起斯诺交来

的访问提纲,说:‘斯诺先生,咱们闲话少叙,言归正传,我来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吧。’

就这样,毛泽东开始了他那有历史意义的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吴亮平认真、准确地译着,斯诺用英文流利地记录下来。

这样无拘束的谈了几天几夜。与毛泽东谈完,斯诺又不受任何限制地找到了他想采访的许多人,其中包括中共政治局委员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凯丰,德高望重的‘四老’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著名红军将领彭德怀、林彪、徐海东、陈赓,女共产党人邓颖超、贺子珍、张阴天的新婚妻子刘英、博古的妻子刘群仙、正在与叶剑英谈恋爱的抗日剧社社长危拱之以及陕北英雄刘志丹的未亡人同桂荣,等等。

这天,斯诺要求访问王稼祥。刚吃过早饭——在他的坚持之下,在外交部招待所,他争得了不要特殊照顾,和红军战士一样吃普通伙食的待遇,他也像毛泽东那样,以吃苦菜为乐事——王稼祥的警卫员来接他来了。他带了笔记本,把钢笔吸足了墨水,挎着照像机就跟着警卫向王稼祥的住处走来。

一个安静的农家小院。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枣子已经有豆粒大了,密密麻麻地挂满了枝头。日光透过树冠洒在干净的地面上,出现了一片明暗斑斓的图案。斯诺刚踏进院子,王稼祥闻声迎了出来,用流畅的英语说:‘斯诺先生,欢迎你呀!’

斯诺紧走两步,握住王稼祥的手。见他身材瘦高,面容腊黄,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但举止儒雅,落落大方,颇有学者风度。

进到窑洞，警卫员递上两杯白开水，二人坐下叙话。

斯诺说：‘我在白区的时候，经常看到南京的报纸上，把你们共产党宣传成是一群饥饿无知的土匪，是一帮没有文化知识的群氓。可是，我到红区一考察，发现你们共产党里面有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的知识都非常渊博，使共产党充满了强大的生命力。’

王稼祥点着头说：‘我们党内，确实有许多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和人民一道，正为中国的光明、独立而战斗。’

‘听说你负了很重的伤，你是怎么负伤的？’

‘那是一九三三年春天，中央苏区正在进行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我随中央机关迁到乐安县谷岗村。一天上午，突然吹起了防空警报的号音，随之两架敌机嗡嗡飞来。干部、战士和村民开始隐蔽，我正在一个山坡上的古庙里主持一个会议，敌机见得多了，以为没什么，或许侦察一下就飞走了。当敌机开始投弹时，我们才离开古庙，奔向防空壕，偏巧这时一颗炸弹爆炸了，一块弹片打进了我的下腹部，因出血过多，我当时就昏迷了。当时没有X光机，弄不清弹片的位置，主治医生不同意手术，采取了保守的治疗。后来，为了搞清楚弹片的位置，党中央给上海地下党发电报，要他们设法搞一台X光机运来。红军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到封锁线上把X光机运回来。照了X光之后，弄清楚了弹片嵌在右腹骨窝上。这时，我的伤口附近均已脓肿，因为苏区没有开刀取出弹片作根本治

疗的条件,只好切开引流,把脓排出来,后来形成脓毒败血症,经常发烧,身体越来越虚弱。’

‘你这样的身体,怎么能够想像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呢?’

‘我能够完成史诗般的长征,活着到达陕北苏区,首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的关怀,为我派了专门的医生和担架;其次是同志们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没打这些,也许我早就见马克思去了。长征路上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大家有时吃野菜、草根、树皮,过草地时把皮带、皮鞋都煮着吃了。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同志们想方设法给我弄粮食吃。有时打了胜仗得来食品后,首先给我送来。毛主席、周副主席经常把分给他们的食品送给我。有的同志为了我的安全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些抬担架的小伙子们,有的人从开始长征就抬着我,一直抬到了保安,把腰部压弯了,我实在感觉对不起这些同志们。’说到这里,王稼祥流出了眼泪。

年轻,正直的斯诺听了也为之动容,插了一句说:‘谁说共产党人无情无义、铁石心肠,听你说你们的内部关系太令人感动了。’然后话题一转:‘我和许多同志谈话时,都谈到你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支持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才使遵义会议取得成功。毛主席和我谈话时,也几次谈到你关键的一票。你能说一下,你是如何投这关键的一票的?’

‘这有什么好谈的。’王稼祥内疚地说:‘我执行过错误的军事路线,作为军委副主席对中央苏区的丢失和长征初期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斯诺说：‘毛主席说你早在一九三二年错误路线解除他的军事指挥权时，你就是积极反对者之一，可以说你那时就和错误的军事路线划清了界限了。所以，他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就和你谈了他的主张，得到了你的支持，你又做了其他人的工作，才开成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全党同志都记着你的这一历史功绩。’

王稼祥怀着对毛泽东的敬意说：‘我们的党，经过了流血和牺牲，胜利和失败，终于在最危急的关头，找到了可以信赖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把大家胜利地带到了陕北。毛泽东同志这一历史功绩，才是全党同志永远应该记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这个转折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所显示的历史作用，和他的历史贡献，是我们党内谁也无法比的。’

‘这一伟大转折的实现，也离不开你那关键一票的支持呀！’斯诺说。

‘当时支持毛泽东同志正确主张的，主要有周恩来、张闻天、朱德、陈云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让毛泽东出来参予最高领导，当时已经成为全党、全军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了。我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也是在毛主席的教育、启发下才这样做的，算不了什么功绩。’

‘这是非常伟大的功绩，没有你首先站出来支持我，投了关键的一票，错误军事路线很可能不会结束！’随着说话声，毛泽东走了进来。他为给红军大学讲课，写了一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

题》。吃过了早饭，顺路来看看王稼祥。斯诺、王稼祥、医生、警卫员都站起来欢迎。毛泽东和王稼祥握着手，顺势扶他坐下，招呼大家也都坐下，亲切地说道：‘稼祥，最近怎么样，伤口还发炎吗？’

王稼祥说：‘还好，最近没有再发炎。’

毛泽东又问：‘吃饭如何？’

王稼祥回答说：‘饭量比在瓦窑堡的时候增加了许多。’

毛泽东让警卫员过来，从挎包里掏出一瓶罐头，两个西红柿，说：‘这是恩来从安塞捎回来的，两瓶罐头我留一瓶，四个西红柿，前两天招待斯诺先生，吃了两个，还剩两个送给你，开开胃，这东西营养丰富。’

王稼祥很受感动，说：‘主席，你留下吃吧，你的身体也不好。’

斯诺对这四个西红柿印象太深了。他看到了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之间这种情感，觉得这样一个政党是不可战胜的。正想说点什么，只见毛泽东冲着他说话，经过王稼祥翻译，是说：‘斯诺先生，你在报道我们情况的时候，不要报道王稼祥同志。我们等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以后，就派人护送他去苏联治疗。这是为了保证稼祥同志在路上的安全。’

‘我保证在报道红区的所有文章中不提王稼祥同志，请放心。’斯诺说。对于那‘关键的一票’他觉得还没有搞清楚来龙去脉，又把话题引到这上边来。

王稼祥说：‘要说我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出来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是个功绩的话，这首先是毛主席对我教育、启发的结果。长

征开始,毛主席有病也坐担架,和我同行,每到宿营地时,经常在一起交谈。由於我对毛泽东同志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和一、二、三次反“围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十分钦佩,所以,我向毛主席坦率表示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博古、李德撤下来。毛主席很赞同我的看法,针对现实情况,谈了中国革命不能靠外国人,不能照搬别国经验,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给了我很大启示,也使我更加坚定了支持毛主席的决心。我和毛主席还商谈了应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接着我又和张闻天同志谈了我和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看法。张闻天同志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的领导权,让毛泽东同志参予最高领导。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同志也毫不犹豫地支持这一主张。遵义会议就是在这种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召开的。’

这些话,王稼祥是用英语讲给斯诺听的。毛泽东笑着问斯诺:‘他给你说了些什么呀?’

斯诺用生硬的、但还准确的汉语说:‘他说他的关键的一票,是你的启示、教育的结果,是许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

毛泽东对王稼祥说:‘你这个人,总是那么谦虚。怎么是我对你教育呢?你的谈话对我也有启示嘛!遵义会议的成功,哪能和你关键的一票分开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功绩,你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是有大功的人!’

此情此景,斯诺又生感触,用生动的比喻说:‘我感到你们共产

党,就像一棵茁壮生长的小树,青枝绿叶,生机勃勃,生命力非常旺盛,一定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的;而国民党就像一棵快要死亡的枯树,枝干叶落,上面爬满了大大小小的蛀虫,枯树虽然高大,但内心已经腐烂,毫无生命力了。’

毛泽东和王稼祥听了都笑了。毛泽东说:‘斯诺先生这个比喻很好。我们共产党现在力量虽小,但是一定能长成为参天大树的;但国民党只要改变政策,走抗日的道路,还会恢复生机,枯树也会开花的呀!’

斯诺摇摇头说:‘根据我的观察和判断,国民党已经很难恢复生机了,造就像一个人到了老年之时;不可能返老还童一样。你们共产党从不文过饰非,并勇于在实践中改正错误,能够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是一个非常坚强的整体。而国民党是一盘散沙,无法团结一致,更不能齐心协力。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并经过我的思考才得出的结论。我这个人从来不轻信我没有亲眼看到的事情的宣传,也从来不给我没有经过观察和思考的问题下结论的。’毛泽东听罢频频颌首,说:‘我们很敬佩你正直的品质,也很赞赏你实事求是、尊重事实的精神,更喜欢你对事物追根究底、探明真相的意志。所以,我们相信你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斯诺很激动,站起来说:‘我到红区以后,耳闻目睹了红区的一切,把红区和白区进行了对比,我认为国民党要想阻止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除非本身来一个奇迹般的变化,进行深入地、戏剧般地、迅速地、彻底地改造,否则,整个中国的状况,将使你

们共产党的胜利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正谈得起劲，贺清华来请毛泽东，说给红军大学上课的时间到了。

又是一个采访日。斯诺正准备出去，负责斯诺安全保卫工作的李长林来说：‘斯诺先生，博古和李德同志来看你来了。’斯诺赶忙迎出门来。

‘斯诺先生，你仔细看看，我是谁？’李德造屋坐下，微笑着直视斯诺。

斯诺迟疑有顷，自语道：‘真是面熟，像是在哪里见过。他难道是那个奥地利记者奥托·斯登吗？不会，如是，他怎么会成了共产党的军事顾问呢？’

李德看着自言自语的斯诺，得意地笑道：‘我就是那个自称奥地利人的新闻记者奥托·斯登！你感到奇怪吗？’

原来一九三三年李德前往北平执行共产国际交代的与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取联系的使命，从上海出发前，他请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给埃德加·斯诺写了一封介绍信。到北平后，他以记者斯登的身份去拜访斯诺，想说服斯诺以他合法记者的身份陪他一道去张家口会见冯玉祥将军。斯诺警惕性很高，有礼貌地拒绝了。

斯诺哈哈大笑。问道：‘你这个洋鬼子是如何进入红军的？’

李德说：‘那时候一个外国人要进入红区，可不像你这次进来这么容易，多亏一位王牧师的精心安排，我化装成考古学家，说起

来是很有传奇色彩的……’

斯诺说：‘我到西安时，也是一位王牧师和我联络，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博古笑着说：‘你们两个说的王牧师，其实是一个人，是我们党的秘密信使，他的真名叫董建吾。不过，斯诺先生，你可要保密呀，千万不能泄露王牧师的真实姓名，否则他的安全就要受到威胁。’

斯诺知道李德在苏区栽了筋斗，略过战争之事不提，望着正在吸烟的李德，幽默地说：‘李德先生，你和冯·赛克特将军两个德国人，通过两支中国军队进行较量，真有戏剧意味啊！’

李德不以为忤，笑着说：‘我和冯·赛克特虽然同是德国人，但不同道，他是一个法西斯分子，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这就像毛主席和蒋委员长都是中国人，但本质上不同一样。我在中国的工作成绩不理想，看来毛泽东主席更理解中国的革命。’

博古很开朗，主动接话说：‘李德同志是顾问，由於我自己对军事一窍不通，而又担负着领导战争全局的责任，应由我对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之战的失败负责。遵义会议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是应该的。是毛泽东同志在长征中扭转了战争局势，把大家胜利带到陕北。’

斯诺采访的目的已达，便提议和李德、博古一起去打网球。

一天晚饭后，斯诺准备到球场去看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的篮球比赛，走在路上，与正在散步的张闻天夫妇邂逅相遇。张闻天是共产党领导人中唯一到美国留过学的，能讲流利的英语。斯诺见

是个谈话的机会，便放弃了看球赛的念头。抬头一看，见毛泽东正和博古、李德在稍远的小河边交谈。抓住话题问道：‘博古和李德在中央苏区时，那样的打击、排挤毛泽东同志，给中国革命造成那么大的损失。而现在毛主席对他们却是那么亲切和重用。我有好几次看见他们在一块亲切地谈话，这是为什么？’

张闻天说：‘毛泽东同志胸怀非常宽阔，能从革命的大局出发，善于团结各方面的人一道革命，特别是反对过他的人——而且是在实践中证明反对错了的人。’

斯诺感慨地说：‘要是蒋介石的话，在遵义会议后，就把他们除掉了。’

张闻天笑了，说道：‘正因为蒋介石那样心毒手狠，不能容人，所以国民党才四分五裂，不能统一。遵义会议根据当时中央领导同志认识的程度和觉悟水平，批判的问题集中在军事上，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不过多追究个人责任。对博古同志的错误，不搞过火斗争，适可而止。对保留意见的凯丰同志，耐心等待。这样就避免了一场可能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和分裂的危机。所以，遵义会议是进行政治路线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的光辉范例。’

斯诺连连地点着头说：‘那天我同凯丰同志谈话时，他一再说毛主席胸怀宽阔，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凯丰说，他在遵义会议上对毛主席当面无理质问，说毛主席不懂马列主义，只读过《孙子兵法》，并在会后不让博古交出中央的大印，搞了许多反对毛主席的活动，很对不起毛主席。但是毛主席对他仍信任，继续让他负责一

个方面的工作。凯丰心服口服地对我说：“毛主席是共产党的最好的领导人。”

张闻天说：‘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此以后，红军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把我们大家都带到了陕北，使革命得到了顺利的发展。在事实面前，使原来坚持教条主义的同志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正确。所以，现在全党全军都拥护、支持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斯诺又问道：‘张闻天同志，我不明白你是党的总负责人，而毛泽东同志却是党和红军第一个主要负责人，这怎么解释？’

张闻天笑着说：‘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和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后，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常委，重新回到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上，实际上已经建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会议后改组党中央与军委机构和常委分工时，毛泽东同志从全党、全军的最高利益和团结的愿望出发，体现了大公无私的精神。在常委分工时，他并没有取代博古当书记，而是根据当时党内形势，把党内负总责的工作推让给我。在后来的行军中，军委又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是谁当家的。’

斯诺解开了一个疑团，说：‘原来是这样。’

张闻天继续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后，对博古同志仍要他参加中央党委的集体领导，并没有把他排除

在外。对李德的生活照顾如常,对他的正确建议仍然采纳。由於对待党内犯了错误的同志,在批评其过失的同时,又从政治上热情帮助,组织上适当安排,工作上继续信任,所以克服了消极情绪,调动了积极因素。正因为毛泽东同志采取了这些英明的政策,才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全党全军的革命精神,团结了同志,扭转了中央红军被动不利的局面。从此我们党又走上了光辉灿烂的征途。’

斯诺说:‘张闻天同志,我刚刚到保安时,心里常常想,毛泽东主席是一个农民出身的革命领袖,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没有到过外国,不懂得外语,他能够博得共产党内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吗?能够得到从苏联回来的、受过当时盛行的教条直接训练的知识分子的拥护吗?现在我的这种怀疑和担心消失了。我发现在共产党和红军中,毛主席的影响最大,受到了大家一致的拥护和爱戴,也得到了博古、凯丰同志的衷心拥护。我在红区见到所有的农民,都把毛主席当成翻身的救星,我开始感觉毛主席在中国农民中简直成了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他们边谈边散步,不知不觉间从城南走到了城北。张闻天说:‘斯诺先生,我们只顾谈话了、你不是还要去看球赛吗?’

斯诺说:‘和您的这次谈话,比看球赛还要令人着迷。您还没有谈谈您个人的作用呢?’

张闻天说:‘我这个人犯了许多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少损失,有什么好谈的。’

斯诺说：‘毛主席和我谈话时多次提到你，说如果没有你和王稼样同志的支持，遵义会议是开不好的，说你犯教条化的“左”倾错误，其原因是缺乏革命的实践经验，理论脱离了实际。毛主席说你是一个犯了错误的马列主义者！’

张闻天说：‘毛泽东同志是善于团结每一个同志一道工作的；他是我们党真正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

斯诺为了追踪访问彭德怀，在李长林和黄华的陪同下来到了前线。这年五月下旬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组成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给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等部很大打击，创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纵横八百余里的根据地，解放了环县、曲子镇、花马池、预旺堡、宁条梁、定边、监边等城镇，他的司令部在预旺堡的一座城隍庙里。彭德怀设午宴於正殿招待斯诺。在这里，斯诺会见了西征军参谋长聂鹤亭，政治部主任刘晓，第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瑞，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王首道，红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勇，红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萧华，红四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黄克诚，红七十三师师长张绍东、政委陈漫远，红七十五师师长陈锦秀、政委常玉清，红七十八师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等三十多位高级将领。

席间谈到毛泽东；斯诺发现每一个人都怀着尊敬的心情，赞扬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用活了；赞扬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才能，说毛用兵如神；赞扬毛主席学识渊博，精力过人，富有演讲才能；赞扬毛主席

胸怀广阔，能够团结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有才干的人；说毛主席是一个顾全大局，以革命利益为重的人。斯诺深深感到毛泽东在红军里是一位为大家心悦诚服的强有力的军事领袖。

斯诺要显示一下自己的汉语会话能力。对彭德怀说：‘彭将军，你是不是为毛主席改过诗？’

彭德怀不解其意地说：‘没有呀，我是个粗人，哪敢给毛主席改诗？这是谁跟你说的。’

‘是毛主席说的。’斯诺笑了笑，然后用华语朗诵起来、

山高路险沟深，
骑兵任你纵横，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大家都鼓起了掌，称赞斯诺朗诵得好。

彭德怀谦虚地说：‘毛主席把我的作用夸大了，所以我把最后一句改成：“唯我英勇红军。”’机警的彭德怀为了不使主题转移到他‘横刀立马’上来，对着旁边一张桌子喊了一声：‘陈赓同志！’彭也是天生的统帅之才，他的音容笑貌都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威严之感。随着一声答‘到’，陈赓师长来到彭德怀面前，立正站住。彭德怀说：‘你把我们过六盘山时，毛主席作的那首词给大家朗诵一遍，给斯诺先生助兴。’‘是！’陈赓略一沉吟，朗诵道：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斯诺看着激情洋溢、充满儒将气质的陈赓，激动地站起来拉住陈赓的手说：‘你朗诵的太好了。简直把我带到了六盘山上，看到了风展红旗的壮丽情景。’

‘是毛主席的词写得好。’陈赓谦虚地说。

彭德怀说：‘陈赓同志诗朗诵得好，仗也打得好。连蒋委员长都很看得上他，千方百计收买他哩！’

斯诺听了感到很惊讶。

彭德怀笑着说：‘蒋委员长也是爱将如宝呀！他对我们这位战将，简直爱的要命，采取了像曹操收买关云长的办法。但是，陈赓同志视高官厚禄如粪土，心向马列志不移呀！’

这顿接风洗尘的便宴边吃边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饭后又上了切好的西瓜。

彭德怀递给斯诺一块西瓜,说:‘斯诺先生,为了使你的采访能有计划地进行,我们为你安排了个日程表。从明天开始,下午你先在预旺堡走走,看看这座古城堡。听说是成吉思汗的一员大将,被封为预王,在这里集草屯粮,在那个基础上发展成为预王城,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改叫预旺堡了。’

斯诺连声称好。

这时,刘晓把刻印好的日程表递给了斯诺一份。

在告别时,彭德怀握着斯诺的手说:‘刘晓同志是政治部主任,他多陪一陪你,有什么困难你就找他解决吧。我们西征红军,现在都集中在预旺堡、下马关一带学习整训,准备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到来。’

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会师。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红二师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

44 改弦更张 蒋氏屈从兵谏 化敌为友 周公力挽狂澜

三军会合后，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率直属机关到达保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率领由红军大学学生组成的仪仗队在保安郊外热烈欢迎他们。毛张会面，彼此客客气气，相敬如宾，但城府之内各有各的想法。三军会合后，首先要实现对红军的统一领导，毛泽东经过与各个方面的协商，提出一个军委组成人员名单，获大家一致通过。十二月七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通电第一号)向全军公布：

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即扩大组织，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

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等二十三同志为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七同志组成主席团，以毛泽东为中华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国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特此令之。

二、任命林彪同志为中国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刘伯承同志为副校长，罗瑞卿同志为教育长。

三、刘伯承同志为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为副总参谋长。

四、任命王稼祥同志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中央军委主席团

在群雄并起的时代把各路英雄豪杰团结起来是不容易的。毛泽东巧妙地做到了这一点，把红军将领中有代表性的人物都安排到适当的位置上，使每个人都感到一定程度的满足。首先说张国焘。他在长征中闹了那么大的乱子，如今仍然保持了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两个重要职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面子是保全了，但实权是削去了。军委日常工作是由主席毛泽东主持，重要问题的决策有主席、副主席会议或主席团会议，在这两种场合张国焘都是一票，孤掌难鸣，他的意见再不像长征途中那样有份量了。对张这样安排是因为他是四方面军的代表，但这样安排的结果，使他

失去了控制四方面军的能力。在长征中毛儿盖会议上,他企图否定毛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如今毛泽东没有运用中共中央的权威,而是运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权威,来安排他的位置,他接受这个安排,就等于是接受毛泽东的任命臣服於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其次说朱德。自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朱德一直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虽然大权旁落,由李德、周恩来等实际指挥军队,但名义上的主席一直是朱。如今不同了,他不仅失去了主席的位置,副主席也没有他,成为主席团委员,只给他保留了名气最大的红军总司令的职务。他的嫡系在一方面军,但长征后期他是随四方面军一起行动的。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第二军委时他的态度毛、周还不是很摸底,对他的信任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保留。如安排朱当副主席,在主席副主席一正三副的格局中,假若朱德和张国焘站在一起,就能和毛周分庭抗礼;朱张如再兼任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职务,实际的军队指挥权就可能转移。朱德要恢复毛周对他的信任,只有在执行总司令职权时贯彻毛周意图而与总政委张国焘划清界限。保留朱德的红军总司令职务,在全党全军不会引起震动,在全国和国际的观感中,也给人一个共产党团结一致的印象,于大局有利。这又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一九三一年在筹建红军学校时,毛泽东就跟何长工说:‘蒋介石有黄埔,我们要把红军学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如今他把红军大学的地位摆在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之上,任命林彪为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而以总参谋长刘伯承为副

校长,尽管刘一天也没有到职,只起一个衬托的作用。须知刘伯承南昌起义时任方面军参谋长,林彪只是一个连长。这种衬托的用意是向林彪表明:他的地位在总参谋长刘伯承以上。毛泽东以红大(后为抗大)为基地,讲述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一个党,一支军队,只有组织上的统一,而没有思想上的统一,是没有战斗力的。毛泽东取得了军委上席的职位,完成了组织上的统一之后,对抓思想上的统一是不遗余力的。这是他这次人事安排的第三个高明之处。

就在毛泽东的地位和权力逐渐确立和巩固的时候,蒋介石在西安栽了大筋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扣起来了。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违背全国人心,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必然结果。

一年前,蒋介石要陈立夫设法找到与中共联系的渠道,国共两党建立了联系,西安事变之前,潘汉年是共产党方面谈判的最高代表。十一月十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见陈立夫,面交了周恩来的信件,口头转达了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救国协定草案》八项条件。但陈立夫的态度大大后退了。他说:‘蒋委员长的意思是: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编三个团,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一律解职出洋,经过考察半年后按才录用。共产党作为一个在野政党参加政

府。’潘汉年严词驳 回：‘你这是收编条件，我党中央绝不会接受。’

蒋介石为什么突然变脸呢？

在日本侵华日深之际，依附英美的蒋宋家族是有抗日打算的。为此，蒋介石希望同苏联改 善关系，缔结一同盟条约，稳住北邻，避免对日、对苏两面作战，并可拉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苏联是共产国际的头，中共是国际的一个支部，要联苏就必须在国内停止反共。所以他让 陈立夫在国内找寻与共产党对话的渠道；在国际上加紧与苏联接触。

因苏联价刺激德日，不愿与蒋政府缔结军事同盟条约，蒋介石退而求其次，要陈立夫提出 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认为，这样既可以避免刺激日本，又可使苏联专对法西斯德国，所以谈判顺利。

一九三六年九月的一天，在谈论了条约的文字后，陈立夫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

‘惟有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国，对苏联最有利，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非但对苏联无利，而且有大害。’

大使请述其详。陈立夫得意地眨眨眼睛，继续说：

‘你可能在全世界找到第二个主义，够得上做你们的朋友吗？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 主义？这些都是你们的敌人。惟有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颇有相似之处。如果现在的时候，中国是共产化，日、德、意轴心联合攻苏的决心更坚，日本侵华也成了他们反共的最好理由，岂不是你们要自速灭亡吗？如果将来中国共产化，你想你们能制服一个比你们大二倍多人口 的中国吗？’

鲍格莫洛夫对陈氏的谈话非常欣赏，并请求允许他以密码形

式报告莫斯科。

不久，鲍大使得到政府的指示，向陈立夫正式通知：‘一旦中日战争爆发，苏联绝不会帮助中共。’

外文词令过后，这位苏联大使以随便的语气说出了非常郑重的话：

‘陈先生，中共只有两三千兵，他们如果不听话，你们就把他们消灭算了！’

这显然不是人使个人的意见，他也没说是政府的意见，更没说是斯大林的意见。

但陈立夫理解了。几十年后陈立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这时候苏联只希望能促成中战争，他们就是牺牲中共，亦所不惜，国家至上，势所必然。’

蒋介石摸到了斯大林的底牌，又大肆开始了剿共战争。十二月四日，他带着钱大钧、陈诚、陈调元、蒋鼎文、卫立煌、万耀煌、陈继承、蒋百里、张冲、朱绍良、蒋作宾、邵元冲等文武大员来到西安，亲自指挥对红军的第六次‘围剿’。

蒋介石到西安，带着卫队住城郊骊山华清池五间厅，其他大员住城里西京招待所。

蒋介石进入骊山行宫，席不暇暖，就向西北‘剿总’司令部参谋长晏道刚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师以上军官名单。从五日起分批接见，谈话，吃饭，照像。实际上是分化，收买，挖张杨的墙脚，同时，调兵遣将，部署‘剿共’战争。

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组织通渭会战。当时东北军之何柱国骑兵军位于海原、李旺堡地区；王以哲第六十七军位于固原、平凉、隆德地区；于学忠第五十一军位于兰州、定西地区。蒋介石之嫡系胡宗南第一军进至秦安、清水地区，王均第三军及关麟征两个师向天水、甘谷集结，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向陇西、武

山、榆盘集结。蒋介石又令集中于陇海路郑州至灵宝段、平汉路汉口至郑州段的三十个师，向潼关开进。

第二步，组织最后‘围剿’。集中几十万大军，配属一百架新从意大利购买的新式战斗机，稳紮扎稳打，步步为营，将红军主力压迫在黄河以东、西兰大道以北地区，一举消灭；乘机压迫、分化和拆散东北军和西北军，收一箭双雕之效。

西安事变发生前，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受挫，正与马家军鏖战中。从西安到兰州的公路运输线，很快被中央军所控制。东北军和西北军处于被分割、监视的状态。张学良和杨虎城感到事态严重。经过密商后，决定对蒋进行最后的谏诤，如蒋仍顽固不化，则发动‘兵谏’。

十二月七日，张学良赴华清池见蒋，慷慨陈词：

‘无论是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还是为委员长的个人威信着想，都应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现在全国老百姓一致要求政府打日本，如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请委座三思！’

‘你懂什么！’蒋介石怒火中烧，拍案而起，绕室疾走几步，接着说：‘当今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是共产党，过去耗费多年之功，没有剿灭他们。五次围剿我们打了大胜仗，逼得他们万里流窜，从江西跑陕北，残余力量已不多了。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现在的剿共战事到了最后的五分钟。你是个军人，打仗打不赢，就想投降共匪，和他们搞联合，你的部下在前线暗通共匪，你纵容不办，以为我不知道吗！剿共是既定国策，决不动摇，你就是拿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我的决心。’

‘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大哥耿耿忠心，天日可鉴。‘九，一八’事变，我执行不扩事态的命令，部下不理解我，东北父老骂我不抵抗，我名誉扫地，人格破产，您知道吗？’说到此处，张学良一肚子

委曲，双泪长流，不能自抑。

‘汉卿，我不是不抗日，但先贤有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共匪是心腹之患。日本是疥癣之疾。我们光忙于抗日，共产党就会在我们的腹心坐大。你还年轻，对共产党的认识太肤浅，先执行命令，打好西北剿共的最后一仗，作战中消耗的物资弹药，我可以下令给你补充。’

提起人员和武器弹药的补充，张学良气不打一处来。直罗镇一仗第一〇九师全军覆没，蒋介石就是不同意重建番号。损失的武器弹药，何应钦给批了条子，但到联勤总部，七推八拖，一条枪也领不出来。蒋介石是借东北军消灭红军，又假手红军的力量消耗、削弱东北军，蒋坐收渔人之利，张学良对此看得很清楚。

‘委员长，不是我不执行剿共的命令，是官兵反对内战，厌恶内战，在战场上红军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我们帮助你们打回老家去！”遇上这种情况，未战先败，士气就垮了。不仅下级官兵认为人家说得有理。就是师长、军长们也这样看，你说这仗怎么打？！’

‘你们中共共产党的毒太深了。我明白地告诉你！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服从命令，全部开赴陕甘前线剿共，中央军作为你们的后援；另一条是如果不执行命令，就把地盘让出来，我指挥中央军去完成剿共大业，你们嘛，立即撤离西北，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这两条路何去何从？你们可以自由选择。’

张学良一听，心完全冷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马上面临着被拆散，被改编的命运，自己和杨虎城将像蔡廷锴和蒋光鼐那样被解除兵权。先大帅传给我的基业就这样被老蒋轻而易举地攫走了，老蒋果然难斗！但张学良的身上毕竟流着张作霖的血液！他暗暗下定决心：‘姓蒋的，走着瞧吧！’

张学良冷静下来，恢复常态，彬彬有礼地说：‘委员长委学良以西北剿总副司令的重任，怎敢不执行命令，只是把军心士气的真实情况报告委座，党国大计我当然是听委员长的。’说毕告辞。

蒋介石哼哼哈哈送客，心想：‘谅你也不敢不听。’他对自己领袖人格充满了自信。

张学良驱车返回市区，吩咐司机直开九府街杨虎城公馆。二人决心执行‘兵谏’方案，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分工。

十二月九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当时西安有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东北救亡会两个群众组织，简称‘西救’、‘东救’，领导核心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共产党员谢兹山、徐彬如、李木庵、宋黎、马绍周等是核心人物。

九日清晨，‘西救’、‘东救’发动群众举行纪念大会，到会两万余人，以学生为骨干，结队前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和陕西省政府请愿，印发‘欢迎蒋委员长来西北领导抗救国’的宣言，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援绥救国’等口号。然后，浩浩荡荡出城直奔临潼，要直接向蒋委员长请愿。

大队行至十里铺，临潼蒋介石行营已得到消息。蒋派侍从室组长、宪兵第二团团团长蒋孝先乘车赶来劝阻，在十里铺暗步兵和马队，高地架起了机关枪，将在前面开路的学生交通队扣留，学生不怕威胁，坚持要往临潼。正在相持不下，张学良乘车赶来，张说：

‘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救国热忱，我是非常钦佩的。但是今天时已不早，路程尚远，而临潼又无餐宿之地。你们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转回，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转向蒋委员长陈述，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

站在前面的学生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权最高统揽者，必须他亲自答应我们的请愿。方能相信。临潼虽无大队餐宿之

地,我们宁愿不吃饭,宁愿集体露立达旦。救国之事,还怕辛苦吗?’

张学良又说:‘你们的救国志愿,我并不来阻挠。只是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然触动最高当局之震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

青年学生血脉喷张,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佩戴东北大学校徽的女生们对张学良说:‘请少帅带我们打回老家去!’说毕放声大哭。上万学生悲愤之情难以自抑,由队头至队尾哭声震动山岳。伫足围观的过往行人目睹此情此景,潸然泪下。张学良的随从警卫人员在悄悄拭泪。这种悲壮的群众性场面,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无动于衷。张学良深深地被感动了。这位血气方刚的少帅决心不顾一切和群众站在一起,他抑制住满腔悲愤,向群众说:

‘各位同胞,同学!我张学良不是不救国的,我的心情是和你们一样的。自从失掉东三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我不是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抗日战场上的。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之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情答覆你们,请你们今天暂行回去。我不欺骗同学们。我是国家的军人,我不是蒋某人的走狗,如果逾期欺骗了你们,我张学良愿意你们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你们能相信我吗!?’

群众见张学良如此恳切真挚,表示相信张副司令,列队回城。时天已薄暮,学生自晨六时至晚七时颗粒未进,但秩序井然,在街头电灯的照耀下,泪光莹莹,市民见之均感叹不已。

张学良对学生的讲话早由特务密报蒋介石。当晚,蒋给陕西

省主席邵力子写一密信：力子主席兄动鉴：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

‘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止

十二月九日

《大公报》虽系民间报纸，但系颇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蒋发表这一消息的本意是逼张、杨就范，把张、杨逼上铤而走险的道路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张学良和杨虎城不露声色，‘兵谏’的准备工作在抓紧进行着。

张学良最先召见最亲信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卫队营做好一切准备，听命令执行扣蒋任务。

继又召见骑兵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白、刘是绿林出身，干‘掏老窑’的活有经验，叫他们协同孙铭九执行任务，由白凤翔统一指挥。为了让白、刘熟悉蒋介石的住处和警卫情况，以委派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赴热河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由刘桂五接替师长职务为由，带二人谒蒋聆训。

继又召见第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和第二旅旅长唐君尧，该师驻防潼关，给他们的任务是控制临潼火车站，策应华清池方面卫队营的捉蒋行动。

杨虎城指挥第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进行了部署。主要是解除亲蒋的宪兵、特务、警察及中央军各部驻秦办事处的武装，控制火车站、飞机场，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及散居各处的南京军政大员。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华清池和西安城里同时响起了枪声。

华清池方面，孙铭九率卫队营，在白凤翔的统一指挥和刘多荃师的外围掩护下，顺利完成了捉蒋任务，打死蒋孝先等一批卫士，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脚部负伤。

西安方面，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周率部解除了宪兵团和公安纵队等部的武装；杨虎城的卫队营营长宋文梅率部完成了扣留西京招待所等处南京大员的任务。国民党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邵元冲翻墙逃跑被打死。

两处捷报传来，张学良放声大笑，声震屋宇。这一夜他在新城大楼和杨虎城坐镇指挥，听说在石洞穴里找到了蒋介石非常高兴，对周围的军官们说：‘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天，把天戳了一个大窟窿。目前国家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捉蒋成功后，张学良首先让他的秘书刘鼎给保安中共中央发出文寅电，文是十二日，寅是凌晨至五时，电报的内容是请中共派人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

刘鼎原名阚尊民，一九三〇年生，四川南溪人，曾留学法国，是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共的老党员。这年四月，受中共中央派遣，任中共驻东北军常驻代表，以便及时沟通双方联系，公开身份是张学良的秘书。据刘鼎留下的札记记载，他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十一点多才从张学良那里得知发动兵谏的消息，事先并未参与策划。

十二月十三日在保安的张闻天窑洞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报告，根据会议记录，毛泽东说：

‘蒋最近的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

毛还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多数人同意毛泽东意见。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林祖涵、徐特立、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叶剑英、任弼时、林彪、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等十五名红军将领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电文说：‘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作为中共代表，率十七名工作人员于十五日从保安出发，十七日晚六时到达西安。当晚，在金家巷张公馆与张学良会晤。张学良介绍了六天以来局势的变化及各方的反映。南京何应钦在日本支持下，主张武力解决，打着救蒋的旗号，企图炸死蒋介石，取而代之。宋氏兄妹在英美支持下，力主和平解决。由于驻守潼关的西北军师长冯钦哉投靠南京，潼关不攻自破，中央军直下华阴、渭南，并大肆轰炸。经端纳斡旋，蒋介石态度有松动，可能答应抗日。十七日上午蒋写手令给何应钦，命令二十日以前停止轰炸，争取和平解决。周恩来与张学良商定了和平解决的五项条件：

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周张会谈后，周恩来给保安发来一电，汇报五项条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解决、保蒋安全的意见，电文中说：

‘为缓和蒋系进兵，便于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掀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十八日，周恩来又致中共中央一电，说张学良‘极愿听我们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

接周恩来两电后，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形势和对策，仍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做报告和结论。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保蒋安全、消弥内战的意见，他说：

‘西安事变后，对于内战的发生与延长是不利的，我们主要是要消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内战的前途一定要结束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有六种力量：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六是国际。……我们应把六种力量团结，使内战结束。’

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他在会上解释说：‘国际指示还未到。’‘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通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通电提出：‘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放弃了公审蒋介石的意见。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际来电施加压力的结果。’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国际来电不是如张国焘所说十三日晚上到达，而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到达保安的。此时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已经定下来了。

收到国际来电后，毛泽东立即电告周恩来，原文如下：

周：

国际来电如下：

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

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毛

十二月二十日二十时

周恩来收到此电后，即按和平解决的方针放手展开工作。

十二月二十二日，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周恩来与宋氏兄妹长谈，对转变蒋的态度起了积极作用。

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周恩来会晤了蒋介石。这时蒋介石已由新城大楼迁居玄风桥高桂滋公馆。先由张学良进去通报说：‘周恩来先生来了。’蒋闻之脸色陡变，连说：‘不见！不见！’张笑着说：‘周先生已经来了，你们是老交情了，我们是新交。’说罢引周入室。蒋介石见周恩来进来，神色沮丧，木讷无言。周恩来不失礼趋前问候，同蒋介石握着手说：‘我的头是从你的刀底下滚过来的，现在都不说了，一致抗日吧！’

蒋介石狼狈地说：‘我后悔了，杀人太多了。’

宋美龄插话圆场：‘算了吧！以后不剿共了。’

蒋介石羞愧交作，流出了两行清泪。

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判。谈判相当顺利。共产党的顾全大局、不计前仇出

乎蒋的意料,推动他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十二月二十五日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如实反映了作为国民党与共产党第二次合作的起点的谈判情况:

(甲)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乙)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丙)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

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丁)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戊)现在军事布置仍旧，并加紧戒备。

(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45 打通国际 徐向前勇担艰巨 鏖战临高 西路军血染河西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西北的集中,造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打通苏联取得国际援助,在西北联合抗日友军,造成抗日新局面的战略态势。

在中共领导人内部,从毛泽东到张闻天到张国焘,在打通国际路线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过去中共党史材料说打通国际路线是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或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毛泽东是反对这条路线的,这违背历史的真实。一九三六年六月,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一封电报中说:

从总的战略上来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

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

毛认为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是一九三六年的战略任务。但他最初的想法是让红一军团或红十五军团执行这一

任务,后来才交予红四方面军。这样就出现了中共党史上一大悬案——西路军问题。研究西路军问题,切忌‘见人不见物’,一切都是为了谁接收和控制苏联援助的物资展开的,这是问题的主线。

所谓西路军问题,就是红四方面军的半数兵力约二万一千人,由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西渡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因各种复杂的原因,在河西走廊(甘肃西部武威至高台一线)全军覆灭的功过是非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毛泽东接见李先念等西路军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派巨大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一九九〇年甘肃《社会科学》第五期将这段话公开发表)这次谈话,为以后关于西路军失败问题的宣传口径定下了调子。

一九五一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释〔十九〕中说:‘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转移。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将领,对这个结论是不服气的。特别是后来看到了指挥调动西路军的往来电报,西路军过河及过河后的作战行动,明明是中央军委的命令或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为何把西路军的失败同张国焘路线捆在了一起?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党史学界以朱玉副教授为代表对西

路军问题进行了重新探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得出了全新的结论。

一九八五年徐向前元帅发表了他的《历史的回顾》，得以一吐胸中块垒。

徐向前元帅去世后，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表的讣告中说：‘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奉中央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与敌血战河西走廊，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对西路军问题的彻底平反。

一九九一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前者提到注释〔十九〕变成〔二十五〕，释文作了修改：‘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重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派红四方面军一部到黄河以西，虽是符合或迁就了张国焘的想法，但最后下命令的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对于西路军的覆灭，毛泽东是难辞其咎的。

早在一九三五年八月毛儿盖会议上，张国焘就有拉队伍西渡黄河，进入青海、宁夏、新疆另搞一个局面的想法。一九三六年七月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等推动下，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后，张国焘一路之上几次反覆。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在牙磨河畔接陕北中央来电，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张国焘为第一书记，朱德为第二书记，任弼时

为第三书记。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了西北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傅种、曾传六、李卓然、何畏、萧克等。张国焘主持会议。关于行动方针,大多数同意中央九月十三日来电,北上静(宁)会(宁)地区,发动静会战役,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独张国焘反对北上,要西渡黄河,去青海·新疆。张国焘的主要助手、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张国焘唱了反调,他也主张北上。张国焘说北上静、会会断送红军。朱德劝他要尊重多数,不要个人推翻集体作出的决定。张国焘无人附合,发了脾气,说总政委不干了,作战方案也不作了,带上警卫员离开了总司令部,到漳县三分岔前敌指挥部去了。

三天后,即九月二十一日,张国焘从漳县给朱德发来电报,令进到通渭执行静会战役任务的部队停止北上,转头西进永靖、循化,准备西渡黄河。

朱德接电后立拟两电。

第一电,以朱德、傅钟(西北局委员、组织部长)名义致徐向前、周纯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转致张国焘。

向、纯转焘:

(甲)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昌浩今早可到漳,带来陕北来亲译长电,表示国际态度,望详加研究。

(乙)接到指示,已告各方停止一切行动。

(丙)弟等即日赶到漳县,并电告传六、何畏、长工也兼程赴漳,续商大计。

(丁)静会战役各方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

朱、傅飞覆焘(向纯转)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三时

第二电是发给陕北中共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文中的‘英’是国际代表林育英,因居于调停毛张矛盾的地位,受到双方尊重。

英、洛、毛、周、彭、贺、任、刘:

(甲)西北局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似根本推翻这一原案。

(乙)现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继续讨论,结果再报。

(丙)我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一原案推翻,我不能负责任。

朱德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不料电稿送到电台后,电台负责人展示九月二十一日张国焘的电令:‘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几次派人做工作,答覆仍是:‘不能发,不能违抗张主席的指示。’

作为总司令的朱德竟被剥夺了发电报的权力,可见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家长制统治何等严重!

最后由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亲自出面做工作,他到了电台,把大家召集起来说:‘有人要推翻岷州会议决议,总司令不赞成,要向中央报告,也要召集人继续讨论,这是关系红军前途的大事。总司令有命令应该执行。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遵守党的纪律和原则,维护党的决议,下级服从上级。现在我代表西北局组织部问问大家,怎么?’

沉默了一会儿,电台负责人王子纲站起来表态:

‘给总司令发报！’

两封电报发出，已是二十二日凌晨了。朱德率总司令部向漳县转移。

张国焘在漳县城外三岔前敌指挥部，对徐向前、周纯全说：‘四方面军就让陈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坐班房！’陈昌浩到了三岔，又受到了张国焘雷霆万钧的训斥。所以在漳县西北局会议上，前指领导人，包括陈昌浩，都转而同意张国焘的第二方案，即西进方案。

朱德无可奈何地说：‘那就暂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做好工作，少受损失。我建议向中央报告，如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

于是，九月二十二日以朱、张、徐、陈名义致电毛、周、彭并贺、任，提议先以红四方面军一部从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渡河，抢占兰州北之永登、红城子地区；一部于甘南吸引胡宗南南进，完成任务后亦转移到河西。而后以一部阻扼兰州敌北进，一部向一条山、靖远、中卫活动，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红二方面军在现地完成牵制胡敌任务后，则经 邑、■县、庆阳北上接通红一方面军，待红一方面军主力渡河后，即依据原陕甘苏区向南活动。对于张国焘的这份电报，九月二十五日彭德怀致电毛、周，作如下之评论：

看到张国焘二十二日二十二时致毛周彭电，其目的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南部，回避胡宗南，使该敌以全力对付我一方面军，破坏打通国际计划，其反说是完全同意国际指示。九月二十七日，毛、周、彭将中央政治局讨论结果电告红四、红二方面军领导人：

中央认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成任务之危险。

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即跟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肃，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失。一方面军目前一面确占界石铺，一面立即出四国以上通过隆、静线，直迫秦安、天水，使胡敌不敢动作，以便四方面军十分安全的北上，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亦即九月十八日朱、张、陈三同志之方针。

同日，朱、张、陈、徐覆电中央：‘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二十六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至此，北上与西进之争告一段落。九月三十日，红四方面军分为五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静（宁）、会（宁）地区急进；十月上旬，在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红军三大主力在静会地区会合，标志着共产党和红军由分裂走向团结，标志着张国焘臣服于陕北中央，毛泽东、张闻天等所争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统地位如今取得了全胜。

毛泽东、张闻天等陕北中共领导人对张国焘坚持西进的打算看得很清楚。同时，他们也不愿张国焘带着四万人马到陕北来，一则陕北地瘠民贫，养不了那么多兵；二则担心张国焘发动兵变，用武力强迫中共中央改组领导，夺取最高权力。所以，三军会合后，怎样安排和使用红四方面军，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对中央战略全局的展开有利；二是张国焘可以接受。毛泽东做了军委主席，他要在这两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赋予四方面军任务时和张国焘发生关系。这一良苦用心在十月十四日毛泽东起草的洛恩博泽致彭德怀电中说得很清楚：

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四方面军干部不可求善太急，他们在中央指定朱张任前线指挥后表现很好。彼任前线指挥，事实上与名义上不能不听任中央军委指挥，加上兄与弼时的赞助，前线行动当无大不好处。若于此时调其来定边，则太勉强，彼可有理由推诿不来。我们政策应表示对他们信任，不宜使他们感觉对他们不信任。准备经过长过程，使国焘、徐、陈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

既要在争取张国焘的支持、至少是不遭到张国焘反对的情况下指挥红四方面军完成于战略全局有利的任务，又要提防和挫败张国焘利用红四方面军在执行中央赋予的任务时割据称雄、与陕北对立的图谋。这就很难避免伤害红四方面军本身。西路军的悲剧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因共产国际来电，有一批援助中共的武器和物资循蒙古、绥远、宁夏的路线于近期运至宁夏之定远营（今宁夏阿拉善左旗）。三军会师后立即执行毛泽东制定的以夺取宁夏、接受国际援助为战略目的的《十月份作战纲领》。鉴于张国焘一路北来与朱德等争论，充分表达了必欲率部西渡黄河的愿望，毛泽东改变了原定要红一军团或红十五军团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把这个任务赋予了红四方面军。令其‘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队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之渡河点，以加速度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红四方面军主力与红一、红二方面军一起参加攻宁作战。张国焘完全同意《十月份作战纲领》，派木匠出身的李先念督造船只。

十月二十五日晚，以程世才为军长、李先念为政委的红三十军在靖远城西之虎豹口（河包口）渡河成功。奉谁之命？中央军委。尽管渡河命令是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下达的，但他们是依据

毛泽东制定的中央军委《十月份作战纲领》履行组织指挥的责任。

十月二十六日晚一时半，红三十军渡河甫告成功，毛泽东即给朱、张、彭发电指示：‘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朱、张遵从毛的意见，又令红九军过河。

十月二十八日，徐陈致电朱张并转毛周，建议‘三十一军无论如何须抽出随指(挥)部行动。’以便‘九、三十、三十一三个军中以两个军出动，如得手后即分一个军出定远营’。

十月二十九日，军委电令：‘根据朱张徐陈意见，为迅取宁夏起见，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

十月三十日，彭德怀致毛泽东、周恩来一密电，告了张国焘，说：‘张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以一方面军与胡敌周旋，削弱力量，(他)好说话。’彭德怀的意见影响了毛周，毛周改变了主意，电令朱张将红三十一军留在河东。朱张遵行。在靖远警戒渡口保护船只的红五军(三千余人)，因敌靠近，朱张令其随船开往西岸之三角城。从此，红四方面军一分为二，红三十、红九、红五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下到了河西；红四、红三十一军归彭德怀指挥在河东作战。

十一月一日，朱德、张国焘在关桥堡与张浩(即林育英)会见，张‘带来国际和中央许多消息’。二日，朱张遂电徐陈：‘远方(按：苏联)货物已准备好了，我们即电中央，转电去问明远方货物何时到达指定地点。’要求徐陈率三个军单独解决二马(按：宁夏马鸿逵、马鸿宾)，从一条山出宁夏，占领定远营，准备完成接收‘远方货物’的任务。

十一月三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朱张徐陈：‘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不再提袭取定远营取货的事。实际是

改变主意让彭德怀率部去接收远方货物。

由于国民党出动五个军的兵力企图将红军主力消灭于黄河以东,彭德怀忙于率部拒敌,红一方面军未能按计划于结冰前在中卫、重武段渡河,就近抢占定远营,接取远方货物事落了空。十一月六日,徐陈电告朱张:‘到我处之外(国)人,确系红军,自称带九百骆驼驮送 货给中国红军,现已被马敌劫去。’

东西一丢,毛泽东即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八日张毛周博林致朱张彭贺任的电报中,提出‘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南路军和北路军准备进行战略转移,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同日,张闻天、毛泽东代表中央和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主席。委员名单据报照准。从此,西路军正式成立,执行中央赋予的第二阶段的任务——从河西走廊打通新疆的战略任务。

十一月十三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已令西路军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今酒泉)前进,并望国际准备接济物资。

十一月十三日,张国焘与朱德率总司令合机关由环县河莲湾来到陕北保安。从此西路军直接受中央军委指挥。

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指示徐、陈:‘你们的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远方对于经哈密接济你方已原则上同意,物资经济均可接济,正设法解决交通运输,拟技术手续,大约以(于)明年开春后,可望大批接济,现正急谋小部接济,大抵于我占领安西后即可实现。’‘你方须在甘州(今张掖)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想头。’

徐、陈会意，十一月二十日致电中央，决定‘以五军出甘、肃两州线，一部及骑一师出安西’，主力在凉州至永昌道上制敌。

五军即红五军团，宁都起义部队，军长董振堂，原属红一方面军。徐陈派红五军去安西，由他们去接收国际援助物资，有请中央放心之意。

十一月二十日，洛毛致电徐陈：‘邓发同志从迪化来电，安西、敦煌两县仅有民团，且无枪，更无军队。’‘袁立夫（按：西路军派出联系接物人员）可随进占安西之部队同去，到安西再向哈密。接济军用品弹药及派人接洽帮助军事，正同彼方接洽中，结果如何，容后再告。’

十一月二十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拟稿给中央发电，陈述西路军伤亡惨重，‘胜则难缴获，败即无生还。’‘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覆电徐陈：‘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十一月二十七日，洛甫、泽东电示徐、陈：‘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着重在凉州、永昌之间，各个消灭马部，西面仅以五军占领之。’再次明确不许西路军主力西去。

河东的红一、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红四、红三十一军，这时集结在陕甘苏区西部的盐池、定边、洪德、环县地区，准备东移。蒋介石判断陕甘主力红军的企图是在冰期西渡黄河与徐向前部会合。毛泽东令徐陈率部东移，是要造成接应主力红军过河的假象，将国民党军吸引到西边来，以便于主力红军行动。

徐陈奉命后，从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上旬，与马家军连续进行了五次大血战。一是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之战，二是永昌东南八坝之战，三是永昌以西水磨关之战，四是永昌之战，五是山丹之

战。半个月内,毙伤敌六千余人。西路军处在孤军外线作战地位,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冒白刃,餐风雪,慷慨悲歌,视死如归。经过这段时间消耗,西路军由过河时的两万一千余人减至一万五千人,主力红三十军损失尤重,战斗力大不如前,无法扭转被动局面,但却沉重打击了马家军,吸引了黄河两岸十多万国民党军。这对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是极为有力的配合。十一月中下旬:胡宗南部孤军深入荫城、山城堡、甜水堡一线,红一、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取得了歼灭胡部一个整旅零两个团的胜利。

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局改观,中央军委决定放弃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的战略转移计划。十二月十八日电示徐陈‘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二十二日徐陈向中央军委报告:‘西路军为按期完成任务,决逐渐西移……拟于明年一月中(旬)以九、三十军抢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年(年)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物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个月,度过严寒之三月。’

一九三六年岁末,西路军以久战疲惫之师,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奋力西行。一九三七年元旦,红五军一举攻占高台。一月上旬,红九军攻甘州未下,进驻临泽和沙和堡。总指挥部和红三十军驻倪家营子。这一带粮食较多,拟补充整理后继续西进。

一月七日,毛泽东以军委主席团的名义电示西路军停止西进,要求‘西路军应全部集结临高地带……现勿分兵去安西。’

在西路军停留临、高期间,一月十二日马步芳集中四个旅另三个团和民团一部,猛攻红五军阵地高台。经一周激战,县城被攻破。红五军与敌巷战十余小时,白刃拼杀,备极惨烈。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三千

余人,大部 壮烈牺牲。少数突围进入南山的部队,亦被民团俘掳杀害。徐陈获悉红五军危急时,曾派骑 兵师前往接应,中途与敌遭遇。师长董彦后、政委秦贤道以下五百余人大部牺牲。

一月十六日起,中央又连续致电徐陈,指示西路军东进。徐陈收集余部万余人集中在临泽东南郊的倪家营子,准备夺路突围东返。倪家营子分四十三个屯庄,星罗棋布,座落在祁连 山脚下的戈壁滩上。每个屯庄都是一座堡垒,厚厚的黄土围墙,高达三、四米。徐陈令红三 十军守西南方向,红九军守东北方向,两军前沿阵地相接,纵深梯次配置,构成一个椭圆形 防御阵地,凭垒固守。从一月二十三日起,二马集中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一个手枪 团、一个宪兵团的正规军和甘、肃两州大量民团,共七万余人,围攻倪家营子,双方展开了一场历时二十多天的血战。

二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又令西路军停止东进,春暖后向肃州、安西行动。徐 陈电中央,请求派红四、红三十一军来援,打击二马,否则两路军难以完成西进任务。如不 能来援,拟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解决部队的补充问题,伺机再图发展。照常理,在 敌人重围中的一支孤军,既不能救援,当准其便宜行事。出人意料的是,二月十七日,中 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来电,严令徐陈率部向西,对于他们向青海方向突围的设想,不从军 事上分析利害可否,却说:‘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 何 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 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的政治错误的正确认 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

徐陈接到此电,心情非常沉重。徐向前回忆说:‘南下期间,我们的确犯了错误,欠了账 。把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到一起,谁还能动弹?! 陈昌浩的压力尤大。他 曾是国焘路线的积积支持者,现时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一抓

过去的辫子，他更是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只好唯命是从。’徐向前建议召开军政委员会决定下步行动。在会上徐力主自救东返，获多数人同意。二月二十一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向西洞堡、龙首堡一带转移，马步芳派骑兵旅和宪兵团尾追，被红三十军杀了回马枪，击溃骑兵旅，全歼宪兵团。缴枪一千二百余支，并夺得一批军用物资。东进没有中央命令，陈昌浩本来就有顾虑，他见打了胜仗，得到补充，提出掉头往西，重返倪家营子。徐向前不同意，与陈昌浩大吵一顿二十六日，中央来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让一支弹尽粮绝的部队固守五十天谈何容易？但这份电报支持了陈昌浩，又把部队拉回倪家营子。二月二十六日西路军再陷重围。

二月二十七日，军委命令组成援西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林育英为政治委员，下辖第四、第三十一、第二十八、第三十二军。援西军对外是政治性的——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对内是道义性的——向全党全军表示救援西路军。军委主席团三月二日致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左权并告周恩来的密电中说：

增援之实行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

(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时，周即告顾祝同，请求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则实行增援，否则中道而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域。

(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证明西面是不能生存的。

马步芳是受蒋介石“之命与西路军死战的。如今两路军陷入重围将被消灭，救援西路军要征得蒋介石同意，岂非与虎谋皮？退一

步说,即便蒋‘谅解’,救援部队西行极限是黄河两岸,而西路军在千里之外的临泽,以近水去救远火,岂能奏效,把西路军接出来!

三月十一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来到梨园口,这是进入祁连山的口子,三面环山,中部有些民房,部队已是弹尽粮绝。敌骑兵蜂拥追来。红九军两个团千余人在政委陈海松率领下首先接战。指战员杀红了眼,光着膀子(当地的三月还是冬天),挥舞大刀和敌骑兵肉搏。不到半天,陈海松以下两个团全部战死,掩护总机关和伤病员向山里转移的红三十军又与敌人作殊死战,红二六四团全部拼光,红二六三团大部牺牲。十三日西路军残部两千余人进入山里的康龙寺地区,在石窝召开了最后决策会议,决定:徐、陈离部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由李先念等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善其后。余部分三个支队分散游击。后来大部损失了。只李先念带子千余人沿祁连山西进,历尽千辛万苦到了新疆,剩下四百多人被国际代表陈云、中共中央代表滕代远接回延安。

西路军失败后,苏联把已运抵新疆的援助中共的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给了当时亲苏的盛世才。

徐向前在耄耋之年回忆往事时说:

兵贵神速。我们同意西进,是要趁天气还不太冷。河西走廊敌人兵力空虚一鼓作气插过去。而不是慢慢腾腾,走走停停像后来那样,在河西走廊涮来涮去,孤军鏖战。如果预见到是那种情况,谁不主张东返啊!顺便说一下,在延安时,高岗和我谈过西路军问题。他问我:你对西路军失败有什么看法?我说:西路军过了黄河,如果不在一条山蹲那么久,不在永昌、山丹搞根据地,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关,把玉门、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形势会大不一样的。一是有饭吃,不挨饿;二是有衣穿,不挨冻;三是有枪

炮、弹药补充，有广阔回旋余地。说实在话，西路军只要有个炮兵团，马家军再增加一倍，都不够我们打的。西路军先打到西边，取得补充，立住脚跟，再往回打，是不至于失败的，至少也不会败得那样惨。

46 统一指挥 蒋介石口蜜腹剑 独立自主 毛泽东远虑深谋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各首脑机关迁往延安。毛泽东被安排住在凤凰山下的三间窑洞里。

西路军的失败使张国焘丧失了一切，他不再是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政治领袖。处置张国焘的时机成熟了。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后五天，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凯丰作为主要发言人，系统批判了张国焘反党、另立中央以及其他严重错误。三十一日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

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运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

张国焘同志的南下行动，不但在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上看来，是根本错误的，而且南下的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

张国焘同志始终对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路

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要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

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实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发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表现自己的机会。

《决定》传达到红四方面军连以上干部,红一、红二方面军和党政机关团以上干部。原四方面军各部展开揭发批判国焘路线的斗争。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张国焘的中央军委委员、军委主席团委员、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四个军队任务被撤销了。分配他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林伯渠主席在外执行任务期间,代理主席职务。

在批判张国焘的斗争中,毛泽东没有过多的出面。四月七日,他以有容乃大的姿态在红四方面军党员代表大会上说:‘一个同志藩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同志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对红四方面军的中高级干部,他纡尊探望,促膝谈心。许世友等因为思想不

通，密谋逃离延安，被关在监狱里。毛泽东闻讯，亲手释放，慰勉有加，表示倚重和信任。从此，许世友成了最忠于毛的战将之一。直至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毛泽东的‘周勃’。此是后话。

七月七日，发生芦沟桥事变。

七月八日毛泽东想起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即给退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本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通电》响亮地提出：‘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为迎接全面抗战的新局面，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什么跑到洛川去开会呢？其时，毛泽东在延安，周恩来在西安，红军高级将领在三原一带，洛川是一个适中的地方。洛川驻军是张学良部，安全有保障。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负责人共二十三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贺龙、博古、彭德怀、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凯丰、张国焘和周昆。

毛泽东在会议上唱主角。他认为：南京政府在日寇进攻和人心愤激的压迫下，已经开始定下了抗战的决心。整个的国防部署与各地的实际抗战，也已经开始。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七月七日芦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会议通过了毛

泽东提出的抗日救国 十大纲领：

-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 四、改革政治机构；
-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 七、改良人民生活；
-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 九、肃清汉奸宝国贼亲门派，巩固后方；
-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各、下面都有一些具体内容，第十条的具体内容是：‘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 国各党各派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此件通电全 国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洛川会议上就红军的战略方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毛泽东的基调发言是：中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与扩大红军，争取我党我军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集中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毛泽东解释说：独立自主，是讲指挥关系，红军由共产党集中指挥，只有独立自主，才能发挥红军的特长和伟大作用；游击战，即以分散游击为主，不是以集中打运动战为主，着眼于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创造根据地；山地战，是尽可能依傍山地，以我之长击敌之短，着眼于建立支持长期作战的巩固的战略支点。

与会的高级指挥员欲在抗日战争中一显身手，为国家为民族

立功,觉得只打游击战不够轰轰烈烈,多倾向于打能成围成师消灭敌人的运动战,对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提出了修正意见。如彭德怀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刘伯承提出‘游击运动战’。

会议改组了中央军委。新的军委成员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等十一人,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同时决定设立前方军委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

八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十一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九月十一日改称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九月十一日改称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左权为副参谋长,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一一五、第一二〇、第二一九师和直属部队,共四万六千人。

第一一五师由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及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编成,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周昆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萧华任副主任。下辖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独立团和数个直属营,全师共一万五千人。

第一二〇师由红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军及独立第一、第二师,赤水警卫营和总部特务团组成,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任副主任。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以及教导团和数个直属营,全师共一万四千人。

第二一九师由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一军及陕北红军第二十九、第三十军，独立第一至四团和第十五军团骑兵团编成，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下辖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教导团和数个直属营，全师共一万三千人。

这时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临战地区划分为五个战区，在河北省和河南省北部设立第一战区，辖第一、第二、第十四集团军；在晋、察、绥三省设立第二战区，辖第六、第七、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在苏、浙两省设立第三战区，辖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五集团军；在闽、粤两省设立第四战区，辖第四、第十二集团军；在山东省和苏北设立第五战区，辖第三、第五集团军。

九月二十二日，蒋介石批准中央通讯社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核心内容为四条：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谓：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

今日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在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危急存亡之秋，更不愿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

从此，形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第二次合作、团结救亡的新局面。

但蒋介石和毛泽东各有各的打算和做法。

读者请注意：中共四条宣言与蒋氏庐山谈话，关键性的分歧在一个词上。中共宣言说，红军取消名义和番号，接受政府改编，受蒋介石‘统辖’，是尊重蒋介石的抗战领袖地位；蒋介石则强调要在他的‘统一指挥之下……完成革命之使命’。由此生出了无穷的纠葛。

九月初，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派高级参议乔茂才来到陕西富平县庄里镇第一二九师师部求见刘伯承将军。此人在刘伯承发动沪(州)顺(庆)起义坚守泸州时为刘伯承的部下。刘伯承命参谋处长李达出面接待。寒暄过后，乔茂才拿出蒋介石亲笔签署的命令，调刘伯承师至西安乘车，经陇海路转平汉路，加入石家庄正面防御作战。并说：‘蒋委员长知道刘将军善打守城战，希望接受委座的统一指挥，在抗日战场上早建殊勋。’刘伯承拒绝与乔茂才见面，令李达向乔表示：‘不经过朱总司令直接指挥我师，是违反指挥原则的，这样的命令本师不能接受。’乔茂才唯唯告退无功而返。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于九月十二日给彭德怀发一电报：

甲、同意你偕恩来去南京一行。

乙、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

丙、此原则中包括：（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现在蒋鼎文还在说刘伯承应上前线。彼等用意，或者不明白使用大兵围于一个狭小地域实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如果是这样，可见我们对此原则并未向他们有过彻底坚持的说明；或者他们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丁、你未回军以前，属我直接指挥，通知朱德、任弼时、林彪、贺龙。（按：朱、任此时在往山西途中。）

蒋介石想用削弱、消灭杂牌的办法解决他多年剿不灭的红军。你共产党不是要抗日吗？很好。我调你的部队在正面战场上守阵地、打硬仗。打赢了是我抗日有功，打输了是日本人帮助我完成了‘剿共’大业。老蒋这一手是很毒的。照此做去，要不了多久，几万红军就被消灭了。

毛泽东岂能上这个当！‘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既是他给八路军规定的战略方针，又是他对付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的妙着。抗日是要抗的，打日本是要打的。但到哪去抗？到哪去打？怎么抗法？怎么打法？不能你蒋某人说了算，更不受你下面那些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我说了算。我一要抗日；二要创造根据地，也就是占领地盘，你政府军丢给日本人了，我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你能有什么说的？三要扩大队伍。所以抗战八年，红军由四万

五千人，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七万。毛泽东确实是棋高一着，他比其他共产党的领袖、红军将领看得都更深一些、更远一些。他坚决地毫不含糊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

九月二十一日，他给彭德怀又发一电报：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九月二十五日，他给周恩来并转刘少奇、杨尚昆、朱瑞并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指出：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八路军三个师在华北地区依傍山地进行战略展开。一一五师依托恒山，于涞源、灵丘以南，五台、盂县以东，灵寿、曲阳以西的晋察冀边区展开。一二〇师主力依托管涔山，于晋西北左云、清水河、保德、宁武、平鲁等县展开；其三五九旅于定襄、柏兰镇以南，盂县、井陉以北，平山以西地区展开。一二九师依托太行山在正太路以南晋东南地区展开。

林彪、聂荣臻率第一一五师于九月中旬进至五台、繁峙、灵丘地区。二十二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二十三日，朱、彭总副司令命令林聂率部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侧击该敌。林彪在上寨召开全师连以上干部会，传达任务进行动员。最后他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一带地区打一个大仗，给兽军一个打击，给友军一个配合，给部队一个兴奋！’二十四日，第二战区第六集团军（晋军杨爱源、孙楚部）给第一一五师送来《平型关

出击计划》，拟定以第七十一师附新编第二师及独立第八旅一部，配合第一一五师向平型关以关之日军出击。同日，林彪率旅团指挥员进行现地勘察，选择平型关东北老爷庙至小寨村道路两侧高地，利用居高临下便于隐蔽和突击的有利地形，采取一翼伏击的战术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当夜，冒雨布好伏兵。

二十五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约四千余人和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七时许，全部进入第一一五师伏击地域。雨后道路泥泞，车辆、人马拥挤，行动缓慢。林彪抓住有利时机，命令全线开火，给敌人重大杀伤。第六八五团迎头截击日军，封闭了敌南窜道路。第六八七团将敌后尾部队分割包围于蔡家峪和西沟村地区，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敌之退路。第六八六团担任突击公路敌行军纵队的任务。该团五连连长曾贤生在隐蔽地就命令全连上好刺刀，他说：‘我们要用手榴弹和刺刀消灭敌人，不叫跑掉一个，我们要下决心打胜仗，即使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堵住。堵不住就会影响战斗、首先我自己就有牺牲的决心，每个同志也要有这个决心。’当敌人行军纵队在公路受到夹击，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四下乱窜的时候，第六八六团勇猛冲向公路，与日军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格斗。曾贤生率领他的连队在二十分钟内用手榴弹击毁汽车二十多辆。排长杨路亭带两个战士把钻入汽车底下和附近窑洞内的敌人全部消灭。日军一部企图夺占公路西侧高地，掩护突围。第六八六团第二营迅速抢占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与公路东侧部队构成对日军夹击之势，随之将其压缩于狭谷之中。日军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得知辎重部队遭伏击，急从蔚县、涞源调兵向平型关增援，但被第一一五师独立团、骑兵营阻击于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并在灵丘以东之腰站毙伤日军三百余人。被围于小寨村至老爷庙之敌，在六架飞机掩护下向西突围亦未得逞。第六八六团遂集中全力，在两翼友邻的配合下，将被围之

敌全歼，至下午一时结束战斗。当日黄昏，第三四三旅向东跑池日军展开攻击，据守东跑池西面平型关的友军第六集团军第七十一师等部共八个团，违背协同作战计划，坐山观虎斗，未出兵配合，致使东跑池之日军由团城口突围。

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友军未予配合的情况下，歼灭板垣师团一千余人，缴获步枪千余支，机枪二十挺，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击毁汽车百辆，马车二百余辆，是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在日寇长驱直入，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华北战局危急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林彪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平型关大捷后，十月八日朱德、彭德怀发出《军分会就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在对形势的估计和作战方针上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朱德认为：蒋军和阎军有决心保卫晋北，保卫太原，八路军应积极配合，歼灭深入山西之日军，改变华北战局。与此相关的，在八路军的作战方针上，只打游击战起不了大的作用，文件中提出：‘我们必须依据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机动果敢的作战原则，以高度的积极动作，争取新的胜利，以影响友军在战术上及对群众关系上的改进，巩固我军的威望，提高我们的领导作用。’想多打几个平型关式的战役，以壮声威。毛泽东对此多次提出批评，避开朱德，主要的批彭德怀。

也是在十月八日，毛泽东在致周、朱、彭、任等人的电报中对华北形势和作战方针有完全不同的见解。毛预言：‘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毛预料国民党在山西的‘各军残部将大量溃散，即游击战争亦恐不能好好支持，蒋阎无力再过分干涉八路军之地方工作，故八路军将成为

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备供给之。’一个月后,即十一月八日,太原失陷。事变的发展证明毛泽东的见解是正确的。华北八路军按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全面展开。

十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湖南、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北、河南、安徽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经中共中央提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副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叶挺在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脱离中共,新四军的人事军务实际是项英主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南分局,项英任书记;成立新四军军分会,项英兼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十二月二五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移至江西南昌。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一支队由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二支队由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三支队由张云逸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四支队由高敬亭任司令员。全军一万余人。随后,在江南的一、二、三支队先后到达皖南歙县地区集中,江北的四支队到达皖中舒城地区集中,军部也移至皖南歙县之岩寺。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毛泽东致电项英:‘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并提示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薛岳等的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但现时方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行动自由了。尔后,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

至此，在毛泽东的统一部署下，华北八路军和华中新四军在敌后展开。

但王明的回国带来了斯大林的指示，有使毛泽东精心运筹深谋远虑的一整套战略计划化为泡影的危险。

斯大林的国际战略是联合支持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让蒋介石政府有能力坚持抗战，拖住日本，一旦希特勒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的时候，苏联能够集中兵力对付西边的德国，避免两面作战。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之下，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无条件地服从和支持蒋介石政府。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苏联政府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给了蒋介石政府第一批贷款五千万美元。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又付第二批贷款五千万美元。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支付第三批贷款一亿五千万美元。一九四〇年又有两笔贷款，七月一笔一亿五千万美元，十二月一笔五千万美元。但这些用来购买武器装备的贷款都给了蒋介石政府，共产党八路军没分到一枪一弹。一九四〇年斯大林在接见苏联驻华武官、军事使团团团长兼蒋介石总军事顾问崔可夫时说：‘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很难说。……欧洲的局势，希特勒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可能会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这就可望，由于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他。’‘你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面作战；’

一九三七年一月初，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即将回国的王明、康生、邓发和前来治病的王稼祥，

季米特洛夫陪同接见。

斯大林向刚从中国来苏的王稼祥发问：

‘中国红军有多少人？’

王稼祥回答：‘在陕北约三十千。’

王明马上插话说‘是三百千人。’

因为俄文中没打万字，三万人应是‘三十千’，王明说‘三百千’是睁着大眼说瞎话”。

斯大林说：‘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

王明问：‘中共应当遵照你的指示与国民党合作抗战，但你和共产国际过去对中共所作的指示，是否仍然有效？’

斯大林说：‘现在主要是打日本，过去那些东西现在不要谈。’

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

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十一月十四日，王明、康生、陈云、曾山等乘苏联军用飞机回国，经乌鲁木齐、兰州于二十九日到达延安。王明这时的身份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等前往机场热烈欢迎。毛泽东简短致词说：

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作喜从天降。

在随便交谈中，毛泽东问：

‘以后莫斯科和延安可否通航？’

王明说：‘根据中苏政府间谅解，苏联空军飞机在中国境内，只供国民政府调遣；我们这次乘空军飞机，是秘密安排的。在兰州等了好几天，今天天气好才起飞，一路由飞机师按地图好不容易才找

到延安上空。低空飞行看见延安城门口的大标语才降落。’

‘能否秘密给我们一些军事援助呢?’毛泽东充满了期待。

‘由苏联飞机偷运军火来延安恐怕难以办到。’王明以权威的语气回答。

毛泽东听了很感慨:‘拿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多少分给我们一点呢!’他谈笑间暗暗下定了自力更生打天下的决心。

47 国际钦差 陈绍禹踌躇满志 中共判徒 张国焘摇尾乞怜

王明回到延安，在机关团体和抗日军政大学等单位举行的各种欢迎会上，多次发表演说。当时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的李德听了王明的讲话，‘看作是对毛的党内政策以及全国政策的十分谨慎的批评。’

在王明的提议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到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召开。朱德因在山西前线没有参加，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新四军的项英也赶来参加。王明毫不客气地在会上唱主角。九日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十日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

张国焘在会上的感觉是：‘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

王明在会有‘四批’。

一是批评洛川会议。认为洛川会议没有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这个根本原则，把抗日与民主、民生并列；批评毛泽东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说；‘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受蒋统一指挥’；批评毛泽东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不该把国

共合作 放在最后一条,这是轻视国共合作的证明;说洛川会议主张发动群众,却没有找到发动群众 的具体办法,这办法就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二是批评《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认为参加政府不应以实行 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前提条件,而应以是否抗日为条件,只要国民党政府抗日 ,就可以去参加。这一批评也是直接针对毛泽东的。毛泽东的主张是:‘只有将国民党一党 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时候,即在今天的国民党政府(甲)接受本党 所提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内容,依据此内容,发布施政纲领时;(乙)在实际行动上已 经开始表示实现这一纲领的诚意和努力,并在这方面获得相当成绩时;(丙)容许共产党组 织的合法存在,保证共产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自由时,中共才能去参加。’

三是针锋相对批评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毛 在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纲第十七条写道:‘关于党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第十八条写道:‘在卢沟桥事变 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 主义方面占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王明认为这是机械论,夸大了 右倾危险。

毛的提纲第十九条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 导无产阶级? 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 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 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 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

面抗战?’王明说历史还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事情,只能说‘共同领导’,不能讲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空喊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空喊领导权只能吓走同盟者。

在第二十一条,毛泽东对《少号召,多建议》的章乃器主义提出了批评。王明认为章乃器是对的,共产党不宜从政治上号召要这样办那样办,而应与国民党多商量讨论,采取建议方式?

四是点名批评刘少奇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以陶尚行笔名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刘少奇的这篇文章是十大纲领的具体化。刘当时任北方局书记,与毛泽东配合默契,成为中共华北地方党中毛的有力的支持者。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和五月十七日至六月十日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毛泽东都安排刘少奇作报告,开始树立刘少奇的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形象。王明点名批刘,主要用意在于制止毛派势力的增长,叫高级干部们知所趋归。由此可知,王明批毛有政见的不同,骨子里是争当中共的领袖。

由于王明有共产国际作后台,许多问题说是传达国际的意见,颇有迷惑作用,获得了相当多数的支持。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话,坚持自己的观点,树起了另一面旗帜,使会议没有就王明的意见作出决议。会后彭德怀感到两位领袖意见不一致,问主持会议的洛甫:‘回去怎么传达?’洛甫说:‘由书记处写一个统一的传达大纲。’统一的传达大纲,冲淡了王毛的分歧,因王明代表国际,王的意见是占主导地位的,如强调‘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等等。

这次会议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王明的提议下,中央政治局于十二月二十二日作出了《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通知全党,成立,‘七大’准备委员会,‘准备委员会由下列同志组织之’:

1 毛泽东 2 陈绍禹 3 朱德 4 周恩来 5 项英 6 张闻天 7 张国焘 8

秦邦宪 9 赵容(按:即康生)10 廖陈云(按:即陈云)11 王稼祥 12 彭德怀 13 任弼时 14 邓发 15 刘少奇 16 何克全(接:即凯丰)17 林祖涵 18 吴玉章 19 董必武 20 徐特立 21 曾山 22 张鼎丞

23 陈毅 24 杨靖宇 25 高岗

决定说:准备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同志,书记为陈绍禹(王明)同志,为便于进行经常工作,决定在准备委员会下,设立秘书处,由下列同志组织之:毛泽东 2 张闻天 3 赵容 4 廖陈云 5 陈绍禹

这个准备委员会实权操在秘书处,王明认为在秘书处内他是可以掌握多数,按他的思想进行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的。在准备委员会给毛一个至尊的名义,由王明居第二位掌实权,从这个标了顺序号的名单排列中可以看出王明的用心。

这时南京已经失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在迁都过程中,武汉成为暂时的政治中心,部分军政机关迁往武汉办公。南京是十二月十三日陷落的。蒋介石于十七日在武昌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其中有这样的话:‘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蒋得知王明回国,想了解苏联和斯大林对中日战争和国共合作诸问题的态度,特邀王明赴武汉一谈。所以政治局会议结束以后,王明便和周恩来、博古、邓颖超、孟庆树等到武汉去了。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设在今汉口长春街五十七号,一所四层楼的建筑,原为大石洋行。中共长江中央局也将秘密机关设在这里。王明、周恩来一行在这里下榻。

十二月二十一日晚,王明、周恩来、博古会见蒋介石。先由王明介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抗战形势、两党关系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周恩来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议定共同纲领、中共在武汉出版日报、扩大和改造军队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蒋介石对谈话表示满意,告以今后两党关系问题与陈立夫商谈,最后对王明表示青

睐,要王明‘在汉相助’。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因为代表团与长江局在组成人员上大致相同,为了工作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央长江局。成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机关组成:①参谋处,叶剑英任参谋长;②秘书处,李克农为秘书长;③民运部,董必武为部长;④组织部,博古为部长;⑤党报委员会,王明为主席。

王明在汉期间,以中共领袖的姿态,广泛结交各界人士,出席各种会议,做了许多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工作,反对破坏统一战线的反共言行。但也有许多右倾言论。例如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新华日报》创刊第二天,他撰写的《团结救国》的社论中说:‘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应当是大家分守的信条;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是大家工作的方针。’一月二十九日他撰写的《关于建立新的军队》的社论中提出:‘建立新的军队的目的,是要建立真正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组织、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补给、统一政治工作和统一作战计划的国防军,就是说,完全统一的国防军。’‘我军目前战略方针,似宜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这等于公开宣布否定了毛泽东已经提出并坚持实行的一套,而代之以新的一套。王明没有带过兵,没有打过仗,对军事问题只有浮浅的了解,对于自己说的话、写的文章,例如八路军交蒋统一指挥,自己也没闹清楚意味着什么?就轻率地放言高论。如果把几万红军交蒋收编了,蒋委员长哪里还需要王明‘在汉相助’!中共湖北省委在黄安七里坪办了个培养游击队骨干的训练班,为在华中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培养干部,由方毅任班主任,聂鹤亭任总队长。蒋介石对王明说:‘你们延安办了个抗大,为什么又在七里坪办训练班呢?’于是

王明给湖北省 委下命令：‘训练班不要办了。’后通过董必武的关系，在湖北建设厅办的农村合作社干部 训练班(在应城县汤池)，增加马列主义、党的建设、游击战争课，兼带培养游击队干部。蒋介石又找到王明，说‘汤池训练班将会影响统一战线。’王明把主持汤池训练班的陶铸找 去批评说：‘国民党出钱办合作社训练班，讲贷款就讲贷款，为什么搞游击战呢？’遂下令 停办。这两个小例子可以说明，蒋介石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统一指挥意味着什么？蒋介石要王明‘在汉相助’意味着什么！

特别令毛泽东不能忍受的是，王明以国际代表和中共领袖身份，对陕北发号施令起来。接连 发生了几件事情。

一是从延安发出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电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一日，第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朱德、彭德怀的命令、率独立团、特务团、骑兵营、教导队约三千余人，以阜平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摧毁日 伪组织，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政权，在浑源、广灵、灵丘、阳原、蔚县、涞源、易县、曲阳、完县、满城、平山、孟县、五台、定襄等十四个县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坚 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至十五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 阜平召开，民主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并从延安发出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 代表大会通电。王明在武汉接到通电后，立即于一月二十八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请转 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刘少奇，提出下列意见：①‘关于我军在华北驻区应遵守形式 上维持原有政权形式……此次所采取之已成事实方式，通电逼蒋阎承认，对全国统一战线工 作，将发生不良影响’，②‘以边区名义出面，在客观上帮助‘抗战胜利后是共产党天下’的谣传；③‘通电不从临汾(按：临汾为太原失陷后阎锡山第二战区司令长 官部驻地)发出，而从延安，更增加对国民党之刺激’。并以教训的口吻说：‘此事应

首先光设法取得百川之谅解，然后由阎批准，再经过阎呈报中央（按：指蒋介石）。王明对此事的认识和处理意见、是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主张的一个生动的例证。

二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文章问题。一九三八年二月六、七日，《武汉日报》、《扫荡报》接连发表关于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的反共文章。针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王明致电中央书记处并朱德说：‘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

已成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一切问题，我们已到不能不答复之机会。我们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用泽东名义发表一篇二月二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经过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现用油印发各报馆、杂志及通讯社，明日新华日报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毛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先事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据王明后来说，他起草的这篇用毛的名义发表的谈话，宣传效果还是很好的。‘蒋在政治上受了一个打击，说《扫荡报》、《武汉日报》的言论他不能负责。’‘现在各处都取消了一个政党的口号’。

三是擅用中央名义问题。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三月二十一日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未经延安同意，于三月二十四日擅自送交国民党。同时给了延安一份备案。且不说内容如何，他这种做法就是延安所不能接受的。毛泽东和洛甫收到王明的《提议》后，为补救其不足和错误，于三月二十五日另外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表示中共中央的正统在延安，让王明送交国民党临全大会。但王明竟敢扣下不送，四月一日给中共中央覆电说：‘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

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

这第二、第三件事是王明放出的试探气球。他要试试他和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能否保持长征前那样一种关系。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他在莫斯科起草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等人的名义发表的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的宣言,毛泽东等没提出异议;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他在莫斯科起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没有提出异议。这种关系表示他的政治地位在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之上。他在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实施政治上的领导。如今时移势易,毛泽东岂能继续容忍这样一位主席之上的主席,中央之上的中央?

还有第四件事。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当中央寄给王明油印本,嘱其在《新华日报》发表时,作为主管《新华日报》的中央负责人,王明竟然抵制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还作了一首歪诗:《论持久战(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中心错误)》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

《论持久战》是继《孙子兵法》以来,中国最有价值的军事理论著作。王明恶意贬低这部著作,是因为除了他对军事问题的无知之外,再加上他争夺中共领袖的野心对毛泽东所产生的嫉妒心情,使他完全丧失了科学和理智的态度。

按照欧洲骑士决斗的规矩,王明率先扔掉了白手套,屡屡发出挑战的信号,就看毛泽东怎样迎战了。

曾经参预过领袖争夺战,由于自己的种种错误已经一败涂地的张国焘,在延安度日如年。他和两派都闹翻了,他觉得无论是毛

泽东派当权或是王明派当权,他都不会有好果子吃。王明从国际回来,没有参加毛儿盖的斗争,张国焘曾试图靠近王明。通过和王明搞好关系,缓和博古等人的恶感。但在一次谈话中王明告诉张国焘,黄超,(张国焘的秘书长)、李特(张国焘的参谋长)是托派,他路过新疆时已将这二人处决时、张国焘吓坏了。王明还说毛儿盖的争执是托派暗中作怪,张国焘是受了托派的利用,这使张更加忐忑不安。‘如果王明当了权,会下会把我也当托派杀掉呢?’这样一个问号在张国焘心中日夜萦怀。毛泽东当权,自己处境固然不佳;倘若王明当了权,则可能送掉性命,这便是张国焘作出的结论。他不露声色,暗暗筹划,准备出奔逃亡。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农历清明节的前夕,在陕西中部县黄帝陵前停了许多部轿车、摩托车和军用大卡车。上午九时,祭陵仪式开始。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陕西省政府机关团体着长袍马褂者多人陪祭,张国焘也是陪祭者之一。祭扫轩辕黄帝陵墓是抗战以来的项庄严活动。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清明节,林伯渠曾代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黄帝之陵。’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蒋介石委员长不能让毛泽东专美于前,这年派蒋鼎文代表他祭扫黄帝陵,恰好林伯渠正在西安,名正言顺地由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出来陪祭,这给张国焘造成了逃亡的机会。

张国焘是带着秘书、卫士和一个警卫班乘一辆大卡车于头天晚上到达中部县的。他以拜会的名义到了蒋鼎文下榻的地方将打算密告,蒋派亲信人员作了具体安排。

祭陵仪式完毕,张国焘对陆秘书和卫士张海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我要到西安去办事。’张海忙问:‘毛主席不是说让你祭完陵就回延安吗?’

张国焘很不耐烦地解释说:‘我到西安找林祖涵同志研究事

情。’说罢乘张海等迟疑间，钻进了蒋鼎文的专车。轿车早已升火待发。前面有摩托车开道，后面有一个警卫连分乘几辆大卡车护卫，向西安方向疾驰而去。

到了西安，张国焘在西京招待所藏了两天，拒绝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祖涵)见面。四月七日，当张国焘登上蒋鼎文给安排的去武汉的专车时，才用电话约林伯渠到车站谈话。林对张诚意挽留，劝他有什么事回延安去谈，张国焘拒绝了。林伯渠立即将张的行踪报告延安。毛泽东、张闻天致电长江局，千方百计地将张接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尽最后挽救之努力。

不知沿途在何处耽搁，四月十一日晨，张国焘乘坐的专列才到汉口。汉口大智门车站喧闹中带有紧张气氛。戴笠指挥军统的人，有穿军衣的，有穿便衣的，散布在各个出口的必经之处。李克农带着八路军办事处的少数工作人员也来了。火车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徐徐进站。李克农带领童小鹏、邱南章、吴志坚等人迅速登车，在头等包厢里找到了张国焘，请他到办事处去住。张国焘一见李克农，大吃一惊，吱吱唔唔不下车。这时戴笠走上前来，说奉委员长派遣，来接张先生。于是张国焘上了军统的车。来到大华饭店下榻。他给延安发了明码电报，略云：‘不辞而别，歉甚。愿在武汉做些工作。’

傍晚，周恩来在李克农陪同下来访。张国焘兀自吃了一惊。心想戴笠的秘密安排，又有特务在暗中保护，周恩来怎么能这么快找上门来呢？

其实，这完全是按照蒋介石的意图由戴笠有意作出的安排。蒋介石接到蒋鼎文的报告，知道张国焘在延安混不下去了，决心卖身投靠。蒋介石采取了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政策，密嘱戴笠从汉口接站起，对张不要有一点勉强，更不要给人造成劫持、绑架的印象。所以戴笠在火车站让了李克农一马。如果戴笠调动军

警宪特的力量可以抢先把张弄走,但是他不,有意让李克农等登车先见张围煮,等张明白表示不愿跟李走,他才出面把张接走。凭戴笠的神通在武汉三镇藏个把人是没问题的,但他把张国焘安排在大华饭店,并不保密,亦不阻拦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找张。蒋介石认为张国焘走到这一步,决不会有人一劝就回心转意;如果张翻悔了,把他关起来也没用,那时候他说受了军统的挟持,蒋某人反倒弄巧成拙,落个绑架共产党高级干部、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这就是李克农陪周恩来来找张国焘一点没受到阻拦的原因。

对周的突然来访,张国焘心虚极了。他取出了拍往延安电报的底稿给周看。周恩来晓以大义,希望张国焘珍惜自己半生革命的名节。一直谈到深夜。当晚周恩来住在这里。四月十二日上午,张国焘提出要去看看武汉市容,周恩来陪他一同前往。利用这个空档,李克农带人把张国焘的行李全部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张国焘从街上回来,看见行李不在了,里面有许多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文件,心情非常沮丧,只好跟周恩来移居八路军办事处。

四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张国焘多次外出访问国民党军政要人。周恩来、王明、博古等人多次对张国焘进行规劝,张执迷不悟,并提出见蒋。在周恩来提议下长江局向延安中央发电:建议中央负责人利用报告和讲话的机会说明张国焘路线应由张一人负责,注意做好原四方面军干部的团结工作,以便为最近公开反对张国焘做好准备。长江局并决定:由周恩来陪同张国焘往见蒋介石。

十六日下午,蒋介石在武昌珞珈山临时行馆接见张国焘。张见蒋卑躬屈节,开口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因周恩来在座,张不能深谈。蒋介石说了一番团结抗日的官话,就算接见完毕。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武昌汉口之间来往要坐轮渡。当周恩来带着张国焘由武昌乘轮渡回到汉口时,恰遇一熟人谈了几句话,张国焘乘机脱身,纵身又跳上了开回武昌的轮渡。他很后悔见了蒋没

能多谈。当船到南岸，他登上武昌码头时，周恩来和李克农早有安排，少校副官吴志坚守候在这里。吴志坚连拉带劝把张国焘‘请’进了一家旅馆，写了一张条子让茶房打电话给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接到电话，即带人过江把张国焘接回办事处。

四月十七日晚上，周恩来、王明、博古等长江局领导人与张国焘进行最后的摊牌。

张国焘说：‘我感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当老百姓。我家里饭有的吃，我以后再不过问政治。’

周恩来根据延安意见，给张指了三条路：‘一是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最希望的；二是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三是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你的党籍。’

张沉默有顷、表示：‘第一条根本不可能，可从二、三两条中考虑。请给我两天考虑时间。’

真像电影里的情节似的，要出什么事的时候，总是乌云翻滚，大雨倾盆。这天晚上八时左右，正常一个风雨之夜，张国焘悄悄溜出了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走向黑暗，走向深渊。并非李克农疏于防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过了两天，周恩来收到张国焘一封短信，略谓：‘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安。’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新华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大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

方针,怀疑中央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五月六日,张国焘在《扫荡报》发表《敬告国人书》,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因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张国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将张国焘叛变经过和关于开除张国焘的决定报告国际执委主席团。一九三八年九月,共产国际主席团覆信批准中国共产党开除前中央委员张国焘之党籍。‘主席团深信,张国焘背叛行为,不仅在中共队伍中,而且在抗日统一战线的一切忠实的拥护者中,都会遇到完全的唾弃与蔑视。’

张国焘投靠蒋介石之后,并未得到蒋的重视和重用。将他交到戴笠手下供差遣。戴笠在军统局中成立了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由张国焘主持,其任务是专门对中共进行拉出去打进来的特务活动。开始,戴笠对张国焘寄予很大的希望,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戴将张国焘当作猎取的珍奇动物一样向朋友夸耀,宴客时必让张国焘作陪,宴前先告诉客人们:‘明天你来吃饭时,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但一年以后,张国焘的一切计划都不能兑现,不但拉不出去,也打不进来。戴笠想在延安设立一个特务据点——延安站,叫张国焘想办法。张国焘绞尽脑汁也派不进人去。当时范汉杰任第二十七军军长,驻在太行山区。张国焘派人持戴笠信件请范帮忙进入八路军防区活动,人进去了再没有回来。

延安站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后来在榆林设了陕北站，相机搜集延安的情报。戴笠责怪张国焘不肯卖力气，甚至拍着桌子训他，为什么总是做不出成绩来？张国焘遇到这种情况，无限伤感，摇头叹气。与张一起工作的秘书黄逸公说：‘戴老板骂张国焘不肯为军统卖力气，实在有点冤枉。他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成绩来。’

48 糟糠下堂 子珍含悲异域 红袖添香 江青直上青云

贺子珍伴随着毛泽东走完了漫漫长征路。

到了瓦窑堡,她又怀孕了。一九三六年底,在保安生下了一个女婴。邓颖超去看望贺子珍,轻轻地把婴儿抱起来,怜爱地说:‘真是个小娇娇。’从此,孩子的乳名就叫娇娇,这就是李敏。

娇娇四个月,贺子珍把孩子托付给老乡家抚养,固执地要进延安抗大学习。她长期给毛泽东当秘书,照顾他的生活,管理文件,总觉得自己依附在丈夫身边,没有独立的工作。她是个自尊心、上进心很强的人。她羡慕邓颖超、蔡畅这些老大姐,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受人尊敬。她要学习,要提升自己,将来能独当一面地工作,不能老依附于丈夫。

入学的这一天,贺子珍是很兴奋的。她穿起一身新军服,打上绑腿,扎上皮带,对着镜子照一照,依然是一副巾帼英雄的形象。但当她仔细端详自己的面庞时,不由地又引起了阵阵地心烦意乱,自己才二十八岁,由于长年的征战生活,频繁的怀孕和生育,负伤后十几块弹片留在了体内,当年‘永新一枝花’的风采已荡然无存了。面色由红润变得蜡黄;眼睛的鱼尾纹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眼

神也变得有些呆滞；由于过多的失血，嘴唇的颜色越来越淡，由当年的朱红而浅红而接近于白色了；头发枯槁稀疏，失去了光泽，间或有几根白发出现，拔掉了又再生；残留在体内的一小块弹片，虽然能引起同志们的敬重，但在夫妻生活中并不是爱情的添加剂。丈夫今年四十四岁，事业和年龄都在盛年，她有了自己作为主席夫人地位不稳固的隐忧。为了巩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学习和治病成为贺子珍生活中的两大主题。

抗大的学习生活是很紧张的，上课、讨论、劳动、出操，每天安排得满满的。贺子珍同大家一样，参加全部操课。这时，贺子珍已在延安凤凰山下安家，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是除了星期六外，她很少回家，平时住在学生集体宿舍里。这一方面是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另一方面，也有休养一下身体的打算，她生孩子生怕了。

这时候的延安成了革命的圣地。宝塔山弥散着诗一般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吸引着不甘沉沦和做亡国奴的大后方青年。许多男女知识分子，毅然离开大都会，抛弃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穿过国民党设置的一道道封锁线，来到延安，住窑洞，吃小米，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延安有个毛泽东，毛泽东成了他们崇拜的英雄。毛泽东也乐意和这些青年人交往。

一九三六年，小有名气的女作家丁玲从国民党南京监狱获释，在中共地下党的关怀和帮助下，辗转来到陕北，十一月月上旬到达保安。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为丁玲的到来举行了欢迎会。会后聚餐。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出席了。毛泽东即席赋词，调寄《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执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所谓‘即席’赋诗、赋词之类，其实都是诗人事先冥思苦索，反复推敲，想好了的。毛泽东也不例外。像他往常作诗一样，头天在家里构思，得句时喃喃有声，然后写在纸上，写了改，改了写，闹腾了半夜。贺子珍一看，是赠给一位女同志的。经毛泽东解释，知道丁玲是一位有名气的女作家。这首诗将在有许多中央领导人出席的欢迎会上朗诵。贺子珍是通情达理的人，对这一类正常交往并不介意，只是觉得自己文化低，越来越配不上毛泽东了。

一九三七年夏天，女作家史沫特莱和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思来到延安。丁玲和这两位外国女作家是朋友。毛泽东接见外国女作家时，由一位中国女作家作陪是非常恰当的。由于丁玲的介绍，毛和两位外国朋友稔熟了。问题出在给他们作翻译的吴莉莉（吴广惠）身上，吴是四川人，英语讲得很好，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毛泽东和这位吴小姐接近到了什么程度，很难妄断。据目击者李德说：‘由于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从中介绍，毛泽东和吴莉莉常在马海德的住处见面，关于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见面的时间总是安排在我不在场，可能马海德也不在场的时候。毛的夫人贺子珍是一位游击队员，受过伤，参加过长征。她知道上述情况，对毛进行威吓。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间的冬天，我亲眼见到在毛的房间里（不是在他的窑洞）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中国纪事》第三四〇页）当时在延安的许多老干部都知道这事。为了保护毛泽东的威信，后来也为了怕给自己带来麻烦，很少公开谈论，但私下谈论还是有的。李德说的：‘对毛进行威吓’，其具体内容据说是动了手枪，当然是比划比划，敲山震虎。但这也把政治局委员们吓坏了。贺子珍是个烈性女子，朱德、周恩来都了解她，万一她作出不理智的事情来，如何向全党全军交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经过十几年的摸索,换了好几代领袖,历史铸造了毛泽东这样一个为全党全军信赖的领袖,为 阍房之私闹出乱子来,岂不因小失大!所以,当贺子珍决心‘不跟他过了,离婚’的时候,组织上并没有勉强捏合。就在这个时候,贺子珍又怀孕了。

不能脱毛泽东对贺子珍绝情寡义,当贺子珍要出走的时候,他极力挽留,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信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信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说这番话时,充满了感情。接着,他又说:

‘我现在的情况,和在江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贺子珍在气头上,拒绝了毛泽东这些肺腑之言。一九三七年十月,她把娇娇托付给奶母,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孑然一身,到西安去了。原想转上海去治病,后因上海沦陷,去不成了,在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滞留下来。

这时,毛泽东托人给贺子珍捎来一封信和一个小木箱。贺子珍打开一看,里面装的都是她日常用的没来得及带的小东西,里面还有一把延安造的小刀,是她经常切削水果用的。捎东西的人告诉贺子珍:‘我都要出发了,毛主席又想起这把小刀,亲自放进去的。毛主席说,你在西安住一段早点回延安去。’

贺子珍也惦念自己的丈夫。她想到,这次出来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的毛毯带出来了,他的被子更单薄了,凤凰山窑洞是很阴冷的。她上街买布买棉花,亲手缝制了新棉被让人给毛泽东带回去。她继续在西安住下来,平复心灵的创伤。后

来听说洛甫的夫人刘英得了肺病要去苏联医治,同去治病的还有在战争中丢了一条胳膊的蔡树藩,断了一条腿的钟赤兵(就是贺子珍救的那位团政委)。贺子珍给延安‘组织上’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他们一起同往苏联。

毛泽东见了贺子珍的信,同洛甫商量,作两手准备:一方面给西安办事处发电报,同意在赴苏治病人员的名单里,添上贺子珍的名字。另一方面又给西安、兰州办事处的林老、谢老发报,希望他们好言劝慰贺子珍,使她自己打消去苏联的念头。但林伯渠、谢觉哉和夫人王定国等苦口婆心地劝说,也没能留住贺子珍。贺子珍有一种倔犟的逆反心理:为什么刘英能去我不能去?另外她想:也许出国学习几年回来能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但贺子珍忽略了她是发表了离婚声明离开延安的,毛泽东能等你吗?

到了新疆,中央又给驻新疆办事处来电报,要办事处通知所有候机赴苏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大概是毛泽东的最后一着:全部返回,你还能不回吗?结果,刘英等应召返回了,贺子珍一个人留在了迪化等飞机。一九三八年一月,她乘飞机到了莫斯科。她失掉了最后一个和毛泽东和解的机会。

贺子珍为自己的负气使性、死不回头付出了悔恨终生的代价。晚年她回忆往事时说:‘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到了莫斯科,贺子珍就去医院检查,要求动手术取出身上和头上的所有弹片。苏联医生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深嵌在她的头部、背部和肺部的弹片,已经和头骨、肌肉、肺叶长在一起,弹片不可能也不必要取出来了。贺子珍很失望。这些弹片,直到贺子珍去世,始终留在她体内。

不久,她分娩了,生下一个男孩。一位苏联老妈妈,照顾她坐

月子。满月以后，她把孩子送进婴儿室，自己进了东方大学，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她不愿以毛泽东夫人的名义出现，起了个假名字，叫文英。

杨开慧生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这时已在苏联。她以妈妈的身份去认了这两个孩子。开慧遗下的孩子还有一个小三叫岸龙。一九三一年春，孩子的外婆和舅母把三个孩子送到上海交给了毛泽民。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三兄弟进了中共地下党办的大同幼稚园，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年余，在此期间岸龙患紧口痢夭折。后因地下党遭破坏，大同幼稚园解散。岸英、岸青被地下党员董健吾收养。董健吾就是送李德和斯诺进入苏区的那个王牧师。一九三六年春，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王学文和董健吾商量，决定把岸英兄弟送到苏联去。经过联系，一九三六年六月，乘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出国考察的机会带岸英兄弟出国。冯雪峰派地下党员杨承芳以李杜将军秘书的名义护送。他们乘船从上海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地中海，于七月底到达法国的马赛，改乘火车到巴黎，经苏联领事馆通知莫斯科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派人将岸英、岸青接到苏联，进入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东方大学离国际儿童院很近。每到周末贺子珍都把岸英、岸青兄弟接来，加上自己刚生下不久的孩子，母子四人团聚。贺子珍把有限的生活费买些糖果给孩子们吃，替毛泽东尽亲子之情，看到孩子们快乐，她也感到安慰。

这时贺子珍又接到一封毛泽东要她回国的电报。贺子珍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她在苏联生了一个男孩，见到了岸英和岸青。关于回国问题，申述自己的意见说，学习既已开始，不能半途而废，要等两年学习结业再回来。语气是和解的。

贺子珍没有想到：一个上海明星闯入了毛泽东的生活圈子……这就是江青。

江青,山东诸城人。父李德文是诸城县一个小地主,有土地一百二十亩,雇有长工和短工。母亲是二房小老婆,没有留下姓名,一九一四年生下江青,乳名李进孩。因李德文嗜酒凶狠,动辄打骂她们母女,后来冲突到在家不能存身的地步,进孩娘带着孩子到诸城首富张发祥家当女佣。张家四少爷叫张叔平就是后来成为中共要人的康生。进孩八岁进入诸城县县立高等小学堂时改名李鹤。张叔平是这所学堂的教师。一九二六年,云鹤十二岁时来到天津姐姐家,姐夫王克铭是东北军军官,家中有佣人、勤务兵,生活优裕。姐姐不做事,每天带云鹤不是逛商场,就是看戏、看电影,云鹤受到都市风光的薰陶,羡慕银幕上的明星,决心当演员。十五岁时回到济南,投考省立实验剧院,因容颜艳丽,身材苗条,嗓音圆润被录取。受到山东戏剧界知名人士、实验剧院院长赵太侗和他的妻子俞珊的赏识。十六岁登台演出,结识捧她的纨绔子弟裴明伦,很快成婚。不久,和丈夫、公婆闹翻。结束了第一次婚姻,离济南去青岛。当时赵太侗在青岛大学代理校务。李云鹤频繁看望老师、师母,在青岛大学图片馆谋得图书出纳的职务。赵夫人俞珊,有内侄俞启威,在青岛大学读书。启威思想进步,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姑妈家里与云鹤结识。一九三三年春节他们结婚。几乎在同时,俞启威介绍李云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七月,俞启威的地下工作者的身份暴露,被青岛国民党当局逮捕。由其在国民党政府航空总署任署长的叔父俞大维出面保释,紧急转移到了北平,从此和云鹤失掉了联系。这俞启威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做过天津市市长的黄敬,一九五八年在广州跳楼身亡。

一九三三年秋,李云鹤离开青岛,乘轮船来到上海,因有赵太侗的介绍,结识名导演史东山,靠史的引荐进入上海文艺界,她改艺名为蓝苹,因做地下工作,又用过李云古、李鹤等化名。参加演出的第一个话剧是果戈理的名著《钦差大臣》,饰演‘告状妇人’,虽

是配角，但她演得很成功。

那时候地下党是单线联系，她离开俞启威，不仅失掉了丈夫，也失掉了组织关系。到上海重新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团里分配她在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当教员，参加一些外围秘密工作。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一天，她奉组织命令，到兆丰公园和团中央地下交通乐若接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关押在上海公安局拘留所。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工人员先大启、赵耀珊负责审讯她，在刑讯威逼下自首。

四十三年后，即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八日，先大启亲笔写了江青自首经过的材料：

李云古，女，山东人，左翼文化组织成员。一九三四年下半年被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区逮捕。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在伪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我参加过劝降谈话。有一次赵耀珊迫使李云古自首，打李一个耳光，我以伪善面孔劝李自首，说：‘你的问题很简单嘛，只要转变就好了。’当时，李表现很可怜的样子。以后李云古就自首了。由训练股长阎松年和赵耀珊经办了自首手续。李的自首登记和保证书，由我报送了南京特工总部。

出狱后，她对组织隐瞒了自首的事情，好在她不知道更多的党内秘密，所以没有因为她自首连带地受到损失。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首次在金城大剧院公演，蓝苹扮演主角娜拉，海报上蓝苹、赵丹、金山并列。从此，蓝苹在大上海出了名。后又跻身电影界，演过《狼山喋血记》、《王老五》等影片。

一九三六年暮春，蓝苹同苏州才子、编剧、导演兼戏剧评论家唐纳结婚，赵丹同叶露茜结婚，顾而已同杜明洁结婚。大明星婚嫁

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总前委使用华东局电台,与两个野战军及三野四个兵团联络,三野各兵团凡有关作战事宜的电报,除发粟张外,愿同时发给总前委。

四月三日,毛泽东批准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后因国共两党和谈,总攻时间推迟。十七日,毛泽东在给总前委的电报中说:‘南京方面认为我军渡江有很大困难,他们不相信我军能够大举渡江。我们估计他们二十日以前可能不理我们,要看一下我军能否于二十日以后真能渡江。’毛泽东于十八日下达总攻命令:‘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四月二十日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体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中共华东局和中原局领导地方党和政府竭尽全力,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进行规模巨大的支前工作。‘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船有船。’

尽管国民党军焚毁和凿沉了一些民船,沿江船民巧妙地为保护船只进行了斗争。当解放军要渡江作战的时候,人民献出了九千四百多条船,有万余名船工随军参战。山东、苏北组建了十六个民工团随军服务,军队打到哪里,他们就支援到哪里。

四月二十日晚八时,谭震林指挥中集团第一梯队四个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冒着敌舰和江防炮火的拦截,首先起渡,迅速占领了一些江心洲,并突破荻港至铜陵段敌军防线,打退了敌军多次反

衬衣领子翻出来，长发齐肩，留海复额，一对水灵灵大眼睛，立即使自己淡雅中透出秀丽，显得与众不同。她追求过在宣传部工作的二十七岁的朱光；又和鲁艺的高级教师徐某热恋过；王稼祥从苏联治病回来，江青对这位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也曾下过功夫，但都没有成功。江青投向革命圣地时，康生早已在延安。但地位悬殊，睹面无缘，江青并不知道康生是谁。一九三八年秋季的一天，江青在延河边散步，与康生邂逅相遇。江青立即认出来这是张家四少爷、自己在诸城高小读书时的张老师。她举止适度、热情而有礼貌地上前叫‘张老师’。康生一怔，立即从尘封的记忆中找到了那个叫李云鹤的小姑娘，主动握手为礼，庄重地说：‘我现在叫康生。’面对这个如花似玉善解人意的诸城姑娘；他的大脑迅速运作着：贺子珍出走，数请不归，毛泽东帐中寂寞……

江青因为在上海被捕问题，组织部左一次右一次地谈话，感到心虚恐慌，寻求老师兼老乡的政治局委员保护，几次往康生的窑洞跑，康生秘授机宜。

鲁艺有位京剧爱好者，叫符律衡，以票友的身份登台演出过。虽韵白清楚，但日常生活中说话结巴。口头语是‘啊，这个，这个……’半天接不下去，就得了这么个绰号。平常江青正眼不看符律衡，这天忽然热情打招呼：‘这个，这个，我拜你为师好吗？’符律衡受宠若惊，连忙抱拳：‘啊！这个、这个……不敢当。江青同志是上海有名的大明星，我怎么敢收你这个徒弟呀！’

‘得，得，你别摆架子了，我说的是真的。据我了解，在延安演京剧准能叫座，我们合作排两出京戏怎么样？’

从这天起，符律衡就教江青唱《汾河湾》、《苏三起解》和《打渔杀家》。江青苦学苦练，比在上海演《娜拉》还卖力气。

彩排这天，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来看戏了。彩排一结束，康生登上舞台和演员一一握手。对演员们说：‘你们好好排

练,等正式演出的时候,我把毛主席请来,让他看看你们的演出。’

公演这一天盛况空前,座无虚席。中央首长大部分来了。毛泽东坐在中间,康生坐在他身边,介绍解说。打头的戏是《打渔杀家》,这是演梁山好汉的后代革命造反的戏。江青饰萧桂英,符律街饰萧恩。江青在老师的暗示下,带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生活追求来演这出戏,全神贯注,情绪饱满,扮相出众,字正腔圆,一亮相就博得了满堂彩。康生见毛泽东直视舞台,带头鼓掌,心想:第一步目的达到了。当演出结束,毛泽东登上舞台接见演员和江青握手时,康生在旁介绍说:‘她叫江青,是从上海来的电影演员。’毛泽东望着江青说:‘你饰萧桂英,演得很好啊!我们欢迎像你这样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来解放区参加抗日运动。’

江青是个举一反三的聪明人。按照老师的指点,她知道往下该怎么做。一天,黑板上写出通知,明天上午九点毛主席来鲁艺作报告,讲题是:《世界观和文艺的关系》。她头天晚上到课堂上看了地形,选了一个最佳位置。第二天吃完早饭,没等站队集合,她一个人提着马扎提前到了课堂,占据最佳位置。毛泽东在台上作报告扫视全场时,正视左视和右视,都能看见江青。江青的直觉是:毛泽东愿意多看她几眼。当毛泽东讲完一个问题时,一张条子从台上传到了台上。毛泽东展开一看是:‘毛主席,我还有一个听不懂的问题,能提吗?江青’字体娟秀飘逸。毛泽东当场表扬了她,允许大家提各种问题。江青选了个有深度的问题,想让毛泽东了解,她这个明星,不是光会演戏,对人生哲理的探索是相当深的哩!

江青带着第二个回合的胜利又去找她的老师:‘我能不能到主席家里直接请教他一些问题呢?康生镜片后面的小眼睛眨了几眨,说:‘主席那里警卫、秘书,一道道关卡,你恐怕进不去,这样吧,我给主席打个电话,帮你安排一下。’‘感谢老师!’江青心花怒放。康生嘱咐说:‘以后只说我们是同乡,不要说我当过你的老师。懂

吗?’老谋深算的康生,既要当这个牵线人,又不能明当,他要布设一种条件,让毛泽东自己作出决定和选择。

经过康生的通气安排,江青到凤凰山窑洞来看毛泽东。江青虽只二十四岁,但闯过上海滩,是钟鼓楼上的麻雀——受过大惊的人物。她举止言谈得体,既表现了对伟人的热爱,又没有轻薄和风骚,而是近乎少女的一片纯真。她谈了自己的家世,谈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包括婚姻的变化,一切直言无隐。当然是按有利于她的角度:她是一个从农村恶劣的家庭环境中奋斗出来,受欺凌,受损害,有良心和正义感,在强手如林的上海一举成名,追求革命和爱国 的文艺工作者。毛泽东动心了。留她吃的晚饭。临走,毛泽东说:‘我这窑洞的门,对你是敞开的。只要你愿意来,随时都可以来。’并派警卫员送江青回去。路上,江青详细询问主席的生活习惯、脾气、爱好等等,一一谨记在心。第三个回合,江青又胜利了。

从此,江青三天两日往凤凰山跑。贺子珍出走了,这是多么好的时机呀!她要不断地让毛泽东对她的感情升温,她要运用自己的魅力,征服一个叱咤风云的伟人。她相信,毛泽东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男人的弱点,她要用自己倾国倾城之美,去慰藉毛泽东的寂寞情怀。一个爆炸性新闻在延安传开了。

从前线回到延安的朱德闻之十分不安。他忧心忡忡,会不会是国民党巧设‘美人计’?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在党的领袖身边,这人太危险了。在延安高级领导人当中,只有他有资格去直接过问毛泽东的私生活,他们是共同艰苦创业、百战余生的战友。这天,朱德来到凤凰山,摒退警卫人员,像位兄长一样问道:

‘润之,听说你要和江青同居,此事当真’

毛泽东点点头说:‘总司令,贺子珍跟我动了手枪,她出走转眼一年了,我写信、捎口信、打电报多次叫她回来,她就是不听,我们的感情破裂了。江青是个文化人。蜚短流长的话我也听到一

些,只要地政治上没问题,过去她那些生活上的事我不计较,我看她还善解人意,通情达理。玉阶兄,我也是凡夫俗子,也得有个老婆啊!你和政治局的同志谈一谈我的意见,审查一下江青的历史,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二位老战友推心置腹谈了一阵,朱德告辞出来。朱德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和要求告诉周恩来。周恩来致电中共江苏省委,了解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情况。

一九七九年,当年的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劫后余生,住在上海东湖宾馆,与去看望他的老部下陈修良说:‘我们弄到这种地步,同在江苏省委时期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有关。一九三九年(按:应为一九三八年)周总理曾打电报给江苏省委,了解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情况。当时,我们省委负责人联名回电,一致反对,认为江青历史上不清白,生活腐化,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这个电报落在社会部长康生手中,当然江青马上知道了。周总理从中作梗,江苏省委负责人又一致反对,埋下了仇恨的种子。’(陈修良:《不尽的情思》,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联合时报》)

从刘晓的谈话中可以得知:江苏省委和周恩来反对毛江结婚的,但并没有掌握江青叛变自首的材料,这就很难改变毛泽东要娶江青的决心。那时候,如果发现江青自首变节过,毛泽东不会娶她;毛要娶,政治局也不会同意,如果政治局不同意,毛泽东也还是要服从的。

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毛泽东的请求时,以多数通过批准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但对江青有约法三章: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毛泽东和江青表示同意和遵从中央的决定。他们结婚了。为了表示一个新家庭的组成,在江青的怂恿下,他们离开凤凰山,迁到了杨家岭。共三间窑洞,地面铺上砖,墙用白灰水刷过。房间尽

是毛泽东的特色,唯一标志江青到来的是她从上海带来的一架留声机。‘碧纱无月春调瑟,红袖添香夜着书。’毛泽东得遂所愿。江青从此成了红色中国的第一夫人。这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远在异国他乡的贺子珍,把思念丈夫的心情放在了新生的儿子身上。毛泽覃牺牲了,小毛丢了,就只有一个儿子了,毛泽东还没看到,还没给取个名子,她要好好抚养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不幸,莫斯科的严冬,孩子患了感冒,婴儿室医疗条件差,没有护理好,转为肺炎,还没来得及送往医院抢救,就夭折了。

贺子珍万分悲痛。把孩子送到莫斯科郊区公墓,孤苦伶仃,埋葬了儿子。

她还没有从丧子的哀痛中苏醒过来,园内又传来消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了。这两个打击她承受不住,简直要疯了。

49 六中全会 绍禹争雄初败阵 二期抗战 泽东宏论率群伦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王稼祥赴苏治伤，在莫斯科皇宫医院施行了手术，取出深嵌在腰骨上的弹片，清理了沾连化脓的结肠。手术非常顺利，伤口很快愈合。

在他疗养康复阶段，接替康生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利用各种机会，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介绍中国革命，介绍长征，介绍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作用。由于王稼祥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又亲自参加了长征，遵义会议后作为周毛王三人团的一员参与了指挥和决策，他的介绍对共产国际领导人了解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改变对毛泽东的偏见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三八年春，中共中央接受王稼祥的要求，同意他回国工作，改由任弼时接任驻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

六月，共产国际执委员会会议，专题讨论中国的革命形势问题。会议由季米特洛夫主持。王稼祥应邀作了发言。任弼时也汇报了中国抗日战争最新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是正

确的。令王稼祥将决议案带回，亲自交给中共中央。在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专门约见王稼祥和任弼时。代表国际执委会对中国党的领导有所评论。季米特洛夫说：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目前仍然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不过要警惕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悲剧。‘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

‘也应该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吵了。’最后季米特洛夫责成王稼祥回国以后，向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传达。王稼祥说：‘感谢国际执委会和您的信任，我一定牢记您的指示，保证负责传达。’临别，季米特洛夫握着王稼祥的手说：‘请不要忘了见到毛泽东同志，一定要转达我个人对他的问好，表示我对他的良好祝愿。’

七月。王稼祥携带着苏联秘密援助中共的一小批武器物资，还有三十万美元和一批法币，乘飞机进入新疆迪化。迪化设有苏联援华物资转运站。转运站派出两辆卡车，在一个班苏联红军士兵保护下，王稼祥将这些东西带往延安。中途遇匪，翻车；九死一生，王稼祥终于回来了。

毛泽东、张闻天等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对王稼祥平安归来给予了热烈的欢迎。王稼祥首先将国际的决议，以及从苏联带回的武器、物资、现金清单，面交毛泽东。然后郑重传达了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口头指示。毛泽东听了非常兴奋，与张闻天商定，由王稼祥在政治局会议上和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传达。不久任命王稼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

在武汉的王明接到中共中央开会的通知后，发往延安一份电报，提出全体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都到武汉去，在他那里举行

六中全会，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应该由他来主持。

毛泽东看到王明的电报。哂然一笑，说：‘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跑到国民党的地区去开？我就是不去。’王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给王稼祥单来一电，要王稼祥速到武汉向他汇报。

王稼祥立即拿着电文到杨家岭，走进毛泽东的窑洞说：‘泽东同志，我特地送份电报给你看，这是王明同志从武汉专门给我发来的，他简直异想天开！’毛泽东接通电报看了，问道：‘你对此如何打算？不去，当然不去。不仅不去，还要批评他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我准备回电给他，电文拟好了，请看行不行？’王稼祥说着又把回电底稿送过来。

毛泽东接过看了，说：‘好，我同意，马上去发，催他快回。长江局机要室接到王稼祥复电，立即送给王明。’

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明看罢，知道时移势易，人事全非，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只好打点行装，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等一起于八月二十九日动身回延安。

九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先开政治局会议。由洛甫主持。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历史档案关于这个报告记录是：

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只有党的团结,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

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王稼祥这时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完全转到了毛泽东一边,讲到最后,特别加重了语气。共产国际的指示一言九鼎,中央政治局立即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连康生都急急忙忙地和王明划清界限,王明被彻底孤立了。中央政治局撤销与中央分庭抗礼的长江局,王明留延安工作。另设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东南局以项英为书记,北方局以杨尚昆为书记,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八人,各方面领导干部五十三人。

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共开了三十九天,是在全党全军(按:指八路军、新四军)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全党全军的政治、军事路线统一到毛泽东的政治军事路线上来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由张闻天致开幕词,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张闻天作组织问题报告,陈绍禹作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秦邦宪作青年工作报告,张浩作战工运动报告,项英作新四军工作报告,刘少奇作北方局工作报告。陈云、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林伯渠、吴玉章等在大会发言。刘少奇开始脱颖而出作组织工作结论,毛泽东作总结论,王稼祥致闭幕

词。

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全面地、系统地、深刻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军事战略、政治路线以及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如何巩固党、建设党问题。

在军事战略上，他精辟地分析了全国战局，预见到相持阶段的到来。所谓《论新阶段》，就是论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的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认为：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将表现于在敌则进攻，相持，退却；在我则防御，相持，反攻，这样三个阶段之中。由於敌强我弱（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故出现了敌方进攻，我方防御的第一阶段。不说退却而说防御，是说以战略的运动防即节节抵抗的姿态而表现其退却，不是一下子乾脆退却。但又由于在敌则小国、退步、寡助，在我则大国、进步、多助这些特殊的条件，我之英勇抗战又使敌在进攻中受到分散的困难与消耗的损失，而不得不于一定时机结束其战略上的进攻，转入军事上保守其占领地而从政治上与经济封锁上向我进攻的阶段。此时敌虽消耗，但一时尚未消耗到使之转入失败的程度；我虽坚决抗战与各方面向前进步，但一时也难进步到足以转入反攻驱敌出国的程度。依上诸因，一个双方相持的第二阶段或中间阶段，就形成了。

毛泽东这一段话，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所起的作用。从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广州失守，共十五个月的时间，是中国抗日

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动员了二百个师的兵力,担负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抗击了日本侵略军的绝大部分,是全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日军付出了伤亡四十五万人,耗资一百亿日元的巨大代价,也未达成预定的战略目标。国军先后进行了淞沪、忻口、南京、徐州(含台儿庄大捷)、武汉等多次大会战及一系列保卫战,表现了蒋介石国民党一定程度的抗战决心和抗日积极性,挫败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振奋了民族精神。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英勇献身,出现了一批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如卢沟桥抗战壮烈殉国的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二九师师长赵登禹;忻口战役壮烈殉国的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淞沪战役最后阶段谢晋元团长率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以死报国的英雄群体,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应当受到后代子孙的钦敬。武汉保卫战从六月十二日日军在安庆登陆到十月二十七日武汉失守,历时四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日军死伤二十万,共击毁敌舰六十七艘,击毁敌机二十三架。击伤敌机十六架,击落敌机六十三架,击伤敌机九架。苏联援华空军参加了战争,库里申科大队长碧血洒长空死在中国。国军于是役牺牲近四十万人。

蒋介石统帅部在战略战术指导上的失误,主要表现为在强敌进攻面前,不是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而是采取了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不是集中兵力打运动战,而是分散兵力打阵地战,不是发动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而是单纯依靠正规军打仗。虽然有些部队不乏忠勇爱国之士,付出了巨大牺牲,但由于战略指导的失误,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而使自己处处陷于被动,遭受一次又一次的严重挫折。在十五个月的时间内,国军从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一直退到四川,造成正面战场一泻千里的大溃退。

在日军长驱直入,国土大片沦陷的情况下,八路军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挥下,抓住了有利时机,迅速大胆深入敌后,首先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太岳山和吕梁山,展开于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和晋西南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对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形成四面包围有利态势;尔后,以山区根据地出发点,进一步向冀鲁豫平原发展,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四块根据地,完成了在华北的战略展开。新四军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指挥下,也逐步深入长江南北,实现了在苏南、皖南、皖中等地区的战略展开。东北抗日联军在杨靖宇、周保中的指挥下,艰苦奋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积极牵制日本关东军,对华北、华中抗战起到了战略上配合的作用。在这一阶段中,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一千六百余次,歼敌五万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一万二千余支,收复了大片国土,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友军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由出师时的五万余人发展到十八万人,对停止日军的战略进攻,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的军事理论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的发表,从思想上武装了广大指战员。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生存和发展,是执行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的结果。由于作战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发展,毛泽东在军中威信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预言,日军武汉之后,由于‘我之正面主力军的顽抗与我之敌后庞大领土内游击战争的威胁,所加给敌人兵力不足(他不能足)与兵力分散(他不能不分散)现象上的极大困难’,日军的‘战略进攻接近了一个顶点’。

我们及全国人民必须看到这些地方,不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所震惊,赞助政府调整全国之作战。有计划地部署粤汉

路、陇海路、西兰公路及其他战略地区之作战，部署庞大敌后地区之游击战争，捉住敌人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给以更多的消耗，促使更大的分散，使战争胜利地与确定地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

在新阶段中，正面防御的是主力军，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主要的形式。但敌后游击战争在敌我相持的新阶段中，将采取一种新形势发展着。什么是游击战争的新形势呢？即第一、在广大地区中仍能广泛的发展。这是因为在我则土地广大，在敌则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只要我能坚持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并正确地指导之，敌要根本限制我之发展是不可能的。但第二、在某些重要战略地区。例如华北与长江下流一带，势将遇到敌人残酷的进攻，平原地带将难于保存失的兵团、山地将成为主要的根据地，某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可能暂时的缩小其数量，现在就应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在现在，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在将来，为了配合正面防御使主力军得到休息整理机会，为了生长力量准备战略反攻，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坚持保卫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在长期坚持中，把游击部队锻炼成为一支生力军，拖住敌人，协助正面。一般说来，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是比较前一阶段要困难得多的，我们必须预先看到这种困难，承认这种困难，不可因为前一阶段的发展容易而冲昏了头脑，因为敌人一定要转过去进攻游击战争。然而能够坚持的，一切敌后工作的领导人们必须要有这种自信心。在政治上，毛泽东提出了‘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的政治路线。

他说：

由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其中主要的两个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因此，我们的政策，无论如何要一个长期的民族统一战线，要一个长期合作，无论如何要共同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分歧与分裂，方才有利于渡过战争难关，对抗敌人破坏，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并于战后完成建立新中国的任务。

所谓‘长期合作’主要是国共两党的合作。毛泽东指出：‘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 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抗日战争时期三民主义的内容应是：

在对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与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的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共产党有自己的党纲与政纲，其党纲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与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民主革命政纲，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但对于国民党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三民主义纲领，则是基本上没有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使国民党、共产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认为：‘为了保证长期合作，还要解决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他提出了三种组织形式：

第一种，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

存其独立性,但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同。

第一、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都是公开的,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

第二、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有要求入党者,劝他们顾全大局,不要加入。

第三、如果我们的青年党员得到国民党同意,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话,也是一样,不组秘密党团,不收非共产党员入党。用这种办法,可以大家相安,有利无害。这是第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第二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就是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先生作这个联盟的最高领袖,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为着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我们也是赞成的。这种形式,我们很早就提议了,可惜还没有实行。

第三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就是现在的办法,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之问题。但这种形式太不密切,许多问题不能恰当的及时的得到解决。例如许多大政方针之推行,下级磨擦问题之调整,都因没有一种固定组织,让它延缓下去,所以这种办法对于长期合作是不利的。然而如果第一二种办法不行,这种办法暂时也只得仍之。

纵观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共产党是具有诚意的。为了共同抗日的民族大义,尊蒋为‘最高领袖’,真心实意地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战。不仅公开宣传文字是支持蒋介石的,在党内领导人文电往还中也是真诚支持蒋介石的。如武汉吃紧之时,一九三八年八月六日毛泽东起草了张闻天、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毛泽东致武汉长江局领导人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叶剑英的

秘电：‘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与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总方针之基础。请加注意为盼。’而蒋委员长在堂皇宣言的背后，在给部下的文电和内部文件中，则是充满杀机的阴谋策划，这些在下一回我们将要提到。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中共多次提出与蒋讨论。一九三七年三月下旬，周恩来来到杭州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直接向蒋表示国共合作的诚意。蒋介石却大模大样地表示：‘不要提国共合作，只要提与我合作就行了。’要中共方面想出一个与他永远合作的办法，并示意可以把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蒋介石在武汉失守以前采取的是‘溶共’策略，企图通过‘合作’，将共产党和红军全部吃掉。周恩来表示，还是两党合作，制定一个共同纲领，作为双方行动的准则。蒋要周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返延安与毛泽东等商酌起草了共同纲领。六月四日，周恩来带着纲领草案上庐山见蒋。蒋对共同纲领表示不感兴趣，提出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由他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提出同等数量的干部，共同组成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他任主席，并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共同纲领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同盟会在进行顺利时，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并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的关系。并提出：‘精毛先生、朱先生出洋’。想用解决第十七路军送杨虎城出洋的办法解决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以后、蒋介石始终未对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共同纲领表示意见，置之高阁，悬起来了。很显

然，蒋介石要的是共产党无条件的‘溶合’，化掉共产党；毛泽东坚持国共两党有条件的合作。维持一种脆弱的、不巩固的两党之间的合作，亦即毛泽东说的第三种形式。

十月二十日王明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在国际指示的压力下，他表示臣服于毛泽东，不再竞争领袖。他说：

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

但在政策路线问题上，王明重申：

‘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刘少奇在组织工作结论中针锋相对地批评了王明的口号。毛泽东在十一月五日所作的结论中表扬了刘少奇，毛泽东说：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一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新后奏，例如设置行政导员，派兵去山东之颠，先‘经过’则行不通。……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他，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频。有些则暂时不奏不斩，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愿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

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针对王明提出过的‘七个统一’即把八路军、新四军交蒋介石统一指挥的主张,毛泽东在总结论中还专讲了兵权问题的重要。他以特有的锋利和深刻的语言提醒全党说:

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

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谭延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军阀。他们都懂得中国的特点。

中国也有些不要军队的政党,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进步党,但是它懂得必须靠一个军阀才有官做。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附蒋的是进步党之一部转变而成的政学系),就成了它的靠山。

历史不长的几个小党,如青年党等,没有军队,因此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

在谈到干部路线时，毛泽东批判了宗派主义，为在中央苏区受‘左’倾路线打击的萧劲光，以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六中全会组织上没有大进大出，政治局的组成因张国焘叛党而去，由原来的十六人变成了十五人，他们是：

毛泽东 周恩来 朱 德 张闻天
陈 云 康 生 陈绍禹 刘少奇
王稼祥 任弼时 项 英 秦邦宪
彭德怀 邓 发 何克全

书记处的成员仍是五人，只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位置对调，毛泽东排在榜首，其名单排列是：

毛泽东(主持日常工作)
张闻天
陈 云
康 生
陈绍禹

从此，结束了在名义上张闻天在党内负责的历史。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兼任中央书记处 主持日常工作的第一位书记，实际是第一书记或书记的地位。

50 秘密反共 蒋介石隐身重庆 公开降日 汪精卫开府南京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曾将会议主要文件和毛泽东致蒋介石信送给国民党方面。蒋阅后产生错觉，认为可以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内，实现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会见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时说：‘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当陈绍禹说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时，蒋说：‘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蒋介石又约见周恩来，重提统一两党之事，希望能在国民党五中全会期间得到中共中央的明确答覆。为此，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内称：‘敝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及毛泽东同志代表敝党致先生信，均诚挚具体地提出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之主张和方法，用意所在，无非欲与先生及国民党同志，相见以诚，相守以信，积极地拥护先生及政府之领导，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团结全国，渡过难关，对抗敌人阴谋，消灭汉奸毒计，准备我之

反攻。此物此志，凡在国人，已昭然共见。’‘但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蒋介石阅此覆电，大失所望，乃决心‘势不足以化则除之。’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就在五中全会前夕，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国民党营垒发生了丑闻——汪精卫逃跑了。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行政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是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为了遮丑，蒋介石在国民党纪念周上宣布：‘汪因病告假四月，赴河内治疗。’以欺蒙舆论。十二月二十九日，香港《南华日报》发表了汪氏的《艳电》，公开告诉国人，他出国不是去治病，而是响应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原则，决心当汉奸。

汪精卫的叛变投敌，表明国民党内亲日派与亲英美派的公开分裂，五中全会上主和的空气甚浓。亲英美派的代表人物蒋介石虽仍然谈抗战，但降低了调子，说他坚持抗战到底的气‘底’，就是要‘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就是说可以承认伪满洲国，承认‘华北自治’，只要能保存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利害关系最大的华中与华南，即准备牺牲半个中国与日本罢战言和。而承认伪满洲国和‘华北自治’，就与近卫三原则中的两条有了共同语言，剩下一条是‘签订日华防共协定’。所以蒋介石把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方向引导到防共、反共上来。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照理，应大张挞伐汪精卫，汪氏言行正是丧党魂、失党德、坏党基的典型，不申讨汉奸卖国贼，还有什么党魂、党德、党基？但蒋总裁自有他的逻辑，据他说是共产党在敌后势力的发展，影响了国民党的党魂、党德、党基的发展和巩固，‘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才是国民党‘整顿党务’的中心任务。会议通

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会后又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置异党实施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等，并设置了各级‘防共委员会’的组织。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标志着国民党的政策已由抗战开始阶段比较积极的联共抗日，转向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革命力量迅猛发展，由于日本灭亡中国的政策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就使得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虽然积极推行反共政策，却不敢赤裸裸地破裂国共合作。因此，五届五中全会以后，蒋介石虽然继续打着‘抗日’的旗帜，但却不断制造反共借口，加紧军事磨擦。

蒋介石最头疼的一个问题是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沦陷区的迅猛发展。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组织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将沦陷的国土从日本侵略军手中夺回来，将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人民解放出来，从政治上说，这本是救国救民的好事；从军事观点来说，牵制了日军的兵力，策应了正面战场国军，也是无可非议的。

对于这样一个明如白昼的问题，秘密反共文件之一《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甲、问题性质之认识’是这样认识的：

八路军将利用沦陷地方中央统治力量鞭长莫及之情势，扩大其自由行动之范围。结果中国抗战形成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之局面，日本与共党相反相成，本党统治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又召开了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蒋介石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其进攻的重点集中在三个地区。

陕甘宁边区：一九三九年底，蒋介石令其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部，陆空联合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占据了淳化、邠、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宣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非法组织’，‘绝对不能令其存在’，‘向八路军收复失地’等反动口号，并集结大军，准备进攻延安。

晋西区：抗战初期，山西地方群众抗日团体‘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在中共的推动和帮助下，建立了抗日决死队，又称新军。抗日决死队在薄一波等领导下，发展到五万多人，在晋西、晋西北、晋东南等地配合八路军抗日，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和阎锡山企图解决新军蓄谋已久。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初阎对其高级将领说：‘共产党、八路军势力日益壮大，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与之合作，我晋绥军将无立足之地，现在我们只有解决新军、牺盟，采用日本所提中日提携办法，达到生存之目的。’同时派亲信将领梁培璜、吕瑞英为代表到临汾与敌清水师团长进行‘临汾谈判’，要求日军配合行动。其阴谋计划是，集中晋西六个军，在日寇配合下，消灭决死第二纵队，然后消灭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委任陈长捷为‘讨叛’军总司令。陈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发出密令，分三路向新军进攻。南路为第六十一、第八十三军及警备军第七十三师，由陈亲自率领，进攻隰县之义泉、黄土决死第二纵队司令部；北路司令梁培璜，率第十九军及第三十军之一部，进攻隰县、孝义间之水头、川口、大麦郊一带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支队所在地；右路为新三旅等，司令崔道修，向隰县泉子坪一带出击。日军集中临汾至平遥间驻防军五千余人在韩信岭一带配合同军作战。十一月一日，阎锡山假称

要发动‘冬季攻势’，令决死第二纵队要准于十二月五日至同蒲路大举破击。该纵队受命后正在部署动员，阎军配合日军同时向其发动进攻。该纵队迫不得已，起而自卫。十二月三日，国军在永和附近袭击了决死第二纵队第一九六旅旅部，同时破坏永和、石楼等地抗日民主政权及‘牺盟会’等抗日团体，杀害洪洞县、蒲县县长及位于隰县的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这就是‘十二月事变’。

太行区：阎锡山秘令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乘八路军对敌进行邯长路破击战之机，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至二十六日进攻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并破坏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陵川、壶关、长治等七县抗日民主政权，袭击第五专署和‘牺盟会’等机关，杀害共产党员及其他进步分子五百余人，绑架一千余人。一九四〇年一月中旬，蒋介石下令八路军退出太（行山）南、太岳根据地，令刘戡率第九十三军，范汉杰率第二十七军向临（汾）屯（留）公路以北进攻决死队第一纵队，以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和第二十七军一部在阎军独八旅的配合下，由高平、陵川、壶关等地出动，进攻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和决死队第三纵队，决死第三纵队四个团被解决。同时，阎锡山令第十九军之暂编第二旅、新编第二师分由晋西北、晋察冀边区南下，配合蒋军的进攻。为粉碎蒋、阎军的进攻，八路军第二一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决心集中兵力打击进攻最积极的国军孙楚部，避免与蒋军发生军事冲突。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六日在高平以西歼灭阎独八旅一部；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二日，在榆次东南、榆社以北地区，歼灭暂编第二旅和新编第二师大部，至此，蒋、阎军采取南北夹击夺取八路军太南、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企图，被彻底粉碎。

蒋介石没讨到什么便宜，心有不甘。一九四〇年二月又秘令进占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和清丰等地区的朱怀冰部（第九十七

军)和石友三部(第六十九军),再次向太行、冀南地区八路军发动进攻,夺取太南和冀南抗日根据地。为制造借口,由朱怀冰向八路军总部提出让出河北部分抗日根据地给他的部队,否则将向八路军进攻。二月下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武乡县王家峪村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朱怀冰,朱德说:‘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从日寇手里夺回来的地方,你们要占领,人民不会同意。你们要地盘,有的是地方,你们去把日寇占领的地方夺回来,不就行了嘛?如果你朱怀冰不明大义,胆敢进攻,我们一定坚决自卫。’朱怀冰奉的是蒋介石秘令,自不敢罢手,将所属部队和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的部队一起部署在北磁县、武安、涉县和河南林县地区,与退至卫河以东的石友三部一起,由南向北直逼太行山区和冀南区抗日根据地。三月四日,朱德、彭德怀指挥十七个团的兵力,在平汉路东发起卫东战役,至十五日,歼灭石友三部大千余人;五日,指挥十三个团的兵力,在平汉路西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至八日,全歼朱怀冰两个师,侯如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华北游击挺进第四纵队司令)一个旅、张荫梧(河北省保安司令)一个纵队,共一万余人。这两个战役的胜利,巩固了太行山由抗日根据地。三月七日,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文说:‘我们觉得此时应对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有所让步。在此次反磨擦斗争中,我们能够巩固山西临汾、屯留、平顺及漳河、河北大名之线,已算很大胜利’在此线以南,应与国民党休战。‘朱、彭接电后,立即下令该线以南部队北撤。

四月十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王稼祥:‘卫立煌的高级参议申凌霄于九日抵黎城二九师师部,要求河北武安县、涉县由卫立煌任命县长,鹿炳动(按:第四十军军长)军进驻武、涉两县,范汉杰(按:第二十七军军长)军进驻林县及其以北。我们意见,武、涉两县叮换县长,但庞、范不能在该地驻军。’十二日,毛、王覆电:‘同

意武、涉两县 由卫立煌派县长,向卫再让一步,但对庞军进驻坚决拒绝。目前力争八路、中央两军团结。朱总能否与卫(立煌)一晤?’遵中央军委指示,朱德于五月中旬赴洛阳拜会卫立煌。在卫举行的欢迎会。朱德致词,强调国共两党和全国军队团结的重要性,说:‘全国人民需要这种团结,国民党的大多数需要这种团结,共产党、八路军坚决要求这种团结。只有日寇、汪精卫、汉奸、投降分子和磨擦专家害怕这种团结。这种团结必须建立在进步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有板有眼,对阎锡山伸出了团结的手。据毛泽东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起草的一份致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聂荣臻等人的电报透露:‘派萧劲光、王若飞赴秋林见阎,在秋林住四天,受到极大欢迎,当萧王向阎及各方传达中共中央及八路军赞助新旧团结,拥阎抗日;赞助新军仍属晋绥军不受某方改编,巩固阎之地位并力辟一切谣言时,不但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梁化之、李冠洋等表示欢迎,即王靖国、薄右丞亦表示欢迎。’

‘我们的基本政策是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旧军力量于阎的指挥之下,不使发生不利于我们的分化,保存阎在吕梁山脉的地盘,不使某方进驻,八路军与新军亦不进驻,恢复新军与阎之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与西北之抗战。’

电中所说‘某方’指蒋介石及其中央军。蒋的策略是利用抗战削弱地方军阀,想把新军抓过去,想在山西腹地吕梁山派中央军进来。统战圣手毛泽东硬是和刚打完仗的阎锡山找到了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日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策略,对于反对顽固派的斗争有精辟论述。

毛泽东说：

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说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中国共产党人用这一套策略思想武装起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有理、有利、有节地同蒋介石国民党展开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的较量。在丰富多彩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蒋介石是一个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老手，多少新老军阀、政客败在了他的手下。唯独遇到毛泽东这个对手，他的那一套《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斗一次，他败一次；再斗一次，再败一次。

且说汪精卫投敌当了汉奸，一开始志不在小，为了树立自己的

形象,他要从老根儿上做起。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汪记‘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举行。这个地方是丁默村、李士群主持的特工总部。会场上悬挂着青天白日旗,会议开场奏的党歌还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然后是汪精卫讲演,通过‘宣言’,‘郑重宣布以反共为和平建国之必要工作。’选举出了一百多名‘中央委员’,成立了中央党部。通过这一套程序,汪精卫就算是继承孙中山的国民党正统,否定了重庆的国民党,也否定了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他由副总裁升任‘中国国民党主席’。

接下来就是组织一个汪记‘中华民国政府’,以代替重庆那个国民政府。但组府的事情却一波三折,很不顺利。原因是提出‘近卫三原则’的日本近卫首相下台了,继任的平沼与阿部内阁,对汪政权的建立并不热心。他们认为汪精卫对中国军队没有号召力,真要做到使中国停止抵抗还得跟蒋介石谈。深恐汪政权一旦建立,破坏了日本与重庆和谈的机会。于是策反汪精卫的日本特务机关把汪精卫‘凉’在那里(直至一九四〇年春米内光正任日本首相时期,汪政权才成立),又开始寻求与蒋介石接触。这件事情有个代号叫做‘桐’工作,即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四〇年九月日本军部派驻香港的铃木卓尔中佐和重庆代表‘宋子良’长达十个月的秘密谈判。

铃木——‘宋子良’会谈开始不久,诡计多端的日本特工人员从锁孔偷摄一张‘宋子良’照片,送到上海交汪精卫集团第二号人物周佛海辨认。周佛海一看照片,大吃一惊,连说绝不是宋子良,认为‘这是重庆特工人员直接向日方获取情报的一种手段;如果真是宋子良,这么重大的问题,派他也显得不够分量。’宋子良是宋美龄的弟弟,蒋介石的小舅子,设在香港的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没有政府官衔。

假‘宋子良’真名王新衡。‘宋子良’难假，日蒋秘密会谈确是真的。铃木与‘宋子良’初次接商定双方各派出代表三人。

日本政府派出的代表是：大本营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铃木卓尔中佐和今井武夫大佐。重庆政府派出的代表除‘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和前驻德大使馆参赞、现任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另以侍从次长陆军少将张汉年为预备员，以张治平为联络员。一九四〇年三月二日全体到达香港。蒋夫人宋美龄期于五日到达香港，名义是医牙。日本方面认为是‘从侧面支援中国方面的代表’，表明蒋介石对秘密会谈的重视。

三月八日，在香港东肥洋行二楼举行第一轮正式会谈。会谈前双方出示证件，确认身份。日本方面出示了陆军大臣 俊六的保证书，中国方面只有陈超霖、章友三两人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日方今井武夫事后说：‘中国方面主要由章友三发言，对主要问题一一征求陈超霖的同意，宋子良专事从中斡旋，三人中给人的印象是，真正的实力者好像是陈。’

经过第一次香港会谈，据日人记载，中国方面与日本方面的分歧表现在三个问题上：

1. 关于承认满洲国，重庆主张日、华两国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作为它的保护国。对于日本方面的反对，保留答覆，在询问重庆以后，中国避免再触及这个问题，目前以默认的态度进行。

其所持理由：满洲国在现实上已成为既成事实，即使不触及这个问题，对日本当无任何实际害处。但是中国如果一旦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当然是在预料之中，可以毫不介意。但在国民党内有旧东北系和旧西北系等强硬的坚定反对者，就难免引起国民党的分裂，造成国内大乱的局面，因而，对此问题以暂不着手为宜。

谈到这个问题时,对方说出了—个有趣的比喻,特别使人难忘。据说:满洲国的独立,在中国看来,好像一个不贞之妻投奔到好夫那里去,从而,逼迫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就等于迫使本夫正式承认奸夫和她正式结婚。

本夫既已默认而不坚持异议,即使不再发给结婚书,但随着时日的推移不是就自然解决了吗?

2.关于日华共同防共,中国原则上可以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和把内蒙地区特殊化,但绝对不能承认部分日军驻扎在华北。万—日、华两国国防上有必要时,可以推迟—部分撤兵,说到底,就是在解决和平后可以另行协商。

3.关于汪精卫问题,由于汪逃出重庆,中国国内的反汪空气随即愈加高涨,在这样情况下,要、重庆政府和他合并,无论如何也是不能考虑的问题。

六月四日晚上九点,根据双方约定,在澳门市郊临时找的一所空房子里举行第二轮会谈。双方代表见面时,按惯例先出示委任状,确认合法身份。日方三代表出示了参谋总长闲院 宫的委任状。中国方面出示的委任状,内有委员长蒋介石的签名,在军事委员会信笺上盖了该委员会的大印和蒋中正的小印。在这个委任状上写着中国代表三人的姓名,但自称‘宋子良’的却用了宋士杰的姓名。宋解释了自己不用宋子良的姓名而使用别名的理由。对于‘宋子良’变成了宋士杰,日方并没有怀疑中国代表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中国代表陈超霖首先宣读准备好了的发言:

‘在第一次香港会谈中,关于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和日本军在中国驻兵问题,日、华双方意见不一致,以致不能速成实质性效果,实属遗憾。’

这就是说经过请示蒋介石,在承认满洲国和日本在华北驻兵

问题上,重庆政府不让步。

‘中国共产党预感和平到来时国民党将立即企图发动剿灭共产党的战争,因而企图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尽可能扩张势力。因此,国民党各要人于香港会谈后,对防共方针的意见,愈加一致。蒋委员长也派了几名有魄力的军政要人到西北。防止共产党的反抗。中国的防共政策已开始逐步实行。’

这段话表达了蒋介石两个意思;一是拿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发展逼日本人让步;一是以反共的实际动向日本人靠拢。

六月六日晚上八时半第三次会谈中,日本方面提出举行板垣征四郎(日军中国派遣军参谋总长)、蒋介石、汪精卫三人高峰会谈,地点在上海、香港或澳门。六月二十二日‘宋子良’请示重庆后答覆:‘同意举行三人会谈,会谈地点坚持在长沙。’日方提出要重庆方面确保日军首脑板垣征四郎和汪精卫的安全,并需制定一个文件。六月二十六日夜,‘宋子良’请示重庆后答覆:‘三人会谈当然由重庆方面保证安全,但拒绝制定文件。’由于会谈地点和安全保证问题,会谈拖延下来。后来发生了百团大战打断了日蒋谋和的进程。蒋介石缩回去了。至九月底,日德意三轴心国结盟,日本政府决定停止‘桐’工作。

这就是蒋日秘密谋和的经过。至于真假‘宋子良’案,是蒋介石玩的一个小动作。因为当时举国上下反汪空气激烈,谁谋和谁就准备当第二个汪精卫。谋和是以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下赌注,他不能不留一手。万一事机不密泄露出来,他可以打真宋子良牌辟谣。你日本人连真宋子良都没见到,谋和之事何有?!

由于插了这么一件‘桐’工作,汪精卫成立政府的事一拖再拖。在他出逃一年零三个月之后,这个汉奸政府才建立起来。汪日之

间在谈判中，多次涉及所谓‘国旗’问题。日本以为，日本对华作战，以打倒青天白日旗为目的，若汪政权仍悬青天白日旗，势将影响日本的军心士气。汪精卫则想保留一点形式上的面子，自认是恢复战前国民政府旧制，不是‘新建’，而是‘还都’。因此，‘国旗’断不能改。争到最后，妥协的方案是：在原青天白日旗上，加缝一个黄色三角形飘带，上书‘和平、反共、建国’，以与重庆政府的国旗相区别。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汪精卫率陈公博，周佛海一千人等往紫金山谒陵，表演了向孙中山祭告仪式，以此作为‘还都’的开场。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在南京中山路国际联欢社举行中央政治会议。除汪精卫的班底外，两个地方性汉奸政权的头面人物，南京‘维新政府’的梁鸿志、沮宗尧、任援道，北京‘临时政府’的王克敏、齐燮元、王揖唐等，都出场了。通过了政纲、中央政府的组成人员、还都日期等。出乎与会者意料的是，政府组成人员名单中、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而汪精卫是代理主席。林森是重庆国民政府的主席，并没有参加汪政权。据汪政权中的人士解释，因是还都，不是另起炉灶，所以主席也不换。其实这是日本对汪精卫施加巨大压力的结果。汪精卫从重庆逃出来，担惊受怕，在河内差点送了命，为的就是要当中国第一人，他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既没给蒋介石留总裁的位置，这次为何这般谦虚把国家元首的位子留给林森？说穿了是日本人下令将元首的宝座留给蒋介石，这是‘桐’工作策划韵板垣、蒋、汪高峰论坛的一个伏笔。到这年十一月，日本决定结束‘桐’工作后，汪精卫才去掉‘代’字，做了‘国府主席’。

三月三十日上午七时半，‘还都’仪式在原国民政府考试院大礼堂举行。会场上没有一点喜庆气氛，与会者像参加追悼会一样，心情沉重。汪精卫宣誓就职，以低沉的声调宣读了《还都宣言》，说

‘中日两国，本义同兄弟，一旦不幸，致动干戈，自此次调整之后，永保和平，共安东亚。’

南京的百姓们，横遭日寇蹂躏的幸存者，见到这群汉奸卖国贼的无耻表演，莫不义愤填膺。他们不会忘记一九三七年岁末那个血雨腥风的日子……。

十二月十六日，日军占领南京第四天，麇集于华侨招待所的男女老少五千多名，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用机关枪射杀后，弃尸江中，使随波逐流，借图灭迹。这五千多人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其中一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审判战犯时应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

十二月十八日，日寇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的男女老幼共五万七千四百八十八人，用铁丝捆扎，驱赶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扫射；其未死倒地呻吟者复以战刀砍杀，事后将尸体浇煤油焚化。

最令人发指的是日寇为取乐而举行的杀人比赛。有两个日本军官，忽然别出心裁地相约要举行一次杀人比赛，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杀死最多的中国人。杀人方法是用刀劈。议好规则便分别提刀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当头便是一刀竖劈下来，便成两半，像劈木材一样。当他们劈人都达到了一百的时候，共同登上紫金山高峰，面朝东方，举行了对日本天皇的‘遥拜礼’和‘报告式’，并为他们的宝刀庆功，祝捷。下山时，其中一个刽子手又杀了五个中国人，而另一个刽子手加杀了六个，后者便以连杀一百零六人的成绩成为这次杀人比赛的冠军。

强奸案的残暴和野蛮更是不胜枚举。幼女丁小姑娘，在经兽兵十三名轮奸后，因不胜狂虐，厉声呼救，被割去小腹致死。市民姚加隆携眷避难于斩龙桥，其妻被兽兵奸杀后，八岁幼儿及三岁幼

女在旁哭泣,均被兽兵用枪尖挑其肛门,投入火中,活活烧死。年近占稀老妇 谢善真在东岳庙中被兽兵奸后用力刺杀,又以竹竿插穿阴户,以资取乐。民妇陶汤氏遭兽兵 轮奸后,又被斩断四肢,逐块投入火中焚烧。

远东国际法庭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的一个月中,无辜百姓被杀在三十万以上,妇女被强 奸在两万起以上。

在中国人民血泪未干的时候,汪精卫跑到东京为《日本援华革命同志追悼碑》书写碑文。向在阴间和阳间的日本武士们‘反省’中国人抵抗日军的‘罪行’。

51 百团大战 彭德怀功高遭谤 独断干纲 毛泽东初露锋芒

一九四〇年,当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之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变。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波兰,一九四〇年夏击败英法联军,席卷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战败投降,英国被赶出欧洲大陆。日本加入法西斯阵线。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缔结军事同盟条约。

日本为了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急于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将中国变成他的南下基地,对重庆蒋介石政府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又打又拉的政策。英美为了集中力量在欧洲对德作战,在远东对日本采取了让步政策。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日本政府要求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封锁了越南通往中国云南的国际公路;七月十八日,日本同英国签订协定,封锁了从缅甸通往云南的国际公路。在中国沿海各港口失陷后,友好国家的援华物资百分之九十是通过这两条公路输入的。封锁了滇缅、滇越公路,等于卡住了蒋介石政府的脖子,是日本压蒋投降的重要一着。美国则在一九四〇年卖给日本价值两亿美元的石油和‘废铁’(武器)。英、美、法对日本的讨好,被称之为‘东方慕尼黑阴谋’。

在军事上,日本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了新的攻势。为加强对华作战,一九三九年九月四日日本大本营决定撤销‘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另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侵华兵力(不含东北关东军)共有二十四个师团又二十二个旅团,共七十二万人。其中九个师团又十二个旅团约二十五万人在华北。从一九三九年二月到一九四〇年五月,国民党正面战场又丢掉了江西、广东、广西、湖北等省的主要城镇和大片国土。一九四〇年五月,日军发动枣(阳)宜(昌)战役,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血战殉国,宜昌失陷。

日本近代史学者认为这时候是蒋介石在战与降之间动摇最厉害的时候:‘在这昭和十五年六月中旬以后(按:即宜昌失陷以后)约一个月时间内,的确出现了似乎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所以如此,应该说在八年的日中战争中,蒋介石感到危机最严重的,实际上是在宜昌失守的时候。中共觉察到日中进行和平谈判的危机,突然发动了如下节所谈的百团大战。’([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史》第五十五页)

这时候‘桐’工作尚在进行中。七月二十二日夜铃木卓尔和宋士杰正式交换了备忘录

备 忘 录

下记日华代表关于进行停战会谈事,系分别遵照板垣总参谋长及蒋委员长意旨,并互相确认各自上司有进行会谈的亲笔证件后,约定事项如下:一、时间:八月初旬二、地点:长沙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蒋令石商谈日华停战问题

代表 铃木卓尔(印)

代表 宋士杰 (印)

昭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蒋介石办事也是讲究板眼的。他在准备会晤板垣之前,又想起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声明说:‘帝国政府在攻陷南京后,为了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反省的机会,一直等到今天。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所在……仍在一意孤行地坚持抗战。因此,帝国政府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正与帝国合作的新兴中国政权的成立和发展,并愿与其调整邦交。’这个声明否定了蒋介石政府讲和投降的资格。何况汪精卫又得风气之先,已在南京组织了新政府。这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他怕谈成投降条件全面停战以后日本拿他当老二看待,让他的政府并到汪精卫的南京政府里去。在七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主和派甚嚣压上,认为七七事变以来,国军已伤亡二百一十万人,相当于战前国军的百分之百,由于大中城市的沦陷,中国的工业丧失了百分之九十,再加上外援通道被卡死,仗是再也不能打下去了。在这种失败情绪影响下,蒋介石决心亲自出马,会见日军首脑人物,谋取所谓‘光荣的和平’。七月二十五日,他让那个真秘使、假‘宋子良’再找铃木,郑重提出‘要求取消近卫第一次声明,而且确切约定日本方面严守秘密,不再介入蒋、汪合作,并把这些写成书面。’意思是先要日本承认他有代表整个中国投降的资格,否定汪精卫的这种资格,然后他才能跟板垣见面。事有凑巧,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七日。米内内阁倒台。七月二十二日,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近卫文磨再次出任总理大臣,近卫历任贵族院议长和枢密院议长,是有声望的重臣,受到日本政界和军部的一致支持。他一上台,就接到了蒋介石的条件。蒋的条件虽是向日本国的屈服,但却是对近卫个人的挑衅。这等于让近卫

首相一上台就承认两个错误：一是第一次近卫声明是错误的；二是前米内内阁扶持汪精卫是错误的。气焰正盛的近卫文磨勃然大怒。七月三十一日新陆相东条英机下令停止‘桐’工作。香港的铃木卓尔继续与‘宋子良’保持了一段接触，希望重庆转圜。宋坚持七月二十五日的条件，日蒋谋和秘谈遂中止。并不是蒋介石不想和谈，是近卫一怒之下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八路军在华北的百团大战是为了挽救严重的投降危机而发动的。

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签发了以朱德、彭德怀、左权名义上报中央军委、下发第一二〇、第二一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的《战役准备命令》。命令规定对以正太路为主的敌华北交通线进行大破击，以达‘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命令要求第二一九师和晋察冀军区各以主力一部完成破击正太路的任务，第一二九师在西段，晋察冀军区在东段，阳泉（属第一二九师）为两部作战分界线。这一共同任务达成后，两部作战重点分别转入正太线南北地区，对敌人由该线联接的公路网继续破击，扩张战果。第一二九师还要组织力量对平汉、德石、白晋、同蒲等敌军交通线，展开广泛的破击。第二一〇师则负责破击同蒲路北段联接正太路的交通线。规定八月二十日晚八时为统一发动破击战的时间。据彭德怀回忆，原定兵力是二十二个团（晋察冀十个团，第一二九师八个团，第二一〇师四个团），‘百团大战’是战局发展演变的结果，事先并没有这样大的作战计划。

百团大战是由一系列的战斗组成的，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八月二十日起至九月十日止。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破坏和截断华北敌人交通线。破袭的主要目标是正太路全线。正太铁路由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全长二百三十一公里。它

连接平汉、同蒲两铁路,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如果正太路被毁,山西境内日军的给养补充和外运掠夺的战略物资将发生极大的困难。此时,在正太铁路沿线驻有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驻阳泉)全部,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司令部驻石家庄)和第九旅团(司令部驻太原)各一部、敌在沿线城镇、车站、桥梁、隧道附近,筑有坚固防御工事,在铁路两侧还有外围据点。八月二十日夜,八路军各部同时向敌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第一二九师攻占了阳泉至榆次间日军据点和车站蔗家庄、和尚足、马首、桑掌、铁炉沟、上湖、燕子沟、坡头、狼峪、张净等地,控制了正太路西段。阳泉西南四公里处有狮埝山,是正太铁路西段咽喉要地。战役发起后,刘伯承占先机之利,以总预备队第十四团控制了狮埝山,从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日军从二百余人增至六百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并施放毒气,连续向狮埝山猛攻,第十四团据险抗击,坚守六昼夜,歼敌四百余人,保证了破击战的顺利进行。晋察冀军区部队,在聂荣臻指挥下,攻克了正太路东段要隘娘子关,以及蔡庄、乏驴岭、地都、北峪、南峪等据点;破坏了敌人的重要燃料基地井陘煤矿(日本侵略军在东北鞍山设制铁所,利用井陘的煤炼钢,制造枪炮军械以战养战),使敌损失一亿日元以上。第一二〇师在贺龙指挥下以主力向忻县至静乐、汾阳至离石公路沿线攻击,以一部兵力破击朔县至宁武段同蒲路,切断了同蒲路北段和忻静、汾离、太汾等公路,并攻占了北龙泉、康家会、丰润村、阳方口等据点和车站多处。

第二阶段,自九月二十日开始,至十月下旬止。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扩大第一阶段之战果,继续破击交通线,而重点则在歼灭交通线两侧深入根据地的日伪据点。第一五三号《战报》报道第二一九师战况称:

十月四日，刘师电称，自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我师陈、黄、张、刘、徐、陈、赵等团，先后动员民众三万一千余人，大举破击德石、邯济两大交通线，所获如下：（一）德石线（1）九月二十日晚，袭击龙华之敌，袭敌十余，并破坏龙华周村间公路十余里，又将阜城东古城崔家庄间电线全部破坏。二十一日击溃由古垛外出修路之敌伪百余，毙伤敌三十余名，伤连长一名及以下十余名。

（2）二十六日，我破坏蛹三庄、王五庄附近铁路二里许，路基被我全部挖毁，搬回铁轨十余条、毁枕木五十余根，取道钉千余个，砍电悍五十余根，收电线二百余斤。另一部伏击清河东南油坊北驶之敌汽船一艘、当即炸毁，计毙敌伪官兵各五名，缴获电台一部。

（3）二十七日，景县青兰敌伪二百余，北犯药古庄，被我击溃，敌伤亡三十余名，我伤政委一名，伤亡排长以下二十余名。

（4）二十三日晚，破坏德州贾标单村间铁路三里许，贾村陈七庄间二里许，陈七庄青兰间四里许，搬回铁轨五十余根，道钉千余个，砍电悍三十余根，我伤营副一及以下二十余名。

（5）二十九日晚，袭击固村之敌，毙敌十余，并挖平清凉店路基三十余里，烧毁木桥两座。

（6）三十日晚，破坏龙华马郎间铁路四里许，驰糜周村间铁路十余里，路基尽毁，挖深沟四十余道，毁路轨二百余条，搬回十余条，烧枕木一千二百余根，取螺丝钉五百余个，夹板百余块，收电线五百余斤，并击退敌火车一列，我伤连长以下十余名。

（7）十月一日晚，破坏青兰龙华间铁路八里许，抬回全部路轨及枕木一百四十余根，道钉五百余个，并围击龙华，炸敌火车一列。

（二）邯济线（邯郸至济南）

（1）九月二十四日晚，破坏肥乡广平大名间公路各十余里，挖沟六十余道，收电线八百余斤，击毙巡路之敌二十余，我伤十余及民众六名。另一部破坏肥曲公路十余里，收电线二百余斤。

(2)二十五日晚,破坏邯肥间辛安新庄段公路二十余里,毁木桥三座。二十六日与由肥邯外出之敌二百余及汽车二十余辆激战于南牛竖一带,敌伤亡百余名,我获战马二十余匹,短枪六支,我伤亡五十余名当晚复将永肥公路彻底破坏,毁木桥二座,并破坏肥乡西瓜堡间公路七里许。

(3)二十八日晚,破坏广大开路基十余里,砍电杆百余根,收电线六百余斤,另一部攻克临清西北之台庄据点,毙伪军二十余,俘三十余,缴获长短枪三十余支,军用品甚多。

以上是第二阶段作战的一个侧面——冀南军区部队、民兵破击德石路、邯济路战斗详报。除第一一九师之榆辽战斗、晋察冀军区之涞灵战斗、第二一〇师攻打交城的战斗规模较大外,各地一般的作战形式和战斗规模基本类此。

在第二阶段作战中,苏鲁皖豫境内的八路军也主动积极参战,计有第一一五师向津浦路天津至德州段之破击战,济南至徐州段之破击战,鲁南鲁西北消灭敌据点之作战,山东纵深在胶济路之破击战,胶东胶北消灭敌据点之作战,第二纵队在冀豫边袭击敌据点及反扫荡之作战,第三、第四、第五纵队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之破击战,在陇海路东段之破击战。以及淮河运河沿岸拔除敌据点之作战。

这样,交通破击战的作战地域就越来越大,参战人数也越来越多了。按原来计划的地区,包括冀察全境,晋绥之绝大部分地区,热河南部;原计划破击的交通线,则包括正太路全线,彰德以北之平汉路,德州以北之津浦路,临汾以北之同蒲路,平绥路归绥以东段,北宁路全线,平古路全线,沧石路全线,德石路全线,邯济路邯郸至聊城段,以及联结铁路的主要公路线。若加上自动配合作战的地区,则又增加了山东全境,皖东、豫东、苏北广大地区;交通线

则增加了津浦路全线,胶济路全线,自开封以东之陇海路东段,以及联结铁路的主要公路线。参战部队有第二一〇师(包括大青山支队,决死第二、第四纵队)二十个团,第一二九师(包括冀南军区及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四十六个团,晋察冀军区(包括第三纵队及挺进军)三十九个团,合计一百零五个团,共约二十万,以及上百万的民兵和群众(苏鲁豫皖自动参战的部队和群众尚未统计在内),形成波澜壮阔的人民游击战争。

第三阶段,从十月六日开始,至十二月五日结束。

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粉碎敌人的扫荡,各战区情况不同,反扫荡的发起与结束时间也不一致。在太行区自十月六日至十一月十四日进行了三次反扫荡战;平西区反扫荡作战自十月十日起至二十八日止;晋西北的反扫荡战自十月二十七日起至十一月初结束;雁门区反扫荡战自十一月七日起至同月中旬结束;太岳区的反扫荡战自十一月十八日起至月底结束;晋察冀边区自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五日进行了连续反扫荡作战;十二月一日在太南区开始之反扫荡战,以及向德石路、沧石路、邯济路之继续破击,冀中、冀南、大青山区反扫荡战,亦于十二月五日先后结束。

这一阶段反扫荡作战持续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的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地区。第一次扫荡从十月六日开始,武安之敌八百余人,进犯阳邑一带;十日辽县、武乡、潞城、襄垣之敌三千余人,分多路围攻榆、辽、武之间的浊漳河两岸地区。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十旅在和辽公路之弓家沟设伏,击毁敌汽车四十辆、歼敌一部,扫荡之敌于十七日分途撤退。第二次扫荡从十月二十日开始,敌抽调第三十六师团和第四混成旅团各一部约一万人,向清漳河东西地区,重点是北方局、八路军总部,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麻田、左会间及涉县、偏城一带进行报复性扫荡,根据地军民遭受很大损失。二十六日,冈崎大队五百余人经蟠龙以东之关家垵一带山地西犯

左会,彭德怀副总司令决定集中第一二九师主力歼灭这股敌人。二十九日夜,第三八五旅、第三八六旅、新十旅及决死第一纵队等部,将冈崎大队包围在关家垴高地。敌以优势火力固守待援,并以一个中队夺回关家垴西南之风顶垴,与关家垴成犄角之势,互相策应支援。次日,彭德怀亲自指挥总攻,他传下命令:‘哪个部队完不成任务,就撤销那个部队番号,杀头不论人小!’于是,在不利地形下面的阵地攻坚战,同时在两个高地展开。进攻关家垴的部队,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和三、四架敌机的轮番轰炸扫射,前仆后继,突破敌人防御阵地,与敌展开肉搏。第十六团第一连一排人被敌机炸死;第七十二团一连伤亡殆尽,仅余三人。战斗激烈情况由此可见一斑。从三十日凌晨四点打到晚上九点,虽然消灭了大部敌人,自己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形成了对峙局面。为夺回风顶垴,第二十五团连续组织了七次冲锋,因阶梯地形,且有两架敌机不断投弹扫射,第二十五团从下向上仰攻,遭受很大伤亡,亦未达成预期目的。三十一日下午四时,黄烟洞之敌两千余人赶来增援,彭德怀才下令撤出战斗。敌人在救走关家垴残敌后,又组织第三次扫荡,从南北西三面合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砖壁、东田地区。第三八六旅在西营、蟠龙以东之大陌村南北一线,阻击进犯之敌,掩护总部机关转移。十一月三日上午九时与敌接触,直至四日晨总部机关安全转移后,第三八六旅才撤出战斗。五日,敌向白晋路撤去。其他各路扫荡之敌,于十一月十三、十四日分别回巢。太行地区历时四十天的反扫荡作战遂告结束。

百团大战历时三个半月,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以伤亡一万七千余人的代价,换取了以下的战绩(配合作战部队的战果未统计在内):

(一)歼敌四万四千三百八十七人,其中毙伤日军二万零六百五十四人(内有大队长以上军官十八人),伪军五千一百五十五人;

俘虏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伪军一万八千四百零七人。

(二)消灭日军据点二千九百九十三处，其中险要著名者有：正太路上的娘子关、磨河滩、莒家庄、马首、狼峪、乏驴岭、北峪；晋东南之榆社、箭头、石岭；平西北之龙门所；冀东之蓟县、官屯；晋察冀边区之上社、拘兴、西烟、东团堡、三甲村；冀中之子乐镇、白洋桥、东西安；晋西北之阳方口、塑口镇、轩岗、康家会；冀南之隆平、大城村等。

(三)收复县城二十六座。在破击战的高潮中，一度收复有四五十座县城，最后得到巩固的有二十六座。其中有太行区的榆社、武乡、黎城、涉县、陵川、襄垣；太岳区的沁源、浮山、安泽；五台区的阜平、灵邱、涞源、浑源；晋西北的临县、兴县、苛岚、岚县、五寨、平鲁、左云、右玉；冀中的河间；冀南的南宫；冀鲁豫平原区的南乐、清丰、内黄等。

(四)缴获各种枪五千九百四十二支，子弹三十六万七千发，各种炮五十三门，炮弹八百一十六发，还有许多物资器材。焚毁飞机六架，击毁装甲汽车十三辆，坦克五辆。

(五)破坏铁路四百七十四公里，公路一千五百零一公里，桥梁二百一十三座，火车站三十七个，隧道十一个，拆铁轨二十一万七千零四十条，枕木一百五十四万九千一百七十七根，砍电杆十万九千零二根，收电话线八十四万九千九百二十三斤。

(六)破坏日伪利用的煤矿五座，仓库十一座。

(七)伪军反正者十四次，共一千八百四十五人；日军自动投诚者四十七人。溃散瓦解的伪军、伪组织还很多，无法统计。

中共中央对百团大战在一九四三年以前是充分肯定的。一九四〇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行动的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应按照华北百团大战役，先向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有计划的大规

模的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借以缩小占领区,扩大根据地,打破封锁线,提高战斗力,并在山东与华北方面,继续扩大我军之数量,而给予二百万友军、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百万人民,以良好的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计划,以延缓作用。’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发动反共新高潮,我们当前尚须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百团大战的胜利,使全国军民无比振奋,增强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到底的胜利信心。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致电朱德、彭德怀,说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蒋介石也致电嘉奖,但却严令国统区各大报不准宣传百团大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日发出密函:‘案奉总裁西皓侍秘渝字第四二六一号代电开:“查近来报上常有纪载百团大战字样……此项名词及有关之新闻以后应绝对禁止登载,希即饬遵。”’

在国民党中宣部舆论钳制力所不及之地,还是有许多百团大战的报道和评论。大后方的《中学生杂志》第三十一期发表评论说:‘此次华北出击的部队,地区最贫脊,给养最困难,装备最低劣,而相反敌人在这区域的政治、军事力量却最顽强,他们在那样困难的情势与悬殊力量对比之下,能够有计划地出击,不仅博取小胜,而且攻克坚城。这次成功,决不出于奇迹和偶然,没有广泛地动员了的民众,没有真正立足于人民大众利益的政治组织,没有使一切民众力量自由发扬的民主体制,这一次胜利是不能想像的。’《新疆日报》九月五日的社论说:百团大战‘打击了一向不相信游击战争的荒谬说法,粉碎了诬蔑游击队“游而不击”的种种狂言滥调。’

百团大战大张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其组织者和指挥者

彭德怀(发布命令虽用朱德名义,实际朱未在前线)在党内军内以至全国的威望大大提高。在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上,第一次出现了所谓‘功高震主’的情况。

问题出在百团大战不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或亲自批准的。彭德怀将百团大战的预备命令上报了军委,经‘七大’时查实,是主持军委日工作的王稼祥(军委副主席)没有及时报告毛泽东并代表军委作了批覆(王稼祥后来因此而失宠)。调动这么多部队,打这么大的仗,毛泽东竟然事先不知道,他有一种大权旁落之感。但百团大战毕竟给共产党和八路军也给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袖毛泽东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他不便发作、隐忍下来。到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刘少奇主持召开华北座谈会。会议认为: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是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帮了蒋介石的忙;暴露了我军力量,引起了日寇大扫荡报复,削弱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华北的力量;特别强调百团大战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基本上是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未经毛主席批准’,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于是,彭德怀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为国家和民族立了大功劳,在中共党内却犯了大错误。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指鹿为马,以是为非,他成功了。那时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刚刚确立,以他为核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正在重排座次,有的进,有的出,有的升,有的降。为了‘跟上毛主席’,有的高级干部开始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在理论的高度上,帮助毛泽东完成指鹿为马的工作;而后来他们自己又受到这种指鹿为马的打击,这是很可悲的。

华北座谈会否定百团大战的理由有三条:

一曰百团大战‘帮助了蒋介石’。其具体内涵是因害怕蒋介石投降,所以打百团大战,以减轻日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这

叫作依靠蒋介石国民党抗战,看轻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力量,据此被指是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百团大战起了扭转时局,挽救投降危机的作用。中共党内极‘左’派为了批彭德怀把本党这一历史贡献也否定了,是非常不明智的。日本历史学家认为百团大战‘是中日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激战,给予了日本军队以沉重的打击。’‘日本在拉拢蒋介石工作上所以失败的原因有:日本的要求过高;日本和英美未能充分达成妥协,未能打动由亲美派所操纵的整个国民党;苏联对华援助的加强;从同年(一九四〇年)十月起滇缅公路再次开放等等。但是,使蒋介石不敢脱离抗日阵营的决定性原因是以中共为主体的抗日力量的坚强的发展。’(《太平洋战争史》第三卷第一〇三、一〇四页)。蒋介石降日是以能坐稳儿皇帝为前提的。百团大战一打,蒋介石看到,就是他投降了,共产党仍然会领导五十万军队和敌后广大人民把民族解放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直至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到那时,他将背着汉奸的恶名在中国无立身之地,他和他的党皆会被中国人民所唾弃。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看到百团大战一打,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知道他只要躲在峨眉山上熬到胜利,就是抗日英雄。瞻前顾后,还是留在抗日阵营为上策。不管蒋出于什么动机,只要他不降日,对抗日大局就是有利的。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过去是对的,现在还是对的,只要蒋领导抗战一天我们还是拥护的(当然以抗战为条件),不应对蒋有不尊重的表示。但蒋对抗战在某种情况下,不能坚持的可能是存在的。即在那时,如何表示,还要慎重考虑。当然,那时不能不有表示,但须是适当的表示,应以有利于团结多数抗战,有利于国共继续合作为原则,而不能随便的轻率的恢复“反蒋”口号。蒋对共产党存着敌意,这是他自己表示的事实,我们必须严防他及其部下破坏我们,

这是毫无疑义的。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毛泽东在六中全会的报告和这次讲话，是大政治家的风范。百团大战使一度动摇的蒋委员长又坚定起来，留在了抗日阵营，这正是‘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的重大步骤，怎么会成了王明路线呢？

二曰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力量’。这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打百团大战，让日寇向正面战场继续进攻。让蒋介石更多的丧师失地，我们则尾随南进的日军深入敌后，在江南建立更多更大的根据地，那么，在抗战胜利后我们同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中，则会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这种意见说穿了是消极抗日，保存实力，准备打蒋介石。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抗战胜利后中共要同国民党‘争天下’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为下阶段的斗争作些准备也是必要的。问题是准备什么？怎么准备？一种做法是消极抗日，准备枪炮和军队；一种做法是积极抗日，准备人心。前一种做法实际上是学蒋介石。蒋搞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共产党则来个消极抗日，积极反蒋。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内战的扩大，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最后，国共两党谁也不可能达到利用日本削弱对方的目的，而日本却可以利用中国的内战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如果共产党消极抗日，积极反蒋，就是把自己的策略降低到蒋介石的水平。共产党采取的是后一种做法，积极抗日，准备人心。蒋介石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中消极抗日，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自以为得计，但失尽了全国的人心，国民党营垒中的左派公开起来反对他，中间派也越来越多地离开了他。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对反共顽固派的进攻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不超出自卫的范围；同时顾全大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担负起像华北的百团大战这样的最艰巨的对日作战任务，从而赢得了全国

人民、各民主党派、国民党中的左派和一部分中间派的同情和支持。如果说,为下一步推翻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斗争奠定基础 and 准备条件,那么,人心的归顺是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和准备了最主要的条件。只要得到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护,没有军队可以有军队,没有枪炮可以有枪炮;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有了也会丢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政治斗争的策略最基本的问题是顺应民意,争取人心;耍小智术,搞小动作,是欺骗不了人的,因而也是成就不了大事业的。

三曰百团大战‘是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轻视了游击战争’。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保存下来的《八路军百团大战战报》一至三二九号(中缺一百一十份)记载了八百六十六次大小战斗。按出动兵力分,旅或旅以上兵力参加的战斗七十七次,两个团参加的战斗二十五次,一个团参加的战斗一百一十三次,团以下小分队战斗五百四十六次,民兵游击队为主进行的战斗一百零五次;按歼敌数量分,歼灭敌人四百人以上的战斗五次,歼敌四百到一百的战斗八十七次,歼敌一百到三十人的战斗二百二十次,歼敌三十人以下的战斗二百三十三次,破路炸桥砍电杆未歼敌人的战斗二百二十七次,歼敌数不明(‘毙敌甚多’、‘给敌以重大杀伤’等)的战斗九十四次。从这个不完整的统计中可以看出,团以下分队和民兵进行的战斗占百分之八十八以上,歼敌在百人以下或只破路不歼敌的战斗占百分之八十九以上。百团大战尽管声势很大,众多的部队在广阔的战线同时向敌人发起攻击,但基本上是小分队和民兵在本地区破路,打据点。朱德总司令认为:‘百团大战虽然是胜利的游击战争的战役进攻,但它带有全国性的伟大战略意义。’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百团大战中也有一些不该打的仗,如关家垴阵地进攻战,彭德怀是有些蛮干,但这种仗只是占百分之零点几,不能据此判定百团大战打的不是游击战,事物的性质是不能根据

百分之零点几来确定的。

彭德怀因为打了百团大战，检讨了一辈子。他是抱着不能瞑目的终天之恨死在绞■之中的。此是后话，带过不提。在当时的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被迫作了检讨之后，毛泽东不为已甚，适可而止。天下还没有打下来，彭德怀这样的战将他还要团结的。

52 上官得手 南面堵截北面驱赶 项英失策 一误茂林再误星潭

毛家诡计蒋家兵，主要目标杀项英。

举国劳工哭柱石，全民抗战损干城。

这是王明一九四一年一月在延安写的七言律诗《悼皖南事变牺牲的项英同志》前四句。说皖南事变项英被杀，是毛泽东借刀杀人的‘诡计’造成的，这是王明的偏见臆断。

皖南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项英，原名项德隆，曾化名江钧、张成。湖北武昌人。一九一三年进布厂当工人。一九二〇年起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参与领导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一九二五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一九二六年秋任武汉工人纠察总队长，配合北伐军作战。一九二三——一九二八年间，在中共第三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曾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项英

作为工人出身的领袖，受到斯大林的格外器重，曾单独接见他，勉励他‘既要重视斗争，又要重视学习，使自己完完全全布尔什维克化。’并亲赠钢笔一支，手枪一支，那精致的枪柄上刻着三行俄文字母，译成中文是：

项英同志存念

约·维·斯大林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莫斯科

回国后，项英屡当重任。一九三〇年八月任长江局书记。一九三一年一月起，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一九三四年一月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度是毛泽东的上级，支持博古、李德排挤毛泽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战初期成立新四军时，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叶挺是孙中山卫队营营长，北伐名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领导人，资深望重。广州起义时，国际派来的顾问德国人纽曼主张守城，作为红军总司令的叶挺主张撤出广州，另图发展。事后证明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共产国际把失败的责任放在叶挺身上，要处分他。叶挺一气之下离开莫斯科去了德国，从此脱离中共。叶挺以民主人士的身份，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接受的人物出任新四军军长。项英虽在名份上是副军长，实际上是握实权的政治委员。他在党内的职务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大权独揽，叶挺又不甘当挂名军长，他们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间叶挺曾四上辞呈，两次离军，幸得周恩来调停斡旋，才把叶挺留住。

在六届六中全会后，项英主持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工作期

间,在新四军发展方向上始终和毛泽东持相反的意见。毛泽东主张向北,向敌后发展;项英主张向南,向国统区发展。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九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

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发展华中力量。

但项英对于向北发展的方针一直是抵触的。调部队不给部队,调干部不给干部。为何如此?后来批评他右倾,害怕日本人,不敢向敌后发展;他自己则强调华中不同于华北,有特殊性。这些都是表面上的理由。根据项英的军事政治水平和斗争经验,是容易理解和接受向北发展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的。在六中全会以前,他是积极向北发展的。一九三八年四月,中共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尚未提出,项英即以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各一部组成先遣队,由粟裕率领,从皖南深入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四月底,派新四军第四支队到达皖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明确要求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平原游击战,在大江南北建立抗日根据地。项英立即令陈毅率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主力,挺进苏南,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并逐步向苏北的扬州、泰州地区发展。

为何六中全会以后项英不再向北发展呢?在六中全会前,项

英是东南分局书记，直属王明 为书记的长江局领导。一九三八年九月六中全会召开前的国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同时成立东南局和中原局。东南局书记是项英，中原局书记是刘少奇。表面上项英由东南分局书记改任东南局书记是升格了，实际上管辖的地区大大缩小了。东南局与中原局的分界线是长江，江北为中原局，江南为东南局。在项英看来，向江北发展，派干部，派部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帮刘少奇开辟地区。所以硬顶着不执行中央的指示。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刘少奇到达距长江北岸八十公里的东汤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江北指挥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子恢，辖新四军主力第四、第五支队六个团和地方游击部队四个团。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知：第四、第五支队归中原局指挥。这等于消灭项英统率的武装力量的五分之二。这是毛项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是毛泽东解决抗拒中央、不服调遣的项英的第一个措施。

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重申向北发展的方针，强调同一性，批评项英所谓的‘特殊性’，责问：‘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各支队发展方向与任务给项英、陈毅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也不是溧阳、溧水、郎溪、广德等靠近中央军之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请按这个方针部署兵力，分配指挥人员及指挥机关，在郎广两溧只应配置一部分兵力及一部分人员机关，并须在适当时机

取得该地政权。’

毛泽东可能估计到项英不会执行中共中央指示，又于五月五日，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彭德怀、刘少奇，指出：‘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黄克诚部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和彭明治支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应趁目前时机南下，配合新四军各部在一年之内，在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造成一个统一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整个行动归刘少奇指挥。’这是毛项斗争的第二个回合，是毛泽东解决抗拒中央、不服从调遣的项英的第二个措施。

中央军委指示不是给项英的，但项英很快听到并看到了。项英一看，长江以北已没有自己活动的舞台，刘少奇将在这里唱主角，内心积存的怨愤再也忍耐不住，于五月九日、五月十二日、五月二十九日连续上书中共中央，请求公开撤职。他在五月九日的报告中说：

为了不致使鄙人重演一九二七年之错误，而影响党与革命之发展和胜利，应公开宣布撤我之职，是属必要。不日召开东南局及军分常委联席会，我即提出在中央派人未到前，东南局拟请曾山代理书记，军分会拟由陈毅或国平代理，以保证中央方针之实施。为党的利益，我不作任何申辩与说明。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来《关于项英错误的性质及东南局军分会仍由项英领导的指示》，算是对项英三个报告的答覆。指示说：

1. 项英同志几个报告收到。

2.在项英同志领导下的东南局与军分会,在三年抗日战斗中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但在执行这一路线时犯了某些个别错误,故你处错误不是总路线,而是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中某些个别策略问题错误,在你们总结自己工作,并适当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不应抹杀成绩,不应了解为总路线的错误。

3.项英同志愿继续担负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之责,对政治上及策略上的不同意见,望告中央,对中央指示仍由项英同志传达。

4.现当时局严重转变关头,全党同志应当团结一致。中央号召东南局及新四军全体同志在项英同志领导下,亲密团结起来,为执行中央路线,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而奋斗。

这个安抚电报使项英血气稍平;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更加决心向南,自己单独开辟一个局面。

十月十九日,重庆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即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第十八集团军各部于一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这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信号。

十一月九日,中共方面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电覆何应钦、白崇禧(即佳电),申明长江以北的抗日军队不能撤退的理由,拒绝了国民党的要求;为顾全大局,让了一步,答应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移至江北。

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项英、董必武、刘少奇进行策略交底:

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

钦亲日派的阴谋挑畔，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

十一月十七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江苏海安成立，统一指挥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之新四军和八路军。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陈毅任副总指挥。在叶挺未到江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二十三日华中总指挥部迁盐城。项英最关心的是把自己摆在哪里？他得到的信息是：‘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后，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这是毛项斗争的第三个回合，是毛泽东解决抗拒中央、不服从调遣的项英的第三个措施。

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叶项下达开动命令：

- (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
- (二)希夷(叶挺字)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
- (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

项英提出种种困难，向中央请示方针办法。

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起草了口气严峻的覆电，即《中共中央关于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给项英等的指示》：

各次报告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

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

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景仍是光明的;如果犹豫动摇,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和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这个措词强硬严厉的答覆,使项英无法再拖,乃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召开新四军军分会对行动问题作出决策。出席会议的人有军分会书记项英,委员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周子昆(新四军副参谋长),叶挺军长被邀列席参加。

新四军要撤出皖南,北渡长江,这一行动方针中央已经定死,勿庸再议,所要议的问题是行军路线问题。当时从皖南北渡长江的路线有两条:一条从军部所在地云岭出发东行,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竹箐桥——水西,然后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至苏北;另一条是从云岭出发北上,经戴家汇——孙村——荻港,然后渡江至安徽无为。第一条路线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来往的习惯线。这条路线,沿途都设有兵站,每一兵站都有民运工作组,有一定的群众工作基础;而且,这又是经顾祝同、上官云相同意的合法路线。十一月十一日,叶挺去上饶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会谈。他们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私交甚好。叶挺除请领军费和军需物资外,并

与顾谈妥走习惯线经苏南北渡，顾祝同拍胸脯，以人格担保‘保证尽力掩护新四军北撤’。于是，在十二月三日有后方人员千余人和物资一千三百担经此线到达苏北。十二月八日又有部分干部和眷属一千余人（包括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夫人）沿此线撤离，平安过江。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致电叶项：‘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须注意警戒。’‘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如走这条路线，皖南事变是可以避免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项英鬼迷心窍，舍安全、合法的路线不走，要从云岭南下茂林，经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走宁国、郎溪到达溧阳待机北渡呢？他是真要向南转半圈北上呢？还是别有打算呢？

从成立中原局以来，项英就不愿往江北发展，中央愈强调向北发展他愈对抗，这种逆反心理到十一月中旬正式组成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那时达到了高潮。叶挺是积极准备渡江北上的，他是去就任总指挥；项英跟着过江，是去交卸军权，不光彩地离开他的老部队回延安等候处理。项英与毛泽东在历史上合作的就不好，在江西苏区疙疙瘩瘩的事情很多，他主张给富田事变平反（这是对的），他任军委主席或代理军委主席，代表三‘左’路线站在第一线和毛泽东斗，排斥了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这些历史旧账使他怕回延安；又加上三次上书辞职，已经和毛泽东闹翻了，他不知道毛泽东会怎样处置自己。他把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下来的这支队伍当作自己手中的资本，他不能丢掉这个资本，作为新四军的领袖人物，在党内有他的地位，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也有他的地位。如果把他调离新四军，他就变成了孤家寡人，像一棵大树离开土壤一样，会枯萎死掉。他决心一不到江北，二不上延安，他要带

上这支部队(虽然只是老骨干的一部分了),向南发展,另创一个局面。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七日陈毅在皖南事变问题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项英‘对形势估计不对,坚持南进政策,黄山计划,天目山计划、浙西计划。’这是一语中的的分析。

蒋介石、顾祝同等最怕的是新四军南进,最怕的是项英的‘三山计划’(黄山、天目山、四明山)。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提供的资料证明: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下旬,顾祝同在长官部例行汇报会上说:‘新四军要渡过长江,困难不少。我们要抽调必要的兵力,掩护他们通过日占区安全北撤。同时也要考虑到,他们可能不遵守命令,反而向南、向西流窜,我们也需要增强皖南的兵力,作堵击的准备。部队还要选好的才顶用。参谋处应按照我的这个意思,拟出计划送我核定。’顾祝同这是内部讲话,是对高级幕僚们说的,是要执行的。因此,应看作是真话,不是假话;是实话,不是官话。意思很清楚,新四军北渡长江,通过日占区,要掩护;倘向南、向西流窜,要堵击。调遣部署兵力也是执行这个精神,从诸暨方面调第七十九师开往茂林西南太平附近;令位于郎溪地区的第四十师西开,到茂林东南的星潭、三溪布防。荻港——泾县——三溪——旌德,是第三战区两个集团军(第三十二集团军与第二十三集团军)的结合部,是最敏感的地方。顾祝同、上官云相认为:‘若新四军一举打出旌德,就可以不遭任何阻碍,在我大后方随意行动。我们的后方联络线就被截断,我们陷于腹背受敌,苏南、皖南抗日防线就变成了游击区。’所以,十一月十五日,叶挺在周王村与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会晤时,上官特别强调:‘行进路线最好是从驻地往北,由马头镇开出守备线,经宣城以北开往镇江,你先派人侦察,这个好商量。’(据第三十二集团军少将参谋处长武之的回忆文章)上官与叶挺也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他说这个话,是具有避免冲突的诚意的,意思是离开云岭,你千万别

往南走,直接往东 北走马头镇。如果设圈套诱歼新四军,就不会这样叮嘱告戒了。叶挺与顾祝同会见,与上官 云相会见,都安排了行进路线。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军分会会议上,肯定会与项英有一番争 吵,无奈项英握有决策权,他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往南,沿茂林——三溪这一条线南下,正好碰到了执行防堵任务的第四十师的枪口上,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岳星明回忆:‘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以来,战区长官部不断有情报说:新四军北撤是假的,真的是要搞“三山计划”,即南窜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作为根据地。在长官部汇报时,顾祝同也经常强调这些情报,督促有关方向加强防范。除了军事方面按此设想部署以外,行政方面还通报浙江省主席黄绍■、浙西行署主任贺灵扬、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等有关地区 严加防范。’

项英胸中的锦囊妙计是怎样泄露出去的?云岭新四军军部有两个联络参谋,一是上官云相 派的少校情报参谋闻援,一是顾祝同派的中校情报参谋陈淡如,再加上充当内奸、投蒋叛变 的作战处长赵凌波(谭震林力言此人不可重用,项英却偏偏看中他,把他放在作战处长这样 一个要害岗位上),军分会上的争论,行军路线,都是可以搞到的。

项英希望和国民党军队打一下,然后他率主力突破拦阻,突入天目山区,那时候,国民党 拿他没办法,共产党也拿他没办法,像赣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那样割据一方,自己说了算,徐图发展。这是项英个人摆脱困境的最好的出路,后竟全军覆没,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十二月二十八日军分会上确定了南下茂林再转东北这样一条新的进军路线,怎样向中央报 告呢?项英很费踌躇。一直挨了四天,到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他给中央发了如下电报:

毛、朱、王并致胡、陈:

最近情况与我们的行动：

(一)自我抗议电以后，顾即覆电解释：并非改道，而是增辟道路；我又去电，要求主力经苏南，顾覆电只允一个团主力，其余仍经江北。

(二)战区联参于三十一日晚，赶到军部，商量要求，意二十万款十子子弹可办到，今晨又赶回泾县与顾商妥，明后日前来。

(三)现彼方军队正调动布置，尚未完毕，并增七九师，四〇师到太平旌德一带，其计划为封锁围歼我，估计彼怕我走动，故事缓和。

(四)铜繁江边增加两只兵舰汽艇，不断梭巡，少数人也不能偷过。

(五)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定即突进，并采取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极大，我们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

(六)我们已不等其子弹款项，准备立即行动，一切准备完了。中央如有指示，请于明日（二号）最迟三号电告，否则，我们行动后，联络恐很困难。请转告周、叶。

项英的这份电报，说顾祝同不同意新四军主力经苏南北移，只允一个团走苏南习惯线，大部队要从云岭往北，从铜陵、繁昌间渡江，而铜繁间日本人又加强了封镇，这是为其南下茂林制造的借口；但他又没有把南走茂林、绕道往苏南这一最重要的情况明确备案。所以，三日毛朱覆电叶项：‘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朱德以为叶项是走习惯线，所以很快回了这么个电报。肯定开苏南‘完全正确’并不等于肯定南下绕道茂林‘完全正确’，项英要打的就是这个马虎眼。

其次，项英知道他确定的南下路线，触及国民党两个集团军接合部最敏感的地区，冲突定会发生，所以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预言：‘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言外之意是，只要一打响，北渡的任务即自然解除，‘不得已’，留在天门山‘分散游击’。绕道茂林是虚晃一枪，项英根本就没有北上的打算。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晚上，皖南新四军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出发。第一纵队辖老一团、新一团，约三千人，傅秋涛为司令员兼政委，赵凌波为副司令员；第二纵队辖老三团、新三团，两千多人，司令员周桂生，政委黄火星；第三纵队辖五团和军特务团，约两千人，司令员张正坤，正委胡荣；军直属队和教导总队一千多人，总共九千多人。叶挺、项英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化名梁朴、小姚）随军行动。

六日黄昏，各纵队按计划行动。二纵队占领丕岭（国民党军战报称樵岭），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途中遇国民党军第四十师搜索连，战斗从这里打响。按照项英划定的行军路线，从云岭出发南进茂林后，应向东靠走星潭、三溪转东北，星潭是转弯北上必经之地。守星潭的是国民党军第四十师第一二〇团两个营。叶挺军长决心调新三团一个营出击，另外令五团的一个营侧面迂迴。坚决把星潭打下来。夺取敌人既设阵地，自然会有些伤亡。项英以此为由，坚决主张把打星潭的部队撤下来。有没有决心打下星潭，有没有决心北上，是真北上和假北上的试金石。项英以副军长否定军长的决心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于是在百户坑召开军分会会议讨论作战方案，一直耽误了七个小时。最后决定转头西进，经太平进入黄山。八日午夜，军部下令撤退。这时新三团一营已于当晚九时占领星潭。据新三团政治处主任阙中一回忆：‘天黑后我团即向星潭发起攻势，经过一夜的激战，反覆冲杀，八日拂晓前，即肃清

了星潭外围之敌，我团一营打进了星潭。我占领星潭部队正在巩固阵地，并准备继续前进时，突然听到了号声。号长说：“军部号调我部后撤。”我们很奇怪，不敢相信。我说：“昨天军长不是说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退就是灭亡吗？你不要听错了，再仔细听清楚。”号长再听了一会儿说：“没错，是调我们后撤。”（《皖南事变回忆录》第一〇三页）守星潭的第四十师少将副师长陈士章证实：‘一二〇团代团长苏子俊报告，该团有两营长负伤，阵地一部被新四军突破。’（《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七辑第三十七—三十八页）如因伤亡过大，打不下星潭这一东进的门户，转而向西，尚可理解；星潭既已打下来，既已占领了，不东进而改为西进，这就证明项英压根儿就不准备经星潭东进北上。他以北上为掩护，暗自执行他的天目山、黄山计划。

一九四一年五月胡服（刘少奇）在皖南事变问题高干会议上的总结中指出：

一直到今天来说，有一个问题我还怀疑的，这就是北移问题。中央对北移的指示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他（注：项英）总是以特点藉口，不执行北移的方针，一直到最后还是向南走，向茂林走。对这问题我们曾讨论了几天，谁也想不出道理来，据我的估计和推测，他向南走还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道理，只有项自己来讲才清楚，不过项英今天即使来（按：当时项英还生死不明），恐怕也不会讲了。据说，向南走是他们的计划，向南走一下是让敌人注意，迷惑敌人的判断，然后再向东转，钻空隙间突出来。我想，项英虽然不怎么懂得军事，但是这一点常识还是有的，不懂军事的人也不会这样做。自己是做大将的，为什么不走青弋江？这是顾祝同指定的路线，完全合法的，可以不经过战斗，他为什么不走？我想项英、袁国平都不会这样蠢，真正是赵麻子（按：指赵凌波）搞鬼吗？

既然是被包围了就应该突出 来呀！为什么撤回来（按：指从星潭撤回来）？我听说在紧急时候，李志高（按：作战科长）要求带一营人去夺口子，而且拿头担保的，夺不下来就杀头。但是他不相信，以后还是撤回 来了，所以这些地方，是值得我怀疑的。证明他一直到最后还是不北移，还是要在皖南打游 击，还是实行他的所谓黄山、天目山计划，不过是采取了在北移的口号下来进行的。另外，要么就是有奸细与蒋介石特务机关有联系做起来的，或者与特务机关没有联系只是执行南进 计划。不过这是他最大的阴谋，他认为这部队是他自己的，北移就不能统治了，就要送给人 家，就没有职务了。

新四军从星潭转回向西突围，集中茂林地区。茂林是块绝地，正位于青弋江上游两河之间，东西北三面是水，河深不能徒涉，南面靠山，直径不过四十公里。此时，国民党军在茂林 已完成合围。东南为第四十师，西南为第七十九师，正东为第五十二师，东北为第一〇八师，正北为第一四四师和新七师第二旅，西边是第一四五师，第六十二师为总预备队，位于旌 德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的前方指挥所附近。总共七个师一个旅，减去各师在原驻 地担任留守的三分之一兵力，在茂林前线集结的兵力为五万二千五百人，构成对新四军五比 一的优势。新四军向西突围又不成，项英决定向北退回云岭，与由北向南推进的敌第一四四师遭遇，血战一夜，仍无进展。

八日深夜，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带警卫人员不告而别，私自离队。党的领导失去中心，对军心士气影响极坏。叶挺于九日晨给中央和中原局发电：‘今（九日）晨北进，又受包围，现集中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子昆等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不告 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九日上午

九时，中原局(刘少奇)回电：项、袁、周不告而去，脱离部队，甚为不当。要求全军服从叶军长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之指挥，挽救危局，向苏南突围。十日，项英等因走不出去，与新四军五团相遇于途，不得已随五团返回军部。

十日，项英有请罪电上达延安，电称：

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蠡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部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到天亮，曾派人请希夷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着国平及子昆同我走，至九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及赶队到时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项英私心自用，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走到这一步，自己把自己毁了。

十二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叶挺、饶漱石：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但此时大势已去，叶挺纵有多大本事也难以挽回危局了。战至十四日，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而失败。叶挺为保全一部分力量，亲赴第一〇八师师部谈判，被无理扣押。袁国平在战斗中牺牲。除两千余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历史的这一页叫作皖南事变。

项英、周子昆在警卫人员掩护下突围后，隐藏在旌德北面的大山里。在他们周围聚集了失散的干部、战士六七十人。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等也在其中。又和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一天，工兵连副连长刘奎说：‘潭仓东面的濂坑(有人回忆是田坑)是个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沟长几十里，只有几户人家，都是外

乡人，森林茂密，那里有几个山洞特别隐蔽。’项英听完非常高兴，对大家说：‘搬到濂坑去，把胡明（按：留下坚持斗争的皖南特委委员）找来，这样我们和地方党的关系就打通了。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多人，这里的群众又这么好，我们还有枪，这样，很快就可以发展一个营到两个营。我们有李志高、谢忠良可以管机关嘛！管情报的有，管经济的也有，管地方的有胡明。这不是很好嘛！那我管什么呢？我管整个嘛！我们的条件是很好的，比我们在赣南打游击的条件强多了。还有那么多老战士可以当干部。’这就是项英临终前的所想所思。

搬到濂坑，有一个山头叫赤坑山，半山有两个洞，因坑壑较多，状如蜂房，叫蜜蜂洞，非常隐蔽安全。项英、周子昆，项英的副官刘厚总，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住上洞，其他人住下洞。项英说：‘下面是第一线，如果发现情况可以抵抗，掩护我，我们住在上面，我如果走不动，刘厚总他力气大，枪法准，又打过游击，有经验，可以背我上山。’就是这个刘厚总，因在一次烤衣服时发现周子昆的背心里藏有金条，他估计项英身上带的更多，又看到项英犯了错误，再不是当年的项政委、项书记了，就起谋财害命之心。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三日，一个雷雨交加之夜，刘厚总向熟睡的项英、周子昆和黄诚开了枪。项英头部中两弹，周子昆胸部中一弹，立时身亡；黄诚中两枪，一弹伤在右臂，一弹打在脖子上，没有死，成为这一谋杀案的见证人。刘厚总把项英、周子昆身上携带的经费（这不是贪污的公款，从红军以来，部队转移时，经费都是分散带在主要领导干部身上），包括黄金八两五钱、法币两万四千余元，以及金表、派克笔和自卫手枪搜出，向安徽旌德县国民党当局投降。

53 观局布子 毛泽东纵横有道 妄自尊大 蒋介石进退失着

一代枭雄蒋介石，在剪除各路军阀的战争中得心应手，但在‘剿共’战争是就没有顺利过，五次‘围剿’败了四次，吃亏的时候居多。皖南‘捷报’传来，短短几天功夫，‘消灭’了新四军几千人，‘俘虏’了军长叶挺，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惬意。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晚，他发表了《军事委员会解散新四军通电》，宣布‘若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又以‘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说：‘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意思是不牵涉政治问题，不牵涉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蒋自以为聪明得计。自此他的领袖的地位将更加巩固，领袖的形象将更加高大。但他过低地估计了共产党，过低地估计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事情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实现的。蒋介石处心积虑的推行‘反共’政策。要找机会和藉口兼并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实现所谓‘军令、政令的统一，这是必然性。皖南新四军由于项英的错误，使蒋介石找到了消灭新四军的藉口，

提供了消灭新四军的条件(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三十年元月皖南剿匪战役战斗详报》说:他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新四军‘状况判断错误,轻离老巢南过章家渡投我部署上最强之包围圈内’),这是偶然性。就小是小非来说,新四军不东出马头镇走习惯线而南下茂林,既违背延安的命令又违背重庆的命令,是错误的;但作为领导抗战的蒋委员长把一支抗战有功、驰名中外的军队率尔歼灭,这就从根本上输了理,在大是大非上输了理。蒋被这一出乎意外的‘剿共’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又来一个撤销新四军番号 and 审判叶挺,这就很难把自己的面目和投降派相区别了,从而在政治上陷入了完全的被动。

一月十七日晚上,当中央通讯社广播‘通电’和‘谈话’掩盖国军围歼新四军真相,说新四军被‘编遣完毕’的时候,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拟发表新四军被围歼真相的新闻,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扣下稿件,超一流的政治家周恩来立即在第二版开了‘天窗’的地方题写: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中华民国三十年一月十七日夜

周恩来

在第三版开了‘天窗’的地方题诗一首: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周恩来

那浑厚苍劲的周体字刻成木版,然后拼版印刷。十八日黎明,印好的报纸从红岩后山偷运进城。当《新华日报》送入读者手中的时候,重庆轰动了。关心国事的人们扼腕叹息。

叶挺何人？孙中山先生忠实的部下，北伐名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领导人，无论在国民党军界和共产党军界，在政界和民众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蒋介石办人挑了个叶挺，大失人心。周恩来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把叶挺作为爱国抗日的旗帜举起来，寄托了军界、政界和广大民众对这位著名爱国志士的一片深情，深得政治斗争的巧妙！毛泽东在延安看到这张报纸，专门给周恩来一电，说：‘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叶挺领导的新四军，从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与敌伪作战两千七百四十二次，毙伤敌伪三万八千八十六人，俘虏敌伪一万七千一百三十四人。这样一支抗日军队被宣布为叛军，被取消番号，国人理所当然地把这看作是蒋介石准备投降日寇的重大步骤。

一月二十日，与重庆针锋相对，新建起来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反复广播了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称：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战，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軫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同时发表内部通知，以刘少奇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将中原局

与东南局合并,改称华中局,以刘少奇为华中局书记。刘少奇成为新四军的核心人物。一月二十二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重申:

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并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办法十二条:

-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按:西北国军胡宗南部增至二十余万,用以包围陕甘宁边区,并在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到黄河,修筑了绵延千余里的封锁线。);
-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从延安发出《关于对蒋介石的策略致彭

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电》，这是皖南事变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政治上斗法的策略总纲，电文曰：

(一)我们对于皖南事变及重庆军委会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之处置，见一月二十日延安军委命令及谈话。我们须一口咬定这是日寇与亲日派(不说蒋)的计划。关于所谓军纪军令迫我北移及各地捉人杀人一切反革命行为，我们均咬定是亲日派承日寇命令所为。这样一来，使我政治上处于优势，使蒋介石及国民党不得不转入辩护地位。并不是蒋与日本业已讲和了，关于蒋日间矛盾，即使很小，我们还是可以利用的。

(二)我们一月二十日的策略，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

(三)我们三个月来的让步态度(佳电及皖南撤兵)，取得了中间派的好感；但给了蒋以向我进攻的机会。这种态度愿立即结束，转到尖锐对立与坚决斗争的立场。

(四)一月十七日的步骤是蒋一大失策，我们须紧紧抓住，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

(五)如要转弯，除非蒋介石取消一月十七号命令及作其他必要表示，否则我们绝不能转弯。

(六)蒋的阴谋是各个击破，把新四军看成地方事件。我们却不能这样，必须把他看成全国性事件。

(七)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

(八)但蒋现尚未提及八路与中共，故我们亦不提及整个国民党及中央军，八路及中共人员亦不公开出面，看蒋怎样来，我们便怎样去，在这点上我们仍是防御的。

(九)不出三个月德必攻英，日亦还有可能攻华，世界局势必有

变化,蒋介石的气焰可能减低。但如英国根本失败,罗斯福应付不来,蒋的投降可能就大了。

(十)中间派的话不可不信,不可尽信,只有我们取坚决斗争绝不妥协的立场,才能真正争取中间派,否则,中间派的动摇立场客观上是于蒋有利的。

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估量了局势,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关于对蒋的策略又有补充和发挥,强调‘蒋介石的阴谋计划是对于我们及人民抗日力量采取各个击破政策。他现在宣称目前的问题是军事问题非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非全局问题,是内政问题非外交问题。我们必须全部揭破他的这种阴谋,必须指出他的先消灭新四军,再消灭八路军,再消灭共产党,再消灭其他人民抗日力量的各个击破政策。必须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全局问题,是与外交分不开的问题。必须指出这次事变是蒋介石发动全面破裂的开始,是准备投降的重大步骤,是日寇与亲日派推动蒋介石执行的整个阴谋计划的一部分,是西安事变以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但‘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在他还只宣布所谓新四军叛变,没有宣布所谓八路军与共产党叛变以前,我们亦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则当局字样或其他暗指办法,代替蒋介石的名字。对于何应钦等亲日派首领,则指名反对之。’

在历史出现大事变的转折关头,最见领袖人物的舵手作用。中共再不是一九二七年陈独秀时代的中共了,蒋介石低估了对手。毛泽东心明力定,方寸不乱,一着一式地跟蒋介石下这盘棋,几着就夺取了主动权,把蒋逼到防御的地位。

一月底,蒋介石派国民党代表张冲(淮南)拜访周恩来,希望缓

和,并以允许江南新四军 部队展期北移,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并扩大其编制为条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断然拒绝,表示不实行十二条,一切无从谈起。

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在中共的强大攻势和全中国、全世界希望中国避免内战坚持抗战的 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在中央纪念周发表讲话,公开出来为自己辩护。他说‘决不致因制裁叛逆而引起内战。’又大骂汪精卫,表白自己坚持抗战的立场与决心。说‘除了如汪兆铭汉奸 之流,以分裂与内乱的形式来进行他降敌卖国的罪恶以外,再无如此丧心病狂者来破坏抗战 ,出卖民族,作千秋万世的罪人。’这不啻是说:请诸位放心,我蒋某人决不作汪精卫。这 立场就软弱得多了。

蒋介石本想在日本人面前露一手。你米内阁开找汪精卫成立南京政府,搞什么‘中日提携’、‘共同反共’,算是瞎了眼。汪精卫手无缚鸡之力能成什么气候,看我稍有动作就能消灭 新四军。他希望引起日本近卫内阁的重视,更希望日军能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进攻予以配合。但一月三十日,东条陆相在日本内阁会议上说:‘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 日本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靠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接着就以五个师团的兵力进攻 中原,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十五万人于平汉路以东。河南战役是宜昌战役后正面战场上最大的战役。东条给蒋介石陡头浇了一瓢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 打破了。

二月八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居里来华面交致蒋介石信件,盼望国共合作。

二月九日,苏联斯大林大元帅通过军事代表团团长崔可夫告诉蒋介石:他不愿听到国共两 军冲突之事。

蒋介石愈来愈认识到,他策动皖南事变,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了愈来愈不利的地位。

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密授在国共关系僵局中的策略：

目前国共是僵局(如陈布雷所说)，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但如敌不攻，则僵局会继续)。

那时蒋对我表示缓和，我亦可以稍示和缓，但目前尚非其时。目前让僵局存在正是有利，愈僵愈于我有利，于蒋不利。目前的僵仅政治上僵(国共关系上僵)，军事上在我并不僵，因我并未去打他。如蒋再令汤集团进攻淮北，是他自造僵局，将来敌军再一击，他失败更大。如蒋不再打淮北，则目前就可解消他自己的军事僵局，仅剩一个政治僵局。蒋如聪明，应该如此。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十七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我之攻势已收成效，还会有成效的。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

恰在此时，美总统罗斯福代表居里提出要观光国民参政会；并向蒋介石表示，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不能大量援华。国民参政会是蒋介石粉饰民主的一个橱窗，蒋希望能让罗斯福的代表看到他抗战以来民主建设的政绩，看到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共产党参政员出席不出席参政会一时成为举世瞩目的一个大问题。

共产党参政员共有七人，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邓颖超。二月十五日，毛泽东等七参政员将中共中央提出的皖南事变善后办理十二条送达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表示‘在

政府未予裁夺前，泽东等耐难出席，特此达知，敬希鉴察。’参政会定于三月一日开幕。中国职业教育社、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乡村建设学会、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的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黄炎培、沈钧儒、李璜、冷 ■、梁漱溟、张君勱、张澜、褚辅成、周士观、章伯钧、邹韬奋、左舜生、罗隆基、江问渔、杨庚陶、张申府等一致提出：‘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必不可少。’给执政的国民党当局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蒋介石派张群、宋美龄频繁活动，拉拢各小党派。

二月二十七日，蒋介石会见民主党派领袖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勱、褚辅成、左舜生，希望民主党派出面做工作，劝说在渝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参政会。会见后，张澜等在张君勱公馆约见周恩来。左舜生说：‘中共如出席。国民党得面子，中共得全国同情。’周恩来诚挚坚定地表示：‘十二条有满意解决的办法，完全确有保证之后，才能出席参政会。’

据周恩来三月一日打给毛泽东的电报说

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亲提主席名单（按：周恩来参加主席团），昨夜今朝连续派两批特使迎董、邓，一百多国民党员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提议，最后延期一天，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无精打彩地讲话。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产党中央。毛同志的威信，在两个参政员及我们的态度上表现出来了。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没有共产党参政员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三月八日，蒋介石被迫在会上答覆中共的十二条，并保证说：‘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希望参政员诸君本着精诚团结，共同御侮的精神，诚恳地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 劝勉，使中国共产党能切实改变他过去的态度与行动，各中共参政员能在参政会内共聚一堂，精诚团结，来从长讨论他所要提出的问题，以求得合理的解决。’

三月九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即使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剿共事实亦不至发展。’以安全国人心。

三月十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我们攻势(十二条及不出席)结果，迫得蒋介石作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向全国公开了(借一切国民党报纸发表我们的十二条同时暴露了蒋介石的 真面目)，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攻势的结果。’蒋的演说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董必武为常驻参政员及近日西安放人(按：一月底，由西安撤退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李华等二十五人，持有合法护照，但行至同官，被国民党第十六军扣留)，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至此，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即被打退了。

一九四一年的头三个月，政潮跌宕起伏，险象环生。靠毛泽东的运筹掌握，周恩来折冲周旋，中共在政治上获全胜。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进一步低落，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

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本想是消灭、削弱新四军，不料想，经过毛泽东七斗八斗，却为新四军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原因是新四军既被蒋介石宣布为叛军，撤消了番号，即不再隶属于蒋介石为统帅的国民革命军序列了，它成了花果山上的孙悟空，蒋介石统一的所谓‘军令、政令’，再也套不到新四军头上了。蒋介石既没有全面破裂、挑起内战的决心，就只好容忍新四军在长江南北的生根和发展，再也不提把新四军调往黄河以北的事了。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将长江南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黄克诚部编了七个师，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

兹委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所属各师之军政负责人如下：

1. 粟裕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刘炎为政治委员，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

2. 张云逸为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

3. 黄克诚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吴文玉为政治部主任。

4. 彭雪枫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注：后为邓子恢），萧望东为政治部主任。

5. 李先念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

6. 谭震林为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

7. 张鼎丞为新四军第七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毛泽东起草了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名义给刘少奇、陈毅的指示，提出在华中应建立三个战略地区：

第一个基本战略地区是鄂豫陕边，其办法由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三地逐步向西推进，以在一年内达到在鄂西、豫西及陕南，建立游击根据地为目的。

令彭雪枫准备几个精干支队，待汤、李、何大部向西应战，淮西空虚时，渡过淮河，向淮河平汉间发展，如此着成功，则战略上绝大胜利，替我华北部队开辟了一条南进出路。

令张云逸、邓子恢向皖西发展，应使他知道打破桂军进攻，主要是取外线发展的方针，桐城根据地是绝好的战略基地，此次敌军进攻，莫树杰（按：桂系第八十四军军长）已令其商城部队应战，如敌军打汤、李、何后移向在大别山集中的桂军主力进攻，张邓就可将主要发展方向移至皖西。去年十月你们覆电谓巢湖、瓦隔（埠）湖间不过百里。通过甚难，但现时我在无为、桐城已有根据地，虽只一二县，其战略意义却胜过敌后大块根据地，应极端重视之。

李先念的发展方向是鄂西、豫西、鄂东三方面，鄂东即令现有之浠水黄冈支队及路东支队担任，加强其政治领导能力，鄂西豫西均随着日寇的进展向前推进。

华中第二个战略中心是江南根据地，又分为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四方面。

苏南是江南聚集力量的中心，应用大力经营之。……该方将来应准备出天目山。

皖南，应派人过江指导残余力量，仍在芜湖一带抗日，在一年内逐渐聚集一个二三千人枪的支队，联系地方党，准备将来向黄山及赣东北发展，不要全部过江，已过江的待生息一时期后仍可考虑派他们回到芜湖一带去。自一月十七日后形势大部改变了，过去项英错误的南进政策，用在今后就是正确的。皖南损失据国民党报导亦只伤亡二千余，俘虏三千余，项部原有万人。似尚有三千左右已突出或被击散，你们应注意派人指导收集。其往苏南者即在苏南行动，不要过江了。苏南应加强无线电通讯，该方至少要有五个电台，皖南应立即着手建立一个电台。曾希圣愿打游击，不愿做老工作，可以就令他带领现到无为的部队，将来可令他回到皖南去。如可能并必要时，你们亦可考虑派孙仲德（按：江北游击队司令员）随曾希圣过江。

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

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淞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

闽浙赣边,该方有三个藏有少数武装与民众基础甚好的小根据地,你们目前应开始了解该方情况,小饶(按:饶漱石)曾有详报,如你处没有,可转给你们。该地目前是加强地下工作,准备将来武装起义,恢复过去公开根据地。

第三是苏鲁战区,这是目前其中的基本根据地,主力所在,用力最大,并应准备于一年内消灭反共军聚集大量武装力量的地方,但你们应把这地方看作向西向南发展的策源地,他在总任务上的作用是出干部派军队向西边南边去的地方,好像汉高祖的关中。

毛泽东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华中是国共两党必争之地。汉高祖刘邦当年经营关中是为了后来和项羽争天下;毛泽东下大力经营华中是为了将来和蒋介石争天下。这一番军事上的部署,不仅把蒋介石在茂林所占的小小的便宜冲销净尽,而且在长远的战略意义上,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与毛泽东逐鹿中原的斗争中,使蒋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

蒋介石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发轫于《中央提示案》,要把华中的新四军赶到老黄河以北,因此才有毛泽东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移到长江以北的让步,以及长江以北新四军请免移黄河以北的商谈。毛泽东多次约束项英:‘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苏北、皖南军事部署的指示》)这是第一次制止项的南下计划。‘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不利的。’(一九四〇年十月八日《毛周王关于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移动方的电报》)这是第二次否决项英的南下计划。为什么不让项英南下黄山、天目山?因为那是‘友党后方’。‘在团结

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毛泽东恪属于大策略家,不搞小智术,小阴谋,小动作。他制止项英南下,在政治上则占住个‘理’字;他‘遵令北开’,在国人面前则赢得了一个‘让’字。在这种情况下,上官云相把皖南新四军给歼灭了,蒋介石又来一个撤销番号,那好,你不仁则我不义,长江以南地区我要放手发展力量了,黄山、天目山我也要派人去了,但重点还是在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发展。还打新四军的旗子,说明我坚持团结,坚持抗战,蒋介石撤销新四军番号只是撤销自己对新四军的统率权和发言权。新四军不受任何约束的发展起来了。有理、有利、有节、这就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格。

54 不忘农民 指导根据地建设 志在中华 设计共和国蓝图

毛泽东对中国的农民问题有着深刻、卓越的理解。他的群众基础是农民,他的最广大的追随者、信仰者、拥护者是亿万农民。苏维埃运动时期他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把古老的封建社会闹得天翻地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停止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靠什么维系共产党和农民的联系呢?靠什么发动、唤起农民呢?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指出:

抗战以来,我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这一政策,在各根据地实行以后,曾经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团结了各阶层的人民,支持了敌后的抗战。

中央在详细研究各地经验之后,特将我党土地政策作一总结的决定。

(一)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

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

(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下雨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只是对于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才采取消灭其封建剥削的政策。

(三)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份与政治力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不但有抗日要求，而且有民主要求。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富农有其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为中农贫农所不满，故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时，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在对富农减租减息后，同时实行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一部分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地主(所谓经营地主)，其待遇与富农同。

(四)上述三条基本原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土地政策的出发点。四年以来的经验证明，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才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正确的处理土地问题，才能联合全民族支持民族抗战，而使日寇完全陷于孤立。一切过‘左’过右的偏向，

都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

所谓减租,是照抗战前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二五减租’是一九二六年九至十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以及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代表的联席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名义提出,并获扩大会议通过的,但国民党从未执行过(蒋介石直到败退台湾才实行了减租政策)。减息是对于抗战前成立的借贷关系,为适应债务人的要求,并为团结债权人一致抗日起见,而实行的一个必要政策。具体办法是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如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超过原本二倍者,本利停付,债务了清。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减息是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所谓‘过去’和‘今后’,大体上以‘七七’抗战为界限。

为了推行新政,为了和国民党争夺抗日根据地的统治权,毛泽东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就提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他强调: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个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

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谨以晋绥解放区为例来看毛泽东是如何通过他的新政权和新政策与农民保持休戚相关的联系的。

晋绥边区西临黄河，东至汾河，北越平绥路迄蒙古草原，南括吕梁山脉。全境纵长一千公里，横广二百五十公里，包括山西同蒲路以西的大部，绥远省黄河以东及平绥路以北的地区，包括山西的兴县、岚县、神府（神木与府谷合并，原属陕甘宁边区，后归晋绥）、保德、河曲、五寨、岢岚、神池、偏关、平鲁、朔县、左云、右玉、怀仁、大同、山朔（山阴与朔县各一部）、宁武、静宁（静乐与宁武各一部）、忻县、崞县、中阳、石楼、临县、离石、方山、静乐、孝义、灵石、汾阳、平介、文水、交城、太原、清源、徐沟、阳曲、洪赵（洪洞与赵县各一部）、汾西、大宁、永和、隰县等四十一县及绥远的和林、清水河、凉城、归绥、武川、陶林、兴和、集宁、丰镇等九县，有人口五百二十二万人，大部为汉族，并有蒙、回、满等少数民族。

抗战初期，李服膺部（国军第六十一军）不战而逃，致使大同失陷。当日军踏进长城，突破雁门关，深入晋西北时，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〇师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连克宁武、神池等县；并派宋时轮支队深入雁北，收复平鲁、右玉，摧毁了伪政权，开展了雁北地区游击战争。经过两年浴血奋战，大小战斗五百一十七次，毙伤日伪军二万一千五百九十五名，自己也付出了伤亡一万四千四百五十九人的代价（贺龙：《一二〇师抗战二年来的总结》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九日），开辟了晋绥边区。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在兴县举行了晋西北军政民代表大会，出席各地代表一百余人，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

晋西北行政公署(后改称晋绥边区行政公署)。续范亭当选为行署主任。续范亭是老同盟会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讨袁、倒曹(锷)、反吴(佩孚)诸役。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目睹蒋介石倒行逆施,爱国忧民,曾在南京中山陵前剖腹自杀,以警当政者。遇救后回山西从事革命活动,与共产党密切合作,成为新军领袖。

一九四一年十月,行政公署政务委员会决议组织临时参议会,以续范亭(国民党元老)、林枫(共产党代表)、刘少白(地方开明士绅代表)等十五人为筹备员。经过一年筹备,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在黄河边一个村子里开幕。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乐曲声中冉冉升起时,许多敌占区参议员仰望国旗,感奋落泪。参议员一百四十五人,其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党无派以及工、农、兵、学、商等各界人士,也有满、回兄弟民族的代表。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三制的原则,在一百四十五位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只占四十七席,未及三分之一。经过十八天讨论,大会通过了《巩固和建设晋西北施政纲领》、《保障人权条例》、《减租交租条例》、《减息交息条例》等一百一十二件议案。选出林枫为议长,刘少白、牛荫冠为副议长。续范亭、武新宇当选为行政公署正副主任,贺龙等十九人为行政委员。县区村三级政权也都进行民选,妇女也有了选举权与被选权。如兴县二区当选的区政府委员的成份,贫农五人,中农二人,富农二人,地主二人,地主中一人为副区长,一人为财政助理员。整个晋绥边区一千二百八十二个区级干部中,中农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六,贫农占百分之二十七点四,地主、富农占百分之十九点九,其他成份百分之十六点一。据兴县、临县、河曲、保德等十一个县五十五个行政村调查农村代表中有百分之四十四是中农,百分之三十八是贫农、雇农和农村工人,百分之十七是地主、富农,商人占百分之一多些;代表中妇女占百分之九点九;村长中百分之三十二是中农,百分之五十四是贫农,

百分之十四是地主、富农。

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各村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晋绥边区农村的特点是土地集中和高租重利。如河曲县五花城、河北庄、夏营、巡镇、樊家沟五村,百分之三点三的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百分之五十四点五;宁武县宁化堡一百零三户中,两户地主占去全村一千垧(每垧为三市亩)土地的七百垧。地主土地的集中过程,就是农民经济破产并走向赤贫的一部血泪史。许多农民土地被地主用欺骗、高利贷、抵押等几十种方法霸占了去。几百万农民在高额地租下喘不过气来。尤其抗战以后,由于战乱的破坏,土地产量锐减,租率比战前原租率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据调查,兴县、宁武一带一般租率是百分之四十,河曲、保德地区一般是百分之五十,临县、离石等地区最低是百分之三十七,最高竟达百分之八十。如遇荒年,一般交租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有的把收获的粮食百分之百的交了租还不够。同时,地主还要直接剥削农民一部分无偿劳动,如担水、打杂等;另外还有额外剥削,如春节、婚丧,佃户要给地主送礼。

高利贷的剥削同样普遍而严酷。方山县潘家坂的刘司功老汉,一九二一年借了地主李云河一石米,作价四十元,以三眼窑和二十四亩地的老契作抵押,第二年利钱还不起押了二亩水田,第三年又押了一亩水田,第四年押了十二亩山地,第五年一算账,连本带利还欠三十元。拖到一九二八年成了四十元,结果把三眼窑卖给李云河,院里几棵树也白白给占了去。抗战时期的广大农民大多呻吟在旧债的高利盘剥之下。

高租高息的盘剥,再加租佃关系不稳定,使农业生产处于萎缩状态,农民一家老小吃糠菜树皮,也难得一饱。

一九四三年,在中共晋绥边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农村开展了空前的减租减息运动,一直继续到一九四五年春;后来又展开查租

运动,以保证减租的彻底实现,并把减租运动推展到新由敌人铁蹄下解放的地区去。一九四三年冬兴县曾举行过一次包括九十一个自然村、一千五百户农民的减租保佃大会。在会上农民公开揭发地主的种种残暴行为和非法剥削。佃户马明启曾被地主在冬天剥过皮袄,吐过满脸吐沫,打过无数次耳光。有的地主逼债在除夕把佃户的锅搬走,抢走农民的最后一升粮,最后一条被子。在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农民面前,多数地主都减了租,把多收的租子退出,强夺的土地退回。但也有顽固不化的地主,用各种办法欺骗威胁农民,明减暗不减,或‘减租三斗,失地三垧。’政府出面给农民撑腰作主。减租减息法令是临时参议会共同讨论通过的,政府也注意保护地主的合法权益。凡是地主奉公守法执行减租减息的,政府也保证农民交租交息。所以,减租减息法令的贯彻施行,增强了各阶层团结抗日的力量。根据兴县、临县、河曲、保德、偏关、岢岚等十六个县的部分统计,在三万七千七百多户佃农中,减租五万九千九百六十石,退租(地主强迫多收退给佃农)二万七千石。清债方面,十一个县不完全统计,一万零八百九十二户负债户,减免本息折合粮食二十五万五千石,银洋十五万元,法币一千八百万元。青年农民雷狗碰清债以后拍着一个农民的肩膀说:‘这下可好了,把祖宗三代的老穷根也抽了!’兴县农民温象栓,一九三五年后,一大家人租种一百七十多垧地,每年光交租子就是八十二石,还要出牛租、利钱,一年到头还是不够吃。一九四〇年新政权建立后实行减租减息,他很快就劳动致富翻了身,一九四二年买进七十垧地,成为一个富裕农民。他说:‘共产党、八路军、新政权救了我。’一九四二年他被选为特等劳动模范,县和边区参议员。

减租减息后,农村经济有了惊人的恢复和发展,这对于支持长期抗战是有重大意义的。一九四三年秋季反‘扫荡’后,兴县人民一次慰劳部队猪羊七百二十头,鸡六百二十六只,米麦七千三百四

十二斤,以及大批菜蔬、纸烟等。为使战士在前方安心作战,群众对抗日战士家属主动照顾。每村都有代耕队,保证代耕土地不低于一般土地产量。一九四三年临县等十一个县给抗属发优待粮七百五十多石。

自一九三九年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国民政府停止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加上脱产武装人员的增加(至一九四一年八路军由抗战初期的四万多人发展到四十万人,新四军由一万余人发展到十万人),根据地人民的负担还是很重的。一九四二年八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忽然天气骤变,阴云四合,下起雨来。一声炸雷,把礼堂的一根木柱劈断了,出席会议的延川县长李彩云不幸遭雷殛而死。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老天爷不把毛主席殛死?’此事作为社会动态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保卫部门要抓‘反革命’,毛泽东制止了。让仔细查询群众为什么对政府不满?为什么恨毛泽东?查询结果是因为征粮任务太重,群众负担不起。毛泽东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粮任务从二十万石(每石一百五十斤)减至十八万石。

为了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毛泽东就发出了‘精兵简政’和‘生产自救’的指示。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率领下,开入延安东南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的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以缓解因延安机关人员太多造成的陕北人民负担过重的矛盾。‘雷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竭泽而渔的政策将使共产党在陕北难以立足,如果失去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将来如何能够夺取天下?!他对此看得很重,思虑很多,觉得光一个旅军垦屯田还不行。一九四三年初春,在延安召开了军民大生产动员大会。中央直属机关人员、抗大学员和第三五九旅指战员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以他特有的风格作了动员:

同志们！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条是眼巴巴地等着饿死；一条是散伙回家不干革命了；还有一条就是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这三条路我们应该走哪一条呢？我们肩负着解放中华民族的重任，当然只能走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道路，也只有这一条是通向光明的路，是通向胜利的路。党中央号召边区全体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建设边区，保卫边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机关也制定了生产计划，分片开荒种地。毛泽东在杨家岭附近分了开一亩荒地的任务。警卫人员说：‘主席工作忙，成夜处理文电，白天要休息，由我们来开就行了。’毛泽东说：‘你们有你们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当天下午拿着锄头来开荒，在警卫员、勤务员的帮助下，干了几个下午，种上蔬菜。后来又和十几岁的勤务员王来音一起抬大粪施肥。这事被杨家岭一个从来不事生产的二流子看到了，感动得流着泪跑回家，扛起锄头就下地生产去了。毛泽东的行动，当然不只感动了一个二流子，而是传遍了各个抗日根据地。这是最好的动员，无声的命令，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都效法毛泽东的榜样，带领部下，带领人民，干起来了。所有边区的机关干部、学校学生、教职员等也都进行生产，平均每人每年生产一石到三石小米交公。行政人员一律从事生产劳动。县长给老百姓担粪一类的事，开始是传为佳话，后来就司空见惯，认为共产党的县长是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子的。干部的眷属也都动起来了，尽可能作到全部自给，以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

各边区机关部队生产成绩很大。晋绥边区部队在吕正操司令员（贺龙升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带领下到一九四四年共开荒十五万亩，两年产粮七万五千石。一九四四年产蔬菜二千二

百万斤,达到了部队自给的要求。另外,还产棉花一万斤,麻三千六百斤。晋绥边区军民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共开荒一百九十五万六千六百八十五亩,就耕地面积来说,等于创造了一个兴县或三个保德县。开荒之外,农民还兴修水利,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做,增产粮食。

人生产运动的开展,大大减轻了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在晋绥边区,把旧时的苛捐杂税一律废除,每年只收一次统一的、累进的抗日救国公粮。一九四三年人民的负担平均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七点四,以后又有下降。同在山西,阎锡山统治地区人民的负担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二以上。如中阳县冀家峪村,一九四四年产粮八百二十四石,国民党政 府征收达六百八十八石。所以一九四二年以后有一万多农民从阎锡山统治区逃到晋绥边区,在汾阳、离石落户的就有六百六十户,政府每户拨给细粮两石,群众又互济一石,政府还拨了七十万元贷款,并调剂土地、房屋、农具,帮助他们安家生产。

由于日寇和国民党的对锁,解放区布疋极度缺乏。几十万部队发不下衣去。夏天,战士们到河边洗衣服,要等晒干了,才能穿上回来。对这一类困难的解决,蒋介石是靠美援,毛泽东的办法是发动群众。毛泽东手里没东西,但他有政策。在晋绥边区,政府制定了奖励、扶持种棉纺织的政策。颁布法令规定:‘旧种棉区与推广区种棉收入,征公粮时,计算一半,试种区则完全免征公粮两年。一由于政策对头,大大调动了农民种棉织布的积极性。一九四〇年晋绥边区种棉三千六百亩,一九四一年增加了十倍,到一九四四年增加到十五万三千二百亩,一九四五年增至十五万亩,产棉百万斤。一九四一年,晋绥边区共有纺车一万三千架,土机(木制手工织布机,日产一丈)三千七百余架,快机(经过改良的手工织布机,日产五丈)只有二百架。因为宣布了纺织不纳税的政策,到一九九

四年,纺车增至五万四千四百九十一架,上机九千八百四十一架,快机一千四百八十五架,一九四五年纺车又增至八万一千七百六十二架,土机一万二千八百三十四架,快机二千零九十七架。妇女参加纺纱的一九四四年有六万一千四百七十人,一九四五年为九万六千零九十人。织布工人和家庭织布机上的妇女一九四四年为二万一千零三十一人,一九四五年增为:万九千六百四十二人。一九四五年晋绥边区产质量均匀的标准布三十万疋,解决了全体军民四分之三的穿衣问题。过年时,百分之白的群众都做了新棉衣。在纺织业的发展上,妇女真正起了半边天的作用。临县索达干村,全村二百五十户,一九四四年全年一切负担共计一百九十石,同年全村妇女织布八百十四疋,赚米二百五十九石八斗,解决了全村的负担还绰绰有余。离石县妇女张秋林,组织二十五个纺织小组,半年织出标准布六千疋,获利三十五万元。她丈夫参军了。一次鬼子扫荡抓住了她的九岁的儿子,一个鬼子兵拿刺刀逼着问:‘你的妈妈呢?’孩子在发着寒光的刺刀面前没有怯懦,响亮地回答:‘打日本去了!’‘你的爸爸呢?’孩子脖子一挺还是那句话:‘打日本去了!’鬼子一刺刀捅死了这个孩子。张秋林含着泪为儿子收尸掩埋,他说:‘孩子是敌人杀死的,不吃不喝也活不了。纺织合作社垮了,我怎么对得起群众?我要加紧织布,为我们的队伍做军衣,做军鞋,支援抗战,就是为我的孩子报仇!’这位普通妇女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被选为晋绥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抗属模范和拥军模范。

政策对了头,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晋绥边区在战争中还培育了工业的幼苗。到一九四五年统计,边区榨油业有油坊七百座,产油四百二十多万斤。有煤窑四百三十三座,产煤九亿斤以上。冶铁业产铁一百九十四万斤,熟铁二十五万斤。造纸业纸池二百座,产量为五十四万五千刀,超过了战前的产量。发展了硝磺

火药生产,建立了十几座小型兵工厂,能制造各种炮弹、子弹、手榴弹、掷弹筒,能修理各种枪械。建立的国营企业有:西北化学厂、制药厂、工具厂、纺织第一厂、第二厂、边区被服厂、染织厂、吕梁印刷厂和洪涛印刷厂等,有工人二千多人。

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一九四四年秋天在晋绥边区访问两个月。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他在纽约《下午报》发表文章说:‘边区的政府官员和防军从事垦荒、纺纱、织布,把他们的技术知识凑在一起,从乌有之中建立工业……。到一九四四年,他们得到报酬了。我和其他外国记者在那年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发现那边的老百姓和士兵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吃得好,穿得好。’

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大大密切了共产党和边区各界人民群众的关系,特别是密切了共产党和农民群众的关系。农民是最务实的。雷殛事件后,毛泽东决定将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三年征收公粮数,由计划征收二十万石减至十八万石,占农民收获量的百分之九点一;到一九四四年又减两万石,减到十六万石,占农民收获量的百分之八点五,其他税收也有减轻。陕甘宁边区政府征收公粮(平均每亩一升零九勺),比陕西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田赋征实(平均每亩二斗六升)要轻二十三倍。因此,边区农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提高。很多贫农、雇农上升为中农,很多中农变成富裕中农或富农。一九四三年以后,毛泽东开始成为农民心中的救主。陕北葭县农民李有源利用民歌作了一首歌曲: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泽东和朱德的像,开始出现在大会的主席台上,后来深入到了农民家里,代替了灶王爷的位置。晋绥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温象

栓说：‘没有共产党，就没咱老温！’兴县二区农民郝猫子说：‘你要问我什么时候翻身的吗？我不记那些，反正哪一年有了人民政权，我就是哪一年翻身的。’兴县东关一百多农民，大年初一由劳动英雄王建德领着到各机关去拜年，他们见了毛泽东的像就跪下叩头。西关宝珍，自己画了一张毛主席像，贴在堂屋，还写了副对联：‘长思救星毛主席，难忘恩人八路军。’农民李汝梅，过年时把灶君爷‘送走’，买不到毛主席像，自己写了一张‘毛主席万岁’的红纸贴在灶君位置上，供奉香案糕点。

在中国，谁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谁得天下，历代如此。毛泽东是深谙这一历史规律的。他领导着一场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比起李自成和洪秀全来，这种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是新式的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毛泽东必须对他领导的这场新式的农民运动作出理论上的说明。为此目的，他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写了《新民主主义论》。他说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蒋介石为了和毛泽东争天下，他必须要推行反共政策。对此，毛泽东说道：

反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们就请你加入他们的反共公司。但这岂非有点当汉奸的嫌疑么？我不跟日本走，单项跟别国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谁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汉奸，因为你不再抗日。我独立反共。那是梦话。岂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汉们，能够不靠帝国主义之力，干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么？昔日差不多动员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气力反了十年之久还没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独立’反之么？听说外边某些人有这么一句话：‘反共好，反不了。’如果传言非虚，那末，这句话只有一半是错的，‘反共’有什么‘好’呢？却有一半是对的，‘反共’真是‘反不了’。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欢喜‘共’，却不欢喜‘反’。老百姓是决不容情的，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你要反共，他们就要了你的命。这是一定的，谁要反共谁就要准备变成齑粉。如果没有决心准备变自己为齑粉的话，那就确实以不反为妙。这是我们向一切反共英雄们的诚恳的劝告。

毛泽东深切地感觉到了他的党、他本人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农民群众中扎下的根有多么深，充满自信地写下了上面这一段话。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者，又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继承者。他规划的蓝图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55 统一思想 确立领袖地位 整风运动 分清路线是非

一个团体、一支军队、一个政党都需要有自己的领袖人物，其社会上成就的大小，名声的清浊，地位的高下，与领袖人物的品格、才智是成正比例的。一场变革社会的伟大的革命运动，更需要有自己的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有了这样的领袖，才能把千千万万的追随者的思想行动统一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坚无不摧，攻无不克，取得变革社会的伟大成功。

到抗日战争中期，中国共产党把推举确立领袖人物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当时主要是与国民党斗争的需要。国民党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把蒋介石这样的军事、政治强人抬起来压共产党。共产党则把毛泽东这样的军事、政治强人抬起来与蒋介石相抗衡。四十年代中共的整风运动，就是一场统一全党全军思想，分清路线是非，正式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的运动。这场运动当然是毛泽东精心组织领导的，但也是中共领导集团的主要人物，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任弼时、王稼祥等取得共识的结果。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

们的学习》的报告。从此揭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整风运动是要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打垮王明教条宗派集团。在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集团作为中共党内的一个派别在组织上已被打垮了。但王明并没有彻底服输。一九四〇年春他在延安再版他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并作《三版序言》说:‘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白。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是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些材料的帮助。’这就是说,王明继续把自己的三‘左’路线说成是党的正统,而他本人就是这一正统路线的代表。王明以为,毛泽东是不敢碰他这本小册子的,因为小册子后面,站着第三国际,站着斯大林。毛泽东并不是没有投鼠忌器的顾虑,但他以东方政治家的机智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批评了教条主义者‘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改造的最根本的办法是:

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

(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这段话是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宣布独立的宣言书。首先说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不许动辄搬弄马列教条。其次说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只有参考借鉴的价值，不能照搬照套。对斯大林亲自主编的联共党史给以最高的评价，斯大林看了是会高兴的；那么，我学习依斯大林同志的建党经验和工作方法难道不对吗！毛泽东就用这种办法把批判清算王明集团的问题向斯大林备了案，斯大林只能容忍，不能翻脸。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反对‘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又发出《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虽没有直接批评王明集团，但要造成一个与王明的引经据典、搬弄教条迥然不同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大气候。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把清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特别是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王明、博古教条宗派集团所犯的‘路线错误’，提上了日程。

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对王明、博古教条宗派集团的路线错误定下了基调。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久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

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博古等人作了自我批评。

九月十二日，王明作了答辩性发言，坚持说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说博古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

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九月二十六日，成立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部学习。参加成员为中央委员、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师级以上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全国以三百人为限，内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党的二十年的历史。到十月四日又以中央学习组毛泽东、王稼祥名义通知各地高级学习组，暂不进行思想方法论的研究，集中精力研究《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同时阅读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及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上的报告。

经过半年的学习，在高级干部中统一了对三“左”路线的认识，明辨了路线是非，这就为在全党展开整风运动作了最重要的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造就是我们的任务。”并郑重宣布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二月八日，又在一次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对王明为代表的文风作了辛辣的嘲讽。他给党八股列了八大罪状：

第一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第二条：装腔作势，藉以吓人。

第三条：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第四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

第五条：甲乙丙丁，开中药铺。

第六条：不负责任，到处害人。

第七条：流毒全党，妨害革命。

第八条：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四三’决定宣告了整风运动的开始。全延安分成五个分区进行，即（一）中央直属机关；（二）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三）中央党校；（四）中宣部与文委所属四个学校；（五）边区系统。总共参加学习人数为九千余人。规定阅读十八个（后发展为二十二个）必读文件，其中第一、二件是毛泽东关于整顿党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第三件是‘康生两次报告’（二月二十三日康生在《解放日报》社传达毛泽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三月八日康生在《解放日报》社传达毛泽东关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是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康生的袍笏登场可以说是整风运动中的一股暗流。原来在一九四一年年底，康生在西北局干部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大讲他在莫斯科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王明对他是排挤打击的。他在讲台上挥舞一本小册子，那是王明的成名之作《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上面有康生的一些批语。他在‘两条路线’四个字旁边批道：‘实际是一条路线，即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把‘布’字改成‘孟’字，并批道：‘应该改为“为中共更加孟尔塞维克化而斗争”，那就真正名副其实了’。小册子的各页，圈圈点点，打叉划杠，书眉上批几句，书脚下批几句。拿这个证明，他是个反对王明路线的先知先觉分子，至于这份‘康批’小册子，是历史上的真货呢？还是急

就章赶制出来的假证呢？许多人心里有怀疑但不能问，也不敢问。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于毛泽东的整风运动到底要干什么有些放心不下。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日派来国际联络员兼塔斯社军事记者彼得·巴甫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一九〇五—一九五八)，医生奥洛夫和无线电报务员里马尔。十二日，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接见了他们。毛泽东给弗拉基米洛夫起了个中国名字叫孙平。孙平访问了王明，据他的《延安日记》记载：‘王明很不满意的讲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情形。在莫斯科，这个未来的佞臣原属王明部下。他极力的讨好他，讨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有有地位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时候，康生在所有的会议中，总是第一个跳起脚来，热烈地鼓掌，疯狂地大声喊“王明万岁！”’这就把康生的底揭穿了。所谓王明排挤他，打击他，纯属子虚乌有的神话。一个高呼‘王明万岁！’的人，是不可能背过脸去‘批注’小册子反王明的。

原来说王稼祥在三‘左’路线领导集团中觉悟最早，现在出了一个比王稼祥觉悟更早、更彻底的康生。于是一九四二年六月初中共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任，以康生为副主任，代替了中央学习组毛正王副的格局。

康生能够在本该轮到他倒霉的整风运动中飞腾起来，自然有多种原因。江青的内线工作，使康生对毛泽东在各个时期所思所想、所好所恶能够了如指掌，使他的投机无不中的，此其一。康生大奸似忠，博取毛泽东的好感，此其二。毛泽东需要保存和庇护康生这个权奸，此其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说毛泽东受了康生的欺骗是‘为尊者讳过’。康生那样拙劣的骗术岂能瞒过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精通‘南面之术’的毛泽东深深懂得，打天下，治理天下，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外部斗争，内部斗争，不仅需要一批具有文韬武略，能够经邦济世的正人君子，有时候也需要奸臣，主要是为了制约那些正人君子。例如当着‘文化大革命’中，需要把刘少奇打

成‘叛徒、内奸、工贼’的时候，把这样的事交给王稼祥那样的正人君子去办，就无论如何办不成；而交给康生去办就能够‘漂漂亮亮’地办好。此是后话，略过不提。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当时的延安集中了一批左翼文化人的精英。这是毛泽东与知识分子关系最好的时期。其原因主要是毛泽东自己手里有真理，他不需要压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服从真理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讲话》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至今看来仍是正确的。在当时确实得到知识分子们的认同和拥护。著名作家丁玲，以《讲话》为指导，跑到农村去体验生活，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反映农村巨变的长篇小说。这比她的成名之作《沙菲女士的日记》，对社会、历史的反映要广阔深刻得多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中央总学委召开第一次会议。规定‘总学委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第一批抽调笔记的名单由康生同志拟定。’

六月七日，中央总学委第二次会议，决定将中央学习组的百余名高级干部，混合编为十个小组，组长与副组长名单如下：

正组长

副组长

第一组 毛泽东 高 岗 谢觉哉

第二组 朱 德 彭 真 吴玉章

第三组 任弼时 杨尚昆 除特立

第四组 王稼祥 贺 龙 陶 铸

第五组	凯 丰	林伯渠	方 强
第六组	陈 云	罗 迈	蔡 畅
第七组	博 古	徐向前	陆定一
第八组	邵 发	陈正人	师 哲
第九组	李富春	叶剑英	胡乔木
第十组	康 生	谭 政	萧劲光

总学委还确定了抽阅各系统整风学习笔记的分工：

一、四学校（按：中央研究院、延安大学、自然科学学院和鲁迅艺术学院）及文抗（按：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笔记——凯丰、乔木、蒋南翔。

二、党校——毛主席、彭真。

三、军委——王稼祥、陈云、陶铸、陈子健。

四、中央直属——康生、富春、尚昆、曾固、曹轶欧。

五、边区系统——弼时、康生、师哲、廖鲁言。

总学委责成‘中央宣传部通知全国各地党部，按照延安经验，暂行停止其他政治、业务教育及党的历史研究，集中力量研究二十二个文件及检查工作，将整风运动开展到全党’。

总学委建立秘书处，由康生负责领导。

整风的第一年主要是在延安中央直属机关、院校和西北局系统进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学习了一下文件，有些地区没有认真开展起来。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总结了过去一年的整风运动，提出了下一年的整风任务。《决定》说：

自一九四二年‘四三’决定后，整风运动有了大的成绩。凡整风深入的地方，党内团结空前地增长了，干部中不正确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极大地改造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阀主义倾向也逐渐被克服了，面目不清的干部被审查明白了，暗藏在党政军民学机关内大批奸细分子被清查出来了。凡整风深入的地方，证明着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关键，是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关键，是二十二年来我党历史中一个大的创造事件。

这是对一九四二年‘四三’到一九四三年‘四三’这一年延安整风运动的估价。然后提出了下阶段的任务：

由于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还不认识整风的深刻意义，故在这种情况下的地方，还没有获得成绩。有些地方则在部分的机关学校部队中获得成绩，而在其它的机关学校部队中则尚未深入，因此中央决定从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到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除陕甘宁边区责成西北局重新做出整风计划外，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责成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依据战争环境特点，重新做出自己的整风计划。已经做成此种计划并在实施中的地方，则根据此次指示加以必要的修改或补充。

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的与反革命的斗争。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以来，我党增加了约七十万新党员，他们过去都是未受过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马列主义）的锻炼的。在数万老党员中，对于受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锻炼的程度也极不一致，其中有许多人仍然拖着

很长的小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尾巴，思想上的关节还未打通（其中并有若干重要干部）。对于上述新老两类同志给予深刻的整风锻炼，借以纠正其错误思想，打通其思想上的关节，坚定其阶级立场与党的立场，改造其工作作风，是完全必要的。

每一具体机关学校，从重新布置整风之日起，至少五个月内（战争时间不算在内）均须作为发现同志错误思想与纠正错误思想的时间。五个月后，方为开始着手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部分地清理内奸的时间。这样，一年以内（除去战争及其它繁忙任务所占时间）可以大体上结束整风学习，而把全部完成审查干部与清理内奸的任务，推至以后的时间。

这一年是毛泽东五十整寿，是所谓‘天命’之年。他有一种天降大任的使命感。发动整风以来王明已被反对教条主义的浪潮打得抬不起头来，请了长期的病假。其他在王明路线时期跟着犯过错误的人，都纷纷检讨自己，转变立场，对毛泽东表示臣服和尊崇。在遵义会议上反毛最坚决的凯丰（何克全），这时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给毛写信建议为他祝寿，并要在报上宣传毛泽东主义。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给凯丰回了一信，说：

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成熟。

这时的毛泽东头脑是清醒的，态度是谨慎的。他要把全党团结起来，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他一反王明路线时期处理党内矛盾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对整风运动的指导方针

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中共全党全军和解放区人民上上下下心悦诚服地尊敬他、信赖他，毛泽东成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领袖。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这是延安整风结果在组织上的表现：

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

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

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四同志组成之，由毛泽东同志任书记，王稼祥同志任副书记，乔木同志任秘书。

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尚昆、弼时八同志组成之，由刘少奇同志任书记，杨尚昆同志兼任秘书。

为着保证党务与各种政策能与军事行动取得更加密切的配合，决定刘少奇同志参加军委并为副主席之一。

为着分工又统一各地区工作的领导，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同志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同志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同志负责管理（因为陕甘宁晋西北在军事上已统一，财政亦趋统一，决定晋绥分局以

后由西北局直接领导),大后方工作归陈云同志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同志负责管理。而管理各地区工作的同志,对其管理的工作,直接向书记处负责。

这一人事调整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除王明以外,所有‘三左’路线的领导骨干都团结使用,安排了工作。第二、毛泽东担任了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局部地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时‘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第三、刘少奇作为第二书记,又参加军委工作并任军委副主席,从而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和中共领导集团中的第二号人物,

在组织上完成了将毛泽东定于一尊的任务后,以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清算党内的孟塞维主义思想》为代表,完成了在思想上、理论上和历史地位上将毛泽东定于一尊的任务。该文指出:

从有马克思主义以来,在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就有真假两派马克思主义者。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充满着这两派马克思主义者斗争的历史,那末,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也同样的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样充满着这两派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这是我们一切党员必须彻底认识明白的。

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中国,就是陈独秀、彭述之和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就是李立三路线,就是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是教条主义。这些东西,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孟塞维主义,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他们历年来所坚持、所奋斗的路线,他们的工作方法,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

中国党的历史，应该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党内各派机会主义的历史，决不能成为党的历史。党内孟塞维主义的体系及其传统，决不能成为党在思想上的体系及传统。党的历史，是与这种体系传统斗争并将其克服粉碎的历史。为了肃清这种传统的残余，给这种传统以暴露，是完全必要的。

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塞维主义思想。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二十二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

七月八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王稼祥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章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术语提出来。他说：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之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内敌人的斗争，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六日,周恩来、林彪从重庆回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叶剑英的热情迎接。

林彪在平型关战斗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行军途经山西隰县时,被阎军哨兵误伤。是年冬赴苏就医。一九四二年一月回国。八月十四日,蒋介石约周恩来晤谈,提出想在西安与毛泽东见面。毛采纳周的建议,以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往重庆见蒋。十月七日林彪到重庆,先后於十月十三日、十二月十六日、十二月二十四日三次见蒋;并与何应钦、张治中多次会晤。林彪是黄埔四期毕业,与蒋有师生之谊。毛派林见蒋,意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晚上,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举行晚会欢迎周恩来。毛泽东亲自出席。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讲了国际国内形势,讲了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在毛泽东领导下全党各项工作的伟大进步,然后以特有的自然朴实的风格,讲了毛泽东希望他讲的话:

这一切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

同志们：我们有了这样的党，不应该骄傲么？我们有了这样的领袖，不应该骄傲么？

如果说，刘少奇代表了毛泽东的追随者拥立毛泽东，王稼祥代表了除王明以外三‘左’时期领导人和追随者拥立毛泽东，周恩来则是代表了中共的元老派拥立毛泽东。连周恩来这样的大能人都服了毛泽东，谁还能不服呢！毛泽东真像是一轮红日一样不可阻挡地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升起来了。

56 天良未灭 胡宗南中途罢手 文章传世 陈伯达脱颖而出

一九四三年二月，驻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以绝密件向胡宗南及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下达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从而掀起了抗日战争中第三次反共高潮。蒋指令有关部队‘与现地掩蔽，作攻势防御’，俟机转取攻势时，‘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进而‘收复陕北地区。’此时胡宗南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在西安小雁塔荐福寺设副长官部，蒋亲授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希特勒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后，亲苏的新疆盛世才投蒋，‘西防苏俄’的任务减轻了。胡宗南指挥三个集团军，主力第三十四集团军（辖第一、第十六、第九十军）在潼关至宜川担负对日作战，确保河防的任务；第三十七集团军总部驻三原，辖三个军，从南面包围陕甘宁边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驻平凉，辖三个军，从西面包围陕甘宁边区。所谓‘囊形地带’指淳化至马栏镇地区，这是八路军关中军分区防地，占战略要冲，从地图上看这块地方像个布囊一样插入国民党统治区，向南可以进逼西安，向东可以切断咸（阳）榆（林）公路，蒋介石第一步想把这块地方切过去；然后占陕

北,打延安。

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发表了他的理论著作《中国之命运》。为了加重自己身上的学者色彩,蒋公在日理万机之余又兼任了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蒋是军事领袖,进而当了国民党的总裁,成为政治家,如今要由‘英雄进而成为圣人’。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之命运》一书是大小官员人人必读的政治圣经,教育部规定学生必读,并列为正规考试课目。

住在重庆郊外黄山别墅的蒋介石自从荣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以来心情特别好。他回忆着这两年一幕幕的历史巨变……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日本近卫内阁倒台,东条英机出任首相。蒋认为东条上台,势必对美、英开战。这一步他看对了。十二月八日,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指挥他的联合舰队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这天晚上,蒋介石兴奋得一夜未睡。凌晨四时许,驱车返城,上午八时,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对日、德、意宣战。蒋对国际风云,火色看得是够老的,跟日本人打了四年半才正式宣战,这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十二月二十三日,在蒋的提议下,中、美、英、苏、荷五国军事联合会议在重庆召开,讨论了共同作战计划。十二月三十一日,在罗斯福提议下,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包括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盟军最高统帅,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尽管蒋当了半辈子中国军队的统帅,但对洋人封的这个官引为殊荣。接着美国又给了十亿美元的贷款。为了配合美英作战,蒋派杜聿明为缅甸远征军第一路军代司令长官率十万人入缅参战。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蒋忙里偷闲出访印度。二十一日归来时,专机飞越缅甸上空,遭日机十八架尾追,情况十分危急,机上人员系好降落伞;均甚慌张,独蒋镇定自如,读书不辍。传扬开来,他赢得了部下极大的尊敬。十月上旬,美、英将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通告送交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蒋十月

十日的日记写道：‘接获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之通告。此为总理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中心快慰，实为平生惟一之幸事。’这就是蒋介石写作《中国之命运》前后的心境。他要利用自己的优势，打败共产党，收编八路军，统一解放区。《中国之命运》的中心思想是：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以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恰在这时，又发生了第三国际自动解散的事情。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发出《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提议书说：

希特勒匪帮掀起的世界战争，使各国间情形更加尖锐。它在附和希特勒暴政的国家与爱好自由的、团结在反希特勒同盟之中的民族之间，划下了深刻界限。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从上述各项考虑出发，并估计到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与政治上的成熟，提议：

解散共产国际各支部对共产国际章程及历届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就在这天晚上，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召开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指出：

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约组织形式,已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因为,第一、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情况,比过去更为复杂,变化亦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又迅速变化的情况。第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集团与反法西斯集团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组织已不宜。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

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

六月十二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九人开会,以‘群众团体’的名义致电毛泽东,谓应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作为国家通讯社的中央社,向全国播发了这条消息。国民党控制下的群众团体,纷纷效尤,开会发通电,跟着鼓噪一阵,造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与论。

然后,胡宗南按既定部署,车辚辚,马萧萧,调兵遣将,向陕甘宁边区推进。蒋介石密令胡宗南从担任对日作战执行河防任务的第三十四集团军中,抽出第一军和第九十军,去攻占那个‘囊形地带’。预定的进攻日期是七月九日。

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熊向晖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了延安。

胡宗南的参予核心机密的亲信干部,竟是个地下共产党,这是很有传奇色彩的。熊向晖,安徽人氏,父亲是湖北高等法院的庭长,算是国民党系统的中级干部。向晖深沉机警,品学兼优,在清

华大学读书时由蒋南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受周恩来的派遣参加了胡宗南的服务团。在胡宗南召见服务团学员时语惊四座。胡宗南问：

‘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

‘参加革命。’熊向晖回答的简短有力。

胡宗南一怔，觉得青年学子们都骂政府不抗战，这个青年能有这样的认识实在难得，但又觉得不踏实，怕误会了对方的意思，乃再问：

‘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十九岁的熊向晖侃侃而谈：

‘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佩带中将肩章的胡宗南心里笑了，但矜持着：

‘怎样才是革命？’

‘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对反革命怎么？’

‘杀！’

经过这一场问答，胡宗南看上这个青年。为了慎重起见他还进行了‘家访’。熊父在湖北做官，所以家住武昌。胡宗南宴请熊父，摸清了熊向晖的根底。结论是：少年英俊，才识超群。就这样，熊向晖当上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侍从副官。

延安接到熊向晖的报告，于七月四日向第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第一二〇师贺龙、关向应，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第一一五师罗

荣桓、陈光发出《军委关于蒋介石进攻边区军事部署的情况通报》，明确指出国民党驻‘边区南线各军限七月八日准备完毕，待令攻击，故边区形势现已极度紧张’令各部在军事上有所准备。

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朱德致电蒋介石，揭露内战阴谋。原电如下：

重庆蒋委员长、参谋部何总长、军令部徐部长钧鉴：

自五月以来，边区周围友军，不断向职部进迫，职部均一再退避，所有经过情形，均经呈报，并电胡副长官宗南制止在案。自六月十八日胡副长官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后，边境突呈战争景象，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大举剿共。慨自抗战以来，职军奉命改编，六年于兹，而未尝稍懈。陕甘宁边区为城军唯一之后方，少数留守部队，亦安分守己，保境息民，从事生产与教育，陈周徐部诸联络参谋，久驻延安，以及胡副长官派来胡侯二联络参谋等，实所目睹，备致赞美。詎意近日形势突变，南线友军已作发动内战之积极准备。沿固原、平凉、长武、分阳、 邕、淳化、三原、耀县、宜君、洛川、宜川之线，除原有封销部队余师外，近复由河防阵地调动增加之兵力不下六七个师，声言大举进攻，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边区军民闻此意外事变，莫不奔走相告，骇异莫名。竊思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兵速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并使英美苏各友邦之作战任务亦将受到影响，心所谓危，不敢不告。除电胡副长官呼吁团结外，谨电奉陈，敬乞明示方针，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叩午鱼

这封电报揭诸报端，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关注，使蒋介石、

胡宗南陷入了极大的被动。这类电稿，不论用谁的名义发表，向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接着，毛泽东又为延安各界民众三万人参加的抗战六周年紀念大会起草了《关于呼吁团结 反对内战的通电》，其精彩段落有：

正当我全国民族团结抗战已经坚持了六年，愈益接近胜利的时候，正当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主动权已经转移到苏英美同盟国方面，德日意法西斯匪帮，已迫近最后失败的时候，不意中国抗战阵营中竟有一部分丧心病狂之日寇第五纵队（按：一九三六年十月，西班牙叛军和德意法西斯军队进攻马德里时，叛军将领拉诺在一次广播中说，他的四个纵队正在进军马德里，而第五纵队已在首都等待。从此，“第五纵队”成为策应敌人进攻的内奸、叛徒的代称出来响应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汪精卫、王克敏的反共号召，宣称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他们包围军事长官，企图将原在抗日阵地的军队转变为反共内战的军队。他们现在积极策动内战，怂恿军事长官，调动队伍，进攻边区。最近一个月来，除原陕甘宁边区周围，担任封锁边区的十余师军队早已积极准备进攻外，近日又从河防阵地，抽调抗日大军，移作进攻边区之用。根据确实消息，第一军主力第七十八师，第一六七师，已从华阴、渭南开到州、淳化，第九十军之第二十八师，第五十三师，已从韩城、郃阳开到洛川，第五十七军之第八师，已由西安开到中部，第十六军之重炮兵营已由河防开到耀县，原驻西安之炮兵旅，亦已开到淳化。

这段文字妙在给蒋介石、胡宗南留下了转圜的余地。明明是老蒋在发纵指示，却说是抗日阵营内部的‘第五纵队’‘包围军事长官’挑动内战。另外，毛泽东使用了情报资料，对胡部主力第一军、第九十军等部的调动，言之凿凿，了如指掌，这使胡宗南心中一震。

电文最后说：

我们请求蒋委员长与胡副长官，立即命令抗日军队仍返原防，保持团结，避免内战。我们掏诚忠告那些接受密令准备进行内战的军官和士兵，共凛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祸，鉴于过去十年内战之惨，不要打共产党，不要打八路军，不要打边区，不要枪口对内。

毛泽东两电发出，意犹未尽，文思泉涌。在延安西边枣园一所平房里（因王家坪修大礼堂，毛泽东于一九四二年夏搬到这里），他又挑灯工作一夜，撰成《质问国民党》一文，以《解放日报》社论的名义在七月十二日发表出来。因为是共产党机关报的社论，故站在两党平等的立场上，议论纵横：

许多国民党人肆无忌惮地天天宣传共产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么？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么？

请问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你们拿背对着日本人，日本人却拿面对着你们，如果日本人向你们的背前进，那时你们怎么办呢？

如果你们将大段的河防丢弃不管，而日本人却仍然静悄悄地在对岸望着不动，只是拿着望远镜兴高彩烈地注视着你们愈走愈远的背影，那末，这其中又是一种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日本人这样欢喜你们的背，而你们丢了河防不管，让它大段地空着，你们的心就那么放得下去呢？

照你们的说法，中国境内只有共产党是‘破坏抗战’的，你们则是如何如何的‘民族至上’，那末，背向敌人，却是什么至上呢？

照你们的说法，‘破坏团结’的也是共产党，你们则是如何如何的‘精诚团结’主义者，那末，你们以三个集团军（缺一个军）的大兵，手持刺刀，配以重炮，向着边区人民前进，这也可以算作‘精诚

团结’么？

或者照你们的另一种说法，你们并不爱好什么团结，而却十分爱好‘统一’，因此就要荡平边区，消灭你们所说的‘封建割据’，杀尽共产党。那么，好吧，为什么你们不怕日本人把中华民族‘统一’了去，并且也把你们混在一起‘统一’了去呢？

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人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地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毛泽东其人，思想如闪电，烁烁耀眼；文章若雷霆，隆隆有声。两封通电，一篇社论，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这当中，胡宗南做了件好事，不可不记。胡宗南是黄埔生中的佼佼者，受蒋信赖，事蒋以忠。蒋抗日，他拥护；蒋反共，他追随。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周恩来致胡一信谓：‘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胡珍藏信札，屯军西北期间。常以未能在抗日战场一显身手怅惘不已。这次军事行动事机败露，他积极向蒋建议罢兵，以‘委座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倘进兵陕北，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为说词，获蒋采纳，于七月七日电覆胡宗南，同意罢兵，恢复原态势。

熊向晖于十日把蒋介石的收兵令报告延安。毛泽东十二日又发一篇社论大张声讨，含有保护情报人员的用意。胡宗南读到《解放日报》十二日的社论，赞扬文笔犀利，然后哈哈大笑，说共产党情报不灵。

七月中旬，毛泽东读罢《中国之命运》，笑着对副秘书长陈伯达

说：‘蒋介石出题目了，你做篇文章吧。’

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这年三十九岁。北伐时给福建军阀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当过秘书。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九月赴苏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一九三〇年回国，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被捕，一九三二年二月经张贞派人营救出狱。一九三五年在北平任中国大学教授，讲授先秦诸子，并写过一些文史文章。在党内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九三七年秋来到延安，在马列学院当教员。因为探讨中国古代哲学，与毛泽东有了接触。经毛提议，他在延安开了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毛泽东亲自去听讲，大大提高了陈伯达的身价。一九三八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学会，陈伯达成了这个学术团体的负责人之一。一九三九年春，他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与秘书长李六如一起，管理毛泽东的精干的办事机构，他侧重于协助毛泽东从事政治理论和哲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陈伯达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写作任务，不知是为主席的文章提供一个初稿呢，还是为《解放日报》写社论，反正认为这是一项重要任务，得全力以赴。他回忆说：‘我一口气写了三天三夜（当然要吃饭，也略有休息）。我一面写，一面哭，我太激动了，因为极大义愤吧，我以前写过文章，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

使陈伯达出乎意料的是这篇文章一不用毛泽东的名义，二不用社论的名义，毛泽东审改过后，定名为：《评〈中国之命运〉》，署上了‘陈伯达’三个字。

在给周恩来看过后，七月十九日毛泽东给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副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详细具体地交代了对这篇文章的处理意见，信中说：

陈伯达的文章看过改过，送上请阅，请在今日或明天发表，以约五千字登在社论地位，其余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两天或三天广播之，并请广播两次。另印一小册子，亦请在日内印出，印一万五千份，分配延安一万份，发给各级干部、学校学生每人一本，连特务也每人一本；另印五千份交谭政发边区各分区各县。以此作一次大宣传。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按照毛泽东要求的版面，《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了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用电报传送到重庆，印成小册子在国统区广泛发行。文章分五部分：（一）关于中华民族；（二）关于中国历史；（三）关于中国近代思潮；（四）关于国共关系；（五）为中国民族前途呼吁，为中国民众、中国青年们、孩子们呼吁！全文二万四千字。

《中国之命运》和《评〈中国之命运〉》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大仗。国民党方面披挂上场的是蒋介石本人；共产党方面，毛泽东躲在幕后，也没让其他政治局委员上场，出阵应战的是名不见经传的陈伯达。毛泽东这样安排，是要表示对蒋介石及其著作的极大蔑视；但以陈伯达对老蒋，则使陈伯达从此成名。

据陈伯达回忆，文章开头的一段是毛泽东加的。内容如下：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蒋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远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中

《国之命运》出版后，陶希圣又写了一篇歌颂此书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了第一篇，这又使得许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央周刊》这样器重陶希圣的文章？难道蒋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传布不成？总之，所有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们的惊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这个开头确实是大处落墨。把真正的撰稿人汉奸陶希圣拉出来示众，就使蒋一生中这唯一的一部理论学术著作黯然失色。中国百姓的逻辑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既是汉奸写的东西，那些‘孝、忠、信、礼、义、廉、耻’，‘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的说教，则纯属欺人之谈。

《国之命运》认为：五四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共产党‘人主出奴’，挟洋人以自重。而蒋介石本人，则是‘中国古有的文化精神’的光荣代表，对此，陈文中有一段痛快淋漓的论述，专揭蒋介石的‘底’：

中国有一位大人先生，当俄国十月革命后和中国大革命时候，认为苏联对他是有利的，于是自己就跑到苏联去请教一番，并派自己的儿子到苏联去留学，并宣称‘中国革命必须受第三国际领导’；后来反共了，反苏了，于是到了东京，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头山满，宣称中日联合之必要；于是又进了‘外国的’基督教；后来希特勒在德国登台了，就又赶快派遣了自己的儿子及大批党徒到德国去留学，学习法西斯主义。货币靠外国，军械靠外国；有整整十年，还依靠这些去专打革命的中国人，而计划这种战争的，却又是外国人——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德国人叫赛克特；是德国防军的领袖；还来了一个德国警察厅长，专门传授特务方法。抗战了，货币、军械还是都

靠外国,连仗都想专门依靠外国人去打。这些都是什么?不正是所谓‘入主出奴’的思想和行为吗?这不就是‘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吗?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既是《中国之命运》论述的重点,又是《评〈中国之命运〉》评说的重点。陈文指出:‘书中这一部分是具有绝大挑拨性的文字,想由此煽动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仇恨。这一页重大的历史,关系中国的命运太大了,不可以不表而出之。’陈文指出:

一九二四年,即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指导之下进行改组,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时孙中山先生局处于广州一隅,革命旗帜不鲜明,甚至实力不出大元帅府一步,军、政、财……一切权力都握在假革命之名行反动之实的军阀手中,而国民党更无一处有健全的革命组织,足以为革命的辅翼。就是在这样时候,在孙中山先生的英明远见要求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援助的条件之下,中国共产党就挺身而出,援助了孙中山先生,益以苏联在各方面的援助,遂使得国民党改组成功,开辟了中国革命完全崭新的局面。

首先在革命旗帜方面,在革命政纲方面:当国共合作以前,国民党并没有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政纲。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本来限于反满,在反满以后,民族主义早已缺乏内容。即在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中山先生所写的《中国革命之经过》也如此表现。这是历史事实。……明白揭出反帝革命的旗帜,进行反帝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革命运动,这是使中国革命走上完全新的阶段,是中国由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指标。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在一九二四年改组以前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东

西,此种旧民主主义并没有包含彻底地反对封建社会制度,解放广大劳动人民的内容。中国革命民众必由此始能重新获得革命的方向,而动员起来。中国国民党必由此始能重新走上革命的正确道路,而和革命民众结合起来,获得革命的新生命。请问:谁首先给中国民众提出了这个明确的革命政纲?谁帮助了孙中山先生把这个革命政纲变成国民党的政纲?请问:这不是共产党是谁?……《中国之命运》的作者是亲身经过这一段历史的。大家都扪心自问吧,为什么不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呢?请问:抹杀这一段历史,这就是‘公’吗?这就是‘诚’吗?

其次:在国民党改组前,国民党的组织情形又如何?那不是几乎一切都被军阀、政客、贪官、污吏、地痞、流氓所把持所垄断的吗?那不是既无革命的组织、又无革命的宣传吗?革命的工农群众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不是都关在党外吗?但改组以后的国民党的组织情形便不同了:直到清党为止,国民党的组织变得有生气了,成份改变了,国民党的组织变得真像是革命的组织了,因而促进了大革命的胜利。请问:这不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帮助所规划的功劳是谁的功劳?大家都扪心自问吧,为什么不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呢?请问:抹杀这一段历史,这就是‘公’吗?这就是‘诚’吗?

又其次:在国民党改组前,孙中山先生的大元帅府所指挥的军队,有哪支算得起是革命的军队?有哪支能打得仗的军队?中山先生进行了多少年的北伐,有哪次北伐成功了?可是,在改组后,情形不同了,培养革命军官的黄埔学校建立起来了(开始创意组织这个学校的是孙中山先生,廖仲恺先生和俄国顾问,当时《中国之命运》的作者并不认识这个学校的重要,还不愿当校长呢),由此革命军队也建立起来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制度也建立起来了、这样就很快地两次打败了陈炯明,又打败了杨希闵、刘震寰,最后得以进行北伐战争。当时这种革命军队的建立和战绩是中国历史上空前

的,中山先生摸索了几十年,没有摸到门径,但一旦和 中国共产党合作,和苏联合作,几年之间,便有如此伟大的军事成就、国民党势力之所以得到武汉南京,所以有今天,是谁之功呢?大家都扪心自问吧,为什么不把这段历史写出来呢?请问:抹杀这段历史,这就是‘公’吗?这就是‘诚’吗?’

57 白日西驰 陈毅规劝李明扬 曲线救国 文强指导孙殿英

皖南事变后，陈毅在江北高举新四军的战旗，坚持民族抗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率领所部，开始了巩固和发展华中解放区的斗争。

江苏中部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基本阵地。苏中根据地处于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以东，北起斗龙港，东临黄海，面积约两万三千多平方公里，人口八百多万。这里临近南京、上海，扼制着长江下游北侧航运通道；盛产粮食、棉花、食油、海盐等重要战略物资，沿江城镇有纺织、加工等现代轻工业，商业兴盛，财源丰足；境内系平原水网，河流纵横，公路交错，交通便捷，历来是官僚资本江浙财团的重要原料基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沦陷后成为日本侵略军的重要后方和人力、物力、资源的供应基地。所以，苏中地区成为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侵略军三方必争之地。

一九四一年春，成立苏中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后兼政委）。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辖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以粟裕为师长（后兼政委），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旅，每旅三团，依次为一至九团。粟裕是湖南会同县人，南昌起义的老战士，今年三十四岁。他在毛

泽东与蒋介石争天下的解放战争中所立下的赫赫战功,可以和林彪比美,是中共最有才能的军事将领之一。

日军在苏中的部队原是第十七师团的一个联队,分布于沿江和沿通扬运河的南通、如皋、靖江、泰兴、扬州,并沿大运河北伸至邵伯、高邮一线。有汪精卫政府所辖绥靖军第三、第六两个师,分驻于扬州、南通。一九四一年春,日军从江南调来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接替在苏中沿江和沿通扬运河的防务,旅团长是南浦襄吉少将,辖五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特种兵大队,共五千六百余人,武器装备好,有单独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但要占领整个苏中地区,兵力显然过于单薄。为弥补兵力之不足,日军在这一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加紧施行诱降、压降政策。诱降重要对象是泰州地区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和其弟弟、副总指挥李长江。

李明扬,字师广,江苏萧县人,老资格同盟会会员,曾任李烈钧的卫队长。抗战前任江苏省保安处长。抗战军兴,李收集地方团队及散兵游勇,成立鲁苏皖边区游击总队,受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指挥。令出自韩,而兵权在李,二人时起冲突,李有取韩而代之的野心。

一九三九年,陈毅曾写信给李明扬,用毛泽东、朱德名义向他致意,措词恳切,李明扬看了非常感动。曾对人夸口说:‘我在这里打坍了,到延安去,玉阶(朱德字)会招待我的。’从此开始了陈李之间的信使往还。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陈毅由惠浴宇、管文蔚陪同,三次到泰州和李氏兄弟见面。从缴获的日本战利品中挑选指挥刀一把赠李明扬,战马一匹赠李长江。二李待陈毅为上宾,在泰州城里贴出标语:‘欢迎四将军光临指导!’从此‘四将军’成为新四军的代号,江浙一带老百姓伸出四个手指头而不名,谈话对方即知道是说新四军如何如何。一九四〇年秋新四军与韩德勤黄桥决战,争取了二李中立,给专事反共路第八十九军和独立六旅歼灭性

打击，歼敌一万一千人。

陈毅听说汪精卫派缪斌游说李明扬走‘曲线救国’的道路，针对李明扬当时的复杂心理，赠李七绝二首。

(二)

白日西驰瞬覆东，
将军草上枉英雄。
汉家左袒千秋业，
大地横飞草上风。

(二)

折尽南枝尚北枝，
一江春水再来时。
难封李广扬名处，
马耳东风说与知。

第一首头一句是说日本将败。中国在日本的西边，日军侵华是‘白日西驰’，但他很快要被打得退回本土去，‘瞬复东’。第二句说，将军你要‘落草’当了汉奸卖国贼，能英雄几天呢？第三句‘汉家左袒’是历史典故，汉高祖死后，吕氏兄弟族人专权谋篡，太尉周勃入北军，令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所谓‘袒’就是把胳膊露出来。将士闻令，都脱掉了左边衣袖，表示兴刘灭吕之决心。这里借用这个典故，要李明扬向左靠，靠新四军和共产党，不要靠到汪精卫那边去。第四句是说日本人、汪精卫的势力长不了，是暂时的狂暴；像一阵风一样在大地横飞，风过去还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

第二首头一句说，我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受了损失，江南的一枝被折断了，但我在江北还有很大的力量。第二句意思是说我们

像‘春水再来’一样，还会发展起来。第三句又是一个典故。汉朝李广，统兵有方，深得军心，与匈奴七十战，功劳卓著。但为朝廷所忌，功名在其下者俱得封侯，而李广官不过九卿，有李广难封之说。李明扬字师广，诗中作巧妙讽喻：南京汪精卫政府没有你李明扬的位置。第四句‘马耳东风’，耳东乃一‘陈’字，意思是我陈毅把话告诉你，如果你不听，就算‘东风’吹‘马耳’吧。

李明扬反覆吟诵陈毅的诗文，悬崖勒马，未敢公开投敌。但他的弟弟李长江顽冥不化，一九四一年二月在泰州公开附逆，通电就任伪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划少奇于二月十八日颁布讨逆令，任命粟裕为讨逆军总指挥。奉命当天，粟部分三路出击，十九日连克姜堰、石家堡、苏陈庄，二十日攻克泰州城。三天作战，歼伪军三千人，并接受两团伪军反正。李长江翻墙逃脱。

苏中地区与日伪心脏地区南京、上海一带隔江相望，是汪精卫政府的‘卧塌之旁’，新四军在苏中的兴起，使日伪感受到巨人的威胁。早在一九四一年初，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就确定了以长江下游为起点，逐次推行‘清乡’方案。三月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自任委员长，伪江苏省主席，特务头子李士群为秘书长，对苏中地区进行了两次大扫荡。粟裕率部从城镇转入乡村，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依靠群众，创造了在平原水网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的宝贵经验，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一九四一年新四军第一师共作战三百三十四次，毙伤日伪军五千三百人，俘虏日伪军官兵三千八百九十人。

苏中大部分水网、半水网地区，相当一部分非舟楫不通。日伪军‘扫荡’这些地区使用汽船，每条河流都是他们的水上公路，行动比新四军的木船快得多。在‘敌进我退’的情况下，新四军难以摆脱日伪军的追击；如上岸转移，条条河流都成为运动的障碍，且田

梗道路狭窄，往往遭受敌人的火力杀伤。在‘敌退我追’的情况下，木船又赶不上汽船，难以歼敌。但民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发明了河流上构筑明坝、暗坝、交通坝、阻塞坝，新四军和游击队的木船船底平，吃水浅，从坝上一拖而过，畅行无阻，敌伪的汽轮吃水深，拖不过坝，只好搁浅，这就造成了打汽轮的机会’第一次反‘扫荡’作战击毁敌汽轮三十余艘。敌若弃船登陆，条条河流和水网稻田地又成为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抗日军民对陆上地形也进行了改造，变大桥为小桥，固定桥为活动桥，改大路为小路，直路为弯路，增加了敌人运动的困难和伏击敌人的机会。粟裕认为，对于战争中的地形条件，应该辩证地去看。水网地形其实是既有利又有弊，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加强对地形的改造，加强部队的适应性训练，就可以变对我不利为有利，变对敌有利为不利。

在主力部队的掩护下，苏中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军分区的划分和地委、行署的划分相一致。第一分区包括江都、高邮，宝应三县，司令员刘先胜，第一地委书记和第一专署专员惠浴宇；第二分区包括兴化、东台、台北、泰东四县，司令员管文蔚，政委钟明，第二地委书记章蕴（女），第二专署专员刘季平；第三分区包括泰兴、泰州、如西、靖江四县，司令员陈玉生，政委叶飞，第三地委书记韦一平，第三专署专员朱克靖；第四分区包括如东、如中、通中、通西、通海、海启六县，司令员季方，政委向明，第四地委书记向明，第四专署专员季强成。在日伪进攻最猖狂的时期，苏中抗日根据地仍控制全区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七，人口约百分之六十。全区有中共党员九千六百二十人，支部一千零一个，区委一百二十二个，县委十二个和县分委四个。在小共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二五’减租运动，农抗会、妇救会等各种群众组织也建立起来了。脱产民兵自卫队发展到近万人，不脱产民兵发展到十六万人，为长期坚持苏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为支持长期战争,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补充弹药,一九四二年三月新四军第一师成立了军工部,在设备、物资技术极为缺乏、落后的情况下,想了好多办法,除通过伪军关系花钱购买子弹外,还因陋就简建起了小型流动修械所、兵工厂,修理枪械、翻造子弹。派出采购人员秘密进入上海,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购买了无缝钢管和其他钢材、铸铁等物资,自行制造手榴弹、枪榴弹、地雷、迫击炮弹,还能制造少量迫击炮。在敌情严重时,派出部队在苏小近海海域开展游击战争进行掩护,把修理所、小兵工厂设在船上,在海上坚持生产;同时发展渔业、盐业生产,建设后方基地。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军吸取华北‘铁壁合围’的经验,出动一个旅团的兵力,配合伪军和特工人员,总共一万多人对苏中地区进行‘机动清乡’。先从四分区(南通、如皋、启东、海门)开始。七月上旬对三分区(靖江、泰兴地区)进行第二期‘清乡’。九月末对一分区(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进行第三期(清乡)。敌人首先实行水陆封锁,编造二百多里长的竹篱木栅,将清乡区和其它区域隔离开来;然后,增设据点、检问所等二百二十多个,使清乡区内每三、五里即有据点一处;接着派出日伪军和特务混合编组的清乡队,每日下乡挨村挨户进行搜查,户口登记,用烧、杀、活埋等惨无人道的手段强迫群众指认中共干部和新四军人员。这是坚持苏中抗日游击战争最困难的时期。粟裕的对策是以地方武装印民兵在‘清乡’区内就地坚持,捕杀敌特、汉奸,不断袭扰敌人。令各区主力部队适时跳到‘清乡’区外,向敌人的后方和敌人的弱点进攻。于是,各分区的攻势作战此伏彼起,互相策应,互相支援,数月中先后进行的较大战斗有石港攻坚战、海门袭击战、如西反击战、二写歼灭战等。在南通二写镇的夏家渡,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一举歼灭日军保田大队长以下一百一十名,迫使‘清剿’四分区的日伪军惶惶收兵。到十一月,日寇的所谓‘机动清乡’就被基本打破了。

一九四三年是冲破黎明前黑暗的时期。日军从苏南调来第六十一师团四个大队和部分宪兵，在伪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师配合下，以苏中二分区为重点，进行了春秋两次大‘扫荡’，每次出动兵力都在万人以上。苏中军民奋起反‘扫荡’。民兵广泛运用游击战术，在‘扫荡’之前积极破路、打坝、拆桥、藏粮、埋雷，‘扫荡’开始后主动袭击敌伪，配合主力作战。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选择适当时间、地点机动作战，袭击日伪后方，攻占薄弱据点，使日伪军的每次‘扫荡’都以失败而告终。

一年中，粟裕所部主力部队同日伪军作战六百二十四次，毙伤敌一万五千零五十四人，俘虏一万一千九百四十九人，缴获步枪三万零九百一十四支，轻重机枪二百九十四挺，掷弹筒六十二个，炮六十四门。农民自卫队与日伪作战二千八百五十五次，毙伤俘敌伪军四千一百零五人，缴获长短枪五百九十六支，机枪四挺，掷弹筒五个。反伪化斗争也获得了巨大成绩。如反保甲斗争，控制两面政权的乡保长，让他们慢编、乱编、假编，‘编好’后又动员群众把门户牌烧掉，然后到据点报告说是新四军来烧的。到九月中旬，伪强制编保甲、定门牌被迫陷于停顿。全区撕掉门牌七万多张，毁户口册五万多页，惩处伪保甲指导员五十三人。仅一、三分区七个县反伪化斗争，便动员了七十万以上的群众参加。粟裕在苏中领导创造的业绩，可以看作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人民战争的一个缩影。

在国民革命军序列中，新四军后面就是新五军。新五军军长孙殿英，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在河南林县临淇镇率部投降日寇，汪精卫继续让他当新五军军长，只在官衔前加上‘和平反共救国’六个字；在新乡汉奸报纸上发表了孙殿英拥护和平反共救国的通电。蒋介石闻讯，一不强调‘国家至上’，二不强调‘军令、政令的统一’，三不取消番号，四不通缉军长。最可骇怪者，重庆国民政府原定颁给孙殿英的三等云麾勋章，仍以政府令公布颁发，何应钦为

颁给系殿英勋章事专电驻洛阳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孙殿英投敌前受蒋鼎文统辖指挥):‘希将此事告其眷属,善为抚慰,并转达委座及弟惦念彼等之意。’蒋鼎文心领神会,对住在洛阳的孙的眷属和新五军留守人员照前供给,毫不歧视。蒋介石为何对这个投敌叛变的孙军长如此深恩厚泽?其中别有一段隐情。

孙殿英,字魁元,人称孙老殿。河南永城人。幼年娇惯放纵而失学,流氓赌棍出身。稍长,闯荡江湖,以赌为业,后又贩卖鸦片,制造金丹。在豫西参加庙会道,惯于装神弄鬼,说神赐太阿宝剑一把,持此可以逢凶化吉,纵横天下,笼络一帮道徒,成为庙会道的头目。一九二二年投入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半年后升任连长,收集豫西土匪、道徒、流氓,组成一个亦兵亦匪不伦不类的混合体,为害一方。一九二五年又投入镇嵩军第三十五师师长憨玉昆门下,混了个第五混成旅旅长。镇嵩军兴国民军作战失利,孙改投国民军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任旅长,旋升任师长。一九二五年秋率部由豫西往山东投张宗昌(山东军务督办),途经亳州,在商业繁盛的街市,公开抢掠。到济宁后,被张宗昌委任为第五师师长。一九二六年升任直鲁联军第十四军军长。一九二七年春参加对北伐军作战,后经何成浚疏通,归顺蒋介石,任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打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一九二八年,孙殿英率部开到河北蓟县马兰峪一带驻防,六月,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东陵盗宝案。他令工兵营长颢孙子瑜率部炸开慈禧和乾隆的坟墓,并劈开棺椁,将殉葬的全部珍宝古玩洗劫一空。一九二九年二月,孙殿英奉命移驻皖北蒙城,途经山东章邱县旧军镇,又抢了山东首富、北京‘八大祥’(瑞蚨祥、谦祥益等祥字号经营绸缎布疋的八家大商号)的店东孟家,金银财宝细软衣物共装了二百辆大车。一九三〇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孙待价而沽。冯阎为拉拢孙殿英,给以第四方面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的职位。张学良率东北军

人关助蒋，冯阎失败后，孙殿英投张，成为奉军第四十师师长。孙制造‘殿鹰牌’海洛英行销山西、河南、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又伪造河北省银行钞票数十万，劣迹昭彰，名声扫地。

一九三三年二月，孙率部参加热河抗战，在赤峰阻击日寇，相持七昼夜，部队损失虽大，但赢得抗日美名。冯玉祥想争取孙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蒋介石从中破坏，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孙率部西行，与宁夏马鸿逵发生利益冲突，在宁夏作战失利。这时蒋介石免去孙的本兼各职，孙殿英成了光棍一条。

‘七七事变’发生，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给孙殿英一个冀北民军司令的名义。孙嫌官小，一九三八年夏面见特务头子戴笠，与戴拈香拜把，行重购买官做。经戴引荐，蒋介石在武汉珞珈山别墅接见孙殿英。蒋介石说：‘你的情形戴科长向我说明白了，你好好为国出力，我已手令何部长扩编你的部队为一个暂编军的番号。’接见第二天，就发表孙殿英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军军长。

孙受命后，把队伍由冀南的武安、涉县拉到豫北林县一带，设司令部于临淇镇；成为太行山区游而不击、假抗日真反共的流氓军阀。太行山上还有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军部驻彭城镇；刘进的第二十七军，军部驻陵川。庞炳勋原为第四十军军长，后以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鹿还是河北省主席、河北省国民党主委）驻彭城镇，节制以上三个军。

一九四二年春，军统局少将高参文强在被派往新五军之前，戴笠交代任务说：‘校长曾经指示过，在中条山区沦陷后，又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不利形势下，太行山成为华北唯一的敌后根据地，必须稳稳地控制住孙、庞两部配合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才能确保山区为我所用。否则，必将被共党吃光。黄河以北无我军立足之地。’出发前，蒋介石又亲自接见，秘授机宜。文强带着电昼和秘码在西安胡宗南处和洛阳蒋鼎文处耽搁好几个月，辗转来到河南陵川第二

十四集团军总部，与军统驻太岳区头目乔家才约好了密码本，才到新五军驻扎地——林县 临淇镇与孙殿英见面，这时已是一九四二年的岁末了。

孙殿英知道文强是老蒋亲自派来的，执礼甚恭，侍候周到。一来二去，二人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一九四三年三月二日，二人一起到陵川庞炳勋总部去。由临淇镇到陵川，骑马要走两天，羊肠小道，向西越走越险。夜宿壶关窟窿岩，二人同居一室，夜不能寐，披衣坐在热炕上聊天。

孙殿英先打开话匣子，说：‘老弟，你知道我一生最红最得意的是啥时候？’

文强凑趣答道：‘听说你过去在西北军做过总指挥，又当过安徽省主席，在张汉卿指挥下当过长城抗战的民族英雄，现在身为新五军军长，总算是最红最得意的时候了。’孙殿英麻脸通红，得意地说：‘我告诉你，孙老殿一生最红最得意的时候，是当年包运五省鸦片烟。有了我的旗号，华北五省无关不通，无卡不破，连外国洋人的码头，我都打通了。’

‘你是怎样打通五省关卡畅行无阻的呢？’

‘钱可通神，有钱买得鬼推磨。包运五省鸦片时，我事先派出喽，逢关遇卡的调查，清他们的头脑，一物降一物，大虫吃细虫，先拣大头送钱送（烟）土，然后再分层赠送，大关小卡，一律都有。我们的巧妙，是不等人家开口，烟土未到，款先送到，这样打通了关卡，还交了朋友。’

‘你是怎样打通上海的洋码头呢？’‘上海洋码头的帮口紧，被黄金荣、杜月笙把持，租界上的烟赌娼三大财源，他们都包干了，没有我插足的余地。后来我通过天津一个青帮头子与黄金荣联络，先送名片一张向黄问好，黄回了一张名片，不久又汇来十万元，托我买烟土运往上海。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打通上海洋码头的机

会来了，把汇来的十万元全部汇还，掏出老本买了价值十万元的烟土，亲自给黄金荣送上门。从此，和黄金荣交上了朋友，我的烟土在上海洋码头畅行无阻，比在天津销得还多。

‘那东陵盗墓是怎么回事呢？’文强想更多地了解孙殿英。孙全不隐讳，但盗亦有道，他给盗墓披上了革命的名义：‘满清杀了我孙家祖宗三代，我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先生有同盟会、国民党，革满清的命。冯焕章有枪杆子逼宫。我的枪杆子没几条，只好砸皇陵，革死人的命。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尸体已化了，只留下骨头和辫子。陪葬的宝物不少，最宝贵的是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一百零八颗，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我在天津与雨农（按戴笠）见面时送给他作为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面上，剑柄上嵌了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或何部长，究竟雨农怎样处理的，由于怕皇陵案重发，不敢声张。慈禧太后的墓开后，墓堂不及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宝物多得数不清。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量一量大约有五升之多。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雨农代我赠给宋子文院长了。慈禧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呢，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以内可照见头发。这宝贝送给蒋夫人宋美龄了。听说这宝贝可使尸体不化，难怪慈禧的棺材劈开后，老佛爷好像在睡觉一样，只是见了风，脸上才发黑，衣服也有些上不得手。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之后，引起了孔祥熙部长夫妇眼红，雨农打电话告诉我，我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那把九龙宝剑，究竟赠给了委员长，还是何部长，到于今还不明白，有便请代我打听，但也不必当面去问雨农，不然，会显得太小气了，千万千万拜托拜托。

孙殿英对文强‘侃’这一通，是要这位重庆派来监督他的军统要员知道孙老殿在蒋宋孔以及他的顶头上司戴雨农心目中的价钱

和份量,让他在和孙打交道以及向重庆写报告时,知道轻重,并非真要‘拜托’察访九龙宝剑的下落。读者请想,不让文强当面问戴笠,难道去问蒋介石:孙殿英行贿送的宝剑您收到了没有?

说到这里,孙殿英谈锋一转,对蒋委员长有所评论。他先问:‘老弟,你知道蒋委员长一生做的是怎样的两件大事呢?你们是他的贴心人物,应该比我知道的透。’

文强没提防有这一问,讷讷地说:‘我还真被你这一问难住了。’

孙殿英道:‘把话说完,一钱不值,闭着眼睛想一想,你才会知道孙老殿所扯的是闯江湖一生得来的窍门呀!老弟,在我看来,蒋委员长整天整年所做的就是这样两件大事:第一,是怎样把钱挣来;第二,是怎样把钱撒出去。钱嘛,挣来不易,撒出去更不容易。我平日向亲信的人说过三句关紧的话: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还要撒钱撒得呱呱叫。有了钱不会撒。撒得不得其时,不得其人,不得其用,都不行。冯焕章、张汉卿、广西的李白、武汉不可一世的唐孟潇、广东王陈济棠等等,先先后后都垮了台,不都是蒋委员长的钱可通神,撒得好么?!哈哈,老弟,我说的对不对?我看从古到今的大人物,都是干的撒钱,然后才到耍人。人家说孔宋是财神,不过只是管管账,撒还是要有的本领的。我一生被人耍过,也耍过人。不是自家人,这些不三不四的话,是不好拉的。’

孙殿英投降日寇是经过蒋介石默许的。一九四三年二月底,在新乡附近的潞王坟车站召开了接洽投敌的所谓‘和平会议’。会议由日本人安田大佐主持,出席的有孙殿英的代表李国安,庞炳勋的代表王有正,汪精卫派来的代表许一揆。会议开了一整天,主要是拥护汪精卫的‘和平反共救国’的主张,接受汪精卫的加委和定期易帜。(换汪精卫政府那个青天白日满地红加黄布条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六个字的汉奸旗帜)问题。许一揆说:‘重庆蒋先生的抗

日救国与南京汪先生的和平救国，是走的同一条道路。’文强侦知此会详情，向蒋鼎文和戴笠作了详细报告。蒋介石的态度是总任之，无任何遏止、挽救这一投降危机的措施。

孙殿英投敌前给副军长康祥(刘峙的人)打一电报说：‘久与戴雨农所派之文强同志商洽，暂时屈就，图报将来。’孙殿英投降后，在新五军招牌的掩护下，由重庆、洛阳、西安等地派在敌后的特务组织都安然无事。这些特务组织，都照例与重庆、洛阳、西安通消息。例如中统局派到山上的特别情报组组长李育才，军统局派在山上的军事流动组组长李守静，平汉北段爆破总队总队长陈仙洲，太行游击支队司令侯子固，军统华北办事处突围被俘的部分人员，第一战区党政工作团团团长荆宪生等。这批特务头目，大说孙殿英的好话。重庆、洛阳、西安都有电报给孙殿英，表示‘嘉慰’和‘感谢’。此后，日汪蒋在太行山合流，共同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在会见中外记者参观团时充满义愤地说：

‘关于我们政府与我们统帅部赏罚颠倒一事，只要指出一件事就明白了：山西的决死队和华中的新四军，自始至终是英勇抗战的，但是这两部分军队，却曾被我们统帅部派遣大军袭击，并杀死与俘去成万的官兵，又下令通缉写审判其首长，以后便宣布他们为“叛军”；但是，国民党军队真正叛变了几十万，将级军官达六十七名之多，其中最著名者如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夏楚中、公秉藩、陈孝强、吴化文、李长江、王劲哉等都是上将与中将级人物，我们的政府与统帅部却不审判，不讨伐，不宣布骂叛军，反而和他们勾结，给予任务，要他们去进攻八路军、新四军与华南游击队。请你们看看，这是怎样一种颠倒过来的赏罚呀！抗日者有罪，叛国者无罪，请问怎样振奋士气。又怎能叫人心服呢？’

58 总结历史 正确路线两代表 团结全党 毛刘体制二十年

共产国际的解散,解除了套在毛泽东头上的紧箍咒,为其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开关了广阔的前景。同时,王明教条宗派集团失去了国际的保护,也为毛泽东彻底清算王明路线创造了条件。一九四三年九月上旬到十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在王明因病请假缺席的情况下批判了王明抗战初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认为这一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

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三、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主要是支持项英 对抗中央)。

十月十日,毛泽东提议中共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阶段。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参加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王明、康生、洛甫、陈云、邓发、博古、王稼祥、林伯渠等,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彭真、杨尚昆、陈伯达和胡乔木。

政治局委员们大多数都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作了全面系统的

发言。十二月十六日，洛甫发言批评博古，讲了‘三左’路线时期党内的一些情况。他说：

首先关于三条件的了解（按：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我们一开始即有区别。博古说，三条件只是宣传的口号，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我说，三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口号，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对于十九路军的政略，他完全采取开玩笑的态度，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我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但这种不同的意见，没有在正式的会议上发生公开的争论。虽是关于十九路军问题，我曾以在《斗争》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主张在这个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其他关于经济政策也曾经有过别的不同意见。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暗中是驳我的个别意见的。我总感觉到，他在无论什么问题上的总要比我‘左’些。我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在个别问题上也反对过‘左’，如关于劳动政策上的‘左’，同十九路军统一战线上的‘左’，党内斗争中的‘左’，在上海时我曾经反对过河北高阳蠡县暴动中的‘左’，但是我却从来没有一次见过博古反对过任何问题上的‘左’。相反的，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的‘右’打击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我现在反省，这主要的还是由于我的思想上基本上没有转变的关系，但他的态度摧残着一切新思想的生长这一事实，是无可怀疑的。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

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一九〇五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提出要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我现在反省起来，我同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在长征出发前即

合作起来的原因,除了我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外,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擊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关于博古如此纵容李德,信任李德、把他捧为‘太上皇’,这件空前奇案确有值得好好研究的必要。我在十九路军事变时,觉得李德把军队西调不对,广昌战斗中把军队硬拚受损失不对,其余我知道很少。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主义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对于我个人来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是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

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

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这个特殊的顺利环境，使我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到自己的严重错误。

王稼祥、周恩来等也都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对第三次‘左’倾路线进行了分析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认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者之所以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除国际原因外，还同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为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所迷惑有关。周恩来把自己作为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人物，一方面同教条主义者相区别，另一方面又同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相区别。而朱德、彭德怀等也都被归入这一类干部的行列。

这次会议的成果，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中表现出来，在这个发往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文件中指出：

要使干部及党员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九年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现在我党已成了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力量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经过七大，我党将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大与更高度的一

致，向着彻底战线敌人解放中国的大路迈进。

这时康生主持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从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起，到七月底止，由于大搞‘逼、供、信’，不到半个月搞出了两千多个‘特务’。仅举一个案例，可以看出康生的荒唐。他在动员大会上说：‘有个江英，原名叫蒋家英，她是蒋鼎文的女儿，她是怎么来到延安的？她来延安到底要干什么？我这里是有材料的。’会议一结束，江英就被停职反省，召开专门会议，七八个人围攻‘抢救’她。

江英的父亲是一九二二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当时还健在，任《西安日报》社社长。她本人一九三七年二月到延安，五月入党，不久与叶子龙结了婚。而叶子龙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康生乱点‘鸳鸯谱’，碰上个根红苗正气粗的江英，跳着脚地骂他胡说八道，并把状告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叫找李富春，江英又去见李富春。李富春说：‘小蒋，你的历史我是清楚的，你父亲我也是知道的，影都不沾的话你听他干什么？’就这样江英解脱了。

至于一般青年，被康生一点名就要受苦了。有个王尊，是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原在北平上学，因不满汉奸家庭，要求抗日，投向延安，未发现任何特务活动，就是因为是王克敏的侄女，被康生宣布为‘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把她比作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一直关押到一九四六年才结案平反。

一九四三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下令停止‘抢救’运动。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十月九日，毛泽东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一九四四年春，对绝大部分审干中受冤屈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赔礼道歉。由于纠正的及时，延安审干基本上是健康的。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作了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报

告,作为对三年来关于党史问题大讨论的总结。他说:

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另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愿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块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以上这两条,是毛泽东对中共党的建设的主要贡献。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极大的增强了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三‘左’路线时期跟着王明、博古的一些人,心悦诚服地转而拥戴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七中全会开的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会议,一直开了十一个月,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结束。出席会议的中共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康生、彭德怀、张闻天、邓发、陈云、秦邦意、李富春、吴玉章、杨尚昆、孔原、陈郁、李维汉;因病请假的中央委员有王稼祥、陈绍禹、凯丰、关向应;因外出工作而请假的有林伯渠、董必武。列席会议的有:彭真、高岗、贺龙、林彪、叶剑英、陈毅、刘伯承、聂荣臻、朱瑞、徐向前、谭政。在五月二十一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的七中全会主席团。同时决定,在七中全会开会期间,政治局、书记处停止开会。会议通过刘少奇关于以原政治局主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提议。会议决定成立四个起草委员会,分别起草政治报告、军事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任弼时为召集人,刘少奇、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参加起草工作。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和已在延安集中准备出席‘七大’的七百多名高级干部中进行了反复地讨论和修改,成为全党统一思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政治基础。《决议》深深地打上了毛泽东的印记。纵观中共成立以来至六届七中全会的历史,毛泽东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可以说是一贯正确的;而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一次右倾三次‘左’倾路线,确实给中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中共的高级干部经过三年整风学习,摆开历史文件,回顾各地斗争,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个决议,认为‘党在奋斗过的

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幸运，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决议》树立的第二个人是刘少奇，说他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地位，作为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就这样树起来了。这个毛刘体制维持了二十年。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第七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毛泽东准备在‘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及党章草案。四月二十日第八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朱德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在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任弼时转来王明给中共中央写的一封长信，检讨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同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三‘左’路线所作的结论。他在信中说：

过去由于以为四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并反对了罗章龙右派，实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办法，尤其是以为四中全会后中央苏区红军冲破了敌人的四次‘围剿’，因而认为四中全会是对党有很大功绩的会议（如我在国际十三次全会演讲中就是这样吹嘘四中全会的）。现在认识三中全会已纠正了立三路线错误，认识了四中全会既过分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如停止立三同志的政治局委员，罪过、贺昌同志中央委员等），和完全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如停止秋白同志的政治局委员），又很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的大多数同志（如不久后英勇牺牲的何孟雄同志等），而中央苏区红军冲破敌人的四次‘围剿’胜利，现在知道了不是执行四中全会错误路线的结果，而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实行其正确路线的结果。同时，知道了四中全会后派去各苏区的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机关不仅未能起

加强苏区领导和有利苏区工作的作用,相反的,闯下了许多滔天大祸!……因此,四中全会的确不仅是对党毫无功绩,而且是对党造成严重错误的会议,是使‘左’倾路线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开始的会议!同时,王明又有所辩白和保留,主要意见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失利,不应把账挂在他的头上,因他不在国内,又不足党内的第一把手。他说:我应该声明,虽然四中全会前后我主要地是作江苏省委书记和代表中央管理江苏工作;虽然四中全会决议及其後的中央五月九日决议和九月二十日决议等,都非由我所起草;虽然我对四中全会的筹备工作并未参加,以及对四中全会本身(如选举及处分问题)及其以后的组织问题(如派中央代表和中央代表机构到各地等)都没有提出遇任何具体的意见;但是,我是反立三路线及反三中全会领导同志的所谓调和路线的有‘左’倾路线错误的小册子底主要写作者;是在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及政治局的委员,对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在政治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对四中全会本身及一九三一年九月底以前的中央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决定都曾经同意;所以同意中央的指示,我对四中全会至九月底以前这一时期(九月二十五日我即动身赴苏联了)的中央错误,应负主要的责任。

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期间,虽然在共产国际领导的教育和帮助下:……在有些政策问题方面与当时当权的其他教条主义同志有些原则的分歧;……在遵义会议前我并未能经过国际去帮助中央改变其错误的路线;所以我对这一时期中央领导所犯的各种错误,仍负有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驻国际代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应负的责任。

至于我在武汉时期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问题,因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此时来不及自我学习和自我反省,此后当遵循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尽可能地去学习和研究抗战时期的一切思想和策略问题,

以便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纠正自己的错误。

我之所以犯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的错误，也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基础，完全不懂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全不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以及简直不懂国际经验和民族传统的结果。尤其是由于没有群众工作经验和没有群众观点，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出身的劣根性作祟的结果。

王明的检讨标志着毛泽东反对教条宗派集团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泽东的态度是：只要王明认了错，和解是可能的，将来共事也是可能的。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礼堂召开了‘七大’的预备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七中全会向大会提出的下列提案：

(一)大会主席团名单：

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林伯渠 彭德怀 康
生 陈 云 陈 毅 贺 龙 徐向前 高 岗 张闻天 彭
真 任弼时

(二)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名单：

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三)大会正副秘书长名单：

秘书长：任弼时 副秘书长：李富春

(四)大会议事日程：

- 1.毛泽东的政治报告。
- 2.朱德的军事报告。
- 3.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

4. 选举中央委员会。

(五)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

彭 真 林 彪 刘伯承 陈 毅 李富春 高 岗 林
枫 叶剑英 林伯渠 贺 龙 罗贵波 周士第 聂荣臻 刘澜
涛 薄一波 王从吾 朱 瑞 黄春圃 张鼎丞 刘 晓 陈铁
铮 陈光

主 任：彭 真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下午五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两面鲜红的党旗交叉在主席台正面墙上，以红旗为背景，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一条横贯主席台的红底黄字横幅是：‘在毛泽东旗帜下胜利前进！’大会正式代表五百四十四名，候补代表二百零八名，共七百五十二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一百二十万党员。日共领导人冈野进，朝鲜革命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朴一禹，应邀参加了大会。

大会的主旋律是赞颂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与此相反相成的是对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进一步揭露和批评。

任弼时在开幕词中说：

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同志，不仅成了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了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

刘少奇在五月十四日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

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的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

就是我们党和现在中国革命的 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们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提到了 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 确的完整的明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

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之 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 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 的精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在和国内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斗争中,同时又是在和党内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和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投降路线、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进行原则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我们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

朱德在四月二十五日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说：

同志们！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来和全中国人民在一起，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不但已锻炼出了一条极坚强的政治路线，能够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而且已经锻炼出了一条极坚强的军事路线，能够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这条军事路线，如政治路线一样，其代表人物就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为着争取抗战的胜利，我在这大会上特别号召同志们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一如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政治、经济、文化学说一样，所有部队、军事学校、军事训练班，都必须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为基本教本，作为教育的灵魂，以便于在思想上加强武装自己战胜敌人。

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开始了喊‘万岁！’

刘少奇在报告最后高呼：‘我们党的领袖、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舵师——毛泽东同志万岁！’

朱德在报告的最后高呼：‘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周恩来在大会演说的最后高呼：‘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毛泽东同志万岁！’

他们三位一带头，全党、全军、全民（解放区）就喊开了。中国是有几亿农民的国度，是有数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度。在广大农民心目中，喊‘万岁’标志着‘真龙天子’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朝代的开始。这种传统心理不能不反映到中共党内来。

五月三日，秦邦宪在大会作了检讨发言，诚恳认错悔罪。他概述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历史，最后说：

我是与‘左’倾路线共始终的人。它的全部过程，它的萌芽、形

成、发展、破产及转化为右倾投降主义的每一阶段，我都是参加了的。内战时期的每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及抗战初期右倾投降路线，我都是主要负责人之一。我的错误决不是一本小册子上的路线错误，我应负的责任决不是因为是在领导机关中的一员而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而是因为创造、发挥、贯彻这一错误路线而使党使革命遭受空前重大的损失，而应负全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责任。

在这个时期，白区中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是反对刘少奇同志的正确路线；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

我感到‘罪孽深重，百身莫赎’。很痛苦。痛苦在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损失，特别是想到许多同志在错误路线下牺牲了生命，受到打击。听了毛主席说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自己更是难过。一切包袱都可以丢，但自己的罪恶不能忘，今后要脱胎换骨，重新做起，脱小资产阶级之胎，换教条主义之骨。

六月九日，大会举行第十九次会议，选举正式中央委员。在十日第二十次会议上按得票多少顺序公布选举结果。

正式中央委员四十四人：

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任弼时	林伯渠	林彪	董必武
陈云	徐向前	关向应	陈潭秋	高岗	李富春	饶漱石
李立三	罗荣桓	康生	彭真	王若飞	张云逸	贺龙
陈毅	周恩来	刘伯承	郑位三	张闻天	蔡畅	邓小平
陆定一	曾山	叶剑英	聂荣臻	彭德怀	邓子恢	吴玉章
林枫	滕代达	张鼎丞	李先念	徐特立	谭震林	薄一波

波 陈绍禹 秦邦宪

在选举中委之前，毛泽东在五月二十四日第十六次会议上讲话，动员代表们选举李立三、陈绍禹、秦邦宪等，认为这些‘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承认错误，大会还可以选’。同时要注意‘照顾各方面，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要使‘七大’选出的中央成为缺陷最少的中央。’十日公布正式中委选举结果，毛泽东一看，王稼祥得票未过半数，未当选。又专门出来讲了一番话：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浦、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名下，但决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毛泽东讲完话，代表们即投票，这回王稼祥当选了。

候补中央委员选出三十三人，按得票多少排列是：

廖承志	王稼祥	陈伯达	黄克诚	王首道	黎玉	邓颖超
陈少敏	刘晓	谭政	程子华	刘长胜	粟裕	王震
宋任穷	张际春	云泽	(乌兰夫)	赵振声	王维舟	万

毅 古大存 曾镜冰 陈 郁 马明芳 吕正操 罗瑞卿 刘子久
张宗逊 陈 赓 王从吾 习仲勋 萧劲光 刘澜涛

六月十一日是大会最后一次会议。全部议程都已进行完毕。毛泽东致闭幕词，朱德、吴玉章、徐特立三位元老发表演讲，全体代表唱国际歌，大会胜利闭幕。

六月十九日举行七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三人：

毛泽东、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陈 云 康
生 高 岗 彭 真 董必武 林伯渠 张闻天 彭德怀
选举毛泽东、朱 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

选举任弼时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李富春为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

八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毛泽东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增补陈 云、彭真为候补书记；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军委组成人员如下：

委员十二人：

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陈 毅 聂荣臻
贺 龙 徐向前 刘伯承 林 彪 叶剑英

主 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总参谋长：彭德怀(兼)

副总参谋长：叶剑英

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兼)

副主任：程子华

军委秘书长：杨尚昆

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

59 两党相争 赫尔利来华作说客 三强力定 斯大林贪利背友朋

一九四四年四月，侵华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打通了从中国东北直达越南海防的大陆交通线，摧毁了衡阳、桂林、柳州、遂川沿线重镇和设在这些地方的美军空军基地。

与豫湘桂战场国民党军一溃千里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在衡阳失守三天前（八月五日），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指挥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和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加上美军一个步兵族，在美军第十三航空队的掩护下，以打通中印公路为目的，由印度东部的英帕尔，穿越丛山峻岭和热带森林，一举攻占日军第十八师团盘踞的缅北重镇密支那，与由怒江东岸进至腾冲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十四军（军长方天）会师，迫使日军由缅北战线撤退。

史迪威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史迪威自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即蒋介石的参谋长）以来，在两个问题上与蒋介石发生了矛盾。一是史迪威直接向蒋提出：中国军队中师以上高级将领和司令部全部撤销，由他直接编组、训练、指挥、补给中国达远征军部队，直接对日作战。连远征军司令官罗卓英、副司令官杜聿明这些蒋的心腹爱将也在史迪威的压力

下从印度调回国内了。蒋介石要拿美式装备只好隐忍不发。廖耀湘师后来扩建成为新六军，孙立人师后来扩建成新一军，成为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二。

二是史迪威从美国的利益出发，主张经美国的武器装备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广东、广西、西南的非蒋嫡系部队，理由是这些部队比蒋的嫡系能打仗，要想在亚洲早日打败日本，应发挥这些部队的作用。而蒋介石认为让共产党的部队和其他非嫡系部队壮大起来，抗战胜利了也没有意义，反对武装非嫡系部队，特别坚决反对武装八路军和新四军。

蒋介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靠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提携。由于罗斯福提议他才当上了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由于罗斯福的提议，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他出席开罗会议，中国成为四强之一，而蒋介石则成了‘四强之一’的领袖。蒋介石容忍史迪威，是因为不敢得罪罗斯福。但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对蒋政权的‘腐败、混乱、失职’多有批评。罗斯福确信只有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才能扭转中国战场的不利局面。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紧急建议’，要求由史迪威统帅所有中国军队，包括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内，并同样供应武器和粮食。美国远东政策的着眼点‘是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少的美国人生命的牺牲，打败日本。’蒋介石采取了表面应允实际拖延不办的东方式外交，第二天回一电报，要罗斯福派一‘富有远大政治见解’的全权代表来重度商量。八月十八日，罗斯福派赫尔利作为总统私人代表来华。

对于赫尔利到中国的使命和他应当执行的政策，美国政府有如下规定：‘（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做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三）使蒋介石与美国司令官间的关系和谐；（四）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五）为击败日本计，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

赫尔利来华履新之前,先去了一趟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想摸一下苏联对中国 的态度,特别是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对蒋介石与毛泽东,苏联到底支持哪一方?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发表了四点意见:

(一)所谓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不是共产党;

(二)苏联政府并不在(再)支持中国共产党;

(三)苏联不原中国有纷争或内战;

(四)苏联不满中国对在华苏联公民的待遇,但坦白希望在中国有日趋密切的和和睦的关系

这四点 是赫尔利归纳整理向美国国务院汇报的(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一五八页),多少年也没有公布过,其准确性是可信的。

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怀着极其虔诚的心情,遥望克里姆林宫红星的时候,莫洛托夫竟然说 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不是共产党’,并宣布苏联政府‘不再支持中国共产党’。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王明向斯大林告密状的结果。一九四二年五月,共产国际派来的驻延安联络员 兼塔斯社随军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实际上是斯大林的情报人员,他带来一部电台,可以直接和莫斯科通报。

他在延安同王明保持密切的联系,完全站在王明的立场上观察延安的一切。据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自述:‘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有两位同志——他们是苏联的军事记者,来看望我。我问他们,可不可以通过他们的电台向季米特洛夫同志发一份电报,他们同意了。当时我的病非重重。我想,这是我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请求他们同共产国际领导上报告,在我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回到延安以后,在最近这五年里,毛泽东犯了

许多原则性的政治错误和罪行，特别是这一年多来他搞的所谓“整风运动”实质上是反列宁主义、反共、反苏和反党的运动。最后我问了一下，是否有可能派一架飞机来，把我接到莫斯科去治病，那样，我还可以同时向共产国际的领导详细叙述毛泽东的罪行。（见该书中文本第四十页）电报发出去了，并于二月份收到了季米特洛夫的回电。负有了解中共情况使命的弗拉基米洛夫自己发回多少次报告则不得而知了，但他既带来了电台和报告情况是无疑的。

根据这些情报，斯大林一直把王明看作是莫斯科的真传门生，而把毛泽东看作是一个‘托铁式’的民族主义者。但因忙于对法西斯德国作战，他鞭长莫及，管不了延安的事情。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反对批评王明，表现了斯大林和苏共对中共党内斗争所持的立场。

了解了这一历史背景，莫洛托夫对赫尔利所表示的态度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一九四四年九月六日，赫尔利和他的随员美国陆军骑兵上校马堪和一名上士文书到达重庆，住在两路日军政部招待所。第二天到曾家岩蒋介石的官邸拜会了蒋介石。在座的有行政院长宋子文和代表蒋与赫尔利保持联系的中将参谋杜建时。

赫尔利说：‘罗斯福总统派我来华的任务是援助中国早日战胜日本，维护中国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中国领袖的地位。’他说到‘领袖’二字，特别把声音提高，把右臂举起，像宣誓的样子。

蒋介石听了满面笑容，频频颌首，表示感谢，然后说：‘我们十分欢迎你。你们的帮助，是会解决中国困难的。’顿了一顿，蒋补充说：‘以后我们要谈的事情很多，请你和宋子文联系。如想会我，我们可以随时见面。’蒋对赫尔利有良好的印象。

八月二十七日和九月十八日，罗斯福又来两封电报，敦促蒋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九月十八日这封电报由史迪威向蒋转交。史迪威感谢总统的支持，兴冲冲地拿着电报去见蒋。那

天是星期六，蒋在重庆南岸黄山别墅度周末，约了赫尔利上山，史迪威是不速之客。在客厅坐定之后，史迪威说了几句很不自然的客气话，就从口袋里把总统给蒋介石的电报掏出来交给了中将参军朱世明，朱展读电稿，见下面已有中文译文，就递给了蒋介石。蒋把电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罗斯福对蒋介石不积极支援缅北作战，抽调远征军回国，多有微词，特别是又要求蒋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说不这样将引起灾难性后果（按：指豫湘桂战场国军大溃败）。看完电报，蒋表情严肃，一言不发，抬头看着天花板，就这样冷场了五六分钟，双方谁也不说话。史迪威沉不住气，对朱世明：‘你问问委员长有什么指示没有？’朱译给蒋介石听，蒋冷若冰霜，看都不看史迪威。又僵持一会儿，史迪威说：‘我办公厅桌上堆着很高的公文等待我批阅，委员长如没有什么指示，我就回去了。’这时赫尔利插话说：‘事情需要考虑，我们告辞吧。’杜建时把赫的话译给蒋听，蒋转向赫尔利，勉强一笑说：‘好吧，我们回头再见。’史迪威受此冷落，面色很难看，悻悻然下山而去。

九月二十五日蒋介石面见赫尔利，说史迪威对蒋某人不尊重，不能委派史迪威担负统帅中国全部军队的重大责任，而且要免去他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请转告罗斯福总统将史迪威调离中国战区，宁可不要美援，也不能同史迪威合作。蒋介石以攻为守，拒绝交出军队指挥权。

赫尔利向罗斯福迅速发报，建议说，不能再支持史迪威了，否则，‘将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连同失去中国。’罗斯福只好让步，十月十九日，任命魏德迈代替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并不再提要蒋交出指挥权一事。

十月三十一日，魏德迈到重庆。十一月一日，在赫尔利陪同下前往蒋的官邸晋见蒋介石。杜建时作翻译。魏德迈以美军部下对长官的礼节对待蒋介石，必恭必敬地说：‘我是委员长的参谋，参谋

的任务是忠实地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把委员长的命令变成有效的实际行动，而且使这一切行动都适合委员长的企图。’又说：‘史迪威过去的一切计划，大致我都清楚，实施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了解，过几天以后，等我把全盘情况搞清楚，再向委员长请示办法。’魏德迈一反史迪威趾高气扬的作风，给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最后才说：‘经我的要求，美国政府派索尔登来华接替史迪威驻印军总指挥的职务。索尔登是很能务实的人，希望委员长同意。’蒋气顺心平，随口答说：‘很好，有机会希望见见面。’

一九四四年十月，赫尔利根据美国政府的指令，开始了‘调解’国共两党关系的工作。他拟了一个调解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的‘五点协议草案’，经蒋介石修改后报罗斯福批准，十月二十八日形成了以下的五条：

为着协定的基础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

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赫尔利方案的言妙道在于：共产党交出军队，向蒋介石换取合法地位。

为了游说中共领导人，经过马堪上校到延安的预先安排，赫尔利于十一月七日飞往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来到机场迎接了这位美国总统特使。从八日到十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就他带来的‘协定的基础’进行了四次会谈。毛泽东代表中共方面提出了两点原则性的不同意见：

一是改组政府问题。所谓遵循‘政府民主程序’一语含混不清，首先应当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改变现在不民主的、腐败的政府。可是蒋介石对此历来反对，总是想拖，如果有人向他提出改组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他便一巴掌打回去。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与扩大，使国民政府有崩溃的危险。对于这一危险，不只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外国朋友，如许多外国记者，都是感觉到的。

二是改组军队问题。第四项中说要改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恐怕主要是蒋介石自己写的。应当改组的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而是那些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当改组哪个军队。至于第二项中说要共产党的军队‘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也是片面的。难道像皖南事变时解散新四军的命令也要服从吗？要说服从，一切军队都应服从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讨论中，赫尔利曾为国民党、蒋介石辩护；因美国舆论界九月二十八日提出‘中国形势甚为严重，亟需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故对中共方面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的要求也无由反对。他认为有把握说服蒋介石成立一个多党制的内阁，换取对中共军队的控制权，只要把共产党手里的军队拿过来，蒋介石作些政治上的让步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这说明赫尔利不了解中国国

情,也不了解蒋介石。由于这个原故,赫尔利同意中共方面修改他的‘五点协议草案’。九日会谈一开始,赫尔利就说:‘这个方案是正确的,我将尽一切力量使蒋接受。’这个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修改形成的‘延安协定草案’,正式标题是《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内容仍是五条: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狱)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述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此政府及其军事委员长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中国国民政府主席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 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 日

北美合众国大总统代表 赫尔利

中化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 日

赫尔利仔细地研究了中共修改的五条,认为按照美国观点是可以接受的。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十二时四十五分在王家坪一间最讲究的房子里,赫尔利和毛泽东分别签了字;只有蒋介石那个职位下面空着,由赫尔利将文件带回重庆请蒋签字认可。

毛泽东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重庆),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

赫尔利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全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

毛泽东说:‘假如罗斯福总统愿意在白宫对我们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予以接待,我和周恩来可随时一人或一同前去华盛顿与总统举行试探性会谈。我有一封信,请转交罗斯福总统。’赫尔利接过信件,表示极愿意传达这样的信息。

吃过午饭,赫尔利与周恩来一起登机飞往重庆。毛泽东和朱德等到延安飞机场送行。赫尔利上了飞机,还按外交上的礼仪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中国延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先生

我的亲爱的主席:

我感谢你的光辉的合作与领导。

这种合作与领导表现在你率领你的政党提出协定上,这一协

定你已授权于我带给蒋介石主席。我同样感谢你要我转交美国总统的卓绝的信件。

阁下，请信赖我对于你用以解决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的智慧和热忱的品质，深感愉快。你的工作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的胜利的贡献。

这一光辉的合作精神，不仅将继续于战争的胜利中，而且将继续于建立持久和平与重建民主中国的时期中，这是我们的恳切愿望。

美国总统代表

赫尔利

美国陆军少将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赫尔利回到重庆，十八日由宋子文陪同向蒋介石报告延安之行，兴冲冲地说：‘我给委员长带来了好消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是蒋介石对延安修改的、美国人认为可以接受的五条断然否决了。蒋介石向赫尔利解释说：‘中国不比美国，可以玩弄资产阶级民主。你同共产党达成的协议，在华盛顿或者伦敦，作为解决类似问题方案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中国做不通，如果接受延安提出的草案，意味着我本人和我们党的完全失败。’赫尔利这才明白蒋介石统治地位的虚弱，他经不起像组织联合政府这种策略上的变动所引起的政治上的震荡，怕弄假成真，不等把共产党的军队骗到手，他自己的统治就可能垮台。第二天接着谈，蒋介石提出三条‘反建议’请赫尔利转交延安方面。主要内容是：承认中共合法；中共将一切军队转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管辖；中共派出将领参加军事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对于蒋介石在政府民主化方面一点事情也不做，赤裸裸地要中共交出军队，连赫尔利也觉得理亏。他

给罗斯福的一封述职电报中说：‘倘谈判失败，错在国民党。’但他搁置了毛泽东致罗斯福的信件。

二十二日，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希望毛润之先生，朱玉阶先生来重庆做事。周恩来重申本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表示‘愿为它奋斗到底’。但又解释说：‘民主联合政府是指政府的性质，并非要改国民政府的名称。’蒋介石接茬说：‘好，我们革命党就是为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周恩来不失礼仪但词锋甚硬地说：‘我应该声明，对三民主义的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该调换和改组的。’由于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国共两党的谈判又陷入僵局。

二十九日，美驻华大使高思离任回国，美国政府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因为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的代表在延安协定上签了字，而蒋介石又断然拒绝这个协定，罗斯福改变赫尔利的身份，就等于否定了美国总统代表在延安协定上的签字。赫尔利也就理直气壮地背叛了延安协定，帮助蒋介石压共产党屈服。

十二月二日，周恩来拜会赫尔利，告以毛泽东的最后态度：（一）国民党方面的对案同五条协定距离太远，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是解决目前时局的关键，既不同意，则无法挽回时局；（二）国民党态度至今未变；（三）我党中央将召开会议，命我回延安参加。十二月七日周恩来、董必武回延安。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赫尔利致函毛泽东，说国民政府准备作出重要的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来重庆谈判。二十四日，周恩来飞抵重庆。当晚，宋子文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宴请周恩来，赫尔利、张治中、王世杰陪席。席间，宋子文说拟成立一个有中共和其他党

派参加的行政委员会,这个行政委员会附属在行政院,类似战时内阁。周恩来说:‘今天国民党主张在行政院下设立一个新机构,但是整个系统不变。这个系统,就是一党专政,新机构属于行政院,行政院属国防最高委员会管辖,国防最高委员会又属国民党中常委管辖。蒋主席也不是人民选举的,是国民党中党委推选的。这一套系统不改变,我们也无法参加政府。’并表示,只有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才能挽救时局。二十五日,赫尔利又约见周恩来,劝说中共参加战时内阁性质的新机构;关于整编中共军队的问题,他的新方案是成立有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各一人参加的整编委员会,整编后任命一位美国军官任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周恩来断然拒绝了赫尔利的意见。

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说:‘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把在此之前周恩来同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等刚谈出一点头绪的召开党派会议和改组政府的问题一口气吹掉了。

十四日,周恩来在特园宴请于右任、孙科、左舜生、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钧、李璜、冷■、王昆仑、屈武、陶行知、杨杰、陈铭枢、郭沫若、邓初民、谭平山、鲜英、黄炎培等党派领袖和社会名流,向他们报告了最近国共两党谈判的经过,揭露了这次谈判破裂的真相。十五日,周恩来发表离渝前的声明;十六日,飞返延安。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雅尔塔会议的消息。自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之后,经过一年的作战,到一九四五年初整个国际形势已经大变,法西斯德国正面临全面崩溃的命运,日本也已日暮途穷,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国取得彻底胜利而结束的前景已确定无疑了。在这个重要时候,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三强’首脑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了关于分割德国,联合国中大国的否决权的

使用,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苏波和德波疆界,波兰政府的组成和南斯拉夫问题。会后发表了克里米亚声明。

公开声明之外,还有一个秘密协定。二月八日下午和十日下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驻苏大使哈里曼和译员波伦的陪同下,单独与斯大林大元帅和莫洛托夫外长会谈。罗斯福说,根据美国军方估计,如果美国独立进行太平洋战争,打败日本尚需付出一百万人的伤亡和一年半的时间,如果苏联能及早参加对日作战,美英对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可以照顾,允许苏联恢复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前沙俄帝国在中国的权益。斯大林见利忘义,背叛了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原则,经过讨价还价,与罗斯福订立了《雅尔塔协定》。根据美国战后公布的档案材料,其全文如下: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其条件为: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一九〇四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大国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须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帮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斯大林 罗斯福 邱吉尔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

签约后的两个月，即四月十一日，罗斯福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杜鲁门指示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通知了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未作公开表态。

赫尔利认为，毛泽东、周恩来顽强不就范，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仍相信苏联支持他们。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不会改变，除非苏联与中国签订条约，条约中，苏联应允支持国民政府。当中国共产党相信苏联不支持他们，……则他们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六四页）

在赫尔利的敦促下，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在随员蒋经国和卜道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陪同下于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到了莫斯科，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和外长莫洛托夫举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经过了九次会议，八月十四日，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夕，《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宋子文用承认《雅尔塔协定》全部条文的代价，换取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第一款，‘苏联政府同意向中国提供道义的、军事的和其他物质的援助，这些援助全部地交给中国国民政府。’双方都明白，签订这个条约不是为了对付日本，而是为了向中共‘亮相’。

杜鲁门总统为了敦促斯大林执行《雅尔塔协定》，曾派特使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霍普金斯向杜鲁门报告：‘斯大林毅然决然地说，他将尽一切努力促进中国在蒋介石

领导下的统一。他并且说,这种领导在战后还应当继续保持下去,因为没有其他的人像他那样强大。他特别提到没有哪个共产党领袖拥有足够的力量来统一中国。尽管他对蒋委员长有许多保留的意见,但他仍建议支持这位蒋委员长。’

这就是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所面临的形势。美苏两强他都靠不上。特别是斯大林,用不支持中共的保证换取了在满洲的特权。毛泽东在国际社会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但他不气馁。毛泽东不仰仗外人的鼻息。他把目光转向了国民,特别是四万万农民,这是他心目中的上帝。

60 夺城占地 蒋介石十指摊开 大略雄才 毛泽东双拳收紧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美、英、中三国领袖发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八月六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九日，美军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九日，苏联三个方面军越过国境线，向驻在所谓‘满洲国’的日本关东军发动远东战役。

日本关东军辖第一、第三、第十七方面军和独立第四军，共三十一个师团，十三个旅团，约九十七万人，号称百万关东军。配有火炮五千余门，坦克一百六十辆飞机一千八百架。另有伪满和伪蒙军约二十万人。由关东军总司令三山乙山大将统一指挥。

苏联投入远东战役的兵力为八十一个师，四十六个旅，共一百五十八万余人。配有火炮二万六千余门，坦克和自动火炮五千五百余辆，飞机五千三百余架，舰艇六百七十余艘，对日本关东军在数量上、质量上和作战物资储备上，都占巨大的优势。为了领导对日作战，成立了远东苏军总部，任命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总司令。

苏军的战役计划是：使用三个方面军，从西、东、北三个方向向中国东北纵深实施向心突击，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切断关东军与关内日军及在朝鲜日军之音的联系，全歼关东军主力，占领中国东北全境。战役的主要突击方向选在日军设防薄弱的西部。以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后贝加尔方面军（辖四个合成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一个骑兵机械化集群）共三十七个师，二十个旅，约六十五万四千人，由蒙古东部塔木察格布拉克地区，向沈阳、长春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同时，实施两个辅助突击：一个向张家口、承德方向；一个向海拉尔、齐齐哈尔方向。

从八月九日至十四日，苏军在三个方向上推进了五十至五百公里，完成了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日军的分割包围。出动四百八十架次轰炸机在大批歼击机掩护下，轰炸日本集结地域和交通枢纽。日军除在海拉尔、同江、富锦、孙吴、瑷珲等筑垒对地域及牡丹江附近阵地上进行抵抗外，整个战线基本上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八月十五日中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十七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三山乙山大将向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提出停战建议。十八日，关东军总司令部令部队向当地苏军洽降。远东战役苏军毙伤俘日军六十八万余人，其中有建制完整的二十二个师团、十二个旅团不战而降。

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一举歼灭日本百万关东军，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援助，大大加速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

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放弃东北之后，满洲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团结散落在各地的东北军爱国将士和其他爱国力量，在群众的掩护和支持下坚持了长期的游击战争。满洲地下党基本上是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进行工作的。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出现抗日高潮的时候，东北抗日

联军发展到十二个军。四万五千余人,其编制序列是:

第一路军 总指挥 杨靖宇
政治委员 魏拯民
辖:第一方面军 军长 周旭东
第二方面军 军长 金日成(后成为朝鲜领袖)
第三方面军 军长 曹亚范
第二路军 总指挥 周保中
第四军 军长 李延平
第五军 军长 柴世荣
第七军 军长 崔石泉(即崔庸健,后为朝鲜国家领导人)
第八军 军长 谢文东(后叛变)
第十军 军长 汪雅臣
第三路军 总指挥 张寿笈(李兆麟)
政治委员 冯仲云
第三军 军长 赵尚志
第六军 军长 戴洪宾
第九军 军长 顾华堂(后叛变)
第十一军 军长 祁致中

随着抗日联军的壮大,游击区域扩大了,在几乎半个以上满洲的地方,除城市和交通要点以外农村山林均为抗联控制,广大农民以人力物力支援抗日游击战争,使日寇殖民地化政策的推行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伪满洲国修建京图铁路、图佳铁路、林虎铁路、绥佳铁路的计划数度推迟,中东路各屡遭破坏袭击。金日成部队三过鸭绿江、图们江,突入朝鲜咸镜北道,斩将搴旗,激发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使日寇意外震惊。

日本把满洲作为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和准后方,下大力经营之。一九三八年驻满洲的正规师团增至五十万人,对抗日联军进行残酷的‘扫荡’。抗联将士为了民族解放事业,断指裂肤,铺冰盖雪,吃树皮草根代替粮食,用泥土水草里治伤痕,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但终因敌人强大,形势急剧恶化。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三日,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吉林蒙江县(今靖宇县)三道崴子被日军包围,壮烈殉国。日军不解杨靖宇何以在长期断粮的情况下仍能坚持斗争,对烈士的遗体进行了解剖。在场的日本军官看到死者的胃里竟是一团一团棉絮的时候,惊讶不已。在场的中国人,包括当了汉奸的伪警察都哭了。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三十五岁。第一方面军军长周旭东,第三方面军军长曹亚范也相继战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一路军政治委员魏拯民大病之后,兼以冻馁,死于牡丹岭,遗体被日寇搜获,斩首悬于敦化。至一九四二年底,抗联将士剩下不足千人,多为各级干部和骨干中坚分子。

一九四二年八月,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在书记崔石泉的主持下讨论决定,以保存干部以待将来为目的,将抗联基干人员转移到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去;成立A野营;另一部在沃罗什诺夫城郊成立B野营。另外编了十三个不分队,每队十人至十五人,选斗争最坚定、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党员为队长,分散于满洲各地坚持斗争。这些小分队由周保中、张寿钱(李兆麟)、金日成直接领导。

一九四五年五月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以后周保中在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普尔卡耶夫的领导下率领A营B营的抗联人员参加了远东战役。抗联中的朝鲜同志一百七十余人,在金日成、崔石泉(庸健)领导下回国参加解放朝鲜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宋子文去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蒋介石即预料到苏联出兵东北,日本必败,于是便忙于蒋日汪合流,

以对付共产党。因为他的精锐主力都在西南大后方和越南、缅甸，日本如很快投降，他的部队鞭长莫及，赶不到受降前线。蒋与智囊们策划一番，想出了三条办法：一是迅速收编那些‘曲线救国’的伪军，给他们国军的名义，原地维持秩序；二是下令给朱德，叫他的部队原地待命，不得受降；三是请美国从空中和海上帮助连兵，赶到前线受降。

八月初他派遣军令部次长 斌为华北宣抚使，携带着盖有关防印信的空白委任状，飞到南郑 汉中行营，办理华北伪军反正事宜。熊斌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又当过西北军的参谋长，与 庞炳勋、张岚峰等熟悉。他一到汉中，就与西北军老官员丁述本、傅正舜、张允荣等商量进行办法。曾设想要丁述本坐飞机到商邱张岚峰防地跳伞，因丁体胖，高血压，又从来不曾坐过飞机，恐有闪失。耽误了几天。后在傅正舜陪到西安见军统少将高参文强，请求协助进行。熊斌对文强说：‘这次任务艰巨，在汉中耽误了十多天，不料日本投降这样快。委员长 指示，今日是我们与共产党争天下的时候，只要将华北地区百多万伪军控制到手，就可以打击和牵制八路军的行动，这是争天下的一着要棋。戴局长要我到西安找你，希望能找到最迅速的办法与伪军将领取得联络。’稍停，拿出他携带着的空白委任状，指点着说：‘委员长 委派我为华北宣抚使，一切以华北宣抚使署对外。可以从权发表伪军将领的临时头衔，大大小小一律称为选遣军。这不但为汉奸摘了帽子，也可以利用他们去打共产党。委员长真是英明，过去人家不愿听‘曲线救国’这个名词，而今有验，非高瞻远瞩，焉能有此。希望念观兄（按：文强的字）多多协助。’

文强头一个人选就想到了孙殿英。因为在孙殿英的军部有他的情报组长李守静带着电台长驻 那里。他立即给李守静发报，任命孙殿英为暂编第三纵队司令，下面两个师长刘月亭、康祥 为总队

司令；并发表驻柘城的张岚峰为暂编第四纵队司令，下面三个师长为总队司令。令孙 星夜将电报抄送给本人。因恐各伪军将领疑心由孙老殿转达的任命难以作数，熊斌填好委任状，派出专人星夜兼程送达。并约定，等孙殿英等收到委任状后，即在广播中通电反正。孙 殿英迅速回电：‘已奉到电谕，克日在防次就职视事，以报钧命。分送各将领的电令，已专 人星夜送达中。’熊斌立即向蒋介石发电报功。

根据陈诚的主意，凡伪军军级单位，给纵队名义；师的单位，给总队名义，并冠以‘暂编’二字，以与正规国军相区别。经熊斌呈报蒋介石批准的华北伪军头目，仅‘纵队司令’一级的就有六个之多，他们是孙殿英、孙良诚、门致中，张岚峰、吴化文、刘祖笙等；‘总队司令’二十七人，还有一些独立团长。收编伪军总人数为二十三万八千九百九十六人。

八月十五日，蒋介石任命的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公开向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陈公博（按：汪精卫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在日本病死后，由陈公博代理伪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向最高统帅部建议：他负责保收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并说他在这地区的三十六万军队负责保证将国都与上海并杭州完整地归还到政府的手里。’汪精卫政府就这样与蒋介石政府合流了。

八月十日，朱德总司令在延安发布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谍，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附近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政权送出通谍，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后，率队反政听候编遣，逾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蒋介石听到延安电台广播这样的消息,在第二天,即十一日给朱德下了一道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就是说不许八路军、新四军向敌伪前进,不许八路军、新四军收缴敌伪武装。

命令是下了,但是延安不会执行,蒋介石是在意料之中的。于是迅速实施第三条:召见魏德迈,请美国帮助练兵。魏德迈立即报告杜鲁门总统。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花南和花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保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七十二页)根据杜鲁门的意图,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只能向蒋介石的军队投降。于是,冈村宁次命令参谋处长金井武夫到湖南芷江,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洽投降事宜。何应钦的参谋长萧毅于八月二十九日提出第四号备忘录,令金井转知冈村宁次。其内容是:

甲、中国境内之非法武装组织,擅自向日军追求收缴武器,在蒋委员长或何总司令指定之国军接收前,应负责作有效之防御。

乙、根据现有股匪攻开封、天津、郑州等地,该地日军对于现有各该地之庞炳勳、门致中等部,采取旁观态度,未事防卫。关于此事,目前应特别注意,并应依中字第四号备忘录,迅即将指定之日军,集中于上述股匪进攻之地方及其他各地,作有效之防卫。如果各地或中字第四号备忘录所列之其他各地,在蒋委员长或何总司令指定之国军接受前,为股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受部队。这里所谓‘非法武装组织’、‘股匪’,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魏德迈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集中中国与印度境内所有美国

军用飞机与民用飞机,空运国民党军抢占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各大城市,从八月十六日起,抢运驻湖南芷江的新六军至南京,控制日本侵略军总部及冈村宁次,监督他绝对执行只向蒋军投降的命令。九月四日,空运驻柳州的第三方面军汤恩伯总部和第九十四军到上海。然后又空运第九十二到北平。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夜,聂荣臻部十三个团,以夺取天津为目标,对北迄杨村,南至唐官屯一线之日伪军同时发起进攻。第三十八团曾攻入天津西火车站,第二十七团攻占了杨柳表,第十分区两个团攻占杨村、北仓、第八分区两个团攻克天津南的陈官屯、唐官屯,天津已陷入晋察冀部队的包围之中。冈村宁次依据第四号备忘录下令驻津日军‘坚守天津’,反击‘股匪’。蒋介石立刻召见魏德迈,请美国派兵占领天津、塘沽及秦皇岛一带地区,以防万一落入共产党之手。美海军立即在秦皇岛登陆。并以军舰三十余艘从越南海防将第五十二军运至秦皇岛。又于十一月一日由上海把第十三军空运秦皇岛。聂荣臻部停止进攻天津后,美军以飞机援助第五十二军和第十三军攻占山海关,着手抢占东北。十二月下旬,美国海军从上海运送新六军,布广东运送新一军经秦皇岛登陆进军东北。尔后又从越南海防把第五十三、第六十、第九十三海军运东北。第七十一军和几个交警总队也从海上经秦皇岛进入东北,秦皇岛和葫芦岛从此成为补给东北国民党军的主要港口。

毛泽东见夺取大城市条件尚不成熟,反应极为灵敏。八月二十二日电示中共各地党委和各军区:‘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占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二十六日又发出指示:今后我军应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路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兵力占领广大乡村和中小城镇。这一改变有极大的意义在全国造成了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格局。

就在蒋介石面向全国,眼观八方,调兵遣将,夺城占地,将兵力分得四散,十个指头全部摊开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将主力集中起来,暗暗握紧了拳头。

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在毛泽东的巨大身影下，他的作用长期不为世人所知。其实，刘少奇也是一代人杰。在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刘作为代主席在延安主持工作，他提出和制定了抗战胜利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贯彻实行，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发出了《日寇投降后的时局指示》：‘东三省为中苏条约约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可不去则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热察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内）。’

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

二十九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我去东三省工作不要直接与红军接洽》的党内指示给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晋冀鲁豫分局和华中局。电报指出：苏联‘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三省’，但中苏条约也有许多可供我们利用的地方，如条约明确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予伟大之同情’。中央认为，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无基础，现在道路还不通，他要派军队去尚有许多困难，且苏联红军将在三个月内全部撤回，因此，‘我当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指示还要求，部队要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的名义进入东三省；进入东北的干部和部队‘不要声张’，亦不要坐火车进占大城市，要走小路去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块市，在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大大地放手发展；对于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亦须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对红军可进行非下式的接洽，将情报通知红军，凡是‘为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同时中央命令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迅速也发，山东干部和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

九月十五日，在刘少奇主持下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

中央东北局，以彭真、陈云、伍修权、程子华、林枫为委员，彭真为书记。同时决定抽调能组建一百个团的各级干部，要班、排、连、营、团长及各级政治干部、后勤干部，包括司务长和炊事班长，配备齐全，将来有了兵就能把部队组建起来。彭真、陈云、伍修权当天起程赴东北。各地抽调去东北的干部和部队，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陆续抽调，陆续出发，参加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斗争。

九月十七日，在延安的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将《为力争东北控制热察之战略计划及工作布置》意见报告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强调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说明傅作义、胡宗南部完全可能进入平津，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按期制重兵。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并须屯集至少五万军队在冀东，以备苏联红军撤退时我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计划调集十万至十五万军队到冀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且对东北至热河的控制均将没有保障。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计划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和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花不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还提出，立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李富春等去工作；并组织军事指挥机关，建议从陈毅、林彪、徐向前三人中抽一人去负责。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覆延安，同意刘、朱、任的战略计划。决定将长江以南部队主力撤退到江北，缩短战线，握紧拳头，既有力量向东北发展，又有力向南防御。为此战略目的，拟同国民党谈判时，主动让步，撤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根据地。在人事上决定：陈毅、饶漱石率新四军主力到山东接替山东部队防务；罗荣桓、萧华率山东部队去东北；林彪去热河；谭震林、邓子恢留在华中坚持。

刘少奇接电后，连夜起草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的指示》。一九八一年刘少奇平反后编辑也出《刘少奇选集》时此文标题改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说他反对‘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张投降国民党，纯属颠倒功过是非。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伪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红军在十二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察两省将更早撤退),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

(二)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此,特作下列部署,望坚决执行之。

(甲)晋察冀(除冀东外)和晋绥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张家口之进攻及将来胡宗南由北平向张家口之可能的进攻,坚决打击傅、马及其他进攻之顽军,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乙)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

(丙)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丁)成立冀热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戊)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三万兵力在十一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己)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庚)关于各区具体部署另定。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提出和制定,说明在毛泽东周围是一批超一流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蒋介石统帅部滚滚诸公与这批人才比较起来,则显得大为逊色。

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准备夺取整个天下的时候,蒋介石帐下的大员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忙什么呢?他们昏昏然、纷纷然,忙于‘劫收’,大闹‘五子登科’,抢房子、车子、女子、金子、位子。从重庆派到上海的第一个大员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树。他一到上海,即设立机关,派出爪牙,接收寇产逆产,连姨太太都接收了。许多汉奸都赞他的门路,贡献赃物以取得谅解。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吴绍树在一个月內,接收一千余幢洋房,八九百辆汽车,黄金在一万条以上(单是汪政府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内弟叶耀先一人就送给他一千条),其他珠宝无算。

一九四六年四月六日《新民报》发表张恨水七绝《重庆客》三首,专给劫收大员画像的,诗曰:

(一)

先持汉节驻华堂,再结轻车返故乡。随后金珠收拾尽,一群粉黛拜冠裳。

(二)

恢复幽燕十六州,壶浆箪食遍街头。谁知汉室中兴业,流语民间是劫收。

(三)

昂首天外亦豪哉,掠过黄河万事哀。解得难民恩怨在,逢人不敢道飞来。

蒋介石派到上海受降的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在华懋公寓接见日本驻上海的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中将,汤开口说:‘将军!你要顾到你的地位,我们是战胜者,对于投降的日本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应该说:“我命令你”。’美国人一提醒,常败将军汤恩伯才敛容正色重新发言。但谈完话,美国人离去之后,汤又对

松井说：‘早知这样，我们应该预选演习一下。’汤恩伯在八年抗战中寸功未立，一个好仗也没打过。河南老百姓有谚语谓：‘河南四殃，水旱蝗汤。’把汤恩伯及其部队和水灾、旱灾、蝗灾并列。他从上海到重庆，利用军车走私发财，倒卖瑞士手表，法国香水和英国毛织品，又从长江上游带回鸦片，介给上海的青帮。豫湘桂战役他从河南退到柳州，把运送士兵和武器的八百辆卡车，帛出六百辆来送送军官的老婆孩子和掠夺的财物，任士兵自溃。如今胜利了，他回到了上海，自己也觉得底气不足，不像个胜利者的样子，和松井演了那么一齣戏，贻笑于美国人。

吴绍澍和汤恩伯可以作为蒋介石属下文臣武将的代表人物。岳武穆说：文官不要钱，武将不怕死。蒋介石帐不是文官要钱又怕死，武将怕死又要钱，贪污腐败，脱离人民。尽管他有四百三十万军队，有美国以及苏联的支持，在他巨大的优势下面已潜藏着失败的危机了。在当时，只有毛泽东和他的占友们对战胜蒋介石抱有绝对的信心。